

形塑「新人」： 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

余敏玲 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100)

致 謝

一本書的完成，除了作者自己的投入與耕耘之外，往往還有許多外在協力的促成，本書也不例外。這裡首先要感謝陳永發和翟志成，兩位不但慷慨地分享許多關於中共歷史的獨到見解，還經常指出問題，督促思考，獲益之多實非筆墨能夠形容。同時，本書各章節在撰寫和修改期間，承蒙楊貞德、羅久蓉、沈松僑、沈志華、楊奎松、呂妙芬、王友琴、李萌、吳迪、劉小萌、王超華、賀照田、Konstantin Tertintskii、Aleksandr Pantrov、S. C. M. Paine，惠賜寶貴意見，由衷感謝；對許雪姬、游鑑明、劉素芬、張淑雅的關切書稿進度，亦申謝忱。

此外，我要感謝近史所圖書館為讀者提供的最佳服務，以及美國伊利諾州大學香檳城校區 Slavic Service Reference 的 Jan Adamczyk 給予非常多資訊方面的協助，每次都是有求必應。這裡也要謝謝助理黃詩文、吳閔芳、施純純的幫忙，更要感謝張珍琳、王中奇及林明宜的細心、耐心地編輯和校對。最後要感謝家人的支持，尤其是帶給我許多歡笑的槿皮。

本書得到國科會專書寫作計畫的資助，特此致謝。第一、二、六、七章乃是經過修改與增補的新版本，原文曾經發表於期刊和專書論文集如下：(1)〈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到中國〉，《新史學》，卷 12 期 4 (2002 年 12 月)，頁 25-74；(2)〈女人扶犁？女拖拉機手在中

國)，陳永發主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 171-206；(3) “Labor Is Glorious: Model Laborer in the PRC,” in Thomas Bernstein and Hua-Yu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231-258; (4) “From Two Camps to Three Worlds: The Party Worldview in PRC Textbooks (1949-1966),” *China Quarterly*, vol. 215 (Sept. 2013), pp. 682-702.

目次

導論	1
一、文獻回顧與議題旨要	6
二、新人理念的起源與發展	18
三、宣傳運作與中蘇關係	30
四、章節安排	41
第一章 蘇聯新人保爾·柯察金與典型中國化	45
一、保爾的誕生與傳入中國	47
二、保爾精神特質與在中國的宣傳	55
三、保爾典型中國化及其「正統」精神的捍衛	65
四、民間的解讀	73
五、小結	83
第二章 民族/愛國主義為首——教科書中的國際觀	85
一、從改編、改寫到定於一尊	88
二、蘇聯與美國兩大陣營的對立	96
三、三個世界的逐漸形成	105
四、小結	119
第三章 黨國至上——群眾歌曲中的愛國觀	125
一、蘇聯群眾歌曲的起源和傳入中國	127

	二、高唱黨國大我	134
	三、抒情歌曲表現愛國主義	146
	四、中蘇群眾歌曲與民間反應	159
	五、小 結	169
第四章	階級鬥爭為綱——電影中的敵我觀	173
	一、輸入蘇聯電影中的敵人類型	177
	二、美帝、國民黨特務與地主：1949-1954	186
	三、大小「胡風集團」與右派分子：1955-1957	195
	四、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與蛻化分子：1958-1965	206
	五、小 結	218
第五章	集體為重——電影中的愛情觀	223
	一、個人走向集體：五四到延安時期	225
	二、先公後私：中共建國到反右運動	230
	三、邁向大公無私：大躍進到文革	242
	四、小 結	256
第六章	「勞動光榮」——勞動模範與勞動觀	261
	一、蘇聯的斯塔漢諾夫運動與傳入中國	262
	二、1950年代勞動模範的評選和塑造	271
	三、勞動模範的宣傳和勞模運動產生的問題	282
	四、中蘇宣傳之差異與文革後的勞模討論	293
	五、小 結	305
第七章	「男女都一樣」——女拖拉機手與性別觀	307
	一、中共建國初期的女拖拉機手宣傳與典型	308

二、婦女勞動實踐與機耕化發展	316
三、女拖拉機手的工作與實際生活	328
四、小 結	339
結 論	343
一、中蘇新人的差異及斯大林模式的討論	343
二、宣傳新人的成效與民間的解讀	351
三、新人與黨的角色	355
參考書目	363
索 引	391

導 論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¹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隆重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廣場上的群眾頓時歡聲雷動。對台上的黨政領導和台下的群眾而言，這不但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正式確立，也意味著一個新民主主義新社會的誕生，開始邁向人類歷史發展更進步的社會主義新階段。在中共官方掌握所有的詮釋權之下，1949年以前的一切都是「舊」的，都是壞的、落後的或反動的；植基於封建主義、封建階級和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各種「舊」觀念及「舊」行為模式等等，都應該剷除。反之，1949年以後的一切都是「新」的，都是好的、先進的或革命的，都應該扶植。其後中共的各種出版品之中，舉目可見「舊中國」和「新中國」的種種「高度落差」的對照。

根據這樣的思維邏輯，「新社會」、「新中國」治下人民的言行和

¹ 毛澤東，〈七律二首 送瘟神（1958年7月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冊7，頁298。

人生觀必須迥異於「舊社會」；「舊社會」過來的人需要改造，「新社會」生長的人需要塑造。中共宣傳的「新人」乃是所有人民應該見「賢」思齊的最高標準。² 中共意欲改造的對象，如民族資產階級、有親美或有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等，應該以新人作為學習和效法的標竿人物。出生或成長在紅旗之下者，需要以中共宣傳的新人標準來塑造。

改造舊人或塑造新人的方法很多，性質上大致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是特別發起的各種政治運動，如鎮反、肅反、反右；另一是一般性的勸說、宣傳、教育等。就成效而言，兩者有相輔相成之處，也有各擅勝場之點。政治運動可以收到殺雞儆猴之效，³ 但考量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新人理念的傳播主要還是靠宣傳，特別是對社會大眾的宣傳。目前相關的研究，多著重於思想改造、鎮反、肅反、反右等政治運動，鮮少從塑造一般百姓正確思想的宣傳著手；而且即使是思想改造，除了各種強硬的手段外，也包括勸說、宣傳與教育。本書的研究正希望彌補這些方面的不足。

不過，本書重點不在於宣傳的組織機構與人員或宣傳機制與模式，而在於中共透過不同媒介宣傳所要傳達的官方訊息，希望從現代國家做為意識形態機器的角色立論，透過政治、外交、社會和文化的多重視角，檢視中共宣傳新人的內容與本質，並且說明蘇聯經驗在其

² 本書闡析的「新人」乃是體現共產黨意識形態，而非一般意義的新人。為行文方便起見，以下「新人」均省略引號。

³ 誠如 Carol S. Lilly 對南斯拉夫研究指出，共產黨會毫不猶豫地用武力來馴訓新人，但是他們也知道共產主義的最後目標，只有建立在志願地合作和大多數人的參與，才能成功。因此，說服變成了黨的活動的關鍵成分。Carol S. Lilly, *Power and Persuasion: Ideology and Rhetoric in Communist Yugoslavia, 1944-1953*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1).

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書的焦點正是阿圖舍 (Louis Althusser, 1918-1990) 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阿圖舍認為國家權力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運作：一是強制性和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如政府、行政機構、警察、法庭、監獄，這些均具有暴力功能。一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司法、政治、工會、傳播、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貌似溫和，實際上是對個體進行體制化規訓和合法化「生產」的領地，也是一套社會調控的工具。阿圖舍認為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有「形塑」(constituting) 具體個人成為「主體」(subject) 的功能，將具體的個人呼叫 (hail) 或建構 (interpellate) 成具體的「主體」。這種呼叫或建構就是一種徵召 (recruit) 或改造 (transform) 個人的方式。如此成就的新人，在心理上可能自覺是歷史的行動者，但事實上是在特定的論述下建構出來的非自主性的「主體」。⁴ 中共塑造新人觀的宣傳，正好符合阿圖舍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將個人形塑成為「主體」；這也是規訓個人、調控社會的一種工具。新人的出現亦即「主體」形塑的完成。

毛澤東〈送瘟神〉一詩中「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舜堯」，即指共產黨意識形態下的新人。⁵ 新人的核心價值以馬列主義為基礎，崇

⁴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p. 127-186.

⁵ 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到要打掉官風時，突然冒出一句：「過去有句話『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你們難道不願意當聖人嗎？不願意當聖人當個賢人也好。」毛澤東，〈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1月2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7，頁44，註4。毛不但自己要當豪傑，也期望中國人民成為新的「聖賢豪傑」。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173-174。

尚勞動（體力勞動為要），強調階級鬥爭，具有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思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全心全意投入社會主義建設和解放人類的理想，摒除個人主義，強調集體至上。在實踐上則是以黨國意志為依歸，亦即黨性的培養。中共藉著營塑新人來鞏固其政權的合法性，也只有成為新人的百姓才能是新中國的一員，或是文革前夕、文革時期所謂的「革命的接班人」。

從二十一世紀回頭看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對當時所發生的種種狂熱的政治活動與人民狂熱的參與，常常令局外人感到不可思議。為何在大躍進時期，人們會有違常理地找出自家所有金屬製品，用最簡陋的方式大煉鋼鐵，積極地投入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為何文革時期會出現許多令人難以理解的語言暴力和肢體暴力，用來對待自己的師長和親友？我們常常聽到的一個答案是，因為當時相信毛主席、相信黨的領導。這不免令人需要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會相信黨和毛主席到這種近乎迷信、宗教狂熱的地步？大多數的老百姓，特別是居住在城市的人，對於黨的話語和政策如此耳熟能詳，他們是如何得知這些訊息？這些問題的答案錯綜複雜，牽涉的面向極廣，本書試圖提供一個新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那就是中共建國以來大力宣傳新人的理念與典型。

毛時代新人理念的極端體現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本書藉著梳理中共的宣傳，追溯紅衛兵言行的來源，探討這些生長於紅旗下的青少年，他們十七年來所受的養成教育的內容是什麼？他們的人生觀是如何形成的？探討中共的營塑與宣傳新人，雖然不可能解釋紅衛兵的一切言行，但可以提供一個理解他們激進言行的背後成因，同時也有助於進一步了解中共冀圖建設的新社會面貌，以及毛澤東政權的本質。

集體主義是新人價值的一個關鍵詞。毛澤東時代的宣傳深遠地影

響了幾乎所有的中國人，文化大革命將中共所鼓吹的唯集體是從的觀念推展到極致。許多人在經歷了這個浩劫之後，對共產主義理想喪失信仰，並開始反思毛時代以來只重集體、忽略個人所引發的種種弊端。中共在告別革命之後，引入市場經濟，特別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大陸開始進入「全民皆商」的新階段。這些年來甚至有人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縮寫 PRC 改寫成 People's Republic of Capitalism。⁶ 大陸百姓現階段普遍地過度重視自我、拜物拜金的思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乃是對毛澤東時代宣傳新人價值觀的反動。⁷ 我們不免要問，這種走向另一極端的人生價值觀的源頭是什麼？鑑往知來，因此更有必要探究中共建國以來是如何宣傳集體為重的思想，如何塑造新人。

再者，中共自建黨伊始，即大量複製蘇共的種種經驗，甚至一度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因此，蘇聯經驗成為研究中共施政不可忽視的參照對象。中共援用蘇聯的小說、歌曲、電影、勞動模範和女拖拉機手典型，宣傳新人要有黨國至上、集體為重、勞動光榮、男女平等的觀念。然而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新人的特質與宣傳內容也發生變化。倘若缺乏對蘇聯經驗和中蘇關係變遷的了解，很難理解毛時代宣傳內容為何不斷發生變化。所以中共對蘇聯經驗從引以為師到引以為鑑的轉變，亦是本書的一個重點。

⁶ 美國資深新聞主播 Ted Koppel 製作四集關於當代中國的紀錄片，片名就叫做 *People's Republic of Capitalism* (2008)。

⁷ 周志強，〈拜物主義催生的「精神分裂」〉，《人民論壇》，2013 年第 3 期，頁 30-31；許紀霖，〈大我的消解：現代中國個人主義思潮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輯刊》，2009 年第 1 期，頁 18-21。

一、文獻回顧與議題旨要

政治學者 Harold D. Lasswell 首開宣傳研究風氣之先。他認為宣傳會成為動員群眾的主要工具，乃是因為它比暴力、賄賂和其他手段的成本相對要低。現代工業社會需要更多的宣傳，作為社會控制最基本的手段；極權國家比起民主國家更是操縱宣傳的能手。⁸ 不過，越來越多的政治學者指出：宣傳也是民主社會的特色。民主政府不能單靠理性和抽象的自由主義訴求民意，有效運用宣傳來說服百姓也很重要。他們認為不論是強調集體的極權國家，或是強調個人的西方民主國家，宣傳都成為操縱或塑造輿論的重要手段，並沒有那麼明顯的分野；民主社會的資訊和媒體也會被有權有錢的利益團體誤用或濫用。民主和極權國家宣傳的不同在於一個為商業利益，一個為政權；兩者的差別是數量，而非質量。⁹

事實上，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宣傳遠不如極權國家來得多，商業廣告反而比較像極權國家的政治宣傳，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是無孔不入。極權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宣傳還是有差別，主要在於性質、社會環境與後果的不同。極權國家的宣傳絕大多數以政治性為主，整個社會處於孤立隔絕的狀態，由官方宣傳單方面的價值觀。而民主國家的宣傳則是商業和政治性兼有，社會是開放、多元的，因此不同立場者可以宣揚各自認可的價值；宣傳沒有強制性，多半是提供一個選擇的機

⁸ Harold Lasswell, "Propaganda," in Robert Jackall, ed., *Propagand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

⁹ Kevin Robins, Frank Webster, Michael Pickering, "Propaganda, Inform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in Jeremy Hawthorn, ed., *Propaganda, Persuasion and Polemic*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87), pp. 6-7, 15-16.

會。其次，在民主或極權國家宣傳都可以鋪天蓋地，如潮水般地湧向人民，但在民主國家，人們可以不理會商業或選舉宣傳，不必擔心不良後果。在極權國家則不然，忽略或沒有實行政治宣傳所傳播的訊息與價值觀，很可能出現政治不正確的言行而必須面臨嚴重後果。毛澤東時代的宣傳新人觀就具有極權國家的特點：第一，宣傳內容緊貼著時局或政策的變化而轉變。第二，中共的宣傳內容所隱含的價值觀往往二元對立，黑白分明，必須在幾乎完全封閉的環境，阻絕外界資訊的情況下，才可能如鐘擺一般，由一端擺向另一端，依然奏效。本書將在各章闡析這些現象。

關於共產黨塑造新人的著作，最早見於西方人士實地參觀訪問蘇聯所撰寫的略帶遊記性質的考察。Fullop-Miller 於 1920 年代中期在蘇聯看到了處於原始階段的「集體人」(collective man)，認為他們將會取代個人成為未來的主宰。這種集體人誕生於十月革命，是相信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唯物論者。布爾什維克黨試圖展示，救世的真正道路在於透過外在力量組織起來的集體人，而組織這個外在力量者就是黨。Fullop-Miller 也看到了黨利用教育來灌輸黨的意識形態，宣傳也是其中的一種方式。Alt 夫婦在 1956 年夏天第一次前往蘇聯，他們觀察到蘇聯的教育不限於家庭和學校，教育的方式多種，也包括宣傳。書中敘述的形塑新蘇聯人，聚焦於兒童的教養。理想的蘇聯公民必須行動積極、有目標，做人要誠實、有勇氣，遇到困難不退縮，堅持到底，忠於國家，有紀律地執行所交付的任務。¹⁰ 全書中只有在論及少先隊

¹⁰ “collective man” 的另一稱謂是 “mass man,” 作者常將 collective man 和 mass man 交換使用。Rene Fullop-Miller,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本書 1926 年先以德文版問世；Herschel and Edith Alt, *The New Soviet Man: His Upbringing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New York:

和共青團時才提到黨的角色，這可能是因為書的重點是兒童教育，而且時值蘇共二十大之後，比起斯大林時期，黨的角色相對地勢弱。

倘若排除蘇聯的官方論述不計，直到 1980 年代方見蘇聯異議人士處理這個議題，如 Mikhail Heller 主張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新蘇聯人典型。他們的共同點是均為建造新世界的工具，基本特色為都是國家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集體中的一個成員；個人臣屬於集體，反抗當局者必須接受再改造。他認為蘇聯當局使用行刑隊式的強迫與暴力來製造新人，利用秘密警察逮捕與流放等手段，大量殺人，作為鎮懾且深刻的教育方式。他以史家身分撰述本書，卻常帶有許多情緒性的評論，對新蘇聯人持負面看法。¹¹ 蘇聯解體之後，更為嚴謹的著作陸續出現。傑出的先鋒之作是 Stephen Kotkin 的 *Magnetic Mountain*。他以居住在鋼鐵城馬可尼托格斯克 (Magnitogorsk) 的工人及其家庭為個案，說明蘇聯官方利用各種運動與動員，灌輸勞動光榮和階級觀念等，馬列主義是整個人生觀的基礎。黨員與非黨員對破壞工廠生產者要保持警戒心，對政治、黨的活動和生產都要積極，要相信黨會領導全國邁向勝利，要崇拜斯大林。工人若能努力工作，提高產額，且有好的工作倫理，便有機會成為勞動模範，得到許多物質利益；對於階級出身不好的人必須實行勞動改造，使他們能繼續為建設社會主義有所貢獻。這種學習官方話語，培養人們新的社會認同，就是塑造新蘇聯人的過程。人們對於官方話語、新社會認同，出於恐懼或自身利益，或兩者皆有，至少在表面上盡可能做到符合官方的要求，但也有

Bookman Associates, 1964).

¹¹ Mikhail Heller, *Cogs in the Soviet Wheel: The Formation of Soviet Man*, trans. David Floyd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88).

可能公開說一套，私下是另一套話語。¹²

後起之秀 Jochen Hellbeck 和 Orlando Figes 分別借重日記和口述訪問，聚焦於蘇聯人民如何回應官方利用學校教育、各種宣傳活動和政治活動，甚至政治迫害，來灌輸黨所提倡的蘇聯價值及塑造新蘇聯人。兩人的歧異在於 Hellbeck 強調價值的內化，Figes 更重視價值的外鑠。¹³ 而 Lilya Kaganovsky 的書則是利用電影和文學，從性別差異和身體的角度分析新蘇聯人。她認為蘇聯官方宣傳的理想男性形象實際上有兩種：第一種是眾人熟知的、非常陽光健壯、四肢健全、具有雄糾糾氣概的新蘇聯男性；第二種是為了獻身社會主義建設、黨國和領袖等理想而導致肢體殘障的英雄人物。這兩種類型同時存在，殘廢型新人的重要性絕不亞於陽光健康型的新人。¹⁴ 就宣傳而言，蘇聯當局對後者的著墨更多，以他們為社會主義的犧牲致殘來凸顯他們的偉大。

至於近代中國的新人討論，學者研究主題以晚清梁啟超的新民說為最多，¹⁵ 民國時期以 Robert Culp 的研究最為突出。Culp 詳細地敘

¹²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chapter 5; Lewis H. Siegelbaum, *Stakhano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SSR, 1935-194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一書，雖然也觸及新蘇聯人的問題，但是範圍比較狹窄，集中在勞動模範的工作，不像 Kotkin 涉及他們的生活來得全面。

¹³ 兩人歧異產生的主要與其所倚重的資料有密切關係。Jochen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¹⁴ Lilya Kaganovsky, *How the Soviet Man Was UnMade: Cultural Fantasy and Male Subjectivity under Stali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8).

¹⁵ 如 Hao Chang (張灝),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黃克武,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再版)。

述百姓如何從清朝的臣民轉換成民國的國民／公民的過程，強調晚清到中共建國以後在公德、公益的延續性。¹⁶ 關於 1949 年以後的新人研究，最初見於 Charles Price Ridley, Paul H. B. Godwin, & Dennis J. Doolin 利用小學教科書和逃出大陸人士的口述訪問，呈現毛澤東時代的模範公民價值觀。不過，該書沒有討論中共政策對價值變化所造成的衝擊，讀者往往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其後更重要的著作是 Donald J. Munro (孟旦) 的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¹⁷ 他從人性理論的角度，探討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高層領導對人性的看法，以及自 1940 年代至毛過世後中共對人進行改造的措施。全書內容涉及甚廣，強調正反典型人物的對照及其所起的作用。作者認為毛澤東深諳人性，故能改造有成。這個論點固然沒錯，不過倘若缺乏有效的組織動員和宣傳，也不可能達到目的，而這是 Munro 沒有處理的部分。最近的主要新作是程映紅的專著，以全球的視野來討論新人，有其獨到之處。全書闡析啟蒙運動以來所發展出的新人可塑性和完美性論述，並將古巴的新人作為主要的比較對象。作者認為新人強調道德完美乃是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質，全書敘述蘇聯和中國部分偏重於新人觀念的歷史形成，古巴部分則重視新人的實踐。他的書中沒有明確地敘述新人特質，並且將時間主要放在 1960 年代，以當毛主席的好士兵、學雷鋒為新人代表。他雖然提及新人特徵是無私的集體人格，但沒有討論這樣的新人特質是如何養成的。程

¹⁶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¹⁷ Charles Price Ridley, Paul H. B. Godwin, and Dennis J. Doolin, *The Making of a Model 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Donald J. Munro (孟旦),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映紅用了不到兩頁交代 1949 年之前、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新人的差異，指出 1960 年代新人的三個特點：(1) 在意識形態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很快地凌駕於黨之上；(2) 透過每天自我批評和反省，達到自覺地、持續地思想改造；(3) 在平常的工作中也要強調容忍艱辛困苦，作為鍛鍊革命決心的方式，且隨時準備犧牲生命。¹⁸ 這三個特點在 1950 年代均有提倡，真正的差別在於實踐程度的多寡；1960 年代的新人實際上奠基於 1950 年代的養成教育。此外，程映紅書中呈現的中共塑造新人方法，只是概略性述及教育機構、真人典型、思想改造。其中除了真人典型略微觸及工農對象之外，其餘都是以知識分子為主，特別是思想改造部分。本書的重點則放在宣傳新人觀點的內容及特色，對象是全民，不局限於知識分子；但是在討論宣傳成效時，則以城市居民為主。

本書將處理三大議題：中共形塑的新人觀內容，中共運用不同媒介來作宣傳，以及蘇聯經驗在中國的適用性。本書將處理下列問題：中共宣傳的新人內容和特色是什麼？這些內容如何隨著政治環境而有所改變？1950 和 1960 年代所宣傳的新人特質，其中是否有延續和斷裂之處？老百姓又如何看待新人的宣傳？民間的解讀和官方的宣傳有無差距？如果有的話，表現在什麼地方？不同的媒介是否會影響宣傳訊息的傳遞，其中異同為何？「蘇聯模式」/ 斯大林模式是否可能全盤移植？兩國的文化差異是否導致橘逾淮而變枳的現象？「蘇聯模式」在中國如何被修改，以調適彼此不同的國情和政策？

在共產黨認知中，新人觀也屬於共產主義道德的範疇。共產黨嚴厲駁斥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者沒有道德的指控，堅稱共產主義者有另

¹⁸ Yinghong Cheng (程映紅),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p. 96-97.

一套道德準則，主張共產主義的道德完全服從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否定世界上有超人類、超階級的道德。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是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集體主義，要發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¹⁹ 由於共產主義道德包含了集體主義，因此，中共將國民黨提倡的德、智、體、群四育並重，²⁰ 改為德、智、體三育，將群育併入德育之中。

中共所欲塑造的新人觀內容包含很廣，本書不可能面面俱到，無論如何選擇都會有所遺漏，選擇本身就帶有主觀性。本書處理的是國際觀、愛國觀、敵我觀、愛情觀、勞動觀、性別觀；上至國際、國家的公領域，下至個人感情的私領域，希望如此的取樣能涵蓋一些重要面向，並且嘗試回答下列問題：到底中共希望新人如何看待新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外在的國際世界？毛澤東向來講求對立面與階級鬥爭，共產革命政權成立後，誰是其主要敵人？如何辨識和因應？勞動光榮和男女平等也是共產黨的核心價值，黨又如何期望新人在這些方面的實踐？

新人國際觀的基礎是民族主義（共產黨稱為愛國主義），愛國觀則是黨國至上。即使有關當局極力宣揚國際主義，其奠基石仍是中共領導與定義的愛國主義。新人敵我觀的判定標準，則是以階級立場為

¹⁹ 列寧，〈青年團的任務（1920年10月2日）〉，《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2版），卷39，頁303；〈共產主義道德〉，《中國共產黨新聞——民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73273/10415162.html>（2014年3月8日檢索）。

²⁰ 194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指出應該德、智、體、群四育並重。群育指「利導個體的個性與群性、培養群體意識、陶融社會道德、協和人際關係。」教育大辭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國立編譯館主編，《教育大辭書》（台北：文景書局，2000），冊8，頁724-725。

依歸。除了短暫的百花齊放時期，毛澤東時代向來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兩條路線鬥爭或隱或顯地一直存在。新人認同及遵循官方所提倡的「無產階級利益」，也是一種集體主義的表現。不但公領域如此，就是私領域中的個人情感也須以集體為重；大我必須先於小我。這也表現在以勞動模範為代表的勞動觀，一方面要彰顯勞動光榮，另一方面也要求以黨所界定的集體為勞動奉獻的終極目標。新人的性別觀在提倡男女平等，新女性也應該出外勞動，同時也必須遵循集體主義的規範。綜而觀之，本書列舉的各種新人觀，歸根究柢都是以黨國及其所定義的「集體主義」為新人的言行準則。因此，集體主義的主旋律會不斷地在各章出現，但這不是重複，正因為這是中共要宣傳新人觀的最關鍵元素；它浸透到各種領域，並且以不同的面貌出現。

第二個議題處理中共利用多種媒介宣傳新人觀。Peter Kenez 主張宣傳無法作抽象的討論，必須同時考慮政策、宣傳方法和內容。²¹ 對共產主義國家而言，宣傳更是無法單獨討論，必須和政策、組織、動員、教育及其他手段一起考慮。無論是列寧、斯大林或毛澤東，咸認宣傳是教育的一部分。列寧認為俄國人民十分落後，所以需要教育；中國更加落後，更需擴及各層面的社會教育。中共接收大陸政權的時候，國內人民識字率依然很低，必須依賴各種非文字媒介，才能將中共所欲灌輸的政治訊息傳達到社會各個階層。這也是本書為何選擇多種媒體，而非單一媒體來闡述新人宣傳觀念的主因。相較於國民黨宣傳只重視文字和學校教育，忽視對文盲或半文盲的下層百姓的教育，中共則非常重視非文字的社會教育。毛澤東在延安就曾說過，文藝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

²¹ 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

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²² 這裡的文藝還包括非文字的部分。中共建國後掌握了全國的資源，宣傳媒介五花八門。從民間熟悉的傳統方式，例如大鼓、戲曲、雜耍、秧歌、腰鼓隊等，到現代的放映幻燈片、電影和廣播節目都有。各地經常舉辦展覽、演講、座談會、聯歡會、讀書會、流動圖書館、壁報、黑板報、街頭宣傳站、流動宣傳車、化妝演出，也印製針對不同年齡與階級的宣傳文字與圖冊。

正如對新人觀的選擇一樣，本書對媒介的選擇也帶有主觀性。筆者認為從若干觀念和多種媒介入手，至少能夠以管窺豹，看出中共全力宣揚的官方意識形態，教育老百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是政治正確的言行，什麼是錯誤的。這裡所選的媒介又可分為三類，分別是文字、視聽藝術、真人典型。文字媒介利用教科書和文學，視聽藝術選擇歌曲與電影，真人典型則是勞動模範與女拖拉機手。這些都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他們的任務是再生產製造「主體」的條件，呼叫個人。過去處理灌輸意識形態或教育等塑造理念的研究，用得最多的是教科書。由於社會教育的影響力遠大於學校教育，因此本書除了選用教科書之外，其他媒介均以社會教育為考量。教科書的流動性和普及性，比起非文字的文藝產品或真人典型等媒介要偏低；電影、歌曲、真人典型能夠不受識字與否的限制。特別是電影和音樂這些媒體的傳播，能夠無遠弗屆，宣傳對象更為廣大，而且可以發揮藝以載道的作用。

視聽藝術中人聲的傳播成本最低，也是很省事的媒介。藉著廣播、歌詠隊、合唱與表演活動傳唱愛國歌曲，可以凝聚人民的向心力，灌輸愛國情操和正確的黨國觀。被列為第八藝術的電影，製作成

²²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2-23日）〉，收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東京：蒼蒼社，1983第2版），冊8，頁112。

本高；不過，電影素有生活的百科全書之稱，向來注重宣傳的共產黨視電影為灌輸意識形態的利器。電影不但具備了寓教於樂的優勢，還能夠鉅細靡遺地描寫落實生活的細節。分辨敵我及正確的愛情觀牽涉更多的是生活層面的問題；透過電影這樣的媒介，更容易在不知不覺之中灌輸官方期望的新思維。冷戰時期無論國民黨或共產黨當局，都喜歡宣傳敵人就潛伏在你身邊。中共更會強調敵人的身分可能是家人、朋友、同事、同學、鄰居、親戚等等，因此必須隨時提高警覺；而提高警覺的方法則須從日常生活做起。電影反映生活的面向遠比其他媒介豐富，既容易明瞭，又能具體地模仿。中共認為從電影形象化地呈現日常生活，可以對照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言行的區別，進而站穩階級立場，以集體為重。勞動模範是共產黨意識形態下的產物。中共運用勞動模範的真人典型提供了具體實例，宣揚勞動光榮和黨的政策，並作為人民效法的楷模。

這些媒介都可以當作文本來處理，但是文本不是無限開放的。文本並非如文化研究者所言，可以完全重新改寫；曾有學者研究俄國人對西方藍調的理解也有類似的結論。²³ 文本之外，在文化傳播中的翻譯問題不容忽略。蘇聯電影和群眾歌曲如果沒有譯成中文，不可能在

²³ 我同意 Tamar Liebes & Elihu Katz 的研究結論。他們的研究旨在探討好萊塢電視連續劇《朱門恩怨》在不同種族與文化之下的觀眾解讀。作者訪問以色列人（第二代猶太人、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摩洛哥移民、俄國移民、日本人、在洛杉磯出生的美國人，認為觀眾對這齣連續劇的解讀還是有相同之處，觀眾的解碼也都在文本的範圍之內。Tamar Liebes and Elihu Katz, *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 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 由於文化經驗的制約，俄國人對西方藍調的理解會有所修改，但不會完全溢出文本。Michael Urban and Andrei Evdokimov, *Russia Gets the Blues: Music,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Unsettled Time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國流傳如此廣泛。在某種程度上，翻譯等於是對文本的重新詮釋，然而這是必須另外處理的問題，本書僅能對與中國文化衝突的改譯略作說明。

第三個議題討論中共運用「蘇聯模式」（或稱斯大林模式）與調整蘇聯經驗的問題。塑造新人並非中共特有的發明，但是其方法確實增添了中國傳統未曾有的新元素，亦即從蘇聯學習而來的馬列主義和唯黨是從的觀念及宣傳方法。綜觀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曾有兩次以俄為師的經驗：第一次在 1920 年代初期的國民黨改組，意在學習蘇聯的軍事和組織，期能統一全國。更重要的是 1921 年在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除了意識形態和組織方面深受蘇俄影響，經濟方面也完全仰賴其資助。²⁴ 第二次是 1950 年代中共向蘇聯一邊倒，全方位地學習蘇聯，不只在政治和軍事，還包括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觸及層面最為廣泛的向外國學習，也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浩大的「全盤西化」。²⁵

1950 年代中共宣傳學習蘇聯，利用各種媒介渲染描繪出來的進步富庶的蘇聯社會、安和樂利的人民生活等種種景象，以及社會主義的絢麗遠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麵包牛奶」，更激發中國人民對將要踏入的新社會願景產生無限想像，也是當時許多人民響應中共號召投入各種建設不容忽視的力量。1960 年代的中蘇分裂之後，自許

²⁴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²⁵ 1929 年，胡適提出「全盤西化」一詞，1935 年 6 月 23 日在天津《大公報》為文解釋全盤西化，其意實為「充分世界化」（或潘光旦所說的全力現代化），並指六年前用字不小心，而陳序經、吳景超又不注意胡適的英文討論，引起誤解。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 4，頁 584-587。

為「真正馬列主義接班人」的中共，認為蘇聯經驗「保守、落後」而大肆批判。無論是中蘇友好還是中蘇反目，無論是以蘇為師還是以蘇為鑑，蘇聯始終在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和文化中扮演關鍵性的參照角色。著名的大陸學者如沈志華、楊奎松研究的中蘇關係，多是上層的外交和政治，鮮少處理社會文化方面的議題。²⁶ 究竟蘇聯在中國留下什麼遺產，在中國民間社會扮演什麼角色，特別是在文化方面，彷彿是個大黑洞，迄今尚未見到較為全面的處理。本書刻意用蘇聯文藝作為宣傳內容的實例，目的在凸顯同為共產黨統治的中蘇兩國，其政治文化之異同。其次，本書除了介紹學習蘇聯的部分，更重視「蘇聯模式」在中國的調整或修改。「蘇聯模式」的修正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因地制宜或現實需要的小調整。即使中國在學習蘇聯的高峰期，中共對於蘇聯模式亦非完全照搬。例如，蘇聯專家在中國協助建立工廠，管理方式有順應中國國情之處；公安、工廠等部門不推行蘇聯的「一長制」等。²⁷ 再如本書將討論的新人典型本土化，部分原因乃是為了順應現實需要，也利於引起一般百姓的認同。另一個蘇聯模式的修正，源自中蘇領袖政治理念不同而產生分歧的治國大方向。這種大方向的歧異對國家發展與政策走向所帶來的衝擊更大；最後不但造成兩

²⁶ 兩位學者著作豐富，其代表性專著：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45-195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

²⁷ Deborah A. Kaple,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頁98-100。

國分道揚鑣，也促使毛澤東堅持繼續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有不斷革命論的產生，結果中國的政治路線日益激進。本書希望透過這個面向的探討，為了解所謂毛澤東要走「中國式的道路」內涵及其背後的意義，提供另一個思考的角度。

在進入各章正題之前，尚須對中共新人理念起源、宣傳運作，以及影響宣傳新人的中蘇關係變化略作陳述。

二、新人理念的起源與發展

《大學》的第一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按照程朱的解釋，「親當作新」，「新」指革舊更新，就是改造舊人為新人。²⁸從十一世紀以來的宋明理學家，都將「私」當作萬惡之源，至善的天理等同於公。他們在個人修養上提倡「存天理滅人欲」，也就是要人滅私存公。²⁹此後的新民說多指在儒家思想範圍之內的修身改造，一直要到梁啟超，方將改造舊人提高到公德的層次，他的〈新民說〉乃是基於民族主義，提倡以公為重的理念，也開啟具有現代意義的新人說。

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提出新民說，主要是救亡圖存的考量。梁啟超認為中國政府功能不彰、外交上主權又備受威脅，追根究底是因為國民的文明程度太低。「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

²⁸〔宋〕朱熹集註，楊家駱主編，《四書集註（甲種本）》（台北：世界書局，1957），頁1。

²⁹翟志成，〈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辨及其現代意涵〉，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14-15。

無新國家？」梁的「新民」的條件可歸納為：獨立自主、守紀律、常識豐富、身強體壯、個性堅忍、富進取冒險精神、相信物競天擇的進化論、有自尊和毅力、合群、能生利而少分利等。其中如進化論觀、權利義務、群己關係的界定等都是來自歐美的概念。³⁰ 他的新民觀中備受議論的是個人與群體的關係。張灝認為梁啟超的民主信念是從集體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觀點出發，最後以國家的利益為依歸。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中共的雷鋒精神所強調的群體利益優先、個人應為集體犧牲，與梁啟超的重視集體利益有其連續性。³¹ 黃克武則認為梁啟超的群己觀是以保障個人為終極目的；國家與個人存有互相依賴的密切關係，但這與中共提倡的集體主義和雷鋒思想有根本的差異。³² 綜觀梁的新民之議，在群己關係上確實有先公後私之別。然而，他希望新民能夠先公後私，乃是鑑諸中國人過去的習性為私重於公，並沒有因此要求個人只盡義務而完全放棄自己的自由或權利。他的〈自由書〉即提到放棄一己之自由為天下第一大罪惡。³³ 梁在新民說的〈論權利思想〉一節中結語道：「國民不能得權利於政府也，則爭之，政府見國民之爭權利也則讓之。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若是者國庶有瘳。」亦為明證。³⁴ 由此可

³⁰ 〈新民說〉從 1902 年開始連載於日本橫濱出版的《新民叢報》，至 1905 年完成最後一文。梁啟超，〈新民說〉，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冊 2，頁 655。

³¹ 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pp. 298, 307.

³²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 84-90。

³³ 梁啟超，〈自由書〉，收入《梁啟超全集》，冊 4，頁 2264。

³⁴ 梁啟超，〈新民說〉，收入《梁啟超全集》，冊 2，頁 675。

見，梁的新民雖然要求新民時時以群、以國為念，卻不是要完全放棄個人的權利，更與中共後來提倡雷鋒精神的大公無私，沒有個人，根本有別。

新民的討論，到了五四時期重心就轉變到「新人」。誠如王汎森所言，五四時期的「國民」已經沉澱為底色，當時對新人討論雖多，卻十分散亂龐雜，內容不一，不曾出現像梁啟超那樣有系統的論述。大致而言，理想的新人是「單個的、不受各種規範約束的『人』，而不是一切以『國家』為歸宿的『民』」。³⁵ 由「新民」到「新人」的轉變，也是由偏重群體到強調個體的過程。不過，從 1920 年代後期開始，在各種帶有無政府主義、富有烏托邦色彩的新村實驗失敗之後，一些知識分子又轉向藉由組織和紀律建立的「新社會」，使得「新人」的內容又出現傾向集體的一面。³⁶ 其後隨著日軍侵華之心日熾的情勢，大公高於一己之私的呼聲逐漸升高，知識界經常可見以公為重的呼籲。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有感於中國正處於存亡絕續的關口，向學生演講《新人生觀》。其重點在提倡小我應該為集體大我的奮鬥而存在。整個人生的目的在求自我的實現，而自我的實現必須仰賴整個大我才能完成，「必須小我與大我合而為一，纔能領會到生存的意義。」³⁷ 羅家倫提倡以集體大我為重，對象不只是當場聽講的青年學

³⁵ 關於五四時期的新人討論，參見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 177-179、199-200。

³⁶ 新村實驗也含有集體主義的色彩，但當時胡適反對新村運動，認為這種實驗是種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見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新潮》，卷 2 號 3，轉引自季羨林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 1，頁 707-717。

³⁷ 據王雲五說，這本書的銷路打破商務印書館四十多年來，除教科書和字典外，任

子，而是全國人民。其次，在當時的對日抗戰的大環境，他期望人民以大我為重，完全可以理解。必須注意的是，他堅信人是最後目的，不可把人當手段與工具。³⁸ 大我和小我有衝突的時候，要犧牲小我，但是不會像後來的中共那樣，要求做得那麼極端。

距離羅家倫在沙坪壩演講不到一、兩年的時間，另一個更重要、影響日後中國人民更深遠的講演出現在延安。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藍家坪馬列學院窯洞外廣場，演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堅持黨員的利益要無條件服從黨的利益。講稿後來被整理成文，於8月20日至9月20日在《解放》週刊連載四期。劉少奇的新人觀強調個人必須絕對服從於黨的觀念，一方面固然是受到晚清以來知識界倡論的公／集體應該先於私／個人的思潮影響有關；另一方面，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受到蘇聯的影響，而蘇聯的新人說需要回溯到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

俄國與中國不同的是，最初出現新人說主要不是因為民族主義，不是為了要救國保種，而是出於對農奴制度的反思，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所致。³⁹ 如何解決農奴制度所帶來的種種問題，變成了十九世紀

何書籍的紀錄。羅家倫，〈台版自序〉，《新人生觀》（台北：台灣華國出版社分社，1951），頁1。但是台北版將第一章〈建立新人生觀〉增補許多，如加入1948-49年的吃光運動和批評共黨等語。這裡仍以重慶商務印書館1942年版本為準。羅家倫，《新人生觀》（重慶：商務印書館，1942），頁4。

³⁸ 羅家倫說：「我們最不能，也不應，把人當工具，當手段。……康德說，『我們要以人為目的，不以為手段。』這固且是教育裡顛撲不破的格言，同時也是現在機詐殘酷的政治社會中所一刻不能忘記的真理。」羅家倫，《新人生觀》，頁82。

³⁹ 俄國對農奴制度的反思和新人的起源，必須溯及十八世紀末的一位重要思想人物拉季雪夫（Александр Радищев）。1789年，他寫了一篇關於是否有祖國之子的文章；認為奴隸不能成為祖國之子。詳 Александр Радищев, “Беседа о том, что есть 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談有關祖國之子），*А. Н. Радищев: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以來知識分子最重要的關懷。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在小說《父與子》中，描述 1840 年代的父輩和 1860 年代的子輩兩代之間對待現實社會的態度和行為衝突；子代不滿於父代的消極心態、光說不練、毫無作為，視行動為打破現狀的唯一出路。屠格涅夫稱呼這些子輩的新青年為虛無主義者。

屠格涅夫的新人典型在車爾尼雪夫斯基 (Nikolai G. Chernyshevskii, 1828-1889) 的小說《怎麼辦？》(Что делать? Из рассказов о новых людях)⁴⁰ 得到進一步的發揮。《怎麼辦？》的副標題就是：「新人的故事」。這本書塑造了 1870 年代的民粹主義派學生，成為俄國知識階層的生命藍圖；啟發他們創造新生活，在擁有個人自由的情況下，又能致力於服務人民的新生活；並且毫不妥協地反對專制主義。⁴¹ 小說中的新人典型拉赫梅托夫 (Rakhmetov) 自律嚴謹、禁慾、民胞物與，重視勞動和無私的奉獻。他信仰科學、進化論、唯物論，對於工農一視同仁，沒有階級的概念。他將勞動理想化，相信勞動是快樂的泉源。他認為一群人一起工作比一個人工作更有效率。他睡在舖有鐵釘的床上，以堅定其鬥爭的意志。車爾尼雪夫斯基相信人是可以理性來說服自己為集體著想，詢問集體的意見可以避免專制；但是不應當

сочинения (阿·尼·拉季雪夫：哲學作品選集) (Москва: Гос. Из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 pp. 262-270.

⁴⁰ 小說於 1863 年出版；其中的第五章 19-23 節和第六章全部，後來在彼得保羅監獄檔案中找到，直到 1929 才出版。Николай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Что делать? Из рассказов о новых людях* (怎麼辦？新人的故事)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9).

⁴¹ 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19th Century Russia*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129, 179.

違反一個人的意志去為他人做任何事情；自由高於一切，甚至高於生命。這本小說所描述新人的真誠、保有個人自由、純粹的道德和信任、對未來社會主義的憧憬，對當時的知識分子具有無比的吸引力。它為一整代的革命分子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典型，教育和鍛鍊他們違抗當時的法令和威權，保持信念，能夠面對放逐和死亡而無所懼。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麼辦？》對列寧產生很大的影響。1902年，列寧出版同名的書《怎麼辦？——我們運動中迫切的問題》，提出由於工人無法自己產生工人階級意識，必須靠知識分子來教育及灌輸，因此必須由馬克思主義菁英分子組成的職業革命家，以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方式來領導無產階級革命，才能解決當時革命運動中燃眉之急的問題。由此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原來沒有的黨組織與黨幹部，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一般視為列寧主義之始。列寧同意新人要有所行動，問題是如何行動？列寧堅信沒有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成功地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沒有黨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在《怎麼辦？》這本書中，列寧有句經典的革命格言：「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將俄國翻轉過來！」⁴² 革命家組織就是黨。列寧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信奉唯物論的新人，又向前推了一步，新人必須信仰馬克思主義，並且重視組織和職業革命家的角色，以求理想的實現。

十月革命之後，列寧寫成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他在文中明確地提出對黨紀和黨員的要求。他認為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是因為有極嚴格的、鐵般的黨紀，並且得到整個工人階級全心全意的擁護。那麼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

⁴²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寧全集》，第2版，卷6，頁1-183。

靠什麼來維持？靠什麼來檢驗和加強？答案是：第一，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及其對革命的忠誠，靠其堅韌不拔、自我犧牲的精神和英雄氣概。第二，靠先鋒隊擅長聯繫和接近廣大勞動群眾。第三，靠先鋒隊正確的政治領導、政治戰略和策略，而廣大群眾根據切身的經驗也確信其正確。一個革命政黨能夠推翻資產階級，並改造整個社會的先進階級的政黨，必須依賴上述條件，才能建立起紀律。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也不可能短期內就產生；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和艱苦的實踐才能造成這些條件。⁴³至此，共產黨心目中的新人要素，如信奉馬克思主義、對革命的忠誠、堅韌不拔和自我犧牲的精神、重視勞動、不脫離群眾、服從黨紀等，基本俱全。

列寧所要加強紀律的主要對象是青年，畢竟他們是未來的接班人，是需要積極培育的新人。因此，他在蘇聯共產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上，對於新人條件說得更為具體。他認為舊社會已經改變，需要培養社會主義的新人。新人需要具備現代知識、新的道德，重視勞動。現代知識也包含共產主義；惟有掌握一切現代知識才能勝任建設工作。資產階級意識所演衍出來的道德是欺騙，是為了地主資本家利益去矇蔽工農。青年的新任務就是使一切利益都服從於階級鬥爭，共產主義者的道德也服從於階級鬥爭；必須「團結勞苦大眾去反對一切剝削，去反對一切小私產制度的道德，因為小私產把整個社會的勞動所創造的東西放在單個私人的手裡」。新的共產主義道德的目的，「是要幫助人類社會升到更高的水平，消除勞動的剝削」。每個青年團員都是有知識的，又是能夠勞動的，且將個人的勞動和能力

⁴³ 本文是列寧關於統戰策略的重要著作，於7月發給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代表們。中譯本最早出版於1927年，新譯文收入《列寧全集》，第2版，卷39，頁4-5。

貢獻於社會，並兼有自覺的紀律。⁴⁴

自封為列寧繼承人的斯大林，在他的講話或著作中經常引用列寧關於黨紀、新人的看法。⁴⁵ 斯大林比列寧更強調集體先於個人的重要性。斯大林的〈無政府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分析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要差別之一，就在於集體個人孰輕孰重的問題。他認為無政府主義的基石是個人；解放群眾的前提是先解放個人，所以口號是「一切為個人」。馬克思主義剛好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基石是群眾，先有群眾解放才有個人解放，所以口號是「一切為群眾」。⁴⁶

1921年3月初，蘇共第十次代表大會決議為了強化黨紀，黨內不准有派系存在；並規定：大會授權中央委員會對違反黨紀者或出現派系者，最嚴重可開除黨籍（當時這條款沒有對外公布）。雖然黨內派系並沒有因這個條款的出現而完全消失，卻為斯大林在日後的黨內鬥爭中提供重要利器。在他極力打擊反對者時，一再重申「黨是意志的統一，是和派別組織的存在不相容的」；並強調在無產階級專政前後，都需要施行鐵的紀律，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⁴⁷ 斯大林認為黨內民主和派別集團的自由沒有共同之處：黨內民主是「提高黨員群眾的積極性並加強黨的統一，加強黨內自覺的無產階級紀律」。派別集團的自由是「瓦解黨的隊伍，把黨分

⁴⁴ 〈列寧論青年的學習問題（1920年10月2日）〉，《列寧全集》，第2版，卷39，頁293-312。

⁴⁵ 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即引用〈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及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作為強化黨紀的指導原則。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1926年1月25日）〉，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卷8，頁44。

⁴⁶ 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斯大林全集》，卷1，頁273。

⁴⁷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全集》，卷6，頁158-160。

裂為各個中心，削弱黨，削弱無產階級專政」。⁴⁸ 他強調黨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黨必須建立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這種紀律應當建築在黨員的思想一致上，清楚明瞭運動的目標，並付諸行動。⁴⁹

相較於列寧的新人觀，斯大林更強調黨性，絕對不允許黨內派別存在，而且是以他為代表的黨來解釋一切。他的新人理想是絕對服從黨的紀律和指揮，為黨、為革命獻身。代表人物可以是小說裡的主角，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主角保爾·柯察金；也可以是現實中的勞動生產模範如斯塔漢諾夫，或是飛行英雄、北極探險家等等。這些新人同時也是他定義下的「個人」。誠如 Oleg Kharkhordin 的研究指出，斯大林社會的個人不是平常百姓，而是能夠成就非凡事業的英雄，如斯塔漢諾夫式的勞動模範或農民出身而成為生物學家的李森科。平常百姓只有在為了服務社會，發揮天賦、成就非凡的時候，才能被視為個人。有創造力的個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因為異化的結果，無法發揮他們的天賦。在社會主義社會，個人和集體的發展存在著辯證關係。一方面，突出的個人相對於 (versus) 沒有面貌的群眾；另一方面，蘇聯的個人總是為複數 (individuals，不是個性的複數，而是個人的集體總和)，他們是群眾督促下而產生的傑出個人 (mass promotion of talented people from the masses)。⁵⁰ 所謂「群眾」經常以黨的化身出現，「個人」是被黨所組織起來的，因此這樣的「個人」

⁴⁸ 斯大林，〈關於蘇聯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斯大林全集》，卷 8，頁 131-132。

⁴⁹ 斯大林，〈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及關於布爾塞維克化〉，《真理報》，1925 年 2 月 3 日，轉引自〈整頓三風討論資料特輯(一)：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解放日報》，1942 年 4 月 10 日，第 4 版。

⁵⁰ Oleg Khar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192, 197-199.

也必須以黨的意志為意志。

自十九世紀下半開始，新人特質先後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的重視勞動和階級鬥爭、列寧和斯大林的強調服從組織紀律，能忍人所不能忍地為革命、為黨獻身。這些新觀念陸續傳入中國，主要始於五四時期。十月革命在中國帶動了一波譯介俄蘇思想文學著作的熱潮。《新青年》是介紹俄國文學的重要刊物，但多為簡介或短篇的翻譯作品。當時較為罕見地是田漢發表在《民鐸》約五萬字的〈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這是首篇較為深入地敘述十一世紀以來的俄國文學及其和社會、思想的關係；其中不但提及屠格涅夫《父與子》和虛無主義的關係，並且重點分析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⁵¹

1920年代中期，中共在中央宣傳部下設立編譯委員會；致力於編譯黨內黨外小冊子，尤其是關於列寧主義、國際政策、政治經濟狀況以及工人常識材料的編譯。編譯的內容包括理論的譯著，以及為普及黨員教育而發行的《革命常識》、《黨務常識》之類的教本。⁵² 1929年，中共中央將編譯委員會獨立出來，設置翻譯科，「翻譯各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國際上關於政治經濟革命運動蘇聯狀況及各兄弟黨的材料。」⁵³ 這個時期及其後從事翻譯工作者，許多是歸國的留蘇學生。1930年代又掀起另一波翻譯熱潮，主要介紹關於蘇聯政治和

⁵¹ 田漢譯為周爾尼塞勿斯奇，以及《要如何做》。田漢，〈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田漢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卷14，頁56-57。

⁵² 〈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1925年2月）〉、〈關於宣傳部工作議決案（1926年7月）〉，收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卷1，頁620、733-734。

⁵³ 〈宣傳工作決議案（1929年6月25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卷1，頁896。

思想等作品，特別是斯大林的著作。⁵⁴ 1938年5月，延安成立馬列學院，其下設立馬列著作編譯部，由留學過蘇聯的張聞天擔任該院院長，並兼編譯部主任。其後四年之間，中共先後翻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列寧選集》和《斯大林選集》。延安整風規定的許多必讀刊物，也多半是這些留蘇學生翻譯，或參考馬列、斯大林的作品綜合撰寫而成。⁵⁵

曾經留學蘇聯的劉少奇，對於黨與黨員關係、黨紀、黨性的理論並不陌生。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雖然承繼中國晚清以來集體為重的觀念，更加入了馬列主義改造社會的革命因素。劉少奇主張共產黨員要進行修養的目的是，為了改造自己和社會，為了無產階級世界的勝利，民族的和人類的解放。正確的共產黨員態度是視自己為馬克思、列寧的學生，認真地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掌握其精神和實質；並且必須具備崇高的無產階級的立場。⁵⁶ 全文一再重申「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考驗一個共產黨員的忠誠度，就是看他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絕對地、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黨員的最高原則；也就是常說的「黨性」或

⁵⁴ 例如，〔蘇〕拉皮杜斯著，張仲實譯，《政治經濟學教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蘇〕米丁著，沈志遠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西門宗華，《蘇聯》、《蘇聯建國史》和吳清友《蘇聯地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42），轉引自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⁵⁵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2版），頁207-208、297。

⁵⁶ 1949年以後，中共出版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各種版本，雖然經過劉少奇的同意而修訂出版，但是其內容和最初刊登在《解放》週刊的版本，相異之處甚多。顧及當時的情境，這裡採用的是《解放》週刊的版本。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解放》週刊，期81（1939年8月20日），頁12-17。

「黨的觀念」、「組織觀念」。當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衝突時，忠誠的共產黨員應該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生命都心甘情願。黨員的個人利益基本上已經包含在黨一般利益之中。黨允許黨員在不違背黨的利益範圍之內，去建立他個人的以致家庭的生活，去發展他個人的個性和特長。但是兩者發生衝突時，就必須「要求黨員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利益，而不能犧牲黨的利益（不論在任何形式的掩蓋和藉口之下）來服從個人。」黨員的思想意識中「只有黨的共產主義利益和目的，沒有自己離黨而獨立的個人目的和私人打算」。為了黨與革命利益的前提之下，也必須能寬大、容忍與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時忍受各種屈辱與虐待而無怨恨之心。劉少奇除了正面地描述一個忠堅的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各種美德之外，還詳細列舉黨內各種錯誤思想及其來源，以及如何對待處理這些錯誤。這些具體的負面典型，可以使人在思想改造過程中，逐一自我檢視，俾能符合黨的要求。至於可能以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宗派主義、英雄主義、風頭主義、本位主義等不同方式出現的不良思想，則是被極力打擊的對象。共產黨的最高理想是要將人類改造成為大公無私的共產社會的公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不斷的進行黨內外的鬥爭。⁵⁷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要求全體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的意志、統一的行動和統一的紀律之下，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將個人利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⁵⁸

⁵⁷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解放日報》，1942年4月14日，第4版。

⁵⁸ 〈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9-194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卷11，頁698-700。

這個決定是延安整風的先聲，後來也成為整風必讀文件之一。整風期間，《解放日報》以特輯的方式，轉載了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演講的精華部分。⁵⁹那麼黨員是否能允許個性存在？個性和黨性的關係應如何看待？中共的答覆是：「共產黨員黨性是黨的一切優美個性的統一——集合體。作為共產黨員的個性，只能以黨性為基礎。……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必須要在革命的磨練中，廢棄自己與黨性不合的、反動的舊個性，創造與黨性相合的、革命的新個性。……黨性容許一定的個性（不違反共產主義利益的個性），卻絕不是容許黨內有個人主義的存在。」⁶⁰換言之，凡是違反黨的利益者，個性就會被解釋成「個人主義」。歸根究柢就是要求黨員，也就是新人的一切言行要以黨的利益為一切考量的基礎。在中共建國後，這個原則成了全國人民應該依循的最高準則。

三、宣傳運作與中蘇關係

由共產國際扶植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發展深受蘇聯影響，宣傳也不例外。對共產黨而言，宣傳不只是單純的散播觀念、政治教育或爭取政治同盟，還必須重視組織。列寧曾經以報紙為例，指出報紙不僅是宣傳者和鼓動者，同時也是組織者；透過報紙的發行網絡，將

⁵⁹ 〈整頓三風討論資料特輯(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解放日報》，1942年4月13-14日，第4版。摘取各節是：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的服從黨的利益、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之舉例、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來源、對待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態度及黨內鬥爭。

⁶⁰ 陳伯達，〈人性·黨性·個性〉，《解放日報》，1943年3月27日，第4版；後收入陳伯達等著，《人性·黨性·個性》（香港：潮汐社，1947），頁6-7。

會自然成形永久性的組織。藉由報紙的行銷系統可以建立黨在地方的代理人網絡；這些代理人會保持經常性的聯絡，知曉現狀總況，可以試驗他們在各種革命活動的組織力量。這種代理人的網絡將會形成革命所需要的組織骨架：大到可以涵蓋整個國家，又擁有足夠的廣度。透過這樣的方式和工作，不但可以訓練出最熟練的宣傳者，他同時也會是最能幹的組織者、最有天分的黨領導，能夠在適當時刻為決定性的戰鬥提出貼切的口號並領導這個戰鬥。⁶¹

1920年9月，俄共在中央委員會之下正式成立了宣傳鼓動部，由黨務機關、教育人民委員部、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等方面的代表和黨的宣傳鼓動專家組成，同時各層級黨委都設立了相應的宣傳鼓動部門，負責各區的工作。該部負責各種宣傳鼓動和文化教育工作（包括出版部門和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的工作），並直接領導農村工作部、婦女部和少數民族局的工作。⁶² 由此可知，蘇聯的宣傳工作從一開始就面向全民，甚至包括少數民族。

俄共的宣傳與組織相結合的觀念，以及宣傳面對全民的作法，迥異於近代中國的立憲和革命團體。⁶³ 國民黨在歷經二次革命的挫敗之後，亟思重振革命雄風，因此欲仿效蘇聯模式進行改組。當時和孫逸仙接觸頻繁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 (Maring, 原名 Hendricus Sneevliet, 1883-1942) 和後來的蘇聯顧問鮑羅廷 (Mikhail M. Borodin, 1884-1951)，咸認國民黨沒有體認到群眾工作的重要性，輕忽政治和宣傳

⁶¹ 列寧，〈從何著手？（1901年5月）〉，《列寧全集》，第2版，卷5，頁6-10。

⁶² 馬龍閃，《蘇聯文化體制沿革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16-17。宣傳鼓動部於1924年改隸書記處。

⁶³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頁188-189、197-199；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207-212。

工作。⁶⁴ 改組後的國民黨新添了組織部，且強化了宣傳部，但是掌管和活躍於這兩個部門的多半是跨黨的共產黨員，資深且有份量的國民黨員對這些部門的工作興趣缺缺。反觀中共本身從建黨開始就設有專職的宣傳機構，各地的黨支部也設有組織和宣傳部門。同時，中共也重視宣傳和組織人員的培訓。⁶⁵ 對黨內部分不識字的宣傳人員，會依個別訓練或組織平民學校性質的小組幫助他們，以便提高宣傳分子的素質，並且經常對其考核。⁶⁶ 延安整風時期黨確立了意識形態與領導的一元化，能將其貫穿到宣傳組織與人員之中；整風的必讀文件之中也包括宣傳方面。⁶⁷

除了重視組織與人員培訓之外，中共的宣傳方法十分機動與靈活。宣傳工作不僅限於宣傳人員。如一般士兵也可透過軍紀嚴明的方

⁶⁴ Док. 102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М. М. Бородина с Цюй Цюбо (16 декабря 1923 г.),” (文件 102：鮑羅廷與瞿秋白的談話紀錄)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1920-1925 гг.*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文件，卷 1，1920-1925 年) (Москва: АО «Буклет», 1994), с. 346.

⁶⁵ 1925 年中共中央局與鮑羅廷議決：在開封辦一民黨宣傳學校，訓練人才；由李大釗、韓麟符、于樹德（永滋）三人主持。〈中共中央局決議——關於國民黨二次大會、廣東政治問題，建立本黨北京、廣州臨時委員會及訓練人才等問題（1925 年 5 月 7-8 日議決）〉，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卷 1，頁 640-642。

⁶⁶ 〈宣傳工作的目前任務（1928 年 7 月 10 日）〉、〈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1925 年 2 月）〉、〈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二號——紀念日與大的宣傳運動過後應報告宣傳工作情況及效果（1925 年 4 月）〉，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卷 1，頁 825、618-621、635。

⁶⁷ 〈宣傳指南〉的內容有四個重點：1. 擷取聯共黨史片段，談列寧是怎樣進行宣傳；2. 季米特洛夫論宣傳的群眾化；3. 魯迅論創作要怎樣才會好；4. 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香港：文風出版社，1946），頁 167-173。

式當作宣傳。中共要求官兵為百姓上門板、捆煙草、掃地、談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照還、賠償損失。這些要求即使只做到一些，也會給群眾留下深刻印象。又如優待俘虜，醫治敵方傷兵；⁶⁸ 口號響亮，即使實踐上有落差，也能達到宣傳效果。因此，一支軍隊可成為具有流動性的宣傳隊伍。

其次，中共宣傳會區分對象，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宣傳媒介和內容。相異於國民黨的宣傳多局限在知識分子和學生，中共更重視對下層階級的宣傳，甚至還有針對流氓的宣傳。⁶⁹ 例如，對農民宣傳能投其所好。將時事改編成較長的小說、歌曲、彈詞、劇本；蒐集有趣味的瑣事，引起聽眾興趣；利用新劇表演，諷刺舊習俗與迷信；運用一些簡單的標語、畫圖和講演，使農民像進過政治學校一樣。⁷⁰ 洪長泰的研究清楚地闡析延安時期的中共利用說書、漫畫、歌曲、節日等作為媒介，來宣達黨的意識形態。⁷¹

同時，中共長於利用各種事件進行宣傳，且往往事先有周密計畫，能夠未雨綢繆。最明顯的例子是，當中共從醫生處得知孫逸仙已無藥可救，只是拖延時日之際，即開始籌謀如何利用孫的過世來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和三民主義，並且明確三民主義的內容，對較有爭議的

⁶⁸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節選）（1929年12月閩西古田會議）〉，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卷1，頁949、952-953。

⁶⁹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節選）（1929年12月閩西古田會議）〉，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卷1，頁947。

⁷⁰ 憚代英，〈農民中的宣傳組織工作（1925年12月29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卷1，頁675-678；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卷1，頁787。

⁷¹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

部分如民主主義則不多做解釋，嚴禁將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相比較。⁷² 中共心知肚明，三民主義和社會 / 共產主義內容相異之處遠大於相同之處；一旦兩相比較，容易引出更多的質疑。然而，中共能夠明確指出什麼可以宣傳，什麼不宜多宣傳，可以讓宣傳人員有所依循，多少知道底線在哪裡，這是中共宣傳高明之處。類似的例子在日後中共宣傳中屢屢出現。

口號在宣傳之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中共十分重視口號內容要具體化；一再告誡口號必須簡潔有力，內容不能太抽象，必須反覆向人民解釋，避免發生誤解。劉少奇甚至特別指示如何注意口號的提出和改變。1923-1924 年間，列強對華進攻日急，「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得到許多知識分子的共鳴；而口號從提出到流行，有個十分重要的過程。⁷³ 中共在動員群眾土改時，對此有清楚的說明：「口號是指導群眾行動的武器，根據工作的要求，提出通俗鮮明的口號，可以直接鼓舞群眾情緒，口號愈明確愈通俗，就愈適合群眾的口味，群眾

⁷² 〈中共中央通告第五號——關於孫中山逝世後之宣傳問題（1925年2月5日）〉，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卷1，頁624-626。頁625提到「宣傳中山的三民主義，應以1924年1月民黨大會的宣言、黨綱、政綱為根據。民族主義即根本反對帝國主義，取消一切對外條約，要求中華民族獨立為原則。民權主義以根本打倒障礙民權之軍閥，建設民主政府，要求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之絕對自由為原則。民生主義以剷除目前妨礙民生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再以真正人民的國家力量發展農業厚利民生為原則。總之，宣傳中山的主義切不可蹈於空空理論，須舉出具體的事實，尤其須切戒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作比較。對於民主主義亦不可多作解釋。」

⁷³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67-69；劉少奇，〈論口號的轉變（1928年10月5日）〉，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卷1，頁844-846；〈中央局報告（1924年5月14日）〉，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卷1，頁581。

接受就愈快。用群眾自己的語彙，解決群眾自己的思想問題，作用非常之大，啟發其鬥爭勇氣，提高其思想覺悟，指導群眾行動，使群眾運動成為自覺自願。因之口號在群運中是有重要的地位的。」⁷⁴ 從現實的當務之急構思出有力易懂的口號、明確的宣傳內容，到宣傳細節的注意，在在顯示中共對宣傳之用心與重視。

中共的宣傳理念與運作方式，從建黨開始到延安時期，逐漸奠立良好的基礎。國共內戰在三大戰役之後，中共陸續掌握了全國的資源，宣傳工作有更進一步的發揮。1949年3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由河北西柏坡遷入北平時，部內幹部僅二十餘人，由部長直接領導。10月建政之後，為加強對文教宣傳的管理，中宣部不論在人員編制和組織機構均快速擴充，人員的數量增加近10倍。⁷⁵ 同時，將原來在根據地由宣傳部掌管所有的文化、教育、出版和新聞等工作轉給政府部門。表面上是為了顧及政治形象，實際上是使黨中央和各級宣傳部「擺脫行政事務，集中注意於黨內外的思想鬥爭，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領導和黨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⁷⁶ 就在中央政府成立一個多月，黨中央即決定在政府部門設立黨組，「以便統一並貫徹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的執行」。⁷⁷ 同時，中共為了營造出由下而上、全民

⁷⁴ 冀南四地委宣傳部，《土地改革中的口號彙集》（1947），河北省檔案館藏，檔號36-1-26-2。轉引自李里峰，〈群眾運動與鄉村治理——1945-1976年中國基層政治的一個解釋框架〉，《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頁223。

⁷⁵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卷5，頁62-63、104-105。

⁷⁶ 〈中共中央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黨的文化教育工作問題的指示（1949年12月5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冊1，頁66。

⁷⁷ 〈中共中央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1949年11月）〉，收入《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卷9，頁9。

擁護的形象，因此除了有上層建築的黨政機構，還必須有下層組織的「群眾團體」與之呼應。⁷⁸ 各個重要的外圍組織均設有黨組，負責宣傳的領導單位仍是黨中央宣傳部。

中共建國後的宣傳及其他重大決策，深受中蘇關係變化的影響。兩國關係的急劇變化直接衝擊到中共宣傳新人的內容。因此有必要在此簡單交代 1949 年到文革前中蘇關係由蜜月到反目的過程。

向蘇聯一邊倒是中共在內戰後期方才確立的政策。1948 年發生柏林危機，美蘇對立日益尖銳，中共認為若要打倒蔣介石，除了暗中應盡力爭取蘇聯的援助之外，亦須繼續討好美國，但是必須選擇一個公開的外交立場。⁷⁹ 1949 年 3 月，中共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已經確定向蘇聯一邊倒方針的基本輪廓。當時毛澤東指出，無須急於爭取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共政權的承認，拖到全國勝利以後再解決也不遲。⁸⁰ 另一方面，毛澤東也明示：「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現在對非黨人士也

⁷⁸ 工會和青年團雖然也被中共歸類為「群眾團體」，但是與黨的關係特別密切。中共如何利用其他群眾達到其政治目的，是個值得研究卻未受到應有重視的領域。蘇區時期中共直接主導成立或控制的「群眾團體」，除了具有政治性的貧農團、反帝擁蘇總同盟、中央蘇區革命互濟總會之外，還成立了不少文藝「群眾團體」。蘇區的群眾組織詳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 618-660；文藝團體參見劉雲主編，《中央蘇區文化藝術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

⁷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48 年 9 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卷 5，頁 131-133。關於戰後中美關係的變化，參見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賚中筠，《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⁸⁰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卷 4，頁 1435-36。

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⁸¹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正式對外宣布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此後又陸續發表文章加以闡發。⁸² 所謂一邊倒政策並非單純的外交方針，另外還有意識形態與經濟建設等考量。中共在掌權之前，只有治理中國部分農村經驗，建國之後如何經營城市，管理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如何重建中國因戰爭而衰敗不堪的經濟，都是中共領導人所面臨的嚴重考驗。事實上，早在中共正式對外宣布一邊倒政策之前，就開始尋求蘇聯的援助。例如，請求蘇聯專家到東北協助修復鐵路運輸與經濟建設，並要求蘇聯給予中國新政權低息貸款等。⁸³ 當時的中國大陸，除了與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交好之外，在國際外交上實處於孤立地位。不管是基於意識形態或是現實環境的考慮，全面地以俄為師成了唯一出路。蘇聯不但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國，而且在1950年2月與中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大陸，不同於東歐諸國在二戰後外力強加而來的共黨統治。因此其同盟關係更顯重要，兩國成為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分佔歐亞大陸的重要夥伴。

在中共奪取政權前後，除了少數親蘇人士之外，許多知識分子因

⁸¹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1949年3月13日）〉，收入《毛澤東文集》，卷5，頁262。

⁸²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丟掉幻想，準備鬥爭（1949年8月14日）〉、〈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收入《毛澤東集》，冊10，頁296-307、317-324、325-332。

⁸³ 關於蘇聯專家在東北的情況，詳見沈志華，《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000）；關於蘇聯對中國貸款，見沈志華，〈關於20世紀50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3期，頁83-93。

為種種歷史情結或教育背景的關係而有反蘇情緒，至於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則對蘇聯毫無認識與了解。如何改變這種情勢，成為中共執政之後的重要工作。中共必須在全國推動「宣傳蘇聯、學習蘇聯」，宣揚「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致力於剷除知識分子親美反蘇的觀念、灌輸無知百姓關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其實，宣傳蘇聯也等於是宣傳中共所要走的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中共的自我宣傳。

建國初期，中共為了配合黨的政策，宣傳向蘇聯一邊倒的公家機構、機關學校必須執行上令下達外，還有關鍵的外圍組織如共青團、工會、婦女聯合會、中蘇友好協會的配合宣傳。藉由這些宣傳機制及組織動員，中共成功地扭轉全國由先前的反蘇變成親蘇的輿論。⁸⁴ 最好的例子就是人民對斯大林逝世的反應。1953年3月初，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傳到中國。雖然有少數人對斯大林的死幸災樂禍，在飯館大吃大喝，表示慶祝，⁸⁵ 大多數中國民眾則深感哀痛，彷彿天塌下來一般。有人因此哭暈過去，或悲傷到影響工作，或無法進食、入眠。甚至如南京大學副校長孫叔平也當眾大哭失聲，悲痛不已。⁸⁶ 更有人擔心斯大林的死會影響蘇聯對中國的友好關係與建設，或降低對中國的援助，進而使得中國無法順利到達社會主義社會。⁸⁷

⁸⁴ 詳見余敏玲，〈學習蘇聯：中共宣傳與民間回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0（2003年6月），頁105-107。

⁸⁵ 〈天津部分資本家對斯大林的死幸災樂禍〉，《內部參考》，號54（1953年3月10日），頁262-263。

⁸⁶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頁283-284。

⁸⁷ 〈我國各地人民對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反應〉，《內部參考》，號53（1953年3月9日），頁202-207；〈北京青年對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反應〉，《內部參考》，號54（1953年3月10日），頁259；〈天津部分幹部對斯大林逝世在群眾中引起的

斯大林過世後，赫魯雪夫積極調整對華政策，擴大對華援建項目，提高貸款額度，增派專家來華，提前歸還旅順基地，轉讓四個中蘇合營公司的蘇聯股份等。中蘇蜜月關係逐漸走向頂峰，但中蘇關係的破裂也是在赫魯雪夫任內。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當晚，對斯大林的錯誤與個人迷信問題展開批判。毛澤東認為赫魯雪夫此舉是「揭了蓋子，捅了婁子」。「揭了蓋子」指蘇聯、蘇共、斯大林並非一切都正確，破除了對蘇聯的迷信。「捅了婁子」指赫氏的「秘密報告」內容沒有事先通知兄弟黨；而且不該全面否定斯大林，應該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些都犯了嚴重錯誤。毛澤東最初較強調「揭了蓋子」部分，即揭露了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的一面；在某種程度，也是宣洩了他過去與斯大林交涉所受的怨氣，同時破除了中共長期以來對蘇聯的迷信與教條主義。因此毛澤東在4月25日政治局召開的擴大會議上，開始陸續講述〈論十大關係〉，正式提出要以蘇為鑒。⁸⁸

1956年夏天和秋天，先後在波蘭和匈牙利發生反蘇事件，毛認為批判斯大林是將社會主義矛盾暴露於外，是造成波匈「動亂」的主因，中國必須有所警惕，不能重蹈覆轍。毛澤東也難免會聯想到，自己身後是否也有類似斯大林的遭遇？此後毛澤東更重視「捅了婁子」部分，因此對蘇共二十大的批評也日趨負面。⁸⁹儘管如此，中蘇友好

混亂情況表現束手無策〉、〈天津工程技術人員對斯大林逝世的反應〉，《內部參考》，號56（1953年3月12日），頁296-297、300；〈斯大林同志逝世後天津部分工人學生過度哀痛〉，《內部參考》，號57（1953年3月13日），頁343-344。

⁸⁸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6，頁82、101-105。

⁸⁹ 詳見吳冷西，《憶毛主席》（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4-5；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收入李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路》（廣

關係並沒有立即受到影響。蘇聯在 1956-1957 年間，進一步援助中國發展原子能的研究和技術，包括原子彈和飛彈的技術。1958 年，中共推動大躍進，使得全中國開始走向極左狂熱的「國家建設」；相較之下，蘇聯經驗便顯得落後保守。赫魯雪夫對於中國正在進行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制度疑慮重重，遲遲沒有答應中國所提出的新援助要求。⁹⁰同時，中國拒絕了蘇聯提出的在華共同建設長波發射電台及核潛艇共同艦隊，偏偏中共砲擊金門又沒有事先通知蘇聯，雙方關係益趨緊張。⁹¹1959 年，蘇共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出現了批評中共人民公社、大躍進等路線政策的言論，加上蘇聯在中印邊境衝突中，並未偏袒中共，甚至指斥中共不值得為邊界的不毛之地妄動干戈，更激怒了中共。1960 年，中蘇雙方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發生激烈爭吵。⁹²同年 7 月赫魯雪夫突然決定召回所有在中國的蘇聯專家，中蘇關係的惡化全然公開浮上檯面。1962 年，中蘇上層關係雖稍趨緩和，但到 1963 年 7 月莫斯科會議時中蘇兩黨關係又告破裂。7 月 14 日，蘇共中央發表公開信，敘述中蘇矛盾分歧的由來。從 9 月開始至 1964 年 7 月，中共也陸續發表 9 封公開信，批評蘇共，展開中蘇大論戰，出現了著名的「九評蘇共中央」，從而開啟了兩國兩黨持續二十多年的冷戰。由於中蘇關係從高峰跌到谷底的變化，使得中共的政策也隨著中蘇關係的變化而更動。

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頁 357-358；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6，頁 82、101-105。

⁹⁰ Roy A. Medvedev, *Khrushchev, the Years in Pow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87.

⁹¹ 中蘇從蜜月到反目的詳情，見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45-1959）》，第 5-6、8-10 章。

⁹²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 333。

四、章節安排

全書除了第一章以小說的新人典型為例，綜述新人觀的核心觀念，兼及多種媒介的宣傳之外，其後各章均是利用單一媒介對單一新人觀點作更詳細的闡述。

現將各章簡述如下：第一章利用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綜述主人翁保爾所體現的新人典型與精神，以及中共透過各式各樣的媒介作宣傳，兼述蘇聯新人典型的中國化。蘇聯關於新人的小說如《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真正的人》、《青年近衛軍》、《鐵流》、《夏伯陽》、《士敏土》、《丹孃的故事》等等，也在中國流傳。但是將新人的特質描繪得最全面、最周延的非《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莫屬，它所能涵蓋的新人觀也比其他小說為多，加上出版數量和流傳程度在 1950 年代的翻譯小說中，高居第一名，因此筆者挑選具有代表性的保爾為典型。其次，本章展示了中共宣傳機器的高度動員和組織能力，凡是有利於宣傳的媒介都能派上用場。

第二章倚重中小學教科書，檢視文革之前十七年的新人國際觀如何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大陣營，轉變成三個世界的觀點。這裡的國際觀，指的是中共對中國以外世界的看法。為了避免與人生觀混淆，故用國際觀，而不用世界觀。中共的國際觀含有濃厚民族主義情緒，重視階級鬥爭、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相較於其他文字形式的媒介，中小學教科書更值得關注，正如路易·阿圖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所言，國家通常會利用教科書向每個學生灌輸民族主

義。⁹³ 過去的研究多聚焦於政治教育或中國史的教科書，事實上，語文和世界歷史、世界地理傳達官方意識形態的功能絕不亞於前者，這些科別的教材正是本章所研究的資料。

第三章探討中共以群眾歌曲宣傳黨國至上的愛國觀。歌曲對許多人來說，主要是消遣娛樂；對共產黨來說，教育功能更重要。共產黨向來重視音樂在政治上扮演的工具性角色。在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歌詞可視為承載及反映社會的文本；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歌詞更重要的是反映黨國所要傳遞的政治訊息。中共宣傳的愛國主義從 1950 年代包含的黨國、領袖、社會主義建設，轉變成 1960 年代的領袖和世界革命為主的內容。

第四章、第五章均利用電影分別說明敵我觀和愛情觀。共產黨深知電影是宣傳最重要的一種媒介，可以發揮寓教於樂的功能。許多城鄉人民喜歡的中國傳統戲曲，若要請戲班演出，支出龐大。而電影放映隊只要有基本的配備，三人即可成行，到各地放映，無遠弗屆。第四章利用電影討論以「反革命分子」為關鍵詞，呈現主要敵人的形象及其言行。「反革命分子」指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及共產黨的領導，來自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實際上中共對它的定義十分模糊含混，也常常擴大。理論上，分辨「反革命分子」是以階級作為區分，但是工農階級或人民內部因為蛻化的關係，也可能成為「反革命分子」。1962 年以降，毛澤東不斷重申階級鬥爭的重要性，結果被貼上「反革命分子」標籤的人越來越多，同時也反映了毛的不斷革命論心態。

⁹³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 155.

第五章同樣利用電影為媒介，探討愛情與集體的關係。1950年代初、中期，愛情尚能和革命事業等並存；大躍進開始後，集體的比重日益增加；到文革前夕與期間，只能有革命事業，不能有愛情。這裡的集體從大躍進以來逐漸成為黨國的代名詞。乍看之下，本章焦點似乎與第四章相似，實際上是要強調即使在個人最私密的領域，中共亦是意圖消滅個人主義，以集體主義為依歸。

第六章以真人典型的勞動模範說明中共如何宣揚勞動光榮、聽命於黨的理念。表面上，勞動模範在新人之中似屬經濟領域，體現勞動光榮、無私奉獻於生產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精神，實際上中共更重視利用勞模樹立為黨為國、一切為集體的新人標竿。中共的評選與塑造勞動模範標準，也處處彰顯官方的政治考量。中共稱勞模在生產領域能發揮骨幹，發揮帶頭、橋樑的作用，但永遠服從黨的領導才是毛時代要求勞動模範的精髓。

第七章仍是以勞動模範為例，但是從性別的角度出發，以宣傳女拖拉機手為個案，說明中共期望新婦女在「新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本章試圖探究在中共國族論述之下的新婦女典型，並從婦女角度出發，分析其自身體驗；以具體事例勾勒出中共所謂「新婦女」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差距。許多婦女響應黨的號召，成為拖拉機手之後，實際的工作內容和生活情況與他們原來的期望產生落差，並且每人對男女平等的感受也不同。女拖拉機手的例子說明了中共的新人性別實際上是男性。

必須澄清的是，各章雖然主要以一種媒介來闡發新人的一種理念，但還是會觸及其他媒介和理念。這些論述是重疊，不是重複；而且正好反映各種觀點之間的環環相扣，很難楚河漢界似地一刀切。其次，談到宣傳，常常無法迴避一個問題：宣傳的有效性如何？然而，

如何評估宣傳的成效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現在的做法可以用民意調查的方式來檢驗，但是對於歷史問題卻不可能用民調方式來解決。況且中共建國之後施行嚴格的出版審查制度，很難單從官方出版品評估宣傳的影響力。本書將盡可能利用口述訪問、檔案、回憶錄來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這或許會遭到不夠全面的批評，但至少可以反映出一些人的看法，即使不能代表所有人民的想法。

最後，為了比較清晰地呈現本書議題的來龍去脈，有些章節時間從 1920 年代跨越到 1990 年代，但宣傳新人的塑造與發展在文革前十七年是重要形成期，因此這段時間是本書探討的重點所在；但為了對照出歷史發展的延續和斷裂，有時溯源至五四、延安時期乃是不可避免的，而文革和改革開放時期則將作為對照，藉以凸顯文革前十七年的特色。

至於資料來源，以已經出版的官方資料和回憶錄為主，各地檔案館的資料及口述訪問為輔。出版品中包括《內部參考》，這是中共建國後新華社編輯提供給高級領導幹部，「反映國內外不適宜公開報導的重要情況的黨內刊物」。原來設定的讀者是省委以上級別的高級幹部，雖然到了 1960 年初，讀者擴大到地委常委、中央局處級幹部，⁹⁴其內容仍是知曉中共嚴格控制媒體下，了解民間情況的重要訊息來源之一。

⁹⁴ 袁亮主編，〈中央關於辦好《內部參考》和擴大《內部參考》閱讀範圍的通知（1960 年 1 月 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卷 10（1960），頁 219-220。

第一章

蘇聯新人保爾·柯察金與典型中國化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痛悔，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¹

文學向來是共產黨最重視的宣傳媒介之一，斯大林稱作家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文學的各種文體中又以小說的篇幅和表述手法最能完整開展情節與呈現作者理念。傳統上中國知識分子咸認小說的主要功能是娛樂和寓意，直到晚清若干知識分子方賦予小說政治使命；最有名的例子是梁啟超的新小說觀。他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為何小說有如此的重要性？因

¹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 第 1 版，1995 第 5 版），頁 278。

為小說有不可思議的支配人心的力量。小說常常引導人們悠遊於作家筆下的境界，感人至深，進而改變讀者對平常所熟悉的世界的認知。讀者會不知不覺進入小說的情境，並且常將自己化身為書中人物，進入書中的角色。因此梁啟超主張「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²

本章之所以選擇翻譯小說，而非本土小說，乃因中共關於新人的最重要觀念與典型均來自蘇聯，蘇聯小說中出現的新人典型比中國小說要早得多。眾多的蘇聯翻譯小說中，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在中國流傳最廣最久，其主人翁所代表的新人典型較為完整，因此本章的討論將以這本小說作為焦點。

毛澤東時代曾經有無數中國人將前揭那段名言，或寫在日記，或掛在床前，或貼在牆上，或放在案頭，或背誦在心，當作人生座右銘，用來鞭策自己，勉勵自己。尼可拉·奧斯特洛夫斯基 (Nikolai Alekseevich Ostrovskii, 1904-1936) 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經陪伴數代中國人走過他們的青春歲月，也深深地影響過他們的人生觀。本章以這部小說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 (Pavel Korchakin)³ 為例，闡述新人典型應該具有的各種特質，其內容也隨著政治氣候而變化；同時因應需要而產生中國的保爾典型。中共賦予保爾精神政治使命，不但用以作為改造人民的標準，而且在中蘇交惡之後，轉為中共爭取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一面旗幟。同時，本章也將陳述中共如何利用各種媒介來宣傳保爾精神。

² 原文發表於 1902 年 11 月 14 日《新小說》第 1 號，轉引自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收入氏著，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集 2，頁 758-760。

³ 按俄文的音譯，應該是帕維爾·科爾恰金。俄文名字 Pavel 即英文的 Paul。現在人們熟知的保爾·柯察金譯名，乃是從英譯本而來。

一、保爾的誕生與傳入中國

根據流傳最廣的傳記版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於 1904 年 9 月 29 日出生在烏克蘭一個酒廠工人家庭，後來定居在謝比托夫卡 (Шепетовка) 鎮。他因同情紅軍，加入內戰，1919 年加入共青團。數次戰鬥使他的腹部和頭部受了重傷，並在 16 歲時瞎了右眼。後來又因為賣力參與修築從基輔到波雅爾卡 (Боярка) 的鐵路，得了傷寒與風濕病。1924 年加入俄國共產黨，並回到故鄉謝比托夫卡鎮擔任黨的區委委員。但他的身體狀況却急劇惡化，終於導致雙目失明，全身癱瘓。由於不願成為只領政府撫卹金的殘廢，原本教育程度有限的他，進入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Свердлова) 函授學習。奧氏最後將自己在內戰時期的經歷與聽聞寫成小說，用筆繼續為革命事業奮鬥。⁴

奧斯特洛夫斯基說，他撰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為了響應蘇聯共青團中央號召作家創造當代革命者的形象，寫出自己親眼所見，親身參與內戰的一些事件，給無緣目睹父輩為國英勇奮鬥的青年讀者。⁵ 1928 年他開始動筆寫作，可惜唯一手稿因郵寄而遺失。他雖然一度感到氣餒，最後仍振作精神，重新提筆，完成小說。最初沒有任何文學雜誌願意刊登，理由是人物欠缺說服力，文筆欠佳。後來經過一位與文學界關係良好的老黨員辛苦奔走，極力為小說請命，終於

⁴ Семен А. Трегуб,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 (1904-1936)* (尼古拉·雅列克塞維奇·奧斯特洛夫斯基)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0).

⁵ 奧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等譯，〈我怎樣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的創作過程——在聯共（布）索契市委常委會議上的發言〉，《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 第 1 版，1995 第 2 版），卷 2，頁 735、748。

獲得共青團機關刊物《青年近衛軍》(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編輯 Taras Kostrov (1901-1930) 的首肯。編輯們歷經四年的修改，小說的第一部分終於在 1932 年春天《青年近衛軍》第四期開始連載，第二部分則於 1934 年上半問世，並於當年集結成書出版。⁶ 剛開始這本小說並未受到重視，直到 1935 年 3 月 17 日，他的事蹟第一次刊載在《真理報》「我們國家的人民」欄目，以〈英勇〉(Мужество) 為題，方才一夕成名。⁷ 不久，紅軍組織讀書小組，研讀這本小說，並且認購了該書第一版百分之八十的數量。⁸ 各地組織機構，特別是黨小組，紛紛起而效尤，都被要求認真研讀、討論此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頓時風行蘇聯全國。在奧斯特洛夫斯基去世的前兩年間，這本小說用蘇聯各種民族語言重印再版了 50 次。⁹ 直到 1980 年代晚期，這本小說仍

⁶ 除了文字的潤飾，在情節方面，特別是與政治有關者修改更多。例如，編輯刪除第一部分最後一章保爾參加工人反對派的敘述；刪除保爾為了冬妮婭迷人的眼睛而跳崖一幕。第二部分更動最多，有關黨內與托洛斯基派的口舌交鋒部分幾乎全部被刪。集結出書時，書的編輯比雜誌的編輯對政治更敏感，書的內容與在雜誌連載期間並不完全相同。Елена Толстая-Стегал, “К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фону книги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文學背景)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22:4 (Oct.-Dec. 1981), pp. 381, 383, 385, 389-392。蘇聯於 1989 年出版 3 卷本的《奧斯特洛夫斯基文集》，詳細列出小說中被編輯刪去的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於 2000 年重印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全部譯出這些刪節部分。見頁 448-490。

⁷ Михайл Кольцов, “Мужество” (英勇), *Правда* (真理報), 17 марта 1935 г. (1935 年 3 月 17 日), с.4。這篇報導乃是 1934 年底，記者兼作家米·科利佐夫在黑海之濱的索契市(Сочи)訪問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成果。

⁸ 奧斯特洛夫斯基著，〈給父親和哥哥的信〉，《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卷 2，頁 887。

⁹ Лев А. Аннинский,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Николая Островского* (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8, 第三版), с.7；黃樹南，〈譯者前言〉，收入奧斯特洛夫斯基著，黃樹南等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頁 2-3；Елена Толстая-Стегал, “К

是每位蘇聯學生必讀作品。¹⁰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敘述主人翁保爾·柯察金如何從一位原本缺乏政治意識的少年，歷經戰爭與革命的洗禮，以及數位老共產黨員的啟蒙與教導，成為一個堅強的布爾什維克黨員，以獻身革命、解放全人類的鬥爭作為一生的志業。他所成長的烏克蘭小鎮謝比托夫卡（即奧氏故鄉），是六條鐵路交會的樞紐，又離波蘭邊境不遠，乃是兵家必爭之地，也為故事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背景。從一次大戰到蘇俄內戰，這個地方先後被德軍、紅軍、白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波蘭軍隊佔領過，最後是紅軍獲勝。故事始於保爾因故得罪了學校的神甫而被開除。在稅吏家幫傭的母親便將年僅 12 歲的兒子，送到該城的火車站炊房，擔任燒水工作。那裡的工作環境讓他看到了有權勢的人如何壓迫下層勞動階級，這也是當時社會的縮影。在偶然的機會，保爾從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黨員水兵朱赫來那裡得知布爾什維克黨專為解放被壓迫人民的說法，十分贊同。從此他開始暗地支持紅軍，並參加戰鬥，後來加入共青團，並參與修築鐵路的艱困工作。在這些過程中，保爾因為受重傷，變成殘廢，最後癱瘓。但是他不願成為只領國家撫卹金的廢人，積極尋思繼續為革命事業獻身的其他方式。故事以他決定用筆寫出自己一生經歷，用筆重新加入革命行列，作為結尾。

奧斯特洛夫斯基將書名取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意味著革命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如煉鋼一般，經過高溫大火與急劇冷卻的鍛鍊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фону книги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с. 383. 該書在蘇聯被翻譯成 42 種語言（116 種版本），在國外有 18 種譯本（26 種版本）。克士譯，〈尼可萊·奧斯特洛夫斯基〉，《新華月報》，卷 1 期 1（1949 年 11 月 15 日），頁 297-298。

¹⁰ David Gillespie, *Th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Novel: 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 D.C.: Berg Publishers, 1996), p. 62.

而成。編輯原覺得這樣的書名容易引起誤解，以為與真正的冶金煉鋼事業有關，但他堅持用這個書名。他認為 K3C 這三個字母〔俄文書名每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縮寫〕，對青年而言，如同引航的燈塔一般。¹¹

這本小說突然受到蘇聯當局的重視，與 1930 年代的政治大環境關係密切。十月革命之後，黨的高層領導都有機器崇拜的傾向；他們認為機器和工業化是一個國家現代化和進步的象徵。1920 年代有不少小說描述機械的偉大，個人只是國家這個大機器中的小零件，微不足道。1931 年 7 月，斯大林的講話強調專家的價值，官方的宣傳也因而逐漸地強調專家、人才的重要性。國家建設需要重視好的領導和好的管理人才，俾能讓蘇聯的工業化有更好的發展。在此同時，文學界也被要求配合這些變化而創作，他們放棄了過去崇拜機器的題材，轉而改寫可以引為模範的人物。人不再是一個機器的部分零件或螺絲釘，即使是資產階級出身者也有潛力通過在工廠或勞改營的勞動，而被整合到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之中。有關當局期望作家塑造「大寫的人」，描述一個平凡百姓、一個「小人物」如何透過自己的努力和適當的政治指引，成為「大寫的人」、「突出的個人」的過程，成為一般群眾可以效法的典型。黨的領袖是「父親」，「小人物」經過「父親」的指導，成為「大人」、「突出的個人」。他們依賴黨的領導，靠著布爾什維克般的意志，犧牲奉獻於社會大我。無論是真實世界中的奧斯特洛夫斯基或小說中的保爾，都符合這樣的訴求。他們皆出身於社會

¹¹ 《新聞紀事報》駐莫斯科記者詢問奧氏，為何選擇這樣的書名？奧氏答道：鋼鐵的堅硬是在烈火和急劇冷卻下鍛鍊而來的。他們那一代也是在這樣的鬥爭與考驗中鍛鍊出來的。〈對外國朋友們講的話〉，《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卷 2，頁 771；Елена Толстая-Стегал, “К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фонду книги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с. 376.

底層，在政治意識上一步步的成長與進步的過程，正好是當時官方所欲宣傳的政治文化典型。這本小說也回應了當時提倡文藝要反映時代的呼聲。¹² 文學評論家 Lev A. Anninskii (1934-) 即指出保爾是奧氏那一代的象徵，他與當時的歷史事件密不可分。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這本小說中表明了十月革命裡，在反資反帝的內戰鬥爭中，「怎樣產生了和鞏固了工人與貧農的階級意識，怎樣產生了工農英雄。」¹³ 保爾鋼鐵般的意志是從戰爭、艱苦的環境磨練出來。雖然奧斯特洛夫斯基特別強調這本小說不是他的自傳，只有部分內容是他個人的經歷，主要還是以他所聽聞或目睹的真實故事為人物原型或情節。¹⁴ 不過，在官方的宣傳中，作家個人的生活與小說中人物的經歷有很大的重疊部分，暗含小說接近真人真事，而有鼓舞一般人的作用。

1935年10月，奧斯特洛夫斯基榮獲列寧勳章，也是第一個獲得這個獎章的蘇聯作家。當時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葛·彼得洛夫斯基 (Grigorii Ivanovich Petrovskii, 1878-1958) 為他的書作序時，特別指出這本書對蘇聯青年的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性。保爾為了將整個身心獻給社會主義鬥爭，最後放棄了對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小姐的感情。現代青年可從本書「汲取不少生活經驗，以避免錯誤，對抗墮落，肅清舊生活的渣滓，而重新革命地建設起新的家庭。」不論是血戰中所受的重傷，或是威脅他生命的重病，保爾都沒有因此受挫，仍然勇敢堅忍地為建設國家，為反對一切錯誤的政治傾向——為黨的列寧總路

¹² Katerina Clar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nd edition), pp. 117-119, 130-132.

¹³ Лев А. Аннинский,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Николая Островского*, с. 93.

¹⁴ 奧斯特洛夫斯基，〈對外國朋友們講的話〉，《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卷 2，頁 758。

線而鬥爭。保爾的形象是教導後代應該如何生活與工作的模範。¹⁵ 蘇聯文學教科書的標準本更進一步指出，奧斯特洛夫斯基將保爾·柯察金的一生與帶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整整一代人的命運連結在一起。奧氏打開人類潛存的取之不盡的精神資源，證明了獻身於社會理想與共產主義，會產生出一種昇華、真正的道德，更豐富了人的精神層面。¹⁶ 這就是新蘇聯人，不但生活、生命有崇高的目標，而且有堅強的意志和行動力去完成這個目標。

1940年，蘇共當局在莫斯科成立了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館內陳列了奧氏生前的用品和著作。1942年，蘇共為激勵人民抵抗德軍侵略的愛國情緒，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小說拍成電影，廣為宣傳保爾精神。二次大戰期間，蘇聯人民常常會在受傷或陣亡戰士的大衣裡找到這本彈痕累累的小說。¹⁷ 這些被飛機大炮所射穿的書本，迄今尚保存在博物館。一些蘇聯最勇敢的軍隊，往往都用保爾·柯察金來命名。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蕭洛霍夫曾說過，這本書已成為一部別開生面的生活教科書。¹⁸ 而這部小說也是在中國戰雲密布的時候，被翻譯成中文。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出現在中國的最早版本，是由段洛夫、陳

¹⁵ 葛·彼得洛夫斯基，〈序〉，收入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香港：三聯書店，1972），頁10-11。

¹⁶ David Gillespie, *Th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Novel: An Introduction*, p. 62.

¹⁷ 列·費·葉爾紹夫著，北京師範大學蘇聯研究所譯，《蘇聯文學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頁230。

¹⁸ 季莫菲耶夫主編，殷涵譯，《俄羅斯蘇維埃文學簡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轉引自鄒振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載入中國革命史冊的教科書〉，收入氏著，《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頁411。

非璜根據 1936 年出版的日譯本轉譯而來，上海潮鋒出版社於 1937 年 5 月出版。但是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版本則是梅益的譯本。¹⁹ 根據譯者梅益的回憶，1938 年 4 月，上海八路軍辦事處的負責人劉少文交給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英譯本，²⁰ 明言黨組織認為這部作品對中國讀者很有教育意義，希望梅益能以作為組織交辦的任務，盡快譯完。梅益因編報與妻小重病，至 1941 年冬撤離上海前夕才完成翻譯。1942 年夏由上海新知出版社出版，並送到大後方和根據地。²¹ 譯本出版之後，馬上在延安整風中軋上一角。中共當局號召要「學習保爾·柯察金的優秀品質」，努力提高思想覺悟程度，鍛鍊黨性。曾有中央黨校女學員提到，資產階級教育使她對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開墾的處女地》不感興趣，而必須自我檢討。²² 國共內戰時期，中共考慮讀者以青年與幹部為主，他們正忙於戰鬥和工作，沒有時間閱讀長達 30 萬字的原著，因此出版了縮寫本；但更重要的理由是「本書曾給許多青年無比熱情與勇氣而走上革命道路，且在艱苦的

¹⁹ 在 1942 年初版 5,000 冊，銷路很好，同年 5 月上海遠方書店再版，以後大連中蘇友好協會、解放區的新華書店亦紛紛再版，甚至還有梅益譯本的改編本與通俗本。鄒振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最早與影響最大的譯本〉，收入氏著，《譯林舊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頁 200。

²⁰ 這本英譯本的譯者是阿歷斯·布朗(Alec Brown)，書名叫做 *The Making of a Hero*，而不是後來照俄文書名翻譯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1937 年紐約出版。

²¹ 梅益，〈重版後記〉，收入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頁 527；譯文曾由姜椿芳根據俄文加以校閱增補。梅益，〈深情的懷念〉，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下冊，頁 66。

²² 吳運鐸，《把一切獻給黨》（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頁 176；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0），頁 432。

敵後鬥爭中，更堅定的意志」。²³ 中共顯然期望這本書能促使青年認同共產革命，並勇敢、堅毅地接受隨之而來的嚴峻挑戰。

中共建國初期，掀起巨大的譯介蘇聯文學的洪流，是繼五四以來另一個翻譯俄國文學的高峰。除了重印 1930 年代出版的蘇聯文學作品，更翻譯許多新的作品。當時中國所翻譯的俄文書籍之多，有如過江之鯽。根據中共出版總署不完全的統計，自 1949 年 2 月到 1952 年 9 月止，大陸出版的蘇聯書籍中譯本共約 3,131 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就有 12,166,100 多冊，其中列寧、斯大林著作佔六分之一。²⁴ 直到 1953 年年底前，所翻譯的蘇聯文學作品即有 79 種獲得斯大林獎。《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與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日日夜夜》、《不屈的人們》、《絞刑架下的報告》、《丹孃的故事》、《古麗雅的道路》等都是當時的暢銷書；而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發行量最大。²⁵ 根據中共出版界的統計，中共建國之後銷售量最大的文藝小說，有楊沫的《青春之歌》等 17 部，其中唯一的譯作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從 1949 年 10 月至 1952 年 12 月，銷售累計達 207 萬冊。²⁶ 1952 年 12 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 1942 年的梅益版本加以校訂修補後，第一版 (1952-1966) 發行一百多萬冊；第二版

²³ 白刃縮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縮寫本）（天津：知識書店，1949 初版）。

²⁴ 新華社，〈中蘇兩國三年來文化交流工作〉，《人民日報》，1952 年 12 月 9 日，第 3 版。

²⁵ 〈我國大量出版蘇聯文學書籍中文譯本〉，上海《文匯報》，1953 年 11 月 20 日，第 3 版。

²⁶ 鄒振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載入中國革命史冊的教科書〉，收入《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頁 409-41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工作報告（1949 年 10 月 8 日）〉，收入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卷 1（1949），頁 376、633。

至第四版(1979-1995)發行一百三十多萬冊；總共印刷了57次，計有二百五十餘萬冊。²⁷有關當局考慮到不同程度的讀者與兒童，還推出各種縮寫本與漫畫本。²⁸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在大陸十分風行的小說，也曾經悄然登陸台灣。只是在1950年代的台灣，由於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環境使然，這本在大陸被中共力捧的紅書，到了台灣卻變成禁書。國民黨當局不但不鼓勵人民閱讀，反而會因為閱讀該書而惹禍上身。當時曾有12名台灣青年以叛亂罪名被軍方起訴，其中的一條罪名就是向人宣講「匪」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軍事檢察官所舉證的「事實」之一是：他們「於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一日匪幫『國慶日』舉行加菜及互相檢討批評暨研究匪黨理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意志克服環境》等問題。」²⁹

二、保爾精神特質與在中國的宣傳

保爾一生的最高目標，乃是為黨、為革命事業獻身；其他一切都臣服在這個目標之下。左右他思想的兩大原則分別是階級觀念與集體

²⁷ 梅益，〈譯後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第5版），頁493。

²⁸ 例如，中耀改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新華書局，1950，縮寫本）；彭達林科改編成戲劇，陸立之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上海：北新書局，1951年1月初版，3月再版）；吳昭江、李晴改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開明書店，1952）；潘安榮註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1959年由人民美術出版社首次出版連環畫，共四百多幅畫。王素、夏星改編，毅進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²⁹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43)審三字第52號），1954，感謝施顯華先生提供資料。

意識。保爾的一切作為都可以從這兩個角度去理解。現分述於下：

(1) 黨與革命事業：這是保爾生命意義之所在。保爾一生奮鬥目的是為了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為了解放被壓迫者，為了解放全人類的革命事業；這些是支撐他一生，激發他努力不懈的終極理想。他的集體意識就是以黨的意志來體現。保爾每天在狂熱的激戰與建設中，使他融化在集體裡，完全忘了「自我」的存在。在他的眼中，只有黨的「大我」，沒有個人的「小我」；只有集體意識，沒有個人意識。由於打仗受傷、修路受寒，導致保爾的健康嚴重受損，終成殘廢。後來他也承認自己過去對健康的糟蹋是不對的，因為受到損失不是他自己，而是黨。如此一來，他就無法為黨及革命事業做更多的事。他奮不顧身、忍耐疼痛地與敵人作戰，罔顧惡劣的工作環境與天寒地凍，依然積極努力，都是以完成黨交付的任務為最大考量。即使他受盡病痛之苦，也從不訴苦，因為個人的事情完全不能與全體的事業相比。當他在海邊回顧他二十四年來的歲月，曾經猶豫是否要一槍毀掉那個背叛了他的肉體，繼而覺得這是種懦弱的作法。最後他以「即使生活到了實在是難以忍受的地步，也要活下去，使生命變得有益於人民！」作為結論。他認為生活中，再沒有比離開革命隊伍更令人恐懼。只要他的心臟還在跳動，就不能叫他離開黨；能使他離開戰鬥行列的，只有死。即使全身癱瘓在床，他也要用筆將過去參與騎兵師的故事寫成小說，以此證明自己並沒有掉隊。³⁰

(2) 愛情：保爾對愛情的解釋是資產階級的愛情只重視肉體和物質關係。真正的愛情只能產生於無產階級，更多的是柏拉圖式的愛情

³⁰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 191、404、419、424、427、442-443。

或以友情代替愛情。工人出身的保爾無意間愛上了林務官的女兒冬妮婭。他們雖然有個浪漫美麗的開始，最終注定要分道揚鑣，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階級。他們的感情第一次出現嚴重裂痕，是在保爾帶冬妮婭出席城裡的共青團全體大會。一身漂亮打扮的冬妮婭，置身於一群衣衫襤褸的共青團員中，不但十分顯眼，而且格格不入。冬妮婭漂亮的衣服對無產階級而言，是「卑鄙的個人主義」。保爾當時既為難又生氣；他多麼希望冬妮婭能擺脫資產階級的一切束縛，跟他一起加入革命行列。然而，冬妮婭雖然有勇氣愛上一名工人，卻不愛工人階級的理想，保爾只有選擇分手一途。在他們的分手談話中，他對冬妮婭說：「我首先是屬於黨的，其次才是屬於你和別的親人們的。」保爾第二次戀愛對象是共青團員麗達。他們同是無產階級出身，又有相同的志趣，但是保爾認為「愛情給人帶來許多不安的痛苦」，革命事業未成，不該浪費時間談戀愛；³¹ 頗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氣概。後來他雖也承認這在感情上會造成遺憾，但他還是相信他得到的比失去的多。保爾最後與達雅結為夫妻，不是因為他們之間有愛情存在，而是因為他覺得對這個年輕女子有使命感，要改造達雅成為「新人」，成為「真正的人」，成為黨的一員，成為「我們」，否則他就一文不值。³² 保爾的愛情經驗其實都是對革命忠貞度的考驗，亦即黨性的鍛鍊，保爾認為人的階級關係比愛情更重要。

(3) 勞動：12 歲的保爾被退學後，便在鐵路車站的餐廳幹活，勞動使他心安理得，覺得自己不再是吃閒飯的人。小說中對保爾的英雄形象刻劃最出色的篇章是築路；從波雅爾卡車站修築一條直達伐木場

³¹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 201-202、222。

³²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 384-385、426、439。

的窄軌鐵路，以便冬天提供基輔燃料。它深刻地描繪保爾與共青團員如何在冰天雪地、風雨交加的環境下工作，睡的是冷濕的水泥地，吃的是麵包屑，穿的是單薄的衣服與浸入雪水的破靴，同時還得忍受匪徒的突襲與疾病的侵擾。築路期間，保爾與其他大隊展開勞動競賽。天尚未亮，他勉強移動著已經凍麻的雙腳，獨自到廚房燒開水，才叫醒同伴開始工作。他們工作了兩週後，還要繼續留在原地，直到第一批木材能夠順利用火車運送出去，才能換班。但是保爾與共青團員並沒有因此感到氣餒，反而鬥志高昂，奮力不懈。這段情節清楚地說明了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也因此被編入中學語文教科書。當他患重感冒，仍在冰冷的河水和寒冷的秋風中打撈木材，結果得了急性風濕病。住院兩週後痊癒，又急忙回去工作，他最怕的是失去勞動能力，不能為革命繼續服務。³³

(4) 敵我、國際與性別觀：保爾的敵我觀與國際觀皆以階級立場來區分。他所認知的資產階級勢力指波蘭、白軍、美國、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和社會革命黨等反革命勢力。時值內戰，保爾對於白軍或代表外國勢力入侵的波蘭軍隊，均堅決對抗到底。他在中國的地圖上插著紅旗和黑旗，代表中國土地上有著親革命和反革命勢力。任何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派系都是站在敵對陣營，必須嚴厲打擊，特別是對托派的鬥爭。³⁴ 他的國際觀是以無產階級立場，將世界兩分成革命與反革命，分別代表進步與落後兩股勢力。在性別觀念上，他相信男女平等，也尊重女性。雖然他心理上一度打破男尊女卑的觀念，愛上他的政治指導員麗達，但是最後他對妻子達雅所扮演的角色還是一

³³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 8、244-264、329。

³⁴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 88、222、331、361、427。

個教育者。無論是政治意識很強的麗達或是有待啟蒙的達雅，這些革命女性都被期望向男性看齊。在這個意義上，新人的性別事實上是男性。

簡言之，所謂保爾精神，就是以獻身革命事業為前提，愛情的基礎是階級與革命立場的正確；判斷敵我情勢，皆由階級立場出發；在工作與生活方面，必須具備勞動精神，要培養鋼鐵般的意志，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斯大林時期，只有具備這些特質的人，才可以被視為是「個人」或稱為英雄。平凡百姓也可以效法保爾，以鋼鐵意志獻身大我，而成為「個人」或英雄，有為者亦若是。³⁵不過，這裡的英雄不是著重個人主義的「舊英雄主義」，而是以黨作為集體意識依歸的集體英雄主義，或稱「新英雄主義」。

中共對保爾精神的宣傳非常多樣化。除了擷取小說部分內容編入中學的語文教科書之外，還利用其他媒介廣為傳播。例如成立保爾班亦是宣揚保爾精神的方法之一。1952年，北京五中在取得北京教育局和蘇聯大使館的同意後，命名了第一屆「保爾班」，學生以爭取優秀的成績為鵠的。保爾班的教室還會掛著保爾的畫像。³⁶其他城市的學校也相繼成立保爾班，並且以能屆屆相傳為榮。³⁷若干中學發

³⁵ Oleg Khar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 pp. 190-191, 197-198.

³⁶ 徐祖哲（當年「保爾班」學生），〈保爾精神鼓舞我們前進〉，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72296010097rl.html（2014年1月24日檢索）。

³⁷ 例如，1952年中蘇友好月時，昆明一女中高十三班，即爭取命名為保爾·柯察金班。在保爾形象的鼓舞下，他們成了全校優秀班。畢業時，他們將此稱號送給紀律、成績均不好的初三十九班，全班有一半的人人數不及格，在保爾頑強精神的鼓舞下，畢業前全班已無不及格現象。陳兆祥，〈保爾早就來了〉，《中國青年報》，1957年1月13日，第1版。

起「讀好書、學保爾」的活動，要效法保爾精神，忘我地為祖國勞動。³⁸ 這本小說的許多情節也在 1950 年代初期，被中共中央指示用來教育幹部理論，學習斯大林版聯共黨史的文藝參考資料。例如，書中描寫共青團員如何在嚴寒威脅下，努力不懈地修築鐵路，及消滅白軍殘餘分子和破壞分子的鬥爭，與托洛斯基分子的猛烈鬥爭，便是作為《聯共（布）黨史》第九章：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1921-1925）的佐證。³⁹

廣播與話劇也是宣傳保爾精神的媒介。1949 年秋天，北京新華電台即開始在兒童時間連續廣播保爾的故事。至於話劇，最早似乎出現在哈爾濱。⁴⁰ 更為轟動的是 1950 年 10 月由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擔任導演，北京青年劇團演出的話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著名演員金山飾演保爾。話劇演出近三個月，一票難求。⁴¹ 孫維世還利用烏克蘭民歌〈德聶伯爾河掀起怒濤〉的曲調填上新詞，改名為〈在遼闊的烏克蘭草原上〉，作為話劇的主題歌；敘述白軍侵犯家鄉，烏克蘭田野變成戰場。歌詞是「年老父親忍住了悲傷，他把兒子送上戰場，寧死不做奴隸和牛羊，要和敵人血戰一場，……我們都是戰鬥的青年，

³⁸ 1955 年，江蘇連雲市海州初中，即發起這樣的運動，並得到奧斯特洛夫斯基夫人來信鼓勵。見楊永明，〈要為祖國忘我忠誠地勞動——35 年前奧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寄語我國青年〉，《人民日報》，1990 年 5 月 13 日，第 7 版。

³⁹ 見編者按，勒·查列斯卡婭，莫·查列斯基，〈學習「聯共（布）黨史」的文藝參考資料〉，《中國青年》，1953 年第 11 期，頁 5。

⁴⁰ 〈新華電台今晚要目〉，《人民日報》，1949 年 9 月 21 日，第 4 版；高莽，〈保爾精神不死〉，《人民日報》，1990 年 7 月 11 日，第 8 版；魯直，〈保爾教育了我們：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怎樣的人？〉，原載東北旅大區文藝報第 13 期，轉引自《中國青年》，1949 年第 20 期，頁 7-8。

⁴¹ 許國榮、左萊，《金山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曹靖華，〈蘇聯文學在中國——為蘇聯《真理報》而作〉，《人民日報》，1952 年 2 月 14 日，第 3 版。

我們不怕任何困難。偉大的列寧，領導我們前進，我們走向自由光明。」有些音樂老師為了對小學生講述保爾的故事，便在課堂上教唱這首歌。⁴²

再者，韓戰初起之時，各界為激勵官兵，寄去前線的物資中，常包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小說。⁴³而各級學校的學生為呼應政府提倡的保爾愛國精神，紛紛在校成立保爾戰鬥隊，或報考軍事幹部學校。⁴⁴中共為配合抗美援朝保衛國家運動，有關當局趕譯並上映1942年拍製的蘇聯電影《鋼鐵是怎樣煉成的》。⁴⁵這部由 Mark S. Donskoi (1901-1981) 導演的電影，結構散漫，情節沉悶，人物塑造單調乏味。1956年由 Aleksandr A. Alov (1923-1983) 和 Vladimir N. Naumov (1927-) 重新執導，片名改為《保爾·柯察金》。故事內容略有更改，情節變得較為緊湊、明快，比先前電影更為生動；加上演員

⁴² 董曉敏，〈在遼闊的烏克蘭草原上〉，<http://ourgoldenage.org/article-1404-1.html> (2014年1月24日檢索)。

⁴³ 鄭延，〈介紹北京市少年兒童隊的時事教育活動〉，《人民日報》，1951年1月20日，第3版；〈朝鮮前線戰士渴望文化食糧 歡迎大家捐送書籍〉，《人民日報》，1951年2月26日，第2版；魏巍，〈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人民日報》，1951年6月16日，第4版；〈春節各地熱烈進行撫軍優屬活動〉，《人民日報》，1953年2月18日，第1版。

⁴⁴ 王士谷，〈北京青年團員 為抗美援朝鞏固國防而戰鬥！〉，《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日，第1版；〈走向光榮崗位 為祖國人民立功〉，《人民日報》，1950年12月3日，第2版；〈京津中南等地青年學生工人 紛紛準備參加軍事幹部學校〉，《人民日報》，1950年12月8日，第2版；〈以積極分子的行動代替了群眾性的運動——評部分報紙對參加軍幹校的報導〉，《人民日報》，1951年1月8日，第3版；〈各地學生踴躍報名投考軍幹校〉，《人民日報》，1951年7月3日，第1版。

⁴⁵ 〈好電影介紹〉，《人民日報》，1950年3月4日，第6版；〈電影局三製片場翻譯片工作者報告工作〉，《人民日報》，1951年3月4日，第1版。

稱職，表現可圈可點，凡是看過電影的人，莫不對保爾留下深刻印象。1957年，中共為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又為了配合中蘇友好月活動，將電影《保爾·柯察金》配上中文發音，在中國大陸29個城市播放，遼寧省還派出200個電影隊到山區農村去放映。⁴⁶ 1950年代的中國大陸，文盲仍佔絕大多數，透過這種無遠弗屆的非文字媒體，它的宣傳功效自然要比文字大得多。由此可知，中共宣傳媒介的多元化，不拘泥於學校機關，更重視社會管道的傳播，因此涵蓋層面十分廣闊。

在蘇聯，共青團是宣傳、研讀《鋼鐵》小說，動員學習保爾精神的主要官方機構；在中國大陸亦然。中共共青團及其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誌、《中國青年報》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惜目前限於檔案資料之不足，無法有系統地了解共青團宣傳與動員等實際運作的來龍去脈。但是從一些已出版的刊物，尚可略知一二。

當《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話劇即將在北京演出時，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7年改稱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副書記廖承志即指出，演出目的有二：1. 向中國青年介紹蘇聯青年經過怎樣的奮鬥路途；蘇聯共青團經過怎樣的途徑成熟與強大；蘇聯共青團如何成為黨的後備軍。2. 向蘇聯學習，使中國共青團更進一步群眾化，提高政治覺悟，使黨員具有高尚革命品質，像保爾一樣。⁴⁷

⁴⁶ 〈蘇聯電影週勝利結束〉，《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7日，第4版。根據作家老鬼的回憶，電影還有插曲，其中一段歌詞如下：「仇恨的旋風在頭上怒號，黑暗的勢力還在喧囂，我們和敵人做絕死的戰鬥，誰勝誰負等待我們答覆。我們的鬥爭，神聖而正義，前進向前進，工人兄弟，我們的鬥爭，神聖而正義，前進向前進，工人兄弟。」但是筆者所看的1942、1956兩部電影中，都沒有這首歌曲。老鬼，《血與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52。

⁴⁷ 廖承志，〈演出保爾·柯察金的意義〉，《人民日報》，1950年9月20日，第3版。

1957年1月，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來華訪問，並到各級學校，包括北京大學，講述奧氏生平事蹟與宣揚保爾精神。⁴⁸北京大學共青團打鐵趁熱，為促銷保爾精神，即以北大學生黃堅的案例，透過師生討論的方式，引導學生學習保爾精神。黃堅16歲時，家鄉成為共產黨統治的地區，父親也因而有了工作。他在學校曾是第一批積極分子，加入青年團。參加土改宣傳工作時，他與同班女同學隸華成為好友。抗美援朝時，共產黨號召參軍，黃堅決心放下書本，報名參軍，並說服隸華一同參加。臨行前，隸華突然變卦不去。五年後，黃堅從解放軍轉業，考上北大，重回學校。一次偶然機會，兩人重逢，黃堅得知隸華已從大學畢業，現在科研機關工作，她與她的丈夫已在科學刊物上發表過好幾篇論文。黃堅不禁要自問是他自己錯了，還是隸華錯了？黃堅自認因為進步而參軍，卻庸庸碌碌過了五年，如果不「醒悟」，還會庸庸碌碌過一輩子。他得到的痛苦結論是，他為了政治活動，放棄了學業，等於是放棄了為人民服務的本錢。歲月不饒人，生活的經驗證明：忽視政治的人佔便宜。這些人將時間用在學業，學到了真本領；而政治活動只是說說而已，不能解決問題。黃堅最後的結論是，過去他「太幼稚了。……對一切都是那麼迷信，要追求電影小說裡描寫過的生活。幾年來，我明白了，這種生活，這種犧牲一切的英雄，在現實中都是沒有的，他只不過是作家和藝術大師們的理想而已。以往，我正是吃了幼稚的虧，現在應該老練點了。」但黃堅對這樣的結論又有幾分疑惑與不安。他覺得自己在政治上嚴重地掉隊，不知如何是好。他也曾想到要退團，省得成為團組織的包

⁴⁸ 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記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上冊，頁512；〈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同北京青年見面〉，《人民日報》，1957年1月21日，第4版。

袱，也省得心裡不安。但他又沒有這樣做，卻不曉得往後的路該怎麼走？⁴⁹ 他將自己的問題投書到北大校刊，請求指點。

黃堅的投書，引起了學校師生熱烈的討論。有讀者認為黃堅的看法不完全錯，因為用心於學業和參與政治，在時間上會起衝突，而學生的本分就是以學習為主。⁵⁰ 另有讀者認為黃堅也指出部分客觀事實，亦即如果他不參軍，在學業上會有更大的成就，這對科學落後的中國貢獻更大。⁵¹ 但也有讀者提出自己曾有過類似黃堅的經歷，並堅持他的選擇是對的，因為在北大生活美好的一切，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他也以參加這革命鬥爭為傲。黃堅參加韓戰並沒有白白浪費生命，在書本知識上雖落後，卻得到更生動、深刻的教育。在革命的路上並沒有停滯與落後。⁵² 這樣的敘述與觀點和保爾自我反省後，對自己一生做出的結語幾乎如出一轍。同時，有更多的讀者批評黃堅將個人名譽、地位與革命貢獻混為一談；他沒有正確理解對革命貢獻的問題，反而蒙上了個人主義的陰影。這些讀者一致認為黃堅過去所做的並沒有錯，錯的是現在的想法。他們呼籲黃堅應該鞏固革命的人生觀，不要計較個人得失，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真正的幸福是生活在集體中，共同為革命犧牲奮鬥。⁵³

⁴⁹ 〈大家討論：青年團員的稱號意味著什麼？〉，《北京大學校刊》，期 109，1957 年 3 月 3 日，第 4 版。

⁵⁰ 彥東，〈我認為學生不必做社會工作〉，《北京大學校刊》，期 111，1957 年 3 月 16 日，第 3 版。

⁵¹ 石新，〈這也是客觀事實〉，《北京大學校刊》，期 110，1957 年 3 月 11 日，第 3 版。

⁵² 王克武，〈我們愛唱這支歌〉，《北京大學校刊》，期 110，1957 年 3 月 11 日，第 3 版。

⁵³ 〈大家討論：青年團員的稱號意味著什麼？〉（系列），《北京大學校刊》，期 110，1957 年 3 月 11 日，第 3 版；期 111，1957 年 3 月 16 日，第 3 版；期 114，1957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大家討論：怎樣正確對待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北京大學校刊》，期 116，1957 年 4 月 19 日，第 4 版。

最後，北京大學青年團團委會宣傳部總結，應該學習保爾的精神：「那種對敵人無比的恨，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祖國無比的愛，學習保爾在平凡而又偉大的勞動中吃苦耐勞、艱苦奮鬥的精神，來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推進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⁵⁴ 黃堅的經歷與問題，在當時的青年之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共青團透過這樣的討論方式，無疑是要將保爾精神更深入青年的生活，樹立青年熱愛黨、勞動與革命事業的「正確」人生觀。

三、保爾典型中國化及其「正統」精神的捍衛

從內戰、韓戰結束以來，中共當局面臨大量復員後傷殘軍人的心理建設，實有必要積極提倡保爾的樂觀主義，頑強地、堅韌地與命運搏鬥。這也是為什麼《人民日報》報導革命殘廢軍人學校或榮軍教養院時，特別強調這些軍人如何身殘志堅，勇敢地面對肢殘之後的人生挑戰，依然努力學習，爭取為人民服務的機會。他們因此均被冠稱為「中國的保爾」。⁵⁵ 這些也就是 Lilya Kaganovsky 所闡述的肢體殘障，依然繼續為社會主義建設、黨國和領袖等理想獻身的新人。⁵⁶

⁵⁴ 團委會宣傳部，〈向保爾·柯察金學習〉，《北京大學校刊》，期 173，1957 年 11 月 30 日，第 4 版。

⁵⁵ 齊緯，〈最高貴的人——訪河南省革命殘廢軍人學校〉，《人民日報》，1952 年 12 月 20 日，第 3 版；馬少波，〈最動人的藝術〉，《人民日報》，1958 年 6 月 4 日，第 8 版；〈同身殘志不殘的英雄話別：文聯歡送四川革命殘廢軍人課餘演出隊〉，《人民日報》，1958 年 8 月 5 日，第 4 版；周祖佑，〈他們永遠是無畏的戰士——記四川革命殘廢軍人教養院的休養員〉，《人民日報》，1959 年 2 月 26 日，第 6 版。

⁵⁶ Lilya Kaganovsky, *How the Soviet Man Was Unmade: Cultural Fantasy and Male Subjectivity under Stalin*, pp. 22-23.

1953年，中共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主要重點是進行蘇聯協助中國設計的156個重點項目，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而從奧斯特洛夫斯基小說的書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意含企圖將人的意志也鍛鍊成如鋼鐵般的堅強，隱約呼應當時蘇聯政府工業化，亟欲躋入現代國家之林的訴求。⁵⁷ 中共提倡保爾精神，亦是有意藉此推行人的精神工業化，協助中共推動社會主義建設。1950年代中期，中共為解決城市青年失業問題，加上農業合作化運動與發展國營農場需要大量工作人員，政府因此鼓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邊遠地區墾荒或到農村發展文化工作。⁵⁸ 在這些上山下鄉的人和因為1957年反右運動而被下放者之中，也有秉持保爾刻苦耐勞、不畏艱辛的精神，從事過去知識分子所輕視的工作者。⁵⁹ 大躍進時期的城市居民也被組織參加義務勞動，例如北京市民組織保爾隊或學生的保爾排，勞動時高舉保爾的畫像，參加建設十三陵水庫等。⁶⁰

⁵⁷ 余一中認為這裡的「鋼鐵」與斯大林崇拜及其政治路線有關，因為斯大林的俄文姓(Сталин)的字根就是「鋼」(сталь)。余一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俄羅斯文藝》，1998年第2期，頁65。我認為「鋼鐵」一詞的使用與斯大林的政治路線有關，但與斯大林個人崇拜無關。理由有二：整本小說並沒有特別突出斯大林的角色。保爾的政治導師是紅軍老戰士或老黨員，不是斯大林。再者，小說於1932年開始連載時，蘇聯文學尚未有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⁵⁸ 這也是受了蘇聯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青年墾荒運動影響。中共青年團在方法上也有模仿蘇聯之處。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一九五三——一九六八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40-45；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頁18-19。

⁵⁹ 〈墾荒、築路、種菜開始了建設山區的第一步〉，《人民日報》，1958年1月27日，第4版；王昆侖，〈送女下放三首〉，《人民日報》，1958年1月28日，第8版；張正常，〈下鄉鍛鍊日記〉，《人民日報》，1958年2月13日，第4版。

⁶⁰ 〈四個多月達六百八十萬人次 首都人民爭先參加義務勞動〉，《人民日報》，1958年5月17日，第4版。

有趣的是，保爾這位蘇聯英雄在中蘇關係惡化期間，在中國大陸扮演了十分弔詭的角色。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嚴厲譴責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及其對黨國元老大整肅的罪行，隨後他又常提對美和平競賽，不提階級鬥爭。這些均令毛澤東對赫魯雪夫心生不滿。1960年赫魯雪夫突然決定召回全部蘇聯在華顧問。1963年夏天起，中共接連發表九封批判蘇共的公開信，蘇共也不甘示弱地回應。中蘇雙方的叫囂與對罵，節節高升，中共乃以保爾「正統」精神的維護者自居，以此痛斥蘇共的修正主義。

當中蘇關係破裂公開化之後，中共一方面積極維護「正統」的保爾精神，另一方面也感到需要尋找取代蘇聯的保爾典型，推出國產的新人典型。事實上，早在1950年代，在眾多進口的蘇聯新人典型中，也摻雜有少數幾位本土新人典型。最早也是中共力捧的有兩位：劉胡蘭和董存瑞。劉胡蘭14歲即成為中共候補黨員，15歲為閻錫山軍隊逮捕，從容就死。毛澤東曾經特別為她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她的小傳在1951年夏天出版，也是青年團員的必讀刊物之一。⁶¹董存瑞在16歲即加入解放軍，19歲因為捨身炸碉堡而犧牲。他的一生也被寫成故事書出版，廣為流傳。⁶²還有一位別號「中國保爾·柯察金」的吳運鐸，1939年5月加入共產黨。抗戰時，因要取出雷管的炸藥，左手炸掉了四個手指，且炸瞎了左眼，國共內戰他再度負傷。吳運鐸雖然身體殘廢，仍然認真堅守工作崗位，努力不懈。他自己也承認受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影響很深。中共不但大

⁶¹ 劉胡蘭，山西人，生於1932年，死於1947年。梁星，《劉胡蘭小傳》（北京：青年出版社，1951第1版，1952第3版）。

⁶² 董存瑞，河北人，生於1929年，死於1948年。丁洪、趙寰、董小華，《真正的戰士：董存瑞的故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

量發行吳運鐸寫的《把一切獻給黨》，也將他的事蹟描繪成 16 圖的連環畫出版。⁶³

生於 1915 年的吳運鐸，到了 1960 年代初期，已經年近半百，拿來當全國的新人典型，年齡顯得太大。全國的典型必須年輕，最好已經不在人世。如果新人典型還健在，就存有種種潛在的危險，難保哪一天做出違反官方標準的事來。所以，最好找個涉世未深，易於「塑造」的青年「烈士」當典型。孤兒出身又早死的雷鋒是最好的「可造之才」。他生於 1939 年，死於 1962 年的一場倒車意外。以他作為新的全國性中國社會主義新人典型，最適合不過。1963 年 3 月，中共發起大規模的全國性學習雷鋒運動。共青團中央呼籲青少年學習雷鋒的：1. 忠於黨，忠於無產階級立場；2. 做一個「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3. 關心同志，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風格；4. 勇於克服困難的意志，艱苦樸素的作風；5. 堅持又紅又專，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⁶⁴ 4 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在全國發行《雷鋒日記》。日記所摘錄的名言：「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的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嚴酷無情。」以及他勉勵自己的話：「我一定要好好學習和工作，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做毛主席的好戰

⁶³ 吳運鐸，《把一切獻給黨》（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 第 1 版，1957 第 3 版）；潘力模畫，〈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兵工功臣吳運鐸〉（上，下），《中國青年》，1951 年第 79-80 期，封底連環畫。根據新華社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稿編繪。最後一圖是他讀《鋼鐵》書，反覆唸著：「我只要求給我留下一點能夠維持生命的東西，一顆心臟和一葉肺，我還要堅強地鬥爭下去。」

⁶⁴ 〈共青團中央關於在全國青少年中廣泛開展「學習雷鋒」的教育活動的通知〉，《中國青年》，1963 年第 5-6 期，頁 9。《中國青年》這一期是學習雷鋒的專輯。

士。」⁶⁵ 隨著日記和官方傳媒的散播而廣為人知。

繼雷鋒之後，中共又發起學習解放軍戰士王杰、歐陽海等運動。官方均為他們出版了書籍；所強調的共同特質是，他們都聽毛主席的話，願意接受組織分配的任何工作，樂於從事任何微小的善行。⁶⁶ 基本上，歐陽海、王杰的新人典型，就是雷鋒精神的重複。他們的做人處事幾乎接近完美，難有可議之處。這些 1960 年代官方所推出的英雄，與中共建國前後的典型有很大的不同之處，那就是對毛澤東個人的歌頌與崇拜。

1964 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編印了《青年英雄故事》一書，介紹的 13 位中國青年全已過世，其中有多位女性。九位是戰死或為敵人逮捕而死；一位是參加韓戰時，為救一小孩而死；剩下三位則是因公殉職。他們的年齡從 15 歲到 28 歲不等。⁶⁷ 這些「舊」典型（他們的事蹟都發生在 1940、1950 年代，李貢死得最晚——1959 年）與 1960 年代的「新」典型有一點顯著不同——他們沒有明顯地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其中丁佑君想要效法的對象是蘇聯的丹娘，黃繼光引為模範的是馬特洛索夫，而不是毛澤東。相比對照之下，雷鋒和王杰則將自己所有的事蹟與行為全都歸功於毛主席的教導，並將毛的思想運用於日常生活。而在中國新版本的保爾典型《歐陽海之歌》一書中，作者金敬邁認為歐陽海天生具有階級意識，且對革命事業有無私奉獻的

⁶⁵ 雷鋒，《雷鋒日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63），頁 15、20。

⁶⁶ 解放軍報編輯部編，《王杰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金敬邁，《歐陽海之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Mary Sheridan, "The Emulation of Hero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3 (Jan.-March, 1968), pp. 47-72.

⁶⁷ 這些英雄是劉胡蘭、董存瑞、王孝和、丁佑君、楊根思、羅盛教、杜鳳瑞、龍均爵、向秀麗、李貢、黃繼光、丘少云、安業民。中國青年出版社編，《青年英雄的故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4）。

精神，但仍不足以為新人。他特別強調的是新人的成長在於不斷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必須能看出來毛的思想在歐陽海身上產生巨大威力，才算是真正的新人。⁶⁸ 金敬邁的觀點十足反映出當時中共當局對新人的新定義。

在中蘇意識形態的論戰期間，中共認為誰熱愛保爾，誰就是社會主義的正統。中國共青團總書記胡耀邦在全國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嚴厲指責蘇聯的修正主義，聲稱蘇聯當前所提倡的是個人主義。他說蘇聯不但批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戰士雷鋒「沒有頭腦」、「荒唐」，而且認為保爾·柯察金的時代已經過去。保爾「那種苦行僧式的共產主義者，對於達到狂熱赴死程度的自我犧牲精神，是過於熱衷，也過於長久地加以英雄化。」⁶⁹ 文革之初，旅蘇學生亦指證歷歷地聲稱，蘇聯《共青團真理報》曾經刊出保爾精神已過時的文章，還宣傳「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資產階級人生觀」。⁷⁰ 當時任何與中共官方意見相左的觀點，均被指控為資產階級思想；在中蘇關係已經完全破裂，蘇聯成為中共的頭號敵人之下，這樣的指控可能有斷章取義、流於意氣之嫌。況且 1966 年 10 月 4 日，蘇聯當局還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家鄉樹立他的銅像。蘇共沒有否認保爾精神，而是將奧氏等同於保爾，是英勇的象徵，稱頌他為革命獻身。⁷¹ 《共青團真理報》的報導沒有

⁶⁸ 金敬邁，〈《歐陽海之歌》的醞釀和創作〉，《人民日報》，1966 年 3 月 1 日，第 6 版。

⁶⁹ 胡耀邦，〈為我國青年革命化而鬥爭〉，《人民日報》，1964 年 7 月 7 日，第 2 版。

⁷⁰ 〈我留蘇學生代表憤怒揭露蘇修領導集團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人民日報》，1966 年 11 月 15 日，第 4 版。

⁷¹ А. Левина & Э. Есман, "Правобланговый Комсомолий: В Шепетовка открыт памятник Николаю Островскому," (共青團員的標兵：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雕像在謝比托夫卡揭幕)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共青團真理報), 4 октября 1966 г. (1966 年 10 月 4 日), с.1.

片言隻字提倡「資產階級人生觀」。

整體而言，中蘇交惡之後，中共對保爾精神的宣傳重點主要放在強調階級鬥爭與批判蘇修的框架之下處理，特別是在 1962 年秋天，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月月、日日講之後。如 1963 年《鋼鐵》小說以連環畫形式出版時，強調的即是保爾的無產階級出身與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⁷² 1964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程代熙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序言中稱讚該小說是「一本告訴人們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不要忘記過去的好書，也是一本給人長革命志氣、增革命幹勁的好書。」⁷³ 在文革期間，保爾精神再度被中共拿來當作有力的政治武器。對外，繼續用來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對內，用來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與階級鬥爭精神。1970 年代初期，四人幫尚大權在握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曾經數次打算再版梅益的譯本，但是因為譯者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一直無法付梓。⁷⁴

文革強調無產階級革命和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更反映在 1976 年 6 月，大慶油田採油三部部分工人、黑龍江大學中文系 72 級工農兵學員和革命教師經過座談、討論，為新譯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寫的前言：「今天閱讀這部小說，會使我們更加珍愛無產階級專政，更加憎恨蘇修叛徒集團，更加堅定把反修防修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文章稱讚保爾·柯察金是「無產階級戰士的典型形象，在他的身上反映了整個一代革命青年的鬥爭歷程和革命精神。」他「自覺地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侵蝕，主動地向他們發起

⁷² 王素、夏星改編，毅進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⁷³ 程代熙，〈譯本序〉，收入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頁 15。

⁷⁴ 梅益，〈重版後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 528。

攻擊。為維護無產階級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純潔，他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保爾成長的道路，深刻表明：一個革命青年，不可能自發地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只有在黨的領導下，在革命鬥爭的烘爐中長期冶煉，努力學習馬列主義，與舊的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絕裂，只有經過這樣長期艱苦的鬥爭、學習、改造，才能百鍊成鋼，成為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自覺戰士，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⁷⁵ 他們還以文革期間提倡英雄必須「高、大、全」的標準，來檢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不足之處。他們認為小說對保爾和冬妮婭的感情描寫，渲染過多；在描寫保爾喪失健康和他的作品尚未出版時，流露某種絕望情緒，亦是一項缺失。這些都折損保爾的英雄形象。⁷⁶ 這些人對保爾形象提出的批評，亦表示文革期間所要求的新人典型，必須在階級立場、道德、行為各方面完美無缺。

相較於中國新人典型，保爾的個性不夠完美，卻反而讓人感到比較真實。他的脾氣暴躁，有時還會說粗話，不守紀律。⁷⁷ 保爾個性鮮明，內心有衝突、有鬥爭，他成為政治人是有一個成長和成熟的過程。一般而言，蘇聯的新人典型都有一段從無政治意識到有政治意識

⁷⁵ 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和俄語系 72 級工農兵學員合譯，〈前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頁 1、3-4、6-9。根據 1953 年版本翻譯。

⁷⁶ 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和俄語系 72 級工農兵學員合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 9。

⁷⁷ 保爾想轉到騎兵第一軍時，被政治指導員斥為蔑視紀律，帶點無政府主義的味道。保爾承認指導員說的都對，但還是決定轉過去。而他用「奔放的感情去生活」，也被視為是不守紀律的缺點。即使後來修養較好，還是有按捺不住脾氣，動手打人的時候。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 178-9、210、395。

的成長過程。⁷⁸ 而中國的新人典型不是這個成長過程極短，就是根本沒有。他們天生便具有政治意識、富有階級鬥爭觀念，沒有任何思想上的衝突與轉折。中國的新人典型都是有骨無肉，澀而無味，更禁慾，人物平面化，沒有個性，毫無脾氣。他們彷彿是被捏出來的泥人，沒有生命，只有教條；沒有內心衝突，沒有善惡之爭。他們的生活中只有黨與革命，更沒有男女之情。這就像中國傳統的京劇一般，正反面的樣板人物都臉譜化，只有好壞兩極；好人一路好下去，壞人一路壞到底。

四、民間的解讀

雖然《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文革之前發行量極高，甚至是當時中譯小說中銷售最多者，但單從銷售量的多寡並不足以完全說明實際上就是民間最受歡迎的小說。銷售量高也與官方指示性的大量發行、大量購買有關，但也不該忽略當時有許多沒有餘裕買書的人，是透過圖書館或親友同儕輾轉借閱該書而來。如果把官方宣傳的保爾精神當作是一種產品，那麼一旦產品離開官方這個生產者之手，消費者要如何使用這項產品，生產者便難以干涉。這也是解讀民間反應最複雜的地方：它可能有與官方宣傳契合的地方，也可能出現不同，甚至完全背道而馳的解讀。

呼應官方說法或接受官方宣傳保爾精神的讀者，不在少數。在各種官方報刊雜誌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論調，這些不全然都是機械式地被接受。他們咸認青年應該響應黨的號召，願意到祖國最需要、最艱

⁷⁸ Katerina Clar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

苦的地方去，重新創造美好的生活。保爾那一切為了祖國而忘我犧牲的高貴情操永遠值得效法。⁷⁹當中共號召知青上山下鄉時，確實有許多熱血青年在保爾精神的鼓勵下，積極投入各種國家建設，志願支援新疆建設等。⁸⁰作家老鬼（馬波，楊沫的兒子）還是中學生時，決定到內蒙古兵團勞動，而保爾在小車站上的狂熱苦幹的精神，即是他的楷模。⁸¹雖然也有人是被迫下放勞改，在無盡的屈辱和沉重的勞役中，是保爾精神陪他們在泥濘中跋涉，度過他們的人生逆境。⁸²

其實，保爾精神最令人感動、效法最多的是他在已成殘廢的情況下，仍能不對冷酷的命運低頭，繼續勇敢地迎接生活挑戰。這對眾多或因天生病殘，或因戰爭、工作、意外成殘者而言，提倡學習近乎真人真事的保爾精神，幫助他們度過人生難關，是最有效的精神鼓舞。例如，24 歲的青年阮頌銘因風濕性關節炎長期臥病在床，原對自己的前途感到絕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帶給他勇氣與希望。他決心學俄文，經過多年努力，發表許多譯作。在許多城市均有類似的例子。⁸³又如，一位初中生廖貽訓參加韓戰負傷，四肢殘廢，只剩大拇

⁷⁹ 王成玉，〈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影片保爾·柯察金觀後隨筆〉，《北京日報》，1957年11月10日，第3版；羅明，〈保爾·柯察金給我的感受〉，《新疆日報》，1957年11月17日，第3版；葉軍（北京大學），〈保爾的「得」「失」〉，《中國青年》，1957年第24期，頁22。

⁸⁰ 張惠仁，〈拿起鐵鍬，千萬不能摔倒〉，《中國青年報》，1957年11月22日，第3版；李輝、藍英年，〈一個世紀的漫長接觸和影響——關於蘇聯文學與中國的對話〉（上），中構網：<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12.htm>（2000年11月17日檢索）。

⁸¹ 老鬼，《血與鐵》，頁54。

⁸² 范若丁，〈尋找保爾·柯察金〉，<http://book.peopledaily.com.cn/big5/paper17/1/class001700002/hwz1119.htm>（2000年11月11日檢索）。

⁸³ 姚遠方，〈蘇聯文學和中國青年〉，《中國青年》，1957年第21期，頁7；李士媛，〈保爾·柯察金鼓舞我前進〉，《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10期，頁12-13、

指尚能活動。他躺在床上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真正的人》，鼓舞其鬥爭意志與勝利信心，並特別效法保爾精神，努力學習寫字。⁸⁴ 另一位因韓戰失去雙臂的黃仁川，因為看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連環畫，重新站起來，當上宣傳員，也學會用嘴畫畫。⁸⁵ 這樣的案例，《人民日報》每年總有幾則報導，這與官方主流思想也可以互相呼應。

效法保爾精神很有趣的例子是高玉寶。貧農出身的士兵高玉寶，只受過一個月的教育，寫十個字，就得問七、八個字，受到毛澤東質疑為何中國小說沒有以耕田漢為主角的啟發，決定提筆寫自傳。寫作期間，軍中有位宣傳股長對他說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因此大受鼓舞。這位「文藝戰士」信心滿滿地說：「瞎眼的奧斯特洛夫斯基能寫，睜眼的我慢慢寫，總比瞎子寫得好。」結果寫成一部長達 30 萬字的自傳小說《高玉寶》。⁸⁶ 不過，在官方表揚工農兵作家的高潮過去之後，他的小說乏人問津。

不同年齡層學習英雄的行為也會有所不同。大學生有大學生的解讀，小學生有小學生的體會。對好動、頑皮的小學生來說，最吸引他們的恐怕是保爾在小說中幾場打架的情節。保爾的調皮搗蛋最對小學

17；吳嘉，〈「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讀後〉，《中國青年》，1951 年第 81 期，頁 31；彭樹智，〈蘇聯文藝作品鼓舞我戰勝了疾病〉，《中國青年》，1953 年第 21 期，頁 33。

⁸⁴ 廖貽訓，〈重新戰鬥的開始〉，《人民日報》，1952 年 1 月 6 日，第 4 版。

⁸⁵ 樊炳義，〈黨的優秀的宣傳員〉，《人民日報》，1959 年 5 月 19 日，第 6 版。

⁸⁶ 高玉寶的寫作方式：不會寫的字，或寫別字代替，或畫各種圖形符號代替，如果連畫也畫不出來的字，就畫個圓圈。他寫好一段，問人家一段，把整段字問清了，再謄清在另一個大本子上。〈英雄的文藝戰士高玉寶〉，《人民日報》，1951 年 12 月 16 日，第 4 版；高玉寶，〈我是怎樣學習文化和學習寫作的？〉，《人民日報》，1952 年 6 月 8 日，第 4 版。

生的胃口，特別是常被老師處罰的學生，對保爾在學校因惡作劇而受罰，更能引起共鳴。保爾的故事為他們指出一條光明大道：在校是劣等生，長大之後也可以成為英雄。⁸⁷ 作家老鬼回憶他讀小學時，北京正在上映《保爾·柯察金》這部電影，他百看不厭。他認為保爾將褲子弟維克多打到河裡那一段最精彩。這場面給他許多影響和啟示，其中包括打架能夠贏得美人心，「美麗高貴的冬妮婭就是因為保爾會打架才跟他好的」。他和同學們常在晚自習之後，冒著寒風，跑向宿舍之際，學保爾騎馬衝鋒的樣子，高唱電影主題曲。他覺得這首歌有股神秘的力量，一唱起來，非抬頭挺胸不可，一點也不怕冷，反而渾身是勁，「很想找個壞蛋殺一番」，同時也想體會保爾殺白軍的感受。⁸⁸ 英雄應該殘酷地對待敵人，如同雷鋒後來的名言「對待敵人要像冬天一樣殘酷無情」，也是當時許多中小學生共有的想法。文革時期使用殘忍的暴力對待所謂的「階級敵人」的成因很多，其中之一或許與這種模仿革命英雄的作法不無關係。

從資料顯示，官方全力宣傳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要在1950年代初期，到了晚期青年的閱讀興趣似有轉移。根據共青團浙江省委調查，浙江青年的閱讀和欣賞興趣，由一些官方認為有教育意義的嚴肅作品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把一切獻給黨》、《普通一兵》、《高玉寶》等，轉向中國古典文學如《水滸傳》、《封神榜》、《三國演義》、《聊齋誌異》、《紅樓夢》等。⁸⁹ 就作品的藝術性而言，這些

⁸⁷ 〈鋼鐵咋這樣煉成了？〉，<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7.htm> (2000年11月17日檢索)。

⁸⁸ 老鬼，《血與鐵》，頁52、54。作者關於主題曲的回憶可能有誤，電影中並沒有這首歌曲，反而是孫維世導演的話劇中有，但歌詞內容不同。

⁸⁹ 〈浙江省青年近年來對文學藝術的欣賞興趣有很大的轉移〉，《內部參考》，期2389 (1957年12月26日)，頁11。

中國古典作品遠比那些官方認為有教育意義卻是硬梆梆內容與說教的作品，更能引人入勝。這樣的心理與觀眾愛看古代戲，不愛看反映當前生活和鬥爭的戲，頗有異曲同工之妙。⁹⁰

民間解讀與官方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歧異最大者，莫過於保爾與初戀情人冬妮婭的感情。他們的愛情，一直是許多青少年最喜歡的故事情節。官方所強調的是他們兩人分屬不同的階級，分手乃是必然。他們兩人最後一次相見時，保爾正賣命地修築鐵路，冬妮婭看到衣衫襤褸、營養不良的保爾，不禁驚訝保爾「混得如此糟」。保爾則反唇相譏冬妮婭變得如此的帶有資產階級的「酸臭」。這樣的言語交鋒也證明了兩人迥異的人生觀，從此分道揚鑣。自然有讀者會接受這種官方強調的階級觀點，但也有不少讀者階級意識不夠，最令他們如醉如癡，心神嚮往的正是保爾與冬妮婭的戀情，對於他們不能結為神仙美眷，感到萬分惋惜。⁹¹ 這樣的迷戀在文革時期更為明顯。當時官方特別強調的是不斷革命，清心禁慾；文學禁止描寫男女之情，電影也從來不會出現可能導致男女產生愛情的情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文革期間少數能夠公開出版的外國文學之一，保爾與冬妮婭的戀情，對於許多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來說，正好提供他們在精神上可以宣洩與愛慕的管道。當時許多青少年記得的不是官方宣傳的階級愛情觀，而是冬妮婭那迷人的大眼睛與笑容，她的小資產階級氣質。因推出搜狐網站，成為大陸富豪之一的張朝陽，回憶他在 1970 年代擔任紅小兵時，對冬妮婭的印象最深，覺得她所有的一切，對於當時在

⁹⁰ 〈上海各劇場現代劇目上座率低〉，《內部參考》，期 2488（1958 年 5 月 24 日），頁 13。

⁹¹ 淳亮，〈《鋼鐵》——那燃燒著的真實人生〉，http://culture.163.com/edit/000707/000707_31399.htm（2014 年 1 月 24 日檢索）。

物質與精神生活都赤貧的中國小孩而言，彷彿來自童話世界。這也是他第一次在書裡接觸到關於男女的描述。⁹² 文化評論家劉小楓也回憶到他一開始就喜歡冬妮婭。「她性格爽朗，性情溫厚，愛唸小說，有天香之質；烏黑粗大的辮子，苗條嬌小的身材，穿上一襲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個具體的輕盈、透明的美人形象。」冬妮婭代表的是文革時不被允許存在的個人主義。⁹³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初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高居官方排行榜，且受到相當數量民眾的歡迎。1982年，遼寧共青團在團幹部和團員間舉行「薦書有獎」活動中，前五名的推薦書目，就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⁹⁴ 但是進入1990年代，雖然該書在官方排行榜仍舊居高不下，⁹⁵ 這多少與中共官方的刻意促銷與宣傳有關。不過，在一般青年心目中的排行榜已經大幅滑落。1980年代初在上海高校做過讀書調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名列前茅。但是到1997年再做讀書調查，其中最受歡迎的17本書，包括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飄》、《簡愛》、《悲慘世界》等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卻榜上無

⁹² 張朝陽，〈暗戀冬妮婭〉，中構網：<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5.htm>（2000年11月17日檢索）。

⁹³ 劉小楓，〈記戀冬妮婭〉，《讀書》，1996年第4期，頁85；劉小楓，〈冬妮婭的中國情節〉，中構網：<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10.htm>（2000年11月17日檢索）。

⁹⁴ 本刊編輯部，〈「薦書有獎」活動揭曉〉，《遼寧青年》，1982年第11期，頁24。

⁹⁵ 例如：1998年，根據大陸圖書市場的統計數字，這本書名列暢銷書排行榜第5位。1999年，以《光明日報》為首的多家媒體，評其為「感動共和國的五十本書」之首。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對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接受反饋的思考〉，收入戴錦華編，《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文化出版社，2000），頁198。

名。⁹⁶ 其背後成因之一，與 1980 年代初、中期出現的文化熱頗有關係。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仍相信代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和現代化可以結合。但是天安門事件和對政治改革的幻滅，打破了這種想法，加上文化熱期間西方文學著作大量出版，⁹⁷ 代表「革命」的蘇聯文學幾乎完全被拋諸腦後。

1990 年代，中國的市場經濟熱絡的結果是出現信仰危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再度先後搬上銀幕或舞臺，也是這種心理的反映。路學長自編自導的電影《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結局是男主角懷抱著 1950 年代的理想主義，面對 1990 年代的現實環境，造成他的迷惘與游離心態。導演特別說明這種感受：「我們這一代人處在一種很尷尬的位置，……我們是夾在兩撥人之間的一代，……我們今天所處的現實，與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打架。」⁹⁸ 這已經反映出毛時代的集體主義與理想主義碰上改革開放蓬勃發展的經濟掛帥與唯我主義，其間鴻溝日益擴大；舊的信仰已崩解，新的卻還沒有找到。很可能由於這部電影的結局過於灰色、悲觀，幾乎等於完全否定官方仍然想極力挽回的革命新人的形象，電影因此經過三年的大修改，並將片名改為《長

⁹⁶ 余一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俄羅斯文藝》，1998 年第 2 期，頁 69；〈上海四所大學讀書調查——名著最喜愛，《紅樓》居榜首〉，《重慶晚報》，1997 年 11 月 27 日，第 3 版。

⁹⁷ 關於文化熱與當時思潮的現況，參見陳彥著，裴雲譯，《中國之覺醒——文革後中國思想演變歷程，1976-2002》（香港：田園書屋，2006），頁 84-151。

⁹⁸ 路學長生於 1964 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該片劇情始於成長於 1970-1980 年代的男主角周青，偶然撿到一本殘缺不全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連環畫，他便以保爾自居，並以書中的朱赫來（保爾的政治啟蒙導師）為其偶像。電影最後於 1997 年底上演。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收入《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頁 199-201；路學長，〈30 歲對 40 歲說——關於《長大成人》的對話〉，《中國青年》，1998 年第 1 期，頁 62。

大成人》，方准上映。同年秋天，一群前衛、時髦的青年，將小說編成話劇。他們的童年是在保爾的小說、電影、漫畫書中度過的。製作人張揚回首自己過去將近三十年的歲月，卻發現自己的青春沒有顏色，無法在未來生活中找到支撐點。他想念保爾，就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樣東西。他要呈現的保爾是超越意識形態，具有人的高尚尊嚴，為生命奮鬥的積極意義的範例。雖然話劇抽離了革命等政治元素，仍因票房慘澹而停演。⁹⁹ 1999年，為慶祝中共建國五十週年，出現了一部以保爾的感情生活為主軸的大型電視連續劇。¹⁰⁰ 該劇即使以愛情戲為主，仍難以吸引年輕族群。據非官方的抽樣調查，沒看過這部戲的初中生佔60%，高中生佔73.8%。若干看過的學生表示，如果不是老師要求他們寫觀後感，他們根本不會看。許多中學生也不知道保爾是誰，反而對同時段播出的港劇《楊貴妃》津津樂道。¹⁰¹

從路學長的電影到連續劇的播放，保爾精神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最為贊成保爾精神的是一些中老年人，他們認為保爾的一生體現了人生的真正意義；他所顯現的不只是一個革命戰

⁹⁹ 1998年元月初在北京兒童藝術劇場上演。雖然新聞媒體宣傳這齣戲的轟動與賣座，實則不然。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收入《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頁202-203；趙彩婧，〈今天，我們還能「消化」保爾嗎？〉，《中國青年》，1998年第4期，頁58-59。

¹⁰⁰ 深圳一家私人傳播公司與深圳市委宣傳部、中央電視台共同出資和參與製作，總導演韓剛。梁曉聲，《重塑保爾·柯察金》（北京：百花出版社，1999）。雖然導演與編劇在拍製過程中，屢為劇本內容與修改發生爭執，但以愛情為主軸的觀點並沒有改變。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收入《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頁203，註2。

¹⁰¹ 〈「保爾」是昨天的英雄？〉，<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6.htm>（2000年11月17日檢索）。

士的優秀品質，也是一切階級的英雄特質。¹⁰² 有些人以為，保爾的革命戰鬥精神，在今天或許已經不合時宜，但他追求生命意義的精神，仍有現實的迫切意義。¹⁰³ 但是，這些看法在年輕的一代很難引起共鳴。即使贊同保爾精神的青年，談到要效法的也不是他為革命犧牲奉獻的精神，或堅守共產主義理想；而是要學習保爾鋼鐵般的意志，克服障礙，超越自我。¹⁰⁴ 極力反對保爾精神者，是那些覺得青春受騙的中年人。他們認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表現出極左思想與斯大林路線。這本書讓人喪失獨立思考、正常戀愛、正常交友做人的能力。即使保爾精神仍然發光，那也只是餘光，終將熄滅。¹⁰⁵ 他們進而責備自己的祖、父輩的中國人，「沒有理性，沒有寬容，沒有文明，沒有愛。」只想將後代培養成合格的政治動物，為那所謂革命理想，拚命鼓勵人當革命英雄。但即使當了英雄，卻發現世界如此冰冷，物質與精神都極端匱乏，只剩下鬥爭和仇恨，這種理想不要也罷。現在卻又要鼓吹小孩學習保爾，等於是繼續培養小孩的愚昧。父母這種懷舊情緒，是把受騙荒廢的青春當作珍寶。¹⁰⁶

¹⁰² 任光宣，〈重讀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俄羅斯文藝》，1998年第2期，頁60；杜林，〈走進去，跳出來：我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俄羅斯文藝》，1999年第1期，頁77-78。

¹⁰³ 吳俊忠，〈我們是否還需要「保爾精神」？〉，《俄羅斯文藝》，2000年第3期，頁10-12。

¹⁰⁴ 劉亞樂，〈給胡金梅老師的一封信〉；劉書琴（全國勞動模範），〈在工作中體驗保爾〉，<http://www.zuowen.com>（2000年6月21日檢索）。

¹⁰⁵ 余一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俄羅斯文藝》，1998年第2期，頁63-69；余一中，〈再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俄羅斯文藝》，2000年第3期，頁20-25；董健，〈「保爾熱」下冷思考〉，《俄羅斯文藝》，2000年第3期，頁13-15、25。

¹⁰⁶ 〈鋼鐵咋這樣煉成了？〉，<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7.htm>（2000年11月17日檢索）。

事實上，今日的大陸學生覺得保爾那個時代已經離他們十分遙遠。官方傳媒雖然還在大力提倡保爾精神，中宣部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為中學生指定的課外讀物，強調的不是革命和階級鬥爭，而是保爾樂觀豁達的人生觀；試圖利用保爾精神來挽救中國人民的信仰危機，但成效有限。一位初中生坦白地告訴親人，為了老師的面子，勉強擠出勵志感想，但他看了兩遍小說也沒看懂，真實的感受就是「保爾真慘」。許多中學生更不明白保爾吃了那麼多苦，是為了什麼？蘇聯已經解體，保爾的革命理想還是沒有實現，他的苦不是都白吃了？¹⁰⁷這樣的反問真是道盡了 1950、1960 年代那些堅守保爾精神，一心為黨為國，卻受盡各種政治運動折磨者無盡的悲哀。1990 年代末期以來，絕大多數學生崇拜的對象已經不是保爾，而是比爾·蓋茨等事業有成的人。¹⁰⁸在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念與崇美觀念的影響下，多數青年認為成功者不再是刻苦耐勞，或願意做社會螺絲釘，卻孑然一身的人；他們必須是財富傲世或有崇高社會地位的人。

1990 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除了中共當局仍高舉共產主義的大旗，對於保爾的英雄典型及精神，尚在做最後逆流而上的搏鬥之外，今日大陸青年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評價，實則已急速滑落，在俄國更是乏人問津。1991 年之後，隨著蘇共的崩解，這本小說在俄國鮮有人提及，甚至出現意圖解構這本小說的報導。2006 年 11 月 20 日，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接受《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的採訪，聲稱她

¹⁰⁷ 杜致萬，〈網上對話錄——關於保爾和比爾·蓋茨〉，《俄羅斯文藝》，2000 年第 3 期，頁 16-19、33；何云波，〈當神聖已成往事——世紀之交「鋼鐵熱」之反思〉，《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33 期 1（2009 年 1 月），頁 133。

¹⁰⁸ 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收入《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頁 216-219。

的舅舅不是工人，而是軍人家庭出身。他並非完全聽從黨的命令，曾經拒絕射殺白軍。他在晚年對蘇聯當局的作為迭有批評，常說：「這完全不是我們過去奮鬥所要的」。¹⁰⁹《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在蘇聯解體後對許多歷史事件的報導，無法完全令人信賴，基於沒有其他資訊可以證明奧氏外甥女所言皆屬實，姑且存而不論。但是出現這樣的報導，也意味有些人想要顛覆過去官方對奧氏生平的陳述，等於是間接質疑官方宣傳的保爾精神。其次，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故居在他死後成為紀念他的博物館，1992年，更名為自強人文中心（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Центр «Преодоление»），成為老兵和殘障人士恢復身心健康和創作能力的活動中心。時至今日，走訪莫斯科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的中國人，遠比俄國人多；而這些拜訪的中國人之中，恐怕追悼他們逝去青春的人多於要效法保爾精神的人。

五、小 結

中共學習蘇聯的方法，宣傳新人；運用五花八門的媒介來傳播以保爾為典型的新人精神。毛澤東期待中國人民都能夠「六億神州盡堯舜」，但在全國大部分百姓未成為「堯舜」新人之前，尤其需要典型作為標竿和模範；在中國的新人尚未完全成為氣候之前，必須借重蘇聯的典型如保爾，作為中共宣傳的主角。

保爾精神體現了新人主要的價值觀念。中共期望老百姓都能夠效

¹⁰⁹ 報導見 Светлана Самоделова, “Переплавленная жизнь,” (重新評說的一生)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http://www.mk.ru/editions/daily/article/2006/11/20/175049-pereplavennaya-zhizn.html> (2014年7月19日檢索)。

法保爾為了革命的理想，解放全人類的事業，犧牲奉獻，甚至因此致殘或喪失生命，都能夠無怨無悔；同時聽從黨的領導，跟著黨的路線走。然而，即使中共從建國初期即致力於學習和宣傳保爾精神，其所強調的內容和原著小說主人翁的個性與作為，仍然出現差異，這也是中共在學習蘇聯新人的區別。保爾及其精神一方面是社會主義新人具體而微的典範，另一方面中共的宣傳內容因政治變遷而有不同的著重點，正顯現了蘇聯模式在中國的調整。以下各章將選用單一媒介，詳述新人的單一觀念在中國的宣傳和政治氣候下的變化，以及與蘇聯模式的差異。

第二章

民族／愛國主義爲首——

教科書中的國際觀

無論哪一門功課，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一種思想內容或一個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說理的論文來表達，也可以用一篇小說、一首詩歌、一個歷史故事或者一個自然科學故事來表達。¹

在共產黨的理念中，「民族主義」被稱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因為它是從狹隘的資產階級自身利益出發，並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價值是對立的。² 因此，共產黨以愛國主義來取代民族主義。事實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雖有重疊

¹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大意（1950年6月）〉，收入宋雲彬等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冊3，頁3。

² 劉少奇，〈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人民日報》，1948年11月7日，第1版。劉少奇直接將 nationalism 譯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由於 nationalism 一般包含國家和民族雙重含意，翻譯為「國族主義」較為貼切，但是為遷就共產黨的理念詮釋，全章將用「民族主義」。

之處，但後者的涵義比前者廣。

毛澤東時代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國際觀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大陣營」概念轉變為「三個世界」概念。中共對三個世界的定義是：美國和蘇聯都是第一世界的帝國主義強權，亞洲（日本除外）、非洲和拉丁美洲屬於第三世界，其餘國家則劃歸到第二世界；而由中國領導第三世界對抗第一世界。1949年，毛澤東決定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後，美國就成了中國的頭號敵人。自從中蘇關係惡化後，蘇聯悄悄取代美國，成為中共的首要敵人。中共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國際觀的轉變，不是環繞著中美關係，而是以中蘇關係為軸心轉移。

中共建國之後，中國屬於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聯合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及其所代表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³ 根據馬列觀點，這兩大陣營的發展模式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勝。套句毛澤東在大躍進時說得非常俗白的話就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到了1950年代後期，毛澤東口頭上還是以蘇聯為首，卻逐漸有取代蘇聯成為社會主義陣營領導的雄心。文革時期的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在對外關係上就是反霸權主義。這個時候的反霸不但包括美國，更重要的是反對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雖然到1974年，毛澤東才正式公開提出第三世界的說法，實際上從1960年代以來，這樣的觀念和趨勢已經逐漸形成。

³ 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國際觀提供了理論基礎。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的一種延伸，反帝國主義和殖民問題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有進一步的闡發。參見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卷27，頁323-439。

本章主要通過中小學教科書中有關二十世紀世界大事的內容，透視中共國際觀之演變。中共當局對教科書的編寫控制特別嚴格，意圖利用教科書灌輸學生官方的「正確思想」。不斷變化的教科書內容，與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緊密聯結，通過教科書可以理解中共如何看待外部世界，也反映了其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定位。最重要的是，教科書內容的演變可以說明，中共如何竭力成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繼承人，也可看出中共成為世界主要領導者的信心和企圖心如何日益增長。

談到學校教育灌輸意識形態，最容易聯想到的是政治教育。但本文反而不擬將其納入研究對象，一則因為文革前的中小學政治教育課程時斷時續；一則因為政治教育課是共產黨體制下特有的教學科目，是其灌輸政治意識形態特有的場域，太過明顯，不像中外語文、世界史地、算術等課程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的教學科目。正如本章首引文所示，中共當局相信無論是小說、詩歌、歷史故事或自然科學故事，任何科目都能完成政治教育的任務。⁴ 這些科目的教科書更可以發揮「潤物細無聲」的功能。其次，歷來研究中共史觀的學者多將注意力放在中國歷史的重新解釋，世界歷史、世界地理、中外語言、算術等部分相對地欠缺耕耘。⁵ 因此本章利用這些科目提供例證來說明中

⁴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大意（1950年6月）〉，《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3，頁3。

⁵ 目前關於這些科目的研究尚為少數。語文科研究見 Charles Price Ridley, Paul H. B. Godwin and Dennis J. Doolin, *The Making of a Model 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 傅健明，《教科書價值取向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英文科研究見 Bob Adamson, *China's English: 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世界史研究見 Robert J. Culp, "Weak and Small Peoples' in a 'Europeanizing World': World History Textbooks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Perspectives on Global Modernity," in Tze-ki Hon and Robert J. Culp, eds.,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共的國際觀；但僅限於漢人使用的教科書，少數民族使用的教科書牽涉議題過於複雜，⁶不擬論及。

再者，本章還將證明文化大革命中廣泛使用的激進詞彙，事實上在 1950 年代初朝鮮戰爭爆發時即已出現，儘管頻率不高，但這是目前關於中國語文教科書研究從未論及者。⁷ 隨著政治運動日益升溫，這種語言越來越激昂、粗暴、刻薄。我們可以說早自 1950 年代初，「革命接班人」紅衛兵的語言培養即已開始。

一、從改編、改寫到定於一尊

從黨的系統來看，所有的教育部門都歸中央宣傳部管轄。自 1950 年到文革之前，中宣部不但掌管教育部的政策、幹部（包括任免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同時掌控各級學校的教學方針和教材編訂。⁸ 早在國共內戰後期，中央宣傳部已經開始組織準備改寫或編撰新的教科書，其中政治思想和歷史科目尤受重視。1949 年春天，中宣部調集了黨內有編寫經驗的人員，並邀請黨外開明書店的編輯班底，著手編修新的教科書。⁹ 4 月 8 日，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在北平成

and Boston: Brill, 2007), pp. 211-245.

⁶ 有關少數民族的教科書，參見 Mette H. Hansen, *Lessons in Being Chinese: Minority Educ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in Southwest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⁷ 傅建明，《教科書價值取向研究》。

⁸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卷）》，卷 5，頁 62-63、104-105。

⁹ 〈中央宣傳部關於十二月及一月工作情況向毛澤東的報告（1949 年 2 月 23 日）〉，收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卷 2，頁 800。

立；葉聖陶為主任委員，周建人、胡繩副之；該會成員中有多位親共的民盟人士。¹⁰ 為了確保編書者有正確的政治認識，中宣部組織他們研讀《(馬恩列斯) 思想方法論》中〈論寫歷史〉的五個文件、《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等資料。¹¹ 這也等於對這些編書者進行思想改造。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中共建政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公開指出：「教科書要由國家辦，因為必須如此，教科書的內容才能符合國家政策」。¹² 1950年12月8日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編寫、出版和發行教科書的關鍵機構，首任社長兼總編是葉聖陶（出版總署副署長兼），副社長為柳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兼）。

除中國歷史和政治思想之外，有關當局也高度重視語文教科書的編寫。從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編葉聖陶的年譜中，可以得知編寫小組如何組建，哪些人參加編寫。大體上，編者只能變換格式、潤飾文字，內容則須嚴格服從黨的各項規定。¹³ 從一開始，中共對於教科書的編寫就緊抓不放，必須經過繁複的嚴格審查與修改，確保不偏離黨的「正確」觀點才能出版；即使在1956年和1961年政策較為寬鬆時，也不例外。¹⁴

¹⁰ 該會在中共中央政府未成立之前，暫時隸屬於華北人民政府。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118-119。

¹¹ 〈中央宣傳部關於十、十一兩個月的工作情況給毛澤東的報告（1948年12月26日）〉，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卷2，頁763；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頁128、176。

¹² 〈陸定一在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上的閉幕辭（1949年10月19日）〉，收入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卷1（1949），頁445。

¹³ 商金林，《葉聖陶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冊3，頁81-95。

¹⁴ 戴伯韜，《戴伯韜教育文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頁269-270、

相較於毛澤東治下，南京政府給予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寫者更大的空間。1929年，國民黨宣布國民教育方針應以三民主義為基礎，這項宣示通常被認為是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開端。事實上，只要編輯大綱寫上「本書根據三民主義的精神」，絕大多數都會通過；國民黨當局很少干涉或沒有能力干涉，也不仔細檢查內容。例如，1931年出版的《新中華國語讀本》的編寫大綱宣稱，這八冊一套的小學教科書符合三民主義的宗旨。其實課文與國民黨及其意識形態相關的內容所佔比例少之又少，只有兩冊各有一篇課文與三民主義有關。¹⁵ 編寫者把國民黨意識形態撇在一邊，只編選他們認為適合小學生的教材。這樣編寫教科書的內容與方式幾乎不可能在中共治下出現。中共政權建立後，第一批小學語文、歷史和地理新教科書於1950年秋出版，隨後編輯邀集各界意見，然後將回應發表在《人民日報》。所有的討論均以愛國主義為前提，刊登的回應意見最多只能表達細枝末節的問題；如文言還是白話，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的作品；或者批評關於毛澤東或新中國的內容比例仍然不足，沒有充分地表現愛國主義；或者批評在課文中沒能很好地運用馬列主義。¹⁶ 由此可知，新政權下教科書的編寫者幾乎不可能像國民黨政權下那樣，在教科書的實質內容上遠

274、277、296、322、376。戴伯韜於1954-1966年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總編輯。

¹⁵ 該讀本每冊有48篇課文。一是〈孫中山〉，提到他的遺言，希望快點實行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另一為〈黃花崗〉，陳述廣州七十二烈士墓。王祖廉、黎錦暉、黎明編，《新中華國語讀本》（上海：中華書局，1931），冊5，頁2-3；冊6，頁16-18。尚有一例是民國政府教育總署編審會編的《初小國語教科書》，轉引自閻蕓、張雯，《民國時期小學語文教科書評介》（北京：語文出版社，2009），頁432-439。

¹⁶ 〈人民教育出版社：敬答各方面對於教科書的批評〉，《人民日報》，1951年2月18日，第6版；〈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課本裏的愛國主義內容——答江山野先生〉，《人民日報》，1951年4月21日，第3版。

離官方意識形態。

人民教育出版社自編的第一套全國通用中小學教科書於 1953 年陸續問世。在此之前的過渡階段，只能先由教育部和出版總署共同擬定中小學教科書目錄，發到各大行政區，規定必須採用目錄中所列各書，才是國家認可的版本，並施行集體編訂和統一發行、採用的辦法。這個時期的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的角色異常重要；他們對於教材採取選用和改編並進的方式，修訂或編寫的關鍵標準是「政治正確」。

教科書中最迫切需要改編的是中國語文和中國史地。這些科目的編訂，中共任用的多是一些黨外較為有名的編輯。不過，中共當局眼中思想正確的文章，在這些古文底子深厚的編輯眼中，含有太多文句不通、語意不連貫等缺點。儘管他們對於中共當局提倡只要思想搞通、文字不通也無關緊要，頗不以為然。¹⁷ 然而，這畢竟已經不是國民黨執政的時代了，這些原本堅持課本要文字通順的編者，終究必須向「政治思想正確」第一靠攏，否則他們的優渥待遇可能跟著泡湯，並且還可能衍生其他嚴重的後果。

最初，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用的主要教材是 1949 年以前中共根據地或國民黨統治地區被視為比較「進步」的教科書。¹⁸ 1949 年前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出版的課本，有的雖在出版前由編者自行修訂過，增添新材料或刪除一些政治不正確的觀點，但全書架構往往沒有太大更動。正因為如此，這樣的教材在有關當局看來，還是可能出現許多原則性的缺陷。為此，出版總署責令編審委員金燦然對類似教科書作公開批評，藉此明確新的編輯方針。這時韋息予編寫的《開明新編初級

¹⁷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頁 151-152、154。

¹⁸ 例如傅彬然、覃必陶，《外國史》（上海：開明書店，1948）。

外國地理》成了箭靶，因為在目次和內容上沒有明顯區分美蘇兩大陣營的情況和性質；沒有強調蘇聯的革命是最先進的，許多地方將蘇聯與英美「扭在一起敘述，混淆了敵友界線」。¹⁹ 換言之，分清敵我陣營及其意識形態是撰寫新版教科書的第一要義。

中共在編寫新教科書的過程中，高度依賴蘇聯經驗，學習蘇聯通過各科目的教學進行思想教育，²⁰ 並將蘇聯中小學各科的教學大綱翻譯成中文。為了向老大哥學習，1949年初，中宣部就準備了世界史和世界經濟地理的蘇聯教科書的中譯本，並特別派人到蘇聯蒐集關於編輯、出版、發行等辦法的資料。²¹ 中共在延安時期較不重視世界史地，建國後挪用蘇聯經驗的地方也特別多。主持世界史教科書編寫的靈魂人物是王芝九(1909-1978)。²² 人教社出版的初中世界史教科書，最早寫成於1951年，是以王芝九原在新華書店出版的初中外國歷

¹⁹ 金燦然，〈中學地理教本中的幾個政治思想問題〉，《人民日報》，1950年5月3日，第5版。

²⁰ 米定斯基著，李敬永等譯，《蘇聯人民的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頁66-73。

²¹ 〈中央宣傳部關於十二月及一月工作情況向毛澤東的報告（1949年2月23日）〉，收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卷2，頁800；〈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需要資料項目〉，ГАРФ（GARF，俄羅斯國家檔案館），檔號φ.5283，оп. 18，д. 86，л. 174а。

²² 蘇州人，1923年進入江蘇第一師範新設的文史地專科就讀，1925年畢業。隨後到蘇州樂益女中任教，並加入共產黨。1926年8月組建中共崑山獨立支部，任書記。抗戰勝利後，曾任吳縣（蘇州）教育局局長，並參加中國民主同盟。1949年後任蘇州一中首任校長，1950年4月調任教育部第一司（初教司）副司長，11月協助籌組人民教育出版社，其後任編審、編寫、修改和審定中小學、中外歷史教科書和參考書。〈我校解放初期校長王芝九介紹〉，《蘇州市第一中學百年校慶》，<http://www.sz1z.com/xq/ReadNews.asp?NewsID=2962>（2010年3月27日檢索）。

史課本的基礎上改編而成，分上、下兩冊；原書由古代文明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改編時又增加了「戰後的世界」一章，敘述兩大陣營的分野；以帝國主義的反民主陣營和反帝、保衛和平的民主陣營來區分。²³ 高中世界史教科書最初更加仰賴蘇聯經驗。例如，編寫高中世界近代史時，以蘇聯學校八年級用的《新歷史課本（第一冊）》為主，並參考當時現有的中譯本而成；同時建議教師教學時，參考關於蘇聯歷史提綱的中譯本，以及閱讀潘克拉托伐 (Anna M. Pankratova, 1897-1957) 所著的《蘇聯現代史》。²⁴ 儘管到 1953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已出版了第一套中小學教科書中的若干科目，仍來不及完成高中現代世界史教科書。因此，1953 年出版的《蘇聯現代史》中譯本就成了全國通用的世界現代史教材。²⁵ 這也只有在向蘇聯一邊倒政策臻於極致的年代，才會發生以一國歷史代表整個世界歷史的情形。

在中共學習蘇聯的高峰期間，教育部參照蘇聯歷史教學大綱，提出「小學教本國史，初高中一貫，先古後今，先外後中」的原則。不過，1954 年初夏在北京召開的歷史科學專家座談會，有不少人反應這樣的原則和中國現實很難結合；所提出的理由是：(1) 先外後中的原則對初中生不合適。由於中蘇情況不同，中國學生對世界史的知識

²³ 人民教育出版圖書館編，《人民教育出版社書目 (1950-1999) 教材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頁 120。

²⁴ 王芝九編，江季筠助編，《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 年 6 月原版，1952 年 8 月北京初版)，冊 1。例如，鄭平章譯，《蘇聯中等學校世界史教學提綱》(北京：大眾出版社，1953)；潘克拉托伐著，李鐵民譯，《蘇聯現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50)。潘克拉托伐是蘇聯著名的勞工史專家學者，亦是蘇聯中學歷史教科書的主編。

²⁵ 〈出版者的話〉，收入李純武編，江季筠助編，《蘇聯現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比較生疏，人名地名也難於記憶。(2) 中國歷史的發展在古代史部分，與世界歷史的聯繫並不密切，不像蘇聯，從世界史再講到本國史，理路比較清楚；中國不該機械式地搬用蘇聯的教學程序。當時有人進一步主張世界史應以中國為中心，重新編寫。有趣的是，在完全向蘇聯一邊倒的政治大方向下，決策者依然認為世界歷史的研究一向以歐洲為中心，馬列主義對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研究也主要以歐洲歷史為典型，蘇聯世界歷史教科書就是在這樣的考量下編寫，而且衡諸現實，中國很難在短期內編寫出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史教科書，因此維持原議。²⁶ 但這套方案施行一兩年後，發現實在窒礙難行，最後決定還是必須先從中國史講起，再講外國史。²⁷

出版總署原本期望在 1952 年秋天能夠統一全國教科書版本，然而人教社限於人力，未能如願完成。因此若干私營出版的教科書得以繼續上市，但是在高層眼中，許多中小學教材「粗製濫造」，促使教育部和出版總署在 1954 年初發出聯合指示：「中小學和師範學校和工農兵婦女課本是國家對青年、兒童和廣大勞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工具。這些書籍都必須遵照國家的教育方針和教育計畫，在教育行政部門及其他有關部門的指導下，統一由國家出版社來編輯出版，以保證國家教育方針的正確貫徹」，並規定：「凡中學、中等師範學校、小學、幼兒園的課本、教材，一律由國家指定的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社不得出版，已出版者售完為止，不得再版」。²⁸ 這個重申

²⁶ 〈歷史教材編輯工作座談會的討論舉要（1954 年 6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B105-1-1169，頁 1-5。

²⁷ 訪問王宏志，北京，2010 年 4 月 16 日。王宏志，北大歷史系畢，於 1961 年進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擔任編輯。

²⁸ 〈教育部、出版總署發布《關於出版中學、小學、師範、幼兒園課本、教材、教科參考書和工農兵婦女課本、教材的規定》的指示（1954 年 7 月 3 日）〉，收入中

教科書定於一尊的宣示，比起建國之初陸定一的講話，更有執行力。1956年，社會主義工商改造的成功，私營出版社隨之銷聲匿跡，同時隨著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第一套全國中、小學各科教科書陸續完成出版，此後人民教育出版社成了全國唯一編寫、出版、發行教科書的出版社，中共要求教科書編寫符合黨的意識形態，完全由國家掌控的計畫，終於大功告成。國民黨自1930年代以來希望推行教科書國定本的黨化教育未果，²⁹最後卻在共產黨手中實現了。

1958年開始大躍進，有關當局認為教材「少、慢、差、費」，強調要「緊跟形勢」。8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教育事業管理權限下放問題的規定》，允許各地自行修訂甚至編寫教材。9月，中共中央頒布教育工作的指示，以縮短學制、大煉鋼鐵、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開課程改革。全國掀起教育革命、群眾辦學、各省市中小學可以自編教材的風潮。然而各地自編的教材多半由學生集體編寫，粗製濫造。³⁰不到半年時間，鄧小平復於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中，主張「教育，現在總的是在調整前提下鞏固。中央有關部門該管的要管起來，不要推。學制、課程、制度要管。中小學應該有全國統一的課本」。³¹1959年5月，中共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關於編寫普通中小學和師範學校教材的意見〉，決定重編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據

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卷6（1954），頁359-364。

²⁹ 國民黨黨化教育參見李斌，《中學國文教科書研究（1912-1949）》（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頁180-217。

³⁰ 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頁92-97。

³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1479。

縮短學制、提高程度的原則，全面編寫十年制教材，於 1961 年出版。編寫這套教材時，受到大躍進政治風潮的影響，高中歷史要求重今略古，刪去了古代、近代史，只剩現代史。再者，這套教材充斥著大量語錄和政治術語。教育部檢討了大躍進的教育路線後，復於 1963 年 7 月頒發〈全日制中小學教學大綱（草案）〉。在教學大綱和教材尚未完全編妥，雖在一些地區進行試教工作，且反應良好的情況下，卻又遭逢毛澤東 1964 年 2 月 13 日有關中小學教育的春節講話，提出「學制可以縮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人教社不得不再重新編寫課本，以「加強教材的思想性，加強聯繫實際，貫徹少而精的原則，減輕學生負擔」為原則；經過精簡和修改，減少了課程門類。人教社編輯們普遍認為這套十二年制的新教材是創社以來最好的版本，因為政治套話少，涵蓋範圍廣，語言清晰。³²不幸的是，計畫趕不上變化，教材尚未來得及正式出版發行，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文革的到來，中斷了全國一綱一本的政策，各地自行編寫出版「革命教材」；直到 1978 年，才又重新恢復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綱一本教材。

二、蘇聯與美國兩大陣營的對立

國民黨在南京政府時期，所出版的世界地理教科書都是按照各國與中國空間距離的遠近來論述；鄭昶編輯的《新中華外國地理》是少數的例外。他從帝國主義的角度，將世界分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兩大

³² 人民教育出版社圖書館編，《人民教育出版社書目（1950-1999）教材卷》，頁 39；〈人民教育出版社致各省、市、自治區教育廳（局）函，1965 年 11 月 19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B105-8-593，頁 109-110；訪問王宏志，北京，2010 年 4 月 16 日。

區塊，但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出發。³³ 雖然有的民國時期教科書指出，美國是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卻沒有陳述美國是中國的主要敵人。³⁴ 不但編者如是觀，當時中國老百姓也很少會視美國為中國主要的敵人。此乃由於美國從未佔領中國國土，許多中國人對美國的印象要比其他西方列強好。其次，許多知識分子在美國受教育，有親美觀點。相較之下，眾多中國百姓視蘇聯為敵人；因為清末以來，沙俄掠奪中國大量領土以及蘇軍接收東北的惡行，令許多中國百姓對蘇聯反感。職是之故，如何翻轉人民對美蘇的固有印象，對中共是一大挑戰。

依照中共的意識形態，世界分成兩大陣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及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共建國後第一個發布的小學世界史課程暫行標準即明言：「世界史重點在說明以蘇聯為首的和平陣營日益強大，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陣營必然滅亡，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必然成功。」³⁵ 這也是當時中共國際觀的核心觀念。如何將世界各國歸類和劃分，是 1949 年以後編書者面臨的首要課題。就這個問題而言，世界地理課本遠比世界歷史課本更能看出端倪，因為地理必須分論各國，而且有關當局一再強調內容必須與國際局勢密切結合。

茲以 1950 年 9 月及 1951 年 1 月出版的陳原編的兩冊本《初中外國地理》為例。該書被普遍認為是當時最令人滿意的地理教科書，陳

³³ 鄭昶編，《新中華外國地理》（上海：中華書局，1932）。

³⁴ 鄭昶編，《新中華外國地理》，頁 82；王恩爵，《新時代世界史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頁 116-118。

³⁵ 〈小學歷史課程暫行標準（草案）1950 年 8 月〉，收入吳履平、李隆庚編，《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 / 歷史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頁 107。

原以兩 chapters 的篇幅敘述蘇聯，並將其放在分論的眾國之首，其他國家則按陣營及距離中國的遠近來安排。書中出現了新類別的國家：「新民主（或稱人民民主）國家」，即蒙古、北韓、北越和東歐等共產主義國家。在 1953 年的修訂本中，將兩冊合為一冊。按照共產黨的政治排名學：首先敘述的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龍頭老大蘇聯，接著是亞洲人民民主國家，然後是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再接著才是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雖是資本主義陣營的龍頭，因為是首要敵人，所以放在最後一章。為了讓學生了解兩大陣營的歷史，最後一節將十月革命前後的世界局勢作了對照。一次大戰前，全世界有七個帝國主義國家，兩次的大戰削弱了這些帝國主義的力量，到了 1945 年只剩下美國。美國由於獨佔資本與肆意剝削，成為這個反動陣營的首領。其中最有趣的是，將實行共產主義的南斯拉夫列入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是所有的歐洲國家都介紹完畢，才輪到南斯拉夫出場。³⁶ 這是給南斯拉夫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懲罰；因為該國總統鐵托 (Josip Tito, 1892-1980) 在二戰後，對於斯大林並非言聽計從，強勢主導本國的內政和外交，引起蘇聯不滿。1948 年，蘇聯將南斯拉夫從共產黨資訊局 (Kominforma，取代 1943 年解散的共產國際) 中除名，後來鐵托又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因此被斥為工人階級的叛徒、帝國主義的走狗。

十月革命產生了蘇聯，是第一個為人民大眾所治理的國家。二次大戰之後，新人民民主國家接二連三地在東歐和亞洲出現。他們同屬於社會主義、民主、愛好和平的陣營。雖然這些國家的發展尚不能與蘇聯相提並論，但都是朝同一方向邁進：廢除私有制，終止階級制

³⁶ 陳原編，《初中外國地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1951，1953 第 6 次修訂版），上冊於 1950 年 9 月，下冊於 1951 年 1 月出版。

度，兄弟般地團結前進。所有新型的人民民主國家，從歐洲到亞洲，領土幾乎可以連成一塊，約佔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三分之一強的人口，他們的力量越來越大。此外，這個陣營還包括各殖民地和被帝國主義壓迫剝削的人民。美國帝國主義加緊奴役世界人民的活動日盛，各國反帝和反殖民的解放鬥爭益加積極，中國的解放和民主德國〔東德〕的新生即為顯例。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終究要崩潰，因為除了各國少數反動統治階級外，他們與廣大人民離心離德，得不到支持。人民渴望的是和平、民主和幸福，而反動派給他們的卻是戰爭、壓迫和剝削。³⁷ 兩大陣營的性質和分野就此確立。

由於受到向蘇聯一邊倒政策的影響，從建國初期開始編寫的教科書，主要是從蘇聯的角度來看世界；中小學語文教科書提到蘇聯遠比美國多。課文稱頌蘇聯制度的優越性、列寧及斯大林平易近人的作風、蘇聯的科學文化比美國高。至於對美國的描述，主要放在資本家的剝削、工人階級的困苦、高失業率、貧富差距巨大，以及種族歧視。為了強調仇美情緒，編輯特別挑選多篇蘇聯作家和若干美國作家的作品，來增加說服力。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引述美國左派作家德萊賽 (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 的話，說他親眼看見所謂「不偏袒、重民權」的美國官廳和憲兵，是如何蹂躪一群群面黃肌瘦的女人，以及他們手裡瘦骨嶙峋的小孩。³⁸ 由此證明就是美國人自己也嚴厲地批評自己的政府，以此來區分好的美國人民和受資本家操控的壞美國政府。

³⁷ 陳光祖、蔡迪編，《初中世界地理課本》（北京：新華書店，1950），頁 165-170；陳原編，《初中外國地理》，下冊，頁 110-115。

³⁸ 瞿秋白，〈美國的真正悲劇〉，《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6，頁 83-92。本篇課文從 1950-1965 年均被收入初中語文課本。

相較之下，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就沒有發生人剝削人的事情，人民彷彿生活在幸福的人間天堂。在蘇聯，由於工人階級當政，力行勞動保護政策、技術和設備革新，大大改善了辛苦危險的煤礦工作。³⁹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成功，代表了蘇聯工農階級獲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工人失業現象完全消失，農業集體化的結果使國內最後一個剝削階級——富農被完全消滅了。1933年蘇聯已經變成工業國，工業化的結果，使蘇聯成了全世界的先進國。全球的資本主義社會大鬧經濟恐慌，由繁榮走上破產之際，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大搞經濟建設，由窮困走上繁榮，蘇聯成了世界樂園。這是因為蘇聯消滅了一切剝削階級，工人、農民和工農出身的新知識分子做了主人的結果。⁴⁰在蘇聯，尼古拉二世的渡假別墅成為工農療養院；可以常常見到成群的工農，走在過去沙皇散步的專用御道。由此可見，「在蘇聯，工人和農民都做了皇帝了」。⁴¹

同樣的一分鐘，在不同的陣營也有天壤之別。蘇聯的每一分鐘都在增進人民的幸福，美國的每一分鐘都在製造人民的痛苦；這說明社會主義國家正在加速前進，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接近死亡。蘇聯的「每天，每小時，每分鐘都表現出建設性的努力，這就是我們蘇維埃國家生活的步調。……美國平均每分鐘有六個工人失業，或只能做一部分時間的工作。可是在蘇聯，平均每分鐘有四個男女青年從中

³⁹ 〈蘇聯煤礦的勞動保護〉，收入宋雲彬等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北京：新華書店，1950初版），冊1，頁104-107。

⁴⁰ 楊生茂、李純武編，《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第1版，1957第3版），下冊，頁80；沈長虹，《初級中學外國歷史課本》，頁125、128。

⁴¹ 鄒韜奮，〈在雅爾達〉，收入宋雲彬等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2，頁149-155。

學、技術學校、高等學校畢業，開始在工廠或辦公室裡工作。美國平均每四十四秒鐘發生一件竊案，每六分或七分鐘發生一件盜案，每四十分鐘發生一件攔路打劫案。⁴² 藉著短短一分鐘的例子，美化了蘇聯，醜化了美國。

美國的種族歧視是共產黨教科書中最受渲染的議題。無論政治氣候如何改變，種族問題始終是攻擊美帝的最佳武器。美國黑人在共產黨眼中，同被列入被壓迫、等待被解放的工農階級。蘇聯和中國教科書最喜歡舉的例子是美國黑人歌手羅伯遜 (Paul Robeson, 1898-1976)。無論是中文或英文教科書，常用羅伯遜的經歷，呈現美、蘇兩國對待黑人的鮮明差異：蘇聯人民熱烈地歡迎羅伯遜在該國演唱。「可是在他自己的國土，他得不到歌唱的自由，得到的是法西斯暴徒的迫害和襲擊」。羅伯遜個人的遭遇，不是孤例。課文〈美國的黑人〉強調林肯只是名義上解放了黑奴，他們實際上還是處處受壓迫。美國的南方有如人間地獄，公車、學校、旅館、教堂、居住等均實行黑白隔離政策。美國統治者以解放人類、爭取民主自由誘拐黑人參加第二次大戰，可是他們白白犧牲，戰後的黑人還是受盡欺負和鎮壓。⁴³ 羅伯遜可以在美國最好的音樂廳演唱，只因為美國統治階級需利用他來懷柔少數黑人，當裝飾品。他表示在莫斯科感到十分愉快，並認為「世界上從來沒有哪一塊土地上的人們能夠像在蘇聯那樣自由地呼吸」；只有在蘇聯才能體會到「人民的尊嚴」的偉大意義，在美

⁴² 伊林作，晶譯，〈第十八課 蘇聯的一分鐘和美國的一分鐘〉，《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4，頁 134-147。

⁴³ 劉良模，〈羅伯遜〉，《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1，頁 111-112。1952 年版改題名為：人民歌手。劉良模，〈美國的黑人〉，《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1，頁 113-117。

國「人民的尊嚴」是空洞無意義的。⁴⁴ 種族歧視也反映在英文教材。⁴⁵ 相較於中共的教科書，國民黨治下的南京政府時期教科書，對於美國的種族歧視幾乎毫無著墨。

1950年6月韓戰爆發，10月中國出兵，中共發起鋪天蓋地的抗美援朝運動，開始火力四射地指摘美國的好戰、侵略成性、假民主和假自由。所有的美國罪惡都指向最終的結論：好戰成性的帝國主義本質。美國的介入韓戰、對台灣的野心，在在顯示了美國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以便取得更多的殖民地，資本家更可以利用戰爭，謀取暴利。這種思維表現在語文課本，尤為明顯。時為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的馮至，代表全國文聯赴東歐訪問歸國之後，以十分煽情諷刺的筆調寫成《東歐雜記》一書，其中數篇均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有篇名為〈馬鈴薯甲蟲和蜜橘〉，文章一開始陳述蘇聯宣布削減東德戰後補償費50%，並將23個企業所有權歸還東德；與之對照的是美國為了破壞東德的農業生產，特地派飛機從空中撒下大量的甲蟲來吃馬鈴薯。其時正值東德舉行世界青年大會，美國人居心不良地在東西柏林邊界上，拋出無數德國難得一見的美國蜜橘，冀圖拍攝青年男女爭先恐後搶食蜜橘的畫面，藉以向全世界展現並諷刺這些所謂愛好和平的青年：「在美國蜜橘的面前低頭，就等於向美帝國主義手裡的一個重要武器——美元——投降」。⁴⁶ 該文最初刊登於1950年8月13日的《人民日報》，當時中國尚未出兵，馮至這位曾經被魯迅譽為「中國

⁴⁴ 〈我在美國〉，《高中語文課本》（北京：新華書店，1950初版），冊1，頁124-127。本文是羅伯遜要離開蘇聯之前，寫給《少共真理報》的文章。

⁴⁵ 應曼蓉編，〈Two American Boys〉、〈A Negro Boy in the Soviet Union〉、〈Black Jimmy〉，《初級中學課本：英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冊1，頁124-128。

⁴⁶ 馮至，〈馬鈴薯甲蟲和蜜橘〉，《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5，頁82-83、90。

最傑出的抒情詩人」，以詩人豐富的想像力描繪了一場昆蟲戰。全文語多諷刺，若干用詞均加了引號。而「一小撮帝國主義者豢養的……」、「陰險的面目」、「猙獰的面貌」也是日後政治鬥爭常常會出現的用語。這些話語在 1950 年代初期的語文課本就開始傳授了。在課文的「思考、討論、練習」部分，要求學生要細心揣摩這些意味深長的諷刺語；這些挖苦諷刺的話不但是作業，也是要考試的。

茅盾〈剝落「蒙面強盜」的面具〉一課的謾罵、痛批與偏執，同樣令人吃驚；很難相信這是出自寫過小說《子夜》、《林家鋪子》的同一作家之手。在茅盾眼中，美帝國主義等於六十個資本家家族的總和，也等同於希特勒的「孝子賢孫」。這些資本家像吸血鬼般地殘酷剝削工農和黑人，紐約市每五個人就有一個失業；他們像一群貪婪的狼，為了爭奪金錢而互相咬噬；杜魯門、艾奇遜之流把美國說成「世界樂園」，把美國主義說成「救苦救難的觀世音」；美國人在全世界的眼中就是「殺人魔王」、「吃人的生番」。他進而說明，華爾街大亨們為了吸引更多美國青年參戰，發明了新奇的動員口號：「遊歷東方」、「朝鮮姑娘」、「高厚薪餉」等等，將侵略朝鮮的戰爭描寫得彷彿像冒險又兼色情的「蠻荒獵豔」式的美國電影。美國青年紛紛上當，到了朝鮮才知道要去當炮灰，但為時已晚。另一方面，所謂的「美國文明」是用拜金主義、「酥胸玉腿」、「可口可樂」、「尼龍襪子」、「玻璃奶罩」等物質及殺人犯與「蒙面強盜」、「冒險家」等堆砌而來。美帝所謂的和平其實就是要戰爭、要屠殺人民。一言以蔽之，美帝國主義正是「蒙面強盜」。面具上畫著「民主」的圖案，又加上「和平」的花邊，實際上都是用來欺騙人民。⁴⁷ 我們必須承認任何國家描述敵人

⁴⁷ 茅盾，〈剝落「蒙面強盜」的面具〉，《高中語文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 初版），冊 6，頁 48-53。

的用語可能十分惡毒，但中共教科書中類似這種強烈的諷刺、富攻擊性的語言和課文數量遠比南京時期要多。茅盾的文章或許是宣傳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但是若用這些罵人的話與諷刺的文氣灌輸給下一代，而且還要考試，違反了正常教育的規範。雖然這種語言在 1950 年代初期只是用來對付美國，在後來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就可用來攻擊任何黨所指稱的「敵人」；倘若再加上暴力行動，結果難以設想。

韓戰期間，教科書中建構的美帝國主義形象基調已定。1959 年人教社重編教材，編輯為了緊跟形勢，也將 1957 年底毛澤東在莫斯科的部分講話，編入 1960 年初版的高小語文課本和俄語課本。課文的標題就是這段講話的中心思想：「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⁴⁸ 這也是文革時期常見的套話。毛認為所有號稱強大的反動派都不過是紙老虎；希特勒、沙皇、中國皇帝、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一一被打敗，就因為他們都是脫離人民的紙老虎。美帝國主義因為有原子彈，還沒有倒，但將來也會倒。

耐人尋味的是，相對於資本家剝削的許多描述，中共教科書對於蘇聯的民主自由沒有直接或太多細節的著墨。在列舉蘇聯革命後的各項成就，亦隻字不提自由民主，只有含混的「人民民主」或抽象地敘述蘇聯的民主和自由：「這個國家的政治基礎是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它的全部政權屬於城鄉勞動者並通過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而實現」。⁴⁹

⁴⁸ 〈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高小語文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冊 4，頁 1-2。此文來自 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部分講話。“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о том, чт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и все реакционные элементы — бумажные тигры,” 北京師範大學外文系普通教育改革小組編，《九年一貫制試用課本（全日制）：俄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第 1 版），冊 13，頁 27-30。

⁴⁹ 楊生茂、李純武編，《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下冊，頁 85。

唯一比較具體的是聲稱 1936 年蘇聯頒布的新憲法是全世界「最民主的憲法」。憲法頒布的那天，十二月五日被稱為斯大林憲法紀念日。「全國歡迎它，和歡迎其他偉大光榮的節目一樣。它是我們自由的愉快的生活的象徵」。⁵⁰ 另一方面著墨最多、最為人稱道的是科學。蘇聯的生產已可以做到部分自動機械化，使人從笨重的勞力工作中解放出來，消除了勞心和勞力間的分界線。而資本主義的科學研究全為資產階級所壟斷，其目的在追求利潤，不是為增進人類幸福，因此阻礙科學的高度發達，而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為達到科學的真正目的而努力。⁵¹

三、三個世界的逐漸形成

兩大陣營架構的瓦解，實際上來自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分崩離析，其關鍵在於中蘇關係的改變。中蘇的分歧在 1956 年 2 月蘇共召開第二十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時已經開始浮現。大會通過贊成透過議會路線奪取政權的方式，不一定要走階級鬥爭的路線，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社會有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同時又提出美蘇和平共存、和平競賽的原則。這對毛澤東堅信的武裝奪取政權、重視階級鬥爭，與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基本信仰，互相抵觸。再者，赫魯雪夫在會議結束前，在未先告知其他兄弟黨的情況下，以「秘密報告」方式嚴厲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也引起毛的不滿。

⁵⁰ 里亞包克良奇作，嚴風譯，〈二十世紀年代裡〉，收入宋雲彬等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 修訂版），冊 6，頁 91-104。

⁵¹ 薩巴林作，符其珣譯，〈自動工場〉，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4，頁 139-146。

1956 年的中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已經改造完成，全國生產資料由私有制變為公有制；1957 年的反右運動又取得「豐碩」的政治成果。在毛澤東眼中，只有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成功，才能說得上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志得意滿的毛澤東，抱著這樣愉悅的心情，出席莫斯科舉辦的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大會，共有 80 個國家的共黨或工黨出席。他在當地會見中國留蘇學生，發表東風壓倒西風的談話。毛表示世界局勢已經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性優勢。這是繼十月革命之後，在國際形勢上的一個新的轉折點。蘇聯成功地發射兩個人造衛星升空，代表蘇聯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比美國佔了優勢；再過十五年，蘇聯的鋼鐵產量會超過美國，中國會超過英國。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是日薄西山，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旭日東昇。「社會主義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力量。我們社會主義陣營要有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敵人也有個頭，就是美國。」當今世界二十七億人口中，社會主義各國人口將近十億，獨立的舊殖民地國家人口七億多，正在爭取獨立或不屬於帝國主義陣營的資本主義國家人口六億。帝國主義陣營的人口不過四億左右，而且內部分裂，走向衰亡是遲早的事。⁵² 這是毛對社會主義勝利和中國發展所展現的自信，同時三個世界的雛型也隱然浮現。

東西冷戰以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一直以蘇聯為馬首是瞻，為何毛的莫斯科談話必須重申「以蘇聯為首」？這是因為自從蘇共二十大和波蘭匈牙利事件之後，蘇聯和東歐國家存在著矛盾，為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因此毛澤東重申「以蘇聯為首」。對於團結，毛在 11

⁵² 〈毛主席會見留蘇學生〉，《初級中學課本語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冊 3，頁 67-69。毛於 1957 年 11 月 17 日會見學生，談話內容登於 11 月 20 日的人民日報，第 1 版。

月 18 日對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即席演講，提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破壞分子，那就要採取團結的態度」。但他同時也說，目前「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小國」。這暗示著只要中國也成為經濟大國，就可以和蘇聯平起平坐了。這個會議也是促成毛要實行大躍進的因素之一。⁵³ 因此，也可以說向來看不起赫魯雪夫的毛澤東，表面尊蘇，實際上有意挑戰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霸主地位。為了超英趕美，毛澤東發起了大躍進，大躍進的真正目標其實是要超過蘇聯。⁵⁴

當時的算術課本涉及煤、鋼、鐵、石油等工業項目，以美、蘇、英為例，其餘主要以公社經濟和中國的進展為例。毛澤東認為，中國在科學和工業方面確實不如蘇聯。高小算術就出現如下的應用題：蘇聯發射第三顆人造衛星重 1,327 公斤，美國發射的第三顆重量只有 14.29 公斤，蘇聯的人造衛星比美國重多少公斤？⁵⁵ 兩者數量相差近 100 倍，這也暗示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使然。不過，在政治和農業方面，毛對中國的表現有很大的自信。大躍進時期與美國農業比較的對象已經不是蘇聯，而是中國。1958 年初中語文課本選用了一篇文章，課文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國小麥總產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文章引用大量數據，證明中國在乾旱的條件下生產的小麥數量，遠遠超過美國在理想的氣候下的產量。作者誇口道：「美國在小麥總產量方面既然已經被我國所壓倒，今後肯定將永遠地被我國所壓倒」。這是因

⁵³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 214-216；〈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11 月 18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卷 7，頁 325、330。

⁵⁴ 沈志華，〈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39。

⁵⁵ 《算術》（高小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冊 4，頁 18。

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無限的生命力，促使農業生產不斷躍進。作者同時指責美國，利用小麥作為政治訛詐的一張王牌，到處橫行霸道，無論對外「援助」，或「救濟」或「經濟合作」，都是盛氣凌人。「吃美國小麥，常常使人氣得肚子發疼。所以美國小麥像瘟疫一樣，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咒罵」。⁵⁶ 該文作者孟用潛，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寫出這種一年小麥產量高於美國，就等於永遠高於美國的奇怪邏輯，甚至還可以寫出敵人的小麥就是瘟疫，吃了會肚子痛的幼稚兒語，如非放在大躍進的情境之下，委實令人難以置信。此亦可見當時國內大放衛星的現象，也反映在教科書上。然而，倘若學生長期浸潤的，就是這樣意氣用事的遣詞和不合邏輯的觀點，那麼在激進的政治運動上，他們碰到「敵人」——不管是人或國家，自然會不假思索地使用這樣的邏輯和語言，直接投射攻擊「敵人」。

這種過度誇大的課文內容，在大躍進時期屢見不鮮，有的甚至連標題都可以十分聳動。例如，〈在美國，有一個孩子被殺死了〉，看起來更像社會新聞的標題，而不是教科書的課文名稱，全文的語調也很煽情。該文敘述一個 14 歲黑人男孩，利用暑假下鄉摘棉花，貼補家用。他向賣糖的白人老闆娘吹口哨，因此「侮辱」了她，結果被半夜帶走，凌虐而死，棄屍於河。由此揭露美國白人對黑人的暴行已經到了無法無天、令人髮指的地步。當時中蘇關係已經惡化，此時與悲慘黑人境遇相對照的不是蘇聯，而是參加夏令營的中國少先隊員，他們沐浴在金色的陽光下，快樂地綠波戲水。⁵⁷ 這種光明和黑暗的對比，

⁵⁶ 孟用潛，〈我國小麥總產量壓倒美國〉，《初級中學課本語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冊 6，頁 26-31，選自《紅旗》，1958 年第 4 期，頁 28-30。

⁵⁷ 〈在美國，有一個孩子被殺死了〉，《高級小學語文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冊 4，頁 69-77。

也昭顯中國的進步和人民的幸福。

大躍進並沒有真正為中國帶來經濟的大發展，反而帶來大饑荒，加上蘇聯對三面紅旗政策的批評，毛澤東面臨十分嚴峻的情勢。為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並且防止修正主義在中國出現，毛澤東於 1962 年 9 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主張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次年即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暖身運動。約與此同時，小學語文就有一課文名為〈要有鮮明的愛與恨〉，文章一開始就強調愛恨的立場要從階級觀點出發。「愛什麼？恨什麼？總的來講，就是要愛我們的事業，愛共產主義，恨帝國主義。要愛人民，恨敵人」；必須「恨帝國主義，因為它是我們最凶惡的敵人。」「愛恨不明，是非不分，就是階級立場不堅定的表現。……有的人認為向壞人壞事作鬥爭不好作，怕別人不喜歡。這樣的想法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應該有的。」不敢對敵人做激烈的階級鬥爭，是無用的黨員或團員。⁵⁸ 長期浸潤在這種價值立場黑白對立的教育中，受教者會對於黨所定義的「敵人」予以痛擊。

中蘇一連串的意見不合，導致兩國漸行漸遠，在中共先後發表「九評蘇共中央」後，蘇聯不但是修正主義者，還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在蘇聯撤專家之前，中蘇之間的衝突基本上只有雙方高層知曉，一般民眾並不知情。因此，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於 1959 年編寫的《地理》（第二冊）的試用教材時，其指導思想仍停留在「美化蘇聯，醜化美國」的原則，課文中還在強調：「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像

⁵⁸ 〈要有鮮明的愛與恨〉，《高級小學語文課本》，冊 9，頁 101-102。1962 至 1965 年均有此課文。

磐石一樣，……我們在國際上一個重大任務，就是不斷加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團結，維護和加強這種團結，特別是中蘇兩國大國的團結，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和基本利益所在。」⁵⁹ 人教社於 1960 年 9 月出版該書之際，中蘇關係破裂已經公開化。對照引文與當時的情況，不免令人發笑，同時也對編者感到無限同情。

中蘇反目，導致蘇聯在教科書中的篇幅急劇減少。毛澤東雖然在莫斯科會議提出「以蘇聯為首」，更強調的卻是東風壓倒西風，而這個東風就不完全是蘇聯。蘇聯地位的轉變，從地理課本的編排上展露無遺。1950 年代蘇聯先是排在眾國之首，再是被列入歐洲的其中一國，文革期間則位居全歐之末；領銜歐洲的變成被中共譽為「歐洲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的阿爾巴尼亞。⁶⁰ 受到政治氣候的劇變，地位一夜之間翻轉的還有南斯拉夫。南共本在 1948 年被逐出社會主義陣營，斯大林過世後，蘇聯和南斯拉夫關係修好，南斯拉夫重新為共產陣營所接納。因此 1956 年的中學世界地理課本，將其放入社會主義陣營的最後一個國家；從排名來看，彷彿留營察看一般。果然好景不常，蘇聯和南斯拉夫復因匈牙利事件的處理等問題而鬧翻，南斯拉夫又被逐出教門。就像小孩辦家家酒一般，1958 年出版的《高中經濟地理課本》又將南斯拉夫排列在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的一員，並指控其已變成修正主義國家。

到了 1960 年重新編寫教科書時，地理的編寫不再以兩大陣營來

⁵⁹ 楊堯編著，《中國近現代中小學地理教育史》（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下冊，頁 59、65。

⁶⁰ 1972 年湖南省編寫的《世界地理》，歐洲章節的安排如下：第一節阿爾巴尼亞，第二節東歐，第三節西歐，第四節蘇聯。轉引自楊堯編著，《中國近現代中小學地理教育史》，下冊，頁 93。

分，而是要求世界各國以洲排列。蘇聯被納入歐洲，篇幅大量縮減。⁶¹此外，1960年版的初中《世界歷史》到1963年版的二次大戰後的歷史，美國的部分更動很少，社會主義陣營的歷史則變動極大。1960年版的第29到第33章的章名，分別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和壯大」、「亞非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美帝國主義是戰後世界的反動和侵略的中心」、「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勝利開展」、「東風壓倒西風」。雖然名義上還是以蘇聯為首，但是特別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世界歷史意義，意即中國以亞洲大國的身分也走向社會主義道路，進而形成強大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⁶²中國成了壯大社會主義陣營的關鍵要素。這五章20頁的內容在1963年版刪減成只有一章4頁，並改名為：「戰後世界形勢」。刪減的內容包括蘇聯的第四、第五個五年計畫等建設的細節介紹，所有出現「以蘇聯為首的」、「蘇聯無私的援助」的詞句均刪除。結果新版的戰後世界形勢，只有在第一段簡單提及蘇聯打敗了法西斯德國，戰後完成第四個五年計畫，使蘇聯的國民經濟超過戰前水準。原有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形成」、「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友好團結」、「社會主義各國並肩前進」的小節標題和內容，均因不合政治局勢的發展而消失。⁶³不過，這樣大幅的刪減，還是趕不上時事的變化。1965年初，教育部發布通知相關各級單位：「現行的初中世界歷史課本和高中世界現代史課本內容有錯誤，繼續講授，將會產生不良影響。現決定在1964-1965學年度第二

⁶¹ 〈關於中、小學教科書的審查問題（會議紀錄）〉，1960年6月21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23-2-628，頁188。

⁶² 《初中課本世界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第1版，1960第5版），下冊，頁61-62。

⁶³ 《初中課本世界歷史》，下冊，頁59-78；《初中課本世界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第1版），頁59-63。

學期暫時停授初中三年級的世界歷史課和高中的世界現代史課，請遵照執行」。因為世界史停授，1965年初夏，教育部通令當年的大學招生，停考世界史。⁶⁴

自1960年以來，教科書日益凸顯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間接貶低蘇聯在國際共運中的角色，到文革前夕，中共隱然以世界革命的領導者自居。事實上，文革後期中共才正式提出「三個世界」一詞。1974年年初，毛澤東同非洲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中指出，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原子彈多，也比較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他們「原子彈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亞洲除了日本，整個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需要團結起來。⁶⁵在中共眼中，亞非拉是三個世界中反帝和反殖民主義最重要的力量和中心。亞非拉國家在中蘇齟齬日多之際，則成為兩國爭取支持的對象。

亞非拉在1950年代初期教科書中篇幅比較有限。當時的中學世界歷史課本的敘述重點所呈現的亞非拉，多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他們為擺脫資本主義國家侵略和殖民統治，致力於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其他多半為簡單地通論介紹；並列舉二次大戰後宣布獨立的國家，如東歐國家和亞洲的越南、印尼及中國而已。韓戰爆發之後，語文課本中選了一些歌頌中國和北韓友誼、北韓人民感謝「中國志願軍」協助其抗美的文章。⁶⁶除了北韓外，中小學語文課本在1958年

⁶⁴ 〈關於暫行停授初中世界歷史、高中世界現代史的通知〉，1965年2月1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B105-2-944，頁19；〈教育部通知：高校招生停考世界史〉，1965年5月12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B105-2-944，頁23。

⁶⁵ 〈關於三個世界劃分問題（1974年2月22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卷8，頁441-442。

⁶⁶ 如：〈朝鮮孩子們的心（一）、（二）〉，《高級小學國語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以前，沒有任何關於其他亞、非、拉國家的課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只有在地理課本出現；教科書十分強調非洲的種族歧視和殖民主義，號召非洲成為黑人自己的非洲。⁶⁷

韓戰之後，中國第一次登上國際外交舞台是在 1954 年的日內瓦會議，出席的不只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尚有美、英、法等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主要討論韓國統一及恢復越南和平的問題。會議期間周恩來先後跟印度、緬甸兩國總理會談，分別發表聯合聲明，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指導國際關係的五項原則」。編者聲稱這五項原則成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重要因素。⁶⁸ 1955 年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舉行，又稱萬隆會議，共有中國同亞洲、非洲二十九個國家參加。中共宣稱：「這次會議反映了亞非十六億人民的意志，有利地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各種陰謀；同時也證明亞非國家日益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中學歷史教材特別重視這次會議及亞洲、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教科書強調這是第一次沒有殖民國家代表參加的國際會議。會議後發表公報，主張迅速根除殖民主義的禍害，並嚴厲斥責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政策；提倡民族自決是一切基本人權的先決條件，凡是遭受外國征服、統治

社，1951 修訂版），冊 1，頁 14-19；楊朔，〈平常的人〉，《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5，頁 95-101；耐因，〈不朽的友誼〉，《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冊 1，頁 71-73。1958 年《初級中學語文課本》選了日本共產黨員小林多喜二的〈母親〉，冊 5，頁 121-129。1962 年，冊 6 的版本將〈母親〉改名為〈地下黨員〉。

⁶⁷ 東北人民政府教育局編，《初級中學教科書：世界地理》（瀋陽：東北新華書店，1951），頁 225-229；陳光祖、蔡迪編，《初中世界地理課本》，頁 148-150。

⁶⁸ 王芝九編，鞏紹英校訂，《初中課本，世界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 第 1 版），下冊，頁 145-149。

和剝削的人民，都應該迅速獲得自由和獨立。⁶⁹ 只有在1956、1957、1960年版的課本出現「基本人權」用語，這有可能受到當時國內雙百運動以及廬山會議前短暫糾左的寬鬆使然；此外「基本人權」的文字完全消失。大躍進期間所描述的萬隆會議，常出現所謂的「萬隆精神」，則指亞非人民團結反帝反殖，爭取及維護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凸顯中國的角色。當時參加亞非會議的絕大多數國家尚處於殖民地狀態，中國是唯一的獨立大國，中共特別重視宣傳這個會議，旨在予人中國在亞非國家有舉足輕重的印象。1959年版的初中《世界地理》又給亞非會議添加了一個新的意義：「鼓舞和推進了非洲民族獨立運動進一步的發展」。⁷⁰ 1960年初中的版本，將這一節擴大為一章〈亞非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高中則將標題改為「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特別強調亞非各國文化、民族不同，但都同樣的反對殖民主義。⁷¹

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和歐洲國家在非洲的殖民帝國相繼瓦解之後，教科書對於非洲的描述益加詳細。1950年代後期，中國和非洲的互動日漸增多，這樣的情形也反映在教科書中。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的詩〈奴隸船〉，描述白人榨取西非的自然資源，偽善的買主低價購買黑奴，他們只想到利潤，完全不顧黑奴的死活；黑奴生病還逼迫他們用跳舞的方式治療。這是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出現有關非洲的語文教材。其後還有一課文〈桑博〉，講

⁶⁹ 《高中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第1版，1956第2版)，下冊，頁156、158。

⁷⁰ 《初級中學課本世界地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下冊，頁54。

⁷¹ 《初級中學課本世界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下冊，頁64-65；《高級中學世界現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頁73-77。

述一位住在中非的黑人桑博，在白人的橡樹園工作，每天工作 12-14 個小時，薪水微薄，難以負擔家計。白人看他身強體壯，騙說要給他更多錢的好工作。桑博拿了錢，卻不知工作內容為何，原來竟是要拍攝一部真獅吃真人的電影——桑博被獅子活活地撕碎身體的過程。影片在歐洲放映大為轟動。⁷² 兩篇課文都是高小的教材，訴說非洲黑人受到白人殖民者慘無人道地迫害。海涅的詩寫得委婉，〈桑博〉一文則令人感到血腥，中共以此來灌輸小學生仇恨帝國主義的情緒。

自從 1950 年代初期以來，教科書筆下的拉丁美洲則是完全受美帝國主義控制。美國資本家將拉丁美洲變成其榨取利潤的場域，壟斷石油、礦產、農產品原料的出售。差堪告慰的是，共產黨已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中，取得合法的地位。1958 年拉美各國共產黨發表聯合宣言，呼籲拉美人民積極參與爭取和平、民主、獨立的鬥爭；藉由進一步團結人民，可將民族獨立運動推向更高階段。⁷³ 而中國擺脫帝國主義侵略與剝削的經驗，可為拉丁美洲的表率；只要中國和拉美團結，必可打敗帝國主義國家。因此 1960 年 5 月 8 日，毛澤東與來華訪問的拉丁美洲八國代表談話便收入漢語和俄語的語文課本。他說中國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樣，長期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團結和各國人民的支援，進行了長期艱苦的鬥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現在正在建

⁷² 海涅，〈奴隸船〉，《高級小學課本語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 第 6 版），冊 4，頁 65-69；〈桑博〉，《高級小學課本語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 第 7 版），冊 2，頁 98-100；“Sambo I、II”，《初級中學課本英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5），冊 5，頁 50-52。

⁷³ 陳光祖、蔡迪編，《初中世界地理課本》，頁 66-79、158-162；陳原編，《初中外國地理》，下冊，頁 100-103；《初級中學課本世界地理》，下冊，頁 78-80。

設著自己的國家，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中國和拉美國家的人口眾多，團結起來，必能戰勝人數少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取得世界的永久和平。⁷⁴ 毛澤東以眾多的人數作為戰勝帝國主義的主要因素，同時中國的革命經驗對於被殖民的國家大有啟發作用。

在拉丁美洲國家中，卡斯楚領導古巴革命的成功最具鼓舞作用。對共產黨而言，古巴革命是繼十月革命、中國革命後另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革命，1961年版的《世界地理》對古巴的介紹篇幅因而增多。課文詳述古巴革命前，美國壟斷資本集團霸佔了古巴四分之三最肥沃的土地，成為古巴最大的莊園主，同時還控制了製糖、採礦、電力、鐵路、銀行等各個經濟部門。古巴的蔗糖產量和輸出量都佔世界第一，糧食卻不能自給，許多日用品都要依靠進口。革命成功之後，古巴就不再受美帝的剝削了。⁷⁵ 1962年，初中語文課本也選了一位古巴詩人紀廉 (Nicolas Guillen, 1902-1989) 的詩〈美國佬，滾回去！〉，描繪美國佬殘酷地揮舞皮鞭，壓榨古巴人民的血汗。這是1949以來，唯一提到拉丁美洲的語文課文。⁷⁶ 作者實際上描述的是美國在古巴租借的海軍基地關達那摩，中國編者有意將這個地方擴大影射成整個古巴，以彰顯美帝的罪行，並加深人民對美帝的仇恨。另有一課〈向瘟神開炮〉，訴求解放台灣，要美國侵略者滾出台灣，是首次亞非拉並提。該文稱美國侵略者是瘟神、凶惡野蠻的強盜、世界人民的公敵、頭號戰犯。課文的最後幾句：

⁷⁴ “Прие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й 8 стран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毛主席接見八個拉丁美洲國家代表)《十年制學校高中課本：俄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第1版)，冊2，頁45-47。

⁷⁵ 《初級中學課本世界地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冊4，頁83、88。

⁷⁶ 紀廉，〈美國佬，滾回去！〉，《十年制學校初中課本(試用本)：語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冊5，頁105-106。

為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正義鬥爭，
向艾森豪威爾，
向美帝國主義，
開炮！開炮！開炮！⁷⁷

這種攻擊性強的語言乃是受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激進路線影響，無論標題或文字內容，和文革時期的語言十分近似了。

大躍進以來，語文課本選用關於蘇聯課文大幅減少，但是關於亞、非、拉的課文比例並沒有因此大量增加。可見中共並非真的在意亞、非、拉的「友誼」，更在意的是以中國為首。1963年版的高中《世界現代史》特別凸顯中共革命成功，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十月革命後世界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進一步改變世界面貌。中國革命的成功大大啟發了一切曾經遭受或正受帝國主義壓迫的落後國家人民；讓他們感到中國能，他們也能。但是1963年版的最後一章刪掉了1960年版的亞非會議全部內容。⁷⁸原因之一是當時參與會議的印度，在1960-1962年由於邊界問題，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此外，中蘇關係的惡化，也影響到兩國與亞、非、拉若干國家的關係。以1964年的第二次亞非會議的籌辦為例；從籌辦到召開(1965)，期間發生親華的阿爾及利亞政變和印尼政變、第二次印巴戰爭爆發、中蘇對越戰支援的爭議、緬甸等國因當地共黨坐大，導致中國與各政府的關係緊張等等。這些多變的國際局勢無法及時反映在教科書上，使得中學世界現代史的最後一章越寫越短。建國十多

⁷⁷ 〈向瘟神開炮〉，《十年制學校小學課本（試用本）語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冊8，頁111-115。本文從1961年至1965年的小學課本均收入。

⁷⁸ 《高級中學課本：世界現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第1版），頁60。

年後的現代史下限仍然只能談到 1950 年，和建國之初相同，歷史的發展變成停滯不前。1965 年初，連這樣的調整都難以應付多變的國際形勢，最後只能停授，復又停考。

1965 年初秋，林彪為紀念抗戰勝利二十週年的文章，提到毛澤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對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特別是對亞非拉的革命鬥爭，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農民居多的亞非拉不少國家的政治、經濟基本狀況，同「舊中國」有許多共同點。「農民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只有農村，才是革命者向最後勝利進軍的革命基地。」世界革命事業，終究要隨著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非拉的人民革命鬥爭而轉移。他比喻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亞、非、拉是「世界的農村」。那麼當前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中國革命，提供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將民族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經驗。⁷⁹ 擅於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共，儼然以第三世界的龍頭自居。文革期間，中共將蘇聯與美國放在同一陣營，因為蘇聯已經蛻變為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美蘇之間互相爭奪霸權。這時的中共已經丟棄兩大陣營的世界觀，代之以中國為首的三個世界觀點。1974 年，鄧小平在聯合國特別會議發言，更為明確地闡發毛澤東三個世界的觀點。他指出美蘇的第一世界，是當下國際的最大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尤其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蘇聯特別惡劣。蘇聯出兵捷克，肢解巴勒斯坦，「毫無信義，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亞、非、拉發展中

⁷⁹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週年〉，《紅旗》，1965 年第 10 期，頁 19-21。

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新的世界大戰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須有所準備，兩個超級大國「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強烈反抗」。⁸⁰ 鄧小平雖然沒有明說，但已將中國自比為第三世界的發言人和世界革命的領袖。

四、小 結

意識形態影響教科書的編寫，舉世皆然，中國也不例外。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他國家的差異是，自 1949 年至 1966 年之間，為回應快速變遷的國內外局勢，教科書歷經不斷地重編重寫，並以此重新界定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人教社總編戴伯韜要求教科書編寫要維持前後一貫，又告誡要緊跟著政治情勢，⁸¹ 這給編輯帶來巨大的挑戰。面對這麼多的政治運動，尤其是反右運動後，編輯們難免會為政治而犧牲內容的一貫性。

中國共產黨透過教科書呈現的美國形象從 1949 年到 1966 年一直都是負面的；蘇聯的形象則由正面轉為負面，經歷了劇烈的變化；相較於對美蘇的陳述，對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形象則較為模糊。毛澤東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爭奪領導權時，中國共產黨必須重新定位自己，從忠實地跟隨蘇聯到反蘇、反殖民、反霸權的旗手，到爭

⁸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74 年 4 月 11 日，第 1 版。

⁸¹ 戴伯韜，《戴伯韜教育文選》，頁 296、306、312。

奪正統馬列主義的接班人。從兩個陣營到三個世界，界線的移動和劃分最後還是由黨來決定。其實界線的變動，正說明了中共所面臨的內政、外交的挑戰及其因應之道。然而，無論界線如何移動，中共對內建構的反帝反殖與民族主義結合，也是形塑生長於紅旗下的學子成為新人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貫穿二十世紀中國，呈現於教科書中的民族主義確實具有連續性，但內容也有所變化。首先，代表帝國主義的國家有所改變。民國時期的教科書並沒有明確地陳述美國在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徑。1949年之後，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美國被視為最邪惡和最大的帝國主義強權。只有在中蘇分裂之後，蘇聯才被置放於與美國同樣的帝國主義陣營。這樣的變化，不可能從歷史教學大綱中察覺，或如 Alisa Jones 所聲稱的，1956 年和 1963 年的教學大綱版本只有「一些些微的變化」。⁸² 雖然兩個大綱都宣稱資本主義覆滅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但承擔與帝國主義戰鬥的最佳主角，從 1956 年的蘇聯轉變為 1963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部世界的描述也因此隨之變化。

其次，中國共產黨對於教科書撰寫的控制遠勝於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者都致力於將教科書的編寫置於黨的監督之下。然而，三民主義內容的多元和模糊，以及南京政府未能實質統一中國，政令不能有效地執行，給予編輯較大的空間自行解釋其世界觀，只要不涉及階級鬥爭的觀點多能出版。同時，民國時期的社會和學校都相對多元，因此正如 Robert Culp 所言，「民國時期的中國，學

⁸² Alisa Jones, "Chang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y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Edward Vickers and Alisa Jones, eds., *History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74.

校很難作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⁸³ 相比之下，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編輯只有極小的空間與黨協商，而更多地是必須服從於黨的要求。這不只是因為馬列主義有更嚴格的意識形態，而且還因為中共擁有比國民黨更集中且有效率的組織。因此，中共中央的指示能夠有效地上令下達。⁸⁴ 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能夠真正實現了「黨化」教育。國民黨雖有同樣目標，卻沒有能力做到。因而，毛時期中共所建構的民族主義可以更精準地稱之為「黨領導下的民族主義」。由於中共對於社會和意識形態事務更強大的控制力，毛時期的教科書寫作更適用阿圖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⁸⁵

毛時代的中國所有媒體只傳播官方意識形態，儘管他們之中可能出現失誤或偏離，但是程度有限。同時，中國當時在國際上相對地孤立，也有助於中共有效地灌輸官方意識形態。無可否認地，學生的學習是透過許多不同的管道接收資訊，教科書雖只是其中一個資訊來源，卻是十分重要的管道。學生每天在校學習，還要考試，因此教科書的影響不容小覷。誠如同戴伯韜所言，學生必須熟記課本內容，就像吃飯似地，天天吃這些材料，老師則像媽媽餵飯似地，用課本餵學生。⁸⁶ 在毛時代的學生並沒有可以選擇要吃什麼飯的自由，可以彈性處理的只有老師不必然地完全照著課本教學。這在 1950 年代早期尚有可能的，但在反右運動之後，這種可能性降低許多。有位當時在高中任教的老師說，1957 年之後，至少在公開場合，老師必須照本宣科

⁸³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p. 12.

⁸⁴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深入地討論國共這方面的異同，但它十分值得進一步研究。

⁸⁵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127-188.

⁸⁶ 戴伯韜，《戴伯韜教育文選》，頁 286。

以求自保，而不管課本陳述的是什麼內容。⁸⁷ 由於中共持續不斷地重新改寫教科書，由黨來定義誰是敵人及誰是朋友。學生長期沉浸於這樣的教育之後，會盲目地跟隨黨的指示走，而壓制他們自己的詮釋。這一獨斷和壓制的教育系統，最終形成年輕一代紅衛兵的一種心態。

此外，韓戰爆發之後，學校就開始教授文化大革命期間隨時可見的尖酸刻薄、攻擊性強的語言，儘管當時數量不多。大躍進以來，課本中的語言逐漸成為對敵對陣營和叛離社會主義的國家的辱罵。有人或許會說，這樣的用語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已經出現。然而，在談話、報章雜誌中使用這樣的語言是一回事，而將他們放在教科書用以教育後代，又是另一回事。學子長久浸潤在煽情式謾罵、政治意味濃厚的用語，並受到情感的激發，這些漸成制式的反應隨時可以上台表述，用來宣洩他們對「階級敵人」的仇恨。⁸⁸ 結果造成這些學子在文革期間運用這些詞彙和分析世界架構，來攻擊編寫且批准這些文本的老師、編輯，甚至當局，恐是當時這些教育者始料未及的。

自 1980 年代以來，教科書的寫作政治性變低，且呈多元化。在一綱多本的政策下，一般而言，國際觀已經不再是黑白分明。教科書刪除了「階級鬥爭」、「反動」、和「革命」的辭彙。在二十一世紀，國際觀架構變成多極化的「一超多強」形勢。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同時還有日本、歐盟、中國和俄羅斯的強權。中共承續早先的觀點，認為美國仍有佔領世界的野心，因此中國必須

⁸⁷ 訪問楊天石，台北，2011 年 1 月 14 日。楊天石曾在 1960 年代初期擔任高中語文教師。

⁸⁸ Yu Liu, "Maoist Discours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motion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36:3 (2010), pp. 329-362.

繼續為反霸權而奮鬥。⁸⁹ 由此可證，從毛時代到天安門事件，即使期間民族主義的內容因為政治環境的變遷而有所更易，直到今天，民族主義仍持續反映在教科書的國際觀之中。

⁸⁹ 2002 年的教材改革，實行一綱多本制。人民教育出版社編，普通高中《歷史必修（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第 3 版），頁 129；《高中歷史（試驗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六分冊，頁 52-53；高中歷史教材編寫組、DC 加拿大國際交流中心合作編寫，普通高中《歷史必修(1)》（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第 3 版），頁 114-115；陳其編，《教師教學用書：世界歷史（九年級）》（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下冊，頁 200-201；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3 (September 1998), pp. 287-302.

第三章

黨國至上——群眾歌曲中的愛國觀

共產黨把我們各民族人民，團結成統一的勞動聯盟，
共產黨是我們的希望和力量，黨是我們的舵手。
黨領導人民實現了理想，暴風中它無比堅強，
戰鬥裡消滅了萬惡的敵人，我們黨已壯大成長。
在祖國太陽光下我們日益堅強，我們都忠於列寧斯大林事業。
蘇聯共產黨在號召全體人民，為我們祖國建立偉大功勳。¹

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
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²

共產黨堅信在共產革命成功之前的國家是掌握在少數剝削者手中，而不是廣大勞動者手中；只有推翻這些剝削者，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國家，愛國才有真正的實質意義。雖然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國家終會消失；但是在國家尚未消失之前，為了反對剝削的資產階級和反

¹ 〈黨是我們的舵手〉（米哈爾克夫詞，穆拉杰里曲，1952），《歌曲》，1954年第12期，頁18-19。

² 〈大海航行靠舵手〉（郁文詞，王雙印曲，1964）。

對帝國主義，愛國主義仍然是必要的。同時愛國主義必須與國際主義相結合。共產黨所定義的愛國主義，主要是指愛祖國、愛人民、愛共產黨和愛領袖，由此推演出熱愛勞動、擁護黨的政策、獻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保衛世界和平、堅決對抗資產階級思想和行動、解放全人類的事業等。簡單地說，在共產黨邏輯之下，「愛國主義」就是要愛自己的國家、黨及其領袖、制度和政策。就事實而言，國家、黨、領袖、政策、制度不一定都可以用等號互相連結。然而，對中共而言，黨、領袖、制度、政策都等於國家；但在不同階段強調的重點或有所不同。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不但泯除了國界的分野，而且產生了「無祖國」的無產階級，因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會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十七世紀以降，逐漸形成的國際主義觀念，賦予階級意義，提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³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要爭取世界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者的友愛和團結，用來對抗資產階級及其政權，並援助全世界所有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為了世界革命，必須反對帝國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異化成帝國主義的國家。不過，國際主義並不是世界主義；世界主義一如民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的產物。

本章闡析共產黨如何利用群眾歌曲灌輸愛國主義的精神，作為維持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推力。「流行歌曲」在共黨術語中叫做「群眾歌曲」或「大眾歌曲」；意指為群眾而創作，為大眾所喜愛的歌曲。實際上是由黨強勢主導，藉此來灌輸官方意識形態的歌曲。

³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85），卷4，頁469-471。

自 1930 年代以來，中共主張只有反映國家民族大義、以集體為要，能夠激勵大眾人心的歌曲，如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冼星海的〈滿江紅〉、〈黃河大合唱〉等，才是健康、應該宣揚、廣為傳唱的好歌。其中被中共用來動員群眾、改造群眾的最佳範例則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莫屬。毛澤東為了要求新兵紀律和改善軍民關係，煞費苦心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寫成士兵應該嚴格遵守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後來軍團政治部幹部將其配上原已在中共根據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調，使得文盲佔多數的士兵都能牢記在心。⁴ 本章主要討論中共建國後的情形，重視政治變化對歌曲內容和宣傳的影響。除了中國群眾歌曲之外，也將討論在中國流行的蘇聯群眾歌曲；希望以中蘇歌曲對照的方式，凸顯兩國在政治、文化發展之異同。

一、蘇聯群眾歌曲的起源和傳入中國

共產黨向來重視音樂在政治上扮演的工具性角色。列寧曾經說過，音樂是團結廣大群眾的一種手段，指的就是透過音樂可以傳播意識形態，加強人民的向心力。在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歌詞可視為承載及反映社會的文本；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歌詞更重要的是反映黨國所要傳遞的政治訊息。所謂「文字入心、音樂入骨」，戰爭歌曲可以凝聚戰鬥力量，和平歌曲可以抒發抱負與感情。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後，俄共音樂部門的建制中即設有鼓動宣傳科，並在內戰時期利用歌曲為黨宣傳。

⁴ 陳士渠，〈「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來源〉，《中國青年》，1958 年第 15 期，頁 19、27。

普羅音樂是十月革命之後才有的新樂種，主要包括革命歌曲、進行曲以及從工廠機器發出來的各種聲音所形成的「音樂」。許多蘇聯群眾歌曲以進行曲的方式展現，意味著群眾鬥志高昂、有紀律地大步邁向光明的未來。1920年代的革命進行曲帶有十分濃厚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強調階級鬥爭、團結在黨的四周。這個新樂種以合唱為主，全國各種合唱團體一度達二十五萬之多。不過，一般大眾並不喜歡這些旋律過於簡單、歌詞過度嚴肅的歌曲。人民還是喜歡曲調比較輕鬆、歌詞富有情感的歌曲。⁵有鑒於此，1930年代初期，蘇聯有關當局開始允許較為輕鬆的抒情歌曲出現；不但過去廣受大眾歡迎的吉普賽流行歌曲紛紛回籠，同時也鼓勵創作新的、較為輕鬆的曲目，這類的群眾歌曲開始廣為流行。⁶

1930年代蘇共鼓勵創作的新歌，依然充滿了意識形態，表達的方式則較為間接委婉，旋律也多樣化，不再以進行曲為大宗。新歌的主題是歌頌對黨與國家的熱愛，歌頌人民群眾和革命後代的幸福，讚美祖國的大自然與城市；⁷基調樂觀進取、鼓勵向上。當時許多填詞作曲者亦非等閒之輩。從十九世紀以來，俄國就有利用詩人作品譜成歌曲的傳統，將普希金 (Aleksandr S. Pushkin, 1799-1837)、萊蒙托夫

⁵ Н. А. Рыжкова, "Массовая музыка 20-х годов: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х нотных каталогов," (1920年代的群眾音樂) Е. В. Дуков, *Между обществом и властью: Массовые жанры от 20-х к 80-м годам XX века* (介於社會和政權之間：群眾樂種，1920-1980年代)(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2002), с. 164-165.

⁶ А. Сохор, *О Музыке серьезной и легкой* (論嚴肅和輕鬆的音樂) (Ленинград: Музыка, 1964), с. 75.

⁷ Ю. Корев, *Советская массовая песня* (蘇聯群眾歌曲) (Москва: Музфонд СССР, 1956), с. 3-5; Ханс Гюнтер, "Поющая родина: Советская массовая песня как выражение архетипа матери," (歌唱祖國：蘇聯群眾歌曲所表現的母親原型)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文學問題) (Июль-Август, 1997), с. 46, 51.

(Mikhail Iu. Lermontov, 1814-1841)、涅克拉索夫 (Nikolai A. Nekrasov, 1821-1877) 的詩作成為民歌，就是其中的顯例。蘇聯繼承了這個傳統，著名詩人如列別杰夫—庫馬契 (Vasilii I. Lebedev-Kumach, 1898-1948)、伊薩克夫斯基 (Mikhail V. Isakovskii, 1900-1973)、多爾瑪托夫斯基 (Evgenii A. Dolmatovskii, 1915-1994)、馬都索夫斯基 (Mikhail L. Matusovskii, 1915-1990) 等紛紛與優秀的作曲家合作填詞譜曲。這些譜曲者都有深厚的古典音樂基礎，如勃蘭切爾 (Matvei I. Blanter, 1903-1990)、波克拉斯兄弟 (Dmitrii Ia. Pokrass, 1899-1978 & Daniil Ia. Pokrass, 1905-1954)、杜那耶夫斯基 (Issak O. Dunaevskii, 1900-1955)、亞歷山大羅夫 (Aleksandr V. Aleksandrov, 1883-1946)、米留汀 (Iurii S. Miliutin, 1903-1968)、索洛維約夫—謝多伊 (Vasilii P. Solov'ev-Sedoi, 1907-1979)。他們能夠成功地移花接木，將舊有的俄國民歌或西方的華爾滋、爵士樂、探戈、輕歌劇與當局喜歡的進行曲混合在一起，配上作詞者平易近人的文字，使得原本不受歡迎的群眾歌曲，成為市井小民喜愛的流行歌曲，大街小巷，處處可聞。這其中還有個不容忽視的推進因素，那就是宣傳得法。蘇聯群眾歌曲因為電影、收音機、唱片的播放而大行其道。許多群眾歌曲同時也是電影主題曲。有些偏遠地區，電影尚未上演，主題歌卻早已是人人會唱。軍隊、運動會、青年團體經常提供各種演出機會；軍樂隊更是各種節日不可或缺的歌曲推廣者。1928年亞歷山大羅夫將軍成立素質極高的蘇軍紅旗歌舞團，也是宣傳群眾歌曲的主力之一。⁸

⁸ 蘇軍紅旗歌舞團剛成立時只有 12 位團員，十年後已有 250 人；合唱團團員均為男性，舞蹈部分有少數女性。A. Сохор, *Рус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песня* (俄國/蘇聯歌曲) (Ленинград: Советский композитор, 1959), с. 156; Richard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6-78.

杜那耶夫斯基是 1930 年代創作最多的蘇聯作曲家，有群眾歌曲之王、進行曲之王的美譽。他與列別杰夫—庫馬契合作的〈祖國進行曲〉(Песня о Родине, 1936)，極受歡迎，幾乎成了蘇聯的第二國歌。這首歌原為電影《馬戲團》而作，但早在偏遠城市上映之前，已經透過收音機的播放，廣為人知。1939 年 5 月起，〈祖國進行曲〉成為莫斯科電台每天開播的台歌，也是許多年以來克里姆林宮鐘聲齊響的旋律。⁹ 1930 年代的蘇聯抒情歌曲主要也是表現大我，而不是個人感情；即使是關於愛，也是對群眾的愛，不是對個人。但是在音樂會等表演場合，人們偏愛選擇充滿吉普賽風味的歌曲。杜那耶夫斯基認為這並非人民缺乏品味，而是許多人要求帶有感情的抒情歌曲(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м романсе)；現有的歌曲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所以轉而從吉普賽歌手音樂會尋出路。蘇聯的抒情歌曲開始大量出現，並兼顧大我、小我，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是在二戰期間及其後。他們反映了戰士與姑娘之情，捍衛祖國之愛，對故鄉的懷念等等。如〈喀秋莎〉(Катюша, 1938)、〈窯洞裡〉(Землянка, 1941)、〈海港之夜〉(Вечер на рейде, 1941)、〈漆黑的夜〉(Темная ночь, 1943)、〈我親愛的好姑娘〉(Моя любимая, 1942)、〈黑姑娘〉(Смуглянка, 1944)、〈丁香花開〉(Сирень цветет, 1943)、〈在北方有可愛的小鎮〉(Есть на севере хороший городок, 1942)、〈祝酒歌〉(Застольная, 1946)、〈夜晚圓舞曲〉(Вечер вальса, 1948)、〈紅莓花兒開〉(Ой, цветет калина, 1949) 等皆是其中的佳作。¹⁰

繼日本佔領東北，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日本和蘇聯的關係益趨

⁹ 這首歌在法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美國左派的圈子也十分流行。Richard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90.

¹⁰ А. Сохор, *О Музыка серьезной и легкой*, с. 76-77.

緊張，蘇聯天空開始戰雲密布。從這個時候起，到戰後數年，是蘇聯群眾歌曲創作的高峰期。蘇聯是二次大戰參戰的同盟國之中傷亡最為慘重的國家，許多膾炙人口的歌曲都產生於二戰前後。德軍進入蘇聯境內後，斯大林第一次對全國廣播，號召人民所使用的字眼，不是同志與公民，而是兄弟與姊妹，彷彿是東正教大主教所用的語彙。換言之，他不是用黨的名義，號召人民抗敵；而是要他們為了祖國、為了家庭而戰。人民拋開了關於殘酷的農業集體化與大整肅的記憶，凝聚了民族意識，一致對外抗德。雖然歌曲的悲觀主義仍是禁忌，歌詞卻不再是陳義過高地獻身於偉大的共產黨，而是訴諸於簡樸、親切的家園、美麗的大自然、家庭的歡樂、簡陋的小屋、破舊的籬笆、家鄉的可愛等。¹¹ 歌曲以最能傳達百姓心聲，與他們日常生活關係密切的事物景象，以及令他們魂牽夢縈的家人親友作為訴求，進而激勵百姓為國而戰。

聞名世界的〈喀秋莎〉（伊薩克夫斯基詞，勃蘭切爾曲）是蘇聯群眾歌曲的翹楚。這首歌描述癡情姑娘喀秋莎思念戍守邊疆的情郎，旋律輕快悅耳，歌詞同時融合了保國衛民的思想。〈喀秋莎〉受歡迎的程度，甚至連二戰期間蘇聯發明的一種 BM13 的火箭炮，亦別稱喀秋莎；農村的婚禮上也唱這首歌來慶祝喜事。後來鄉民們在作詞者伊薩克夫斯基的故鄉斯摩凌斯克（也就是喀秋莎唱歌的地方），還專門為這首歌曲成立了紀念碑與博物館。¹² 一首歌曲得到這麼隆重的待

¹¹ Geoffrey Hosk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R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ast and Present* 175 (May 2002), pp. 162-187; Richard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p. 100, 104-105.

¹² "Время победы: История знаменитой песни 'Катюша'," (勝利的時刻：名歌〈喀秋莎〉的歷史) *Новости: Первый Канал* (新聞：第一頻道) (31 марта 2005) (2005年3月31日), <http://www.1tv.ru/news/social/74325> (2013年5月17日檢索); James

遇和殊榮，世界少見。

1941年6月22日，德軍入侵蘇聯，其後一週，單單是莫斯科一地就有約100首新歌出現，其中最有名的是有蘇聯戰時國歌之稱的〈神聖的戰爭〉（Священная война，列別杰夫—庫馬契詞，亞歷山大羅夫曲），曲調是典型的軍樂進行曲，呼籲全民奮起，和萬惡的敵人作殊死決鬥。6月27日，蘇軍紅旗歌舞團在莫斯科火車站第一次公開演唱，為開往前線的戰士送行。據當時歌舞團團員回憶，沉重的怒吼、雄壯的歌聲感動了所有臨行的士兵，歌曲連唱五次之多。¹³

抗戰時期，蘇聯群眾歌曲大量傳入中國。一群左派文人在上海和延安均曾譯配蘇聯群眾歌曲；上海的左翼作家對於蘇聯歌曲的傳播，更是功不可沒。蘇聯以蘇商的名義在上海出版的《時代》雜誌，幾乎每期都介紹一首蘇聯歌曲；就是在這個時期譯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蘇聯群眾歌曲，如〈祖國進行曲〉（姜椿芳、呂驥）、〈快樂的人們〉（Марш веселых ребят，塞克）、〈喀秋莎〉（趙楓）。這些歌曲又經由北平學生訪問延安而傳入了中共根據地。¹⁴ 1941年，塔斯社在上海設立了蘇聯電台，許多動聽雄壯的蘇聯歌曲最初都是透過這個電台傳播出去，受到當時左派分子的歡迎。¹⁵ 事實上，蘇聯群眾歌曲進入中國，最早

von Geldern and Richard Stites, eds., *Mass Culture in Soviet Russia: Tales, Poems, Songs, Movies, Plays, and Folklore, 1917-195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15.

¹³ Robert A. Rothstein, "Homeland, Home Town, and Battlefield: The Popular Song," in Richard Stites, ed.,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Wartime Russia*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9.

¹⁴ 薛範，《歌曲翻譯探索與實踐》（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198-200。1937年4月十個燕大學生組成訪問團到延安，當時延安正在開西北青年救國代表大會。趙榮聲〈「一二·九」雜憶〉，《人民日報》，1985年12月5日，第8版。

¹⁵ 草嬰，《我與俄羅斯文學：翻譯生涯六十年》（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頁

可溯源至 1920 年代中期。曾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的李求實，擔任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團委宣傳部長，編了一本《革命歌集》，共收入 15 首歌，包括翻譯的蘇聯群眾歌曲〈少年先鋒歌〉（瞿秋白後來譯為〈青年近衛軍〉），以及利用蘇聯歌曲的旋律填入反映中國現勢的中文歌曲。例如，他利用蘇聯歌曲〈紅海軍共青團員之歌〉的曲調，重新填詞成為〈五一紀念歌〉等。這本歌集還附有五線譜和簡譜，以利歌曲的流傳。在編者前言中，李求實強調，這些歌曲是中國國族主義的見證和革命精神的表現。後來在中共江西蘇區十分流行的除《革命歌集》外，尚有〈騎兵歌〉、〈穿過海洋，穿過波浪〉等。¹⁶ 中共在蘇區時期，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的李伯釗（楊尚昆之妻）和沙可夫是介紹蘇聯歌曲和舞蹈的主將。他們不但介紹蘇聯歌曲（主要是軍歌），也利用蘇聯歌曲的曲調創作新歌。¹⁷

由於日本侵略中國，使得蘇聯群眾歌曲中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被奴役的內容受到許多青年的喜愛。曾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的左派人士陳原說，那時「蘇聯是進步人類的希望，也是抗戰中的中國人渴望的『太陽』」。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寄給他許多曲譜、音樂雜誌，包括一本蘇軍紅旗歌舞團歌曲集。陳原以此歌集為藍本，將北國歌曲彙編成《蘇聯名歌集》，這可能是在中國出現的第一本蘇聯歌集。他也將〈假如明天帶來了戰爭〉（Если завтра война，列別杰夫—庫馬契

131。

¹⁶ 中國翻譯外國歌曲始於清朝末年，如美國的〈飛渡鳩迦〉（〈進軍佐治亞〉）和法國〈馬賽曲〉等。李求實編，《革命歌集》（廣州：中國青年社，1926），轉引自上海音樂學院現代中國音樂資料整理研究組編，〈五四到第一次國內革命工農革命歌曲〉，《人民音樂》，1961 年第 7 期，頁 5；從群，〈展開向蘇聯音樂學系的熱潮〉，《人民音樂》，1950 年第 3 期，頁 6。

¹⁷ 劉雲主編，《中央蘇區文化藝術史》，頁 255、262、373-375。

詞，波克拉斯兄弟曲）收入歌集。陳原在〈前記〉中稱讚俄羅斯，從「無知」農民的北國，在革命之後的二十三年之間，「變成文化的、愉快的、藝術的國土。……〈祖國進行曲〉給我們極大的鼓勵。這個小曲，在那樣晦澀的不愉快的日子裡，帶來了對祖國的熱愛。」¹⁸ 作家王蒙亦回憶道：「在我十一歲的時候，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我從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那裡學會的第一首進步歌曲便是蘇聯的〈喀秋莎〉。當時，思想激進的我甚至覺得這首歌還不夠『革命』呢。但是它的跳動的青春的旋律和美好的心緒迅速征服了我，唱著這首歌，我想到的是新的歷史，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我感到真正的忘我的沉醉。」¹⁹ 對中國人而言，〈喀秋莎〉顯現蘇聯歌曲迷人的魅力，可以有革命的願景，也含有個人浪漫的情懷。陳原和王蒙對蘇聯歌曲的感受，不但反映了愛國大我的一面，也表達了個人生活願望的心聲。

二、高唱黨國大我

中共尚未建政之前，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即已在北平成立，誓言要「以音樂的武器來為人民民主共和國戰鬥不息」。它的機關刊物《人民音樂》聲言要廣泛地展開人民音樂運動，使其成為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一環；所有的音樂創作都需在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下進行。²⁰

¹⁸ 陳原編譯，《蘇聯名歌集》（桂林：桂林新知書店，1941）；〈假如明天帶來了戰爭〉最初登在《救亡日報》；陳原，《不是回憶錄的回憶錄》（上海：文匯出版社，1997），頁80-81、91。

¹⁹ 王蒙，《訪蘇心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頁50-51。

²⁰ 〈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 電毛主席、朱總司令致敬〉，《人民日報》，1949年7月

這個發刊詞明白地揭示音樂為黨國服務、利用音樂作為政治宣傳武器的決心。

關於中共治下歌曲的創作與發行機制，目前似乎尚未見公開出版的研究成果，只能利用口述訪問探知一二。1949年後的音樂創作、發行和傳播逐漸由專門機構負責，中央統一管理。如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樂團等均有專業創作組，連電影製片廠也有專業作曲家，1950年代後音樂院校培養出來的畢業生，也有許多人加入這些專業創作組。他們可以透過公開演出、廣播等方式將作品流傳出去。創作與發表歌曲的另一渠道是透過全國陸續設立在農村鄉鎮和城市街道辦事處的文化站、縣與大中城市各區的文化館、群眾藝術館。文化館、群眾藝術館內有文藝幹部及專業人才，他們經常組織文化活動，發掘與培訓民間的藝術愛好者。同時，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的創作人才或文藝幹部常常需要面對群眾，組織宣傳隊演出，或到農村、工廠宣傳或采風。²¹ 這些均有助於歌曲的傳播與創作。

歌曲可以口耳相傳，傳播速度要比任何紙本媒介快，無遠弗屆。宣傳群眾歌曲的管道，以廣播電台的播放與教唱為最有效且直接的方式。早在1949年6月底，北平新華電台即已開始介紹與播放中國和蘇聯的群眾歌曲，此後晚間均有固定時段播送與教唱。中共軍隊進入上海後不久，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隨即跟進，編輯《廣播歌選》，並在電台中教唱，流傳廣泛。²² 1950年代初期，上海也出版了不少帶有簡

25日，第2版；〈發刊詞〉，《人民音樂》，1950年第1期，頁6。

²¹ 訪問張援，音樂教育研究工作者，北京，2014年9月5日；中國藝術館籌備處、北京華人經濟技術研究所編，《中國群眾藝術館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1-4、865-866。

²² 〈北平新華廣播電台今晚節目〉，《人民日報》，1949年6月30日，第1版；《廣播歌選》初以活頁歌片形式不定期地發行，不久改為月刊出版。

譜的中外歌曲選集。²³ 其他管道尚有學校教唱、電影、音樂會、合唱團、各地的歌詠隊、晚會表演、舞會等。

1952年4月，文化部和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聯合出版《歌曲》，作為介紹群眾歌曲的主要刊物；目的在於藉著群眾歌曲提高愛國熱情，鼓舞其鬥爭意志。選曲的標準是能表現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對祖國、英明領袖與共產黨的熱愛及擁護，宣揚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表現人民維護世界和平和創造美好未來所作的貢獻。²⁴ 無論是新歌或舊歌，《歌曲》所選錄的曲目都強烈反映了當時國內外情勢的官方立場，除了雙百期間之外，絕大多數的歌曲都是以集體大我為主，在報章雜誌和官方出版的其他歌本亦是如此。²⁵ 官方媒體試圖藉由歌曲，營造一種形象，即在中國隨時隨地可以聽到雄壯威武、明朗快樂、充滿愛國精神和國際主義的音樂。

中國群眾歌曲除了延安以來傳唱不歇的〈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之外，中共建國初期又出版了許多關於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歌曲。1950年7月，全國音協上海分會為了歌詠競賽，特別發

²³ 例如，朱嬰選編，《新生歌選（1-4合訂本）》（上海：自立書店，1953）；編者不詳，《新中華歌選（合訂本）》（上海：陸開記書店，1953）；陳歌辛編，《蘇聯群眾歌曲》（上海：自立書店，1953）；朱嬰編，《蘇聯歌曲》（上海：自立書店，1953）；廖輔權編，《蘇聯群眾歌曲集》（上海：萬葉書店，1953）；雷良棻編，《蘇聯群眾歌曲集》（上海：中華書局，1954）；闕仲瑤編，《蘇聯群眾歌曲新編》（上海：新音樂出版社，1953）。

²⁴ 〈發刊詞〉，《歌曲》，1952年第1期，頁3。

²⁵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中蘇友好特別節目」〉，《人民日報》，1952年11月2日，第1版；巴威爾·貝柯夫，〈向中國朋友們致敬〉，《人民日報》，1952年2月13日，第4版。曹禺，〈向蘇聯藝術學習，為保衛和平奮鬥〉，《人民日報》，1950年11月7日，第6版。

行《歌選一百首》，從已發表的一千四百多首新歌中選出 42 首。²⁶ 這些歌曲不一定都為人喜愛或創作水準高，有多少人會唱也是個問題。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代表官方認可且值得提倡的歌曲。歌選重點在於歌頌工人勞動、建設國家及領袖和黨。歌曲比喻毛澤東和共產黨宛如太陽、燈塔、救星，帶領人民打倒帝國主義，肅清反動勢力、封建殘餘，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使人民從過去的奴隸，變成現在的主人，建立了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新國家；人民要永遠跟著毛主席和黨走，中國才會繁榮富強。

1950 年代初期，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有幾首歌曲是中共公令必須全國教唱。第一首是歷史悠久的〈國際歌〉。²⁷ 這首歌標識了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呼籲全世界受奴役的無產者，團結起來奮力掙脫鎖鏈，消滅剝削和壓迫，成為新社會的主人。隨著韓戰爆發，關於抗美援朝的歌曲多如過江之鯽，其中流傳最廣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歌〉（麻扶搖詞、周巍峙曲，1951）。這首短小、旋律簡單的二拍進行曲，好學易唱，適合行軍、踢正步齊唱，發表後立即與國歌被指定為五一勞動節遊行的必唱歌曲。²⁸ 文化部又規定 1951 年國慶日當天，〈歌唱祖國〉（王莘詞曲）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條〉（招司詞，瞿希賢曲）是全國必唱曲目。〈歌唱祖國〉的開頭「五星紅旗迎風飄

²⁶ 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編，《歌選一百首》（上海：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1950）。

²⁷ 在中蘇兩國享有盛名的〈國際歌〉，作詞、作曲者雖均為法國人，但從 1917 年至 1944 年間，它曾是蘇聯國歌，且本章涉及國際主義，故亦列入討論。

²⁸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關於「五一」勞動節示威遊行時唱歌的通知〉，《人民日報》，1951 年 4 月 6 日，第 1 版。當時歌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即《打敗美國野心狼》）。歌詞：「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為祖國，就是保家鄉。中國好兒女，齊心團結緊。抗美援朝打敗美帝野心狼！」

揚，勝利歌聲多麼嘹亮」，流露出中共建國後的開闊氣象和期許。當時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祕書長孫慎評論這首歌「曲調流暢、嘹亮，是宣揚愛國精神的歌曲中較好的一首。全曲展現著無限的驕傲和熱情，歌唱我們美麗、偉大的祖國，勇敢勤勞的人民和幸福美好的新社會。」²⁹〈全世界人民心一條〉歌頌斯大林和毛澤東像太陽，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共同為民主與和平團結在一起。這首歌曲兼有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既符合向蘇聯一邊倒政策，又有兩國團結為新生活共同奮鬥的意義。

中共剛剛建國之際，適合當時情境、流傳廣泛的中國群眾歌曲仍然有限，蘇聯歌曲因此成為表現愛國主義的主要來源。廣為人知的曲目有〈祖國進行曲〉；歌頌祖國山川美麗、軍力強大及人民英勇的〈俄羅斯〉（Россия, S. Alymov 阿雷莫夫詞，A. Novikov 諾維科夫曲，1947）；要保衛祖國像愛護母親一般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Нас не трогай，列別杰夫—庫馬契詞，米留汀曲，1938），它的最後兩句：「在火裡不怕燃燒，在水裡也不會下沉」非常神勇！有不怕犧牲受苦，無論上刀山或下油鍋都無所畏懼的精神。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生活幸福快樂的〈快樂的人們〉（Марш веселых ребят，列別杰夫—庫馬契詞，杜那耶夫斯基曲，1937），最後一段歌詞提到若敵人來犯，必然挺胸應戰。類似這樣的保衛祖國的歌曲相當多，特別是戍守邊疆，思念親友情人的歌曲，因為同時兼有大我及小我，更是受人歡迎。如〈喀秋莎〉、〈遙遠的地方〉（Далеко-далеко, A. Churkin 丘爾金詞，G. Nosov 諾索夫曲，1950）想念故鄉美麗的風景

²⁹ 孫慎，〈國慶節唱的兩首歌曲的唱法〉、〈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關於國慶節唱歌的通知〉，《人民日報》，1951年9月15日，第3版。

和愛人；為了愛人的幸福和祖國的安全，戍守邊疆，永遠不准敵人再犯。還有蘇聯紅旗歌舞團曾在中國各大城市表演的〈太陽落山〉，描述具有堅強意志的士兵不怕犧牲流血，用生命保衛家鄉祖國；現在返回家園，仍然誓言忠於斯大林。³⁰ 歌頌領袖的有〈斯大林之歌〉(Кантата о Сталине, М. Iniushkin 伊紐什金詞，亞歷山大羅夫曲，1938)，比喻斯大林為勇敢有智慧的雄鷹，帶給人民新生活，領導人民抵禦外侮。〈斯大林頌〉(На просторах родины чудесной, 蘇爾科夫詞，勃蘭切爾曲，1938)，高唱「斯大林是勝利的旗幟，青年的曙光」，人民的豐衣足食與幸福安樂都歸功於他的領導。³¹ 歌頌黨的〈我們舉杯〉(Наш тост, А. Tarkovskii 塔爾可夫斯基詞，I. Liuban 留邦曲，1942)，為自由的祖國、英雄的人民、強大的軍隊、為黨和斯大林乾杯。〈蘇軍之歌〉(Песня о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 О. Kolychev 柯雷切夫詞，亞歷山大羅夫曲，1943)，向戰勝法西斯的祖國戰士致敬，蘇軍的偉大歸功於共產黨的領導。

此外，還有表現國際主義、中蘇友好的代表作〈莫斯科——北京〉(Москва--Пекин, М. Vershinin 維爾什寧詞，V. Muradeli 穆拉杰里曲，1949)。這首蘇聯歌曲最能體現當時中蘇蜜月氣氛，也是凡有蘇聯人士訪華的必唱曲目。它歌頌中蘇兩國永遠是兄弟，堅固的友誼攜手共促世界和平；中蘇在自由的旗幟下並肩前進。斯大林和毛澤東是萬眾歸心、全民愛戴的偉大領袖。有些學生喜歡模仿紀錄片中的中蘇人民，手挽手大步走的動作，同時唱著：「斯大林和毛澤東在聽我

³⁰ 音樂出版社編輯部編，《外國名歌 200 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58)，頁 10。〈太陽落山〉、〈唱法說明〉，《歌曲》，1952 年第 8 期，頁 15、23。

³¹ 中國也出版了專門頌揚斯大林的歌集，如高嘉、李念村，《斯大林之歌》(上海：真理書店，1953)；石年，《斯大林歌集》(北京：新華書店，1954)。

們！在聽我們！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最後兩句並用俄文發音。³² 中國歌曲則有〈我們永遠跟著你們走，斯大林、毛澤東！〉（馬可詞曲），讚頌斯大林和毛澤東是人民的指路明燈；他們扭斷舊世界的鎖鏈，打碎反動派的牢籠，將東西方聯成一片，團結歐亞人民，進行勝利的鬥爭。〈北京——莫斯科列車〉（袁水拍詞，徐榮坤曲），頌揚中蘇領袖把人類帶到共產主義仙境；蘇聯就是中國的明天。〈中蘇友好歌〉（安娥詞，呂驥曲），讚頌中蘇友誼形成鐵的長城，為崇高的理想攜手前進，保衛亞洲和全世界的和平。³³ 其中最特別的是郭沫若詞，朱駒曲的〈萬歲！親愛的鋼〉。「斯大林」俄文的原意是鋼，郭沫若比喻他是人類永恆的太陽；因為斯大林，馬列主義才能發揚，無產階級才能茁壯，解放事業才有輝煌的成就。蘇聯像無比堅強的堡壘，最後高呼「萬歲！親愛的鋼。萬歲萬歲萬歲萬歲！」作為結束。³⁴ 「親愛的」是一種非常西式的情感表達，郭沫若用這樣強烈的用語來形容中國對蘇聯的仰慕，亦可見當時中國一邊倒的程度。其次，國際主義的精神尚包含支援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建設和戰事。如〈北京——平壤〉比喻中朝人民牢不可破、血肉相連的友誼，以最強音結束。〔外〕蒙古的〈友誼之路〉就是感謝來自兄弟國家無私的援助，協助修建鐵路穿過山河、戈壁，是親密友誼的禮物……，「讓莫斯科、北京、烏蘭巴托聯結在一起。」³⁵

³² 戈小麗，〈蘇聯歌曲和我們〉，《北京文學》，1999年第8期，頁97。

³³ 〈我們永遠跟著你們走，斯大林、毛澤東！——紀念兩個人民領袖的歷史會見〉，《人民音樂》，1950年第1期，頁35；〈中蘇友好歌〉，《歌曲》，1952年第4期，頁4；〈北京——莫斯科列車〉，《歌曲》，1955年第16期，頁23。

³⁴ 《歌選一百首》，頁74-75。

³⁵ 〈北京——平壤〉，《歌曲》，1954年第10期，頁14；《外國名歌200首》，頁152、156-160。

從上層統治者角度來看，建國三年以來，全國各地發表的群眾歌曲不下萬首，然而其中有許多並不符合官方的要求。從民間角度來看，這些新歌多半曲調難學難唱，歌詞雷同空洞；標語口號太多，唱不起勁。有感於此，中共遂於 1954 年春天，舉辦全國群眾歌曲評獎，提出的標準有三：(一)作品的思想，(二)藝術水平，(三)流行程度。³⁶可見「政治思想正確」是第一要義。音協主席呂驥進而說明：「群眾歌曲作為一種特殊的鬥爭武器，不可能、也不應該脫離廣大群眾所參加的當前的現實的政治鬥爭。」歌曲必須憑藉特殊的思維形式和感染力，透過聽眾情緒的激動，達到思想的變化，才能發揮歌曲宣傳教育的武器功能。³⁷

全國各單位一共推薦 208 首參選，結果有 114 首獲獎。其中絕大多數是歌頌祖國、領袖和紅軍的歌曲。一等獎的九首歌曲亦是歌頌黨、國、領袖和解放軍，但毛主席的形象和重要性超過了黨。這九首歌曲沒有一首歌詞涉及私人小我的情感；旋律是進行曲者佔一半以上，有三首採用少數民族的抒情曲調。少數民族的〈歌唱毛澤東〉(托爾遜瓦依提詞，阿不力克木曲)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美麗其格詞曲)，也是歌頌毛澤東是救星、導師、父親、太陽。³⁸中共特別列入這兩首少數民族的歌曲，暗示非漢族也擁戴毛主席與共產黨。

³⁶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關於三年來全國群眾歌曲評獎的公告〉、〈評獎說明〉，《人民日報》，1954 年 3 月 27 日，第 3 版。

³⁷ 呂驥，〈為創作更多更好的群眾歌曲而努力〉，《人民日報》，1954 年 3 月 28 日，第 3 版。

³⁸ 一等獎九首，二等獎四十三首，三等獎六十二首。〈三年來全國群眾歌曲評獎得獎歌曲名單〉，《人民日報》，1954 年 3 月 27 日，第 3 版。一等獎：〈全世界人民心一條〉、〈歌唱祖國〉、〈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歌〉、〈歌唱毛澤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我是一個兵〉、〈王大媽要和平〉、〈小鴿子〉、〈歌唱二郎山〉。

從 1950 年代中期開始，中共關心民族獨立運動的視角由北韓、蒙古，延伸到東南亞其他國家，甚至非洲。此乃由於 1955 年的萬隆會議與 1956 年蘇伊士運河的危機，促使中共開始宣傳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友好，反殖民主義的國際主義歌曲增多。相關的歌曲有〈印中友好歌〉、〈中阿友好歌〉（馬寒冰詞，李巨川曲）、〈亞非青年團結起來〉（方強詞曲）、〈解放伊利安〉（印尼歌曲，G. R. W 辛蘇詞曲）。1959 年古巴革命成功，國際主義的觸角也延伸到拉丁美洲，產生了〈中國——拉丁美洲人民友好歌〉（王驚濤詞，李名方曲）。³⁹ 中共相信亞非拉各地均有強大的民族解放運動，被壓迫者的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運動日益壯大，宣布獨立的國家越來越多，鼓舞了各地的受壓迫者。當時在全國反帝國主義高漲的形勢下，有關當局特別編選了二十多首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民主義和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鬥爭歌集。這些譯自日本、土耳其、印尼、阿爾及利亞、埃及、古巴的歌曲，可以聽到「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的忿怒吼聲，並可看出他們鬥爭的決心、對民族獨立的渴望和對未來的信心」。這些歌曲的出版也是「對一切被壓迫民族的人民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反帝鬥爭表示熱烈的聲援！」同時，由於中蘇關係日趨緊張，關於中蘇友好的歌曲數量大減，多半只出現於中蘇關係的重大節日，如同盟互助條約簽訂週年而出現的〈中蘇兄弟心一條〉（放平詞，馬思聰曲）。⁴⁰ 無論是關於亞

³⁹ 〈亞非青年團結起來〉，《歌曲》，1956 年第 38 期，頁 3；〈解放伊利安〉，《歌曲》，1957 年第 50 期，頁 18；〈專題：反對美英侵略中東〉，《歌曲》，1958 年第 59 期，頁 1-4；〈中國——拉丁美洲人民友好歌〉，《歌曲》，1960 年第 104 期，頁 5。

⁴⁰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編者的話〉，《反帝之歌（翻譯歌曲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頁 III-IV；〈中蘇兄弟心一條〉（放平詞，馬思聰曲），《歌曲》，1960 年第 96 期，頁 2。

非拉或中蘇關係，這些歌曲多半基於上級指派的任務需要而創作，在官方組織的活動中演唱，人民私下傳唱的頻率不高。

1962年初《歌曲》推廣18首革命歌曲，〈國際歌〉列為首位。⁴¹中共以〈國際歌〉歌詞原來的翻譯「不夠妥切」，請專家加以修訂。對照《外國名歌200首》翻譯的歌詞與1962年中共公布的版本，發現在文意上至少有四處較大的修改：(1)原來的熱血沸騰，「做一次最後的鬥爭」改成「快為真理而鬥爭」，暗含了不斷革命之意。(2)「新社會的主人」改為「天下的主人」，頗有革命從中國推到全世界的意味。(3)「要奪取平等自由幸福，要消滅剝削壓迫。」改為「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衝破牢籠。」(4)「我們的血汗流了不知多少，和那些強盜們戰鬥」變成「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⁴²修改後的文字戰鬥意味濃厚，流露的仇恨更深。蕭三原來的譯詞比較接近法文原意，中共對歌詞的更動，其實也反映了當時日益激進的政治趨勢。同時，中央廣播電台大量播放亞非拉的音樂，例如，日本的〈民族獨立行動之歌〉、〈東京——北京〉，老撾的〈愛老撾〉，印尼的〈解放西伊里安〉，古巴的〈7月26日頌歌〉、〈要古巴，不要美國佬〉，阿爾及利亞的〈萬歲，阿爾及利亞〉。⁴³中國詞曲者也創作了〈哈瓦那的孩子〉（安波、木青詞，李劫夫曲，1962）。歌曲表述父親拿槍鬧革命，是為了打倒資本家，解救工農階級；帶有濃厚的階級仇恨。但相當難得的是，李劫夫不是採用當時最常見的進行曲曲調，而是旋律混合了輕快的古巴樂風，悠揚動聽，是少數頗受歡迎

⁴¹ 〈高唱革命歌曲，鼓舞革命幹勁〉，《歌曲》，1962年第135期，頁2。

⁴² 音樂出版社編輯部編，《外國名歌200首》，頁2-3；〈《國際歌（歌曲）》〉，《人民日報》，1962年4月28日，第6版。

⁴³ 楊琦，〈亞、非、拉美音樂廣播得好〉，《人民音樂》，1962年第2期，頁19-20。

迎的亞非拉歌曲。

1963 年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光未然詞，瞿希賢曲），用進行曲的形式，將中國比喻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歌詞充滿了殺伐之氣，將無產者比喻為大山大海，毛澤東如紅日般地引領無產者解放。其中部分歌詞：「帝國主義、反動派、妖魔鬼怪，怎抵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哪怕它紙老虎張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滅，把它消滅！」⁴⁴ 彷彿世界革命即將在全球展開，大戰就在眼前。這首歌比起 1950 年代初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條〉那種平穩的詞語，更是充滿了血脈賁張的鬥爭殺氣。這兩首歌曲的差異顯示了中共所宣揚的國際主義，從最初的團結友好，到中期的反帝反殖民，到文革前成為世界革命的前奏。

這種日益激進的趨勢，同時也反映在頌揚中國、黨與領袖的歌曲，由 1950 年代中期的和緩抒情到文革前的革命調門越來越高。反右之前，官方大力宣揚〈歌唱中國共產黨〉（金帆詞，李名方曲，1956），⁴⁵ 黨宛如春天的陽光，趕走冰雪；喚醒人民衝破黑暗，得到解放。黨永遠是人民心裡的太陽，照耀祖國，帶領人民歡樂地建設家鄉，走向地上的樂園。這首歌比〈社會主義好〉平穩抒情。〈社會主義好〉（希揚詞，李煥之曲，1957）充滿撻伐之氣；反映的是對國內的右派和國外的帝國主義反動派進行政治鬥爭。⁴⁶ 大躍進期間，全國各地大搞群眾民歌創作運動，讚美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然

⁴⁴ 《歌曲》，1963 年第 149 期，頁 2-3。瞿希賢晚年極力勸阻，不要再唱這首歌，解釋說「此曲是在當時政治形勢下寫的，現在形勢不同了，再唱是誤導。」收入她的合唱作品選時，還特別加註：「收入此集作為歷史足跡。」秦西炫，〈我認識的瞿希賢〉，《人民音樂》，2008 年第 6 期，頁 10。

⁴⁵ 《歌曲》，1956 年第 33 期，頁 1。

⁴⁶ 《歌曲》，1957 年第 47 期，頁 2-3。

量巨質差。1958年，有多位作曲家紛紛為毛澤東的詩作〈蝶戀花·答李淑一〉譜曲，其中包括李劫夫，這意味著對於毛的崇拜進入新的階段。李劫夫另一首著名歌曲是〈我們走在大路上〉(1963)，歡唱毛主席領導全民邁向世界革命的大道，中國儼然成為世界革命的領導中心，革命的鑼鼓越敲越緊。⁴⁷ 1963年上映電影《雷鋒》的一首主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姚筱舟詞，朱踐耳曲)，隨著電影的四處放映，不用等到文革開始，已經到處傳唱黨比親生的母親還偉大，可以用暴力鬧革命。1964年發表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郁文詞，王雙印曲)，旋律輕快，歌詞簡單易記，頗能符合群眾歌曲的要求。但音調十分高亢，最後一句「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的「不落」，用高音 Fa、Sol 的位置來彰顯「太陽的不落」。文革期間，〈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或歌詞常用於各種場合或張貼各地；它的政治地位僅次於〈東方紅〉，對於製造毛的個人崇拜，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1965年開始，官方媒體提到群眾歌曲前面必加「革命」二字。中共以國內外革命情勢一片大好，革命的群眾歌曲是階級鬥爭的重要工具之一，可以「抵制和代替了腐蝕群眾革命意志的資產階級頹廢的歌曲和各種靡靡之音」。職是之故，有關當局選出 13 首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列為榜首，用以表達「社會主義新時代人民群眾的革命思想和感情，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偉大的毛澤東文藝思想運用於我國音樂工作所取得的成就。」⁴⁸ 耐人尋味的是，蘇聯歌曲〈黨是我

⁴⁷ 《歌曲》，1963年第150期，頁8。這首歌詞在文革時期改得更為激進，目前傳唱的版本已經刪除革命等詞。

⁴⁸ 這十三首歌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會主義好〉、〈我們走在大路上〉、〈工人階級硬骨頭〉、〈社員都是向陽花〉、〈三八作風歌〉、〈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為女民兵題照（七絕）〉、〈學習雷鋒好榜樣〉、〈高舉革命大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編者，

們的舵手) (Партия---наш рулевой, S. Mikhalkov 米哈爾克夫詞，穆拉杰里曲，1952) 創作時，斯大林仍在世，也是對他個人崇拜的高峰期，然而舵手是黨，不是斯大林。⁴⁹ 而在中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尚未到達頂峰，毛澤東已經取代黨成為舵手；這也反映了中蘇個人崇拜的政治文化差異。

1966年，李劫夫詞曲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更直白地昭示血緣或倫理關係，都比不上與毛主席的關係；中國人向來重視父子女女的倫理關係，也被毛所取代。文革中，因為〈國際歌〉的歌詞中有「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與領袖崇拜有衝突，雖然也沒有人敢下令禁唱這首歌，却變成「曲可奏，詞不能唱」。⁵⁰ 在黨國主義的語境之下，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凌駕於國際主義之上。

三、抒情歌曲表現愛國主義

1949年以來，中共全力提倡以黨國領袖為重的曲目，那麼過去利用歌曲抒發個人情感的所謂抒情歌曲，是否仍然可以存在？如果可以，在什麼情境之下允許存在？個人及其感情在黨國中的位置應該如何擺放？是否需要或如何協調大我和小我之間的關係？這些問題困擾著歌曲創作者。

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音樂界也有不同的看法。1953年，作曲

〈革命歌曲選〉，《紅旗》，1965年第3期，頁31-49。

⁴⁹ 〈黨是我們的舵手〉不在《外國名歌 200首》之內，但刊登於《歌曲》，1954年第12期，頁18-19。這兩首歌的歌詞見本章章首引言。

⁵⁰ 陸谷孫，〈歌的流變〉，《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38226> (2009年12月3日檢索)。

家賀綠汀在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全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專題發言指出，近年來除了現成的民歌小調之外，極少人敢寫抒情歌曲。然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複雜、多面的，不能要求音樂只有頌歌，只用進行曲的曲調；不能粗暴地動輒對抒情歌曲戴上有「小資產階級的感情」的帽子。⁵¹ 次年，具有更高官方身分的音協主席呂驥，承認建國三年來創作的抒情歌曲在數量、質量上皆差；究其原因，乃是許多創作者「簡單地片面地理解『音樂應該服務於當前政治鬥爭』」，以致所有歌曲幾乎都是進行曲，幾乎都是群眾齊唱，十分單調。他重新定義了「抒情歌曲」，聲稱「新中國」讓人們打破了對傳統抒情歌曲只歌唱愛情、友情和大自然的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發展進步，人們更想歌唱偉大的祖國和領袖，各種社會主義建設，各民族團結成為大家庭、新婚姻法等。⁵² 這樣的定義說明了官方對於「正確」或「優良」的抒情歌曲也只能以訴求大我為重點。

關於抒情歌曲的問題在賀綠汀的發言之後，引發音樂界眾多與廣泛討論；這些討論不僅限於理論上的探討，也反映了民間不斷抱怨沒有好歌可唱的窘境。許多人將抒情歌曲等同於男女愛情歌曲；即使有人敢於創作表達非男女之情，也有可能因為政治調門不夠高或「另類解讀」，受到批評。例如，〈告訴我，祖國來的風〉（晨耕、管平詞，晨耕曲）描寫一個戍守邊境的哨兵思念毛主席、祖國和父母。就歌詞而論，是首政治正確的歌曲，但是旋律卻受到批評。有人認為歌曲的開頭兩句「我是祖國和平建設的哨兵，守衛在朝鮮前線的山峰」，音調過低，表達了「低沉淒涼」的情緒，不是無產階級戰士的聲音，而

⁵¹ 賀綠汀，〈論音樂的創作與批評〉，《人民音樂》，1954年第3期，頁20-21。

⁵² 呂驥，〈為創作更多更好的群眾歌曲而努力〉，《人民日報》，1954年3月28日，第3版。

是「一種瀟灑無事的媚音，只是灌輸了和平麻痺思想，消失〔原文如此〕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的警惕性。」其次，有些曲段採用了朝鮮民歌，卻無法掩蓋作者小資產階級的情感，不能表現戰士淳樸而潔淨的情感及戰士昂揚的鬥志。⁵³ 其後《人民音樂》接續五期，以近半年的時間刊登各界對於這首歌的討論。最後一次登載這些討論時，編輯部沒有表達清楚的立場，只以大多數意見肯定這首歌，作為結束。⁵⁴ 弔詭的是，此後這首歌卻像一陣風似地消失了。事實上，大多數的肯定仍不敵來自高層堅持「政治正確」的主張。連素為官方喜愛的作曲家瞿希賢的作品，也曾受到批評。瞿對於〈拂曉的燈光〉（張明權詞）個人感到十分滿意，認為「我抒發了自己的感情！」它表現一位好學的老幹部夜讀睡著了，「我」進屋給他輕披上大衣。但是有人批評這裡抒發的「不是老幹部之間而是愛人之間的感情」。這個批評促使瞿希賢從此將這歌束之高閣。⁵⁵ 在政治掛帥的前提之下，類似狀況難免更令許多詞曲作者裹足不前，寧可創作在政治上比較安全的歌詞和進行曲的曲調。這也導致民間普遍覺得可唱、愛唱的好歌太少，甚至無歌可唱。《人民歌聲》、《歌曲》等刊物發表的歌曲，大多不為青年所喜愛。《人民音樂》轉載自《中國青年報》一張十分逗趣的圖畫，一

⁵³ 澤民，〈對「告訴我，來自祖國的風」的意見〉，《人民音樂》，1955年第1期，頁15-16；戈風，〈「告訴我，來自祖國的風」不是一首好歌〉，《人民音樂》，1955年第2期，頁27-28。

⁵⁴ 本刊編輯部，〈讀者對「告訴我，來自祖國的風」的意見〉，《人民音樂》，1955年第5期，頁16-17。

⁵⁵ 此曲1955年問世，歌詞：「啊！卻還放在那本煉鋼學上。我輕輕地走進小屋，我把大衣披上他雙肩，我才發現那煙盃上的煙頭，還燃著它，最後一縷輕煙。」秦西炫，〈我認識的瞿希賢〉，《人民音樂》，2008年第6期，頁10；王健，〈拂曉的燈光〉，《歌曲》，1999年第1期，頁59；毛翰、趙會鳳，〈十七年文學論爭檔案（歌詞篇）〉，《名作欣賞》，2009年第30期，頁47，註6。

個合唱團開口唱出來的歌詞竟然是：「作曲家，詩人們，幫幫忙，我們要唱歌！我們沒歌唱！！」⁵⁶

為何會從「沒有好歌唱」轉變成「沒有歌可唱」？問題出在哪裡？這成了 1955 年中期《人民音樂》和《歌曲》的討論焦點，特別是關於如何對待抒情歌曲的討論。然而，這些討論都抵不過當時音協對歌曲創作要求的以大我為重的原則：「體現我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鬥爭中的創造性勞動和勝利信心、表現我國人民對祖國黨和領袖的熱愛和歌頌、反映我國人民在保衛祖國、保衛世界和平鬥爭中的堅決意志和力量」。⁵⁷ 雖然官方也強調愛情歌曲仍然是需要的；聲稱並不反對所有以愛情為題材的民歌或抒情歌曲。但必須是能夠反映工人階級真誠、平等、深厚的愛情，描述他們的愛情與勞動、工作相合，與工人階級的最高利益——共產主義事業相容。⁵⁸ 問題是工人階級的愛情和非工人階級的愛情有何區別，如何在一首歌中清楚界定？要求在大我和小我之間取得平衡或達到官方要求的「政治正確」，談何容易？這也是群眾歌曲處於大我及小我之間的兩難。

雙百時期，對於愛情歌曲有更開放的討論。當時有人為文主張，不該泛稱表達真摯愛情的歌曲為不健康的黃色音樂。即使是描寫英雄、模範的愛情，不該只有一個公式，一個類型；歌曲需要反映人民各式各樣的複雜感情。⁵⁹ 由於《歌曲》鼓勵創作者自由投稿，所以刊登出來的不見得是受歡迎或廣為人知的歌曲。許多讀者寫信向《歌

⁵⁶ 〈重視群眾對歌曲的要求和意見〉，《歌曲》，1955 年第 19 期，頁 22；黃仲軒，〈群眾要唱歌——群眾沒歌唱〉，《人民音樂》，1955 年第 5 期，頁 31。

⁵⁷ 〈稿約〉，《歌曲》，1955 年第 19 期，頁 21。

⁵⁸ 編輯部，〈肅清黃色音樂的遺毒〉，《歌曲》，1955 年第 20 期，頁 22-23。

⁵⁹ 李仃，〈《草原情歌》譯詞質疑〉；岳扶，〈也談愛情歌曲〉，《人民音樂》，1956 年第 10 期，頁 21-22。

曲》雜誌抱怨，已有的歌曲創作不能滿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青年還是比較喜歡唱一些蘇聯群眾歌曲，工人也愛唱抒情歌曲。許多工農認為一些群眾歌曲寫得太複雜、太難唱。⁶⁰ 1957年《歌曲》編輯部針對讀者進行意見調查，收到三千多份意見，紛紛表達對該刊發表的創作歌曲不滿。有讀者每次拿到雜誌總是跳過新歌，先翻到外國歌曲或中國民歌部分。⁶¹

由於表達私人感情歌曲的供需嚴重失衡，使得原本為政治力強行壓制下來的「黃色歌曲」，一有機會便又大量、廣泛地浮現檯面。有段期間各大城市不但可以買到1949年以前的流行歌曲歌本及唱片（連新華書店的書亭也販售），而且許多商店、工廠、學校和機關的舞會及晚會、甚至廣播電台，也公然播放「黃色歌曲」。⁶² 一般唱片市價都是幾毛錢而已，但一張黃色歌曲唱片在黑市可以高達二十元，還有人搶著買。⁶³ 無疑地，掌管宣傳、青年和文藝的相關部門視此為一大警訊。

這個事實逼得中共官方必須正面迎戰「黃色歌曲」。有關當局戮力於解釋1949年以前，以上海為中心的流行歌曲，多是靡靡之音、「黃色音樂」，格調低下，情趣頹廢，矯揉造作。他們是「過去半殖

⁶⁰ 編輯部，〈重視群眾對歌曲創作的要求和意見〉，《歌曲》，1955年第19期，頁22-23。

⁶¹ 〈答讀者意見〉，《歌曲》，1957年第40期，頁22；〈短論：從讀者對歌曲創作的意見想起〉，《歌曲》，1957年第41期，頁21。

⁶² 〈上海廣大群眾要求制止黃色歌曲氾濫〉，《內部參考》，期2310（1957年9月14日），頁14-15；〈目前遼寧省黃色歌曲甚為流行〉，《內部參考》，期2342（1957年10月25日），頁8-9；〈許多城市黃色歌曲氾濫情況相當嚴重〉，《內部參考》，期2390（1957年12月27日），頁8-10。

⁶³ 〈掀起一個社會主義的歌詠浪潮〉，《人民日報》，1958年2月14日，第9版。

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其實質就是資產階級腐朽墮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一種反映，同時也是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文化侵略的一種形式。」中共認為黃色歌曲不單單取決於歌詞，應從歌詞、曲調、唱法、伴奏等全面來看。⁶⁴ 有關當局為了更具體地說明黃色歌曲如何偽裝，便以〈漁家女〉為例，並用反映「舊社會」漁民生活艱苦的〈漁光曲〉作為對照，批評〈漁家女〉如何利用資產階級的觀點，歪曲「舊社會」漁民的真實生活和思想感情。作者指出歌曲旋律一開始就將人「引進這樣一種意境，好像是吃得飽飽的，穿得整整齊齊的人們（在舊社會裡，只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才能過這樣的生活），在悠然自得地盪舟湖上，欣賞著『旭日初升』，享受著『好風和順』。這兒沒有勞動，這兒沒有鬥爭，有的只是盡情的享受？！」〔雙引號內文是歌詞〕。它是供資產階級茶餘酒後玩賞的，並且麻痺人民的鬥爭意志，所以與黃色歌曲並無差別。最後，作者嚴厲地質問那些喜歡〈漁家女〉、認為它是抒情歌曲的人：「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歌曲抒的是哪一個階級之情？你自己的感情又是屬於哪一階級的？」⁶⁵ 顯然作者在歌詞上是斷章取義。因為〈漁家女〉旭日及風和的描景之後，接下來提到一家的溫飽就靠著早晨的漁獲，男女漁民都來不及洗臉搽粉，便開始投入捕魚的勞動，完全看不出來反映了所謂資產階級「閒散、逍遙、舒適的情調」。而受到中共稱讚的〈漁光曲〉，歌詞也沒有階級仇恨或鬥爭的影子。平心而論，這兩首歌曲的曲調和歌詞內容近似，或許有人會覺得〈漁家女〉的旋律比〈漁光曲〉還要優美。其次，倘

⁶⁴ 〈黃色歌曲問答〉，《歌曲》，1958年第52期，頁18-19。

⁶⁵ 羽片，〈什麼是好歌什麼是壞歌——從《漁光曲》和《漁家女》談起〉，《中國青年》，1958年第10期，頁29。

若仔細推敲〈漁家女〉的歌詞，同樣是反映漁民的辛苦。⁶⁶事實上，〈漁家女〉的問題不在詞曲本身，問題出在作曲者是「舊中國」流行歌曲界有「歌仙」之稱，1950年代被俄國人稱為「中國杜納耶夫斯基」的陳歌辛(1914-1961)。1957年他被冠上右派的帽子，他的創作都被視為帶有「資產階級」色彩。⁶⁷這才是〈漁家女〉的真正原罪。

官方主張應該選擇性的接受老歌；凡是反映反封建、反奴役等大我老歌，才值得繼續傳唱，⁶⁸否則都不可再唱。反右運動將所謂「黃色歌曲」、「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歌曲均予以痛擊。〈社會主義好〉就是以反右鬥爭勝利為主旨的歌曲。⁶⁹這首四拍的進行曲，易學好唱，適合群眾集會的場合。有關單位通令全國各級學校和廣播電

⁶⁶ 〈漁家女〉(李隽青詞，陳歌辛曲)。歌詞全文：「啊！啊！天上旭日初升，潮面好風和順。搖盪著漁船，搖盪著漁船，做我們的營生。手網兒張，眼把魚兒等，一家的溫飽就靠這早晨。男的不洗臉，女的不搽粉，大家各自找前程。不管是夏是冬，不管是秋是春，搖盪著漁船，搖盪著漁船，做我們的營生。」〈漁光曲〉的歌詞全文：「雲兒飄在海空，魚兒藏在水中，早晨太陽裡曬魚網，迎面吹過來大海風。潮水升，浪花湧，魚船兒飄飄各西東，輕撒網，緊拉繩，煙霧裡辛苦等魚蹤！魚兒難捕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爺爺留下的破魚網，小心再靠它過一冬。」作詞者安娥是黨員，作曲者任光屬於左翼文藝界人士；任光在新四軍工作時，因皖南事變受傷而亡。

⁶⁷ 驥江叟，〈音樂天才陳歌辛〉，《北方音樂》，2006年第6期，頁6-7。陳歌辛後來餓死在勞改營。中國不是沒有傑出的音樂人才，而是許多政治運動摧毀了這些人才。如果1950年陳歌辛仍留在香港，不回中國，他的成就絕不會輸於後來由大陸到香港發展的作曲家陳蝶衣。

⁶⁸ 編輯部，〈問題回答〉，《歌曲》，1955年第16期，頁24。

⁶⁹ 1964年的歌選將原歌詞的「右派分子」改為「反動分子」，至今傳唱的版本均用「反動分子」。見〈社會主義好！〉，《歌曲》，1957年第47期，頁3；音樂出版社編輯部編，《革命歌曲大家唱》(北京：音樂出版社，1964)，頁4；晨楓，〈記憶的歲月在歌聲中永恆——新中國歌曲創作歷程回望〉，《歌曲》，2005年第6期，頁75。

台教唱這首歌，但是學生和聽眾暗地裡抱怨這首歌不好聽，「像說話一樣的，沒意思」、「乾巴巴的」、「太硬」。不過，官方刊物則聲稱，這首歌曲頗受工農群眾的歡迎，因為它顯示了「人民對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熱愛與堅強的信心；同時也表現了人民對黨的崇高熱情和無比的愛戴。」官方為了強調只有極少數人不喜歡〈社會主義好〉，《人民音樂》特別報導它在全國各地廣受各界歡迎，包括幹部、學生、教師等；甚至連天主教修女都上台演唱這首歌。由此證明「全國各族人民在黨的英明領導下，已向社會主義大步邁進」，一定要唱類似歌曲，才能合乎時代要求。⁷⁰事實上，聽眾會用消極的方式表達他們真正的心聲。有個很好的證明，在一次題為「肅清黃色音樂」的演講上，因為海報註明將採取邊講邊聽唱片方式，結果出席者比平常的唱片欣賞會多。但黃色音樂介紹完畢之後，接下來要用社會主義的紅色唱片作對比時，後面的座位慢慢空了；等到要述說黃色音樂的八大罪狀時，所餘聽眾不到一半。⁷¹聽眾等於是用腳表達了他們對紅色歌曲的態度。

大躍進期間，全國再度掀起群眾歌詠運動，卻又出現老百姓批評多數群眾歌曲乾硬無味，沒有興趣唱的現象。⁷²隨著政治路線日益激進，不但1949年以前的許多老歌不能唱，連民間小調改編的歌曲也受到批評。〈丟戒指〉（潘文林、郭頌改編）原是一首流傳於東北華北地區的小調，表達一位姑娘丟了情人送的戒指，萬分著急的心情。

⁷⁰ 舒揚，〈〈社會主義好〉響遍西安——響遍全國〉，《人民音樂》，1958年第9期，頁39。

⁷¹ 澎湖，〈要多抒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之情——談知識青年唱什麼歌〉，《人民音樂》，1958年第5期，頁8-9。

⁷² 〈掀起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歌詠運動〉，《人民日報》，1958年1月30日，第7版。

這首歌 1953 年曾在東北公開演唱，受到樂界好評；1956 年第一屆全國音樂週演出時，引起轟動。但到了 1959 年卻受到批判，認為它趣味低級，情感挑逗；勞動階級不可能有戒指，主人翁至少是地主的女兒；最後將其歸類於「毒草」、「黃色歌曲」之流。⁷³就在批判〈丟戒指〉是不健康的抒情歌曲之際，《人民音樂》特別推薦一首「動人的抒情歌曲」——〈歌唱毛主席共產黨〉（周化嶺詞，龍飛曲）。作者稱讚徐緩的旋律，洋溢著歡欣鼓舞的感情，表現了人民永遠跟著黨和領袖，奔向共產主義的決心。⁷⁴因為是歌頌毛主席和共產黨，舒緩的旋律就不被認為是表達哀傷或悲觀的感情，反而是感情充沛、激動人心的表現。換言之，官方很清楚地告訴大眾，抒情歌曲只能抒發對大我的領袖與黨國的感情；若是小我，莫說是高度敏感的男女之情，就是表達對親人和朋友的感情都是禁忌。這也是官方對於抒情歌曲討論的最後總結。許多音樂刊物不斷強調在新社會，人民的思想感情不只是寄託於愛情，「而是被重要得多的社會題材所吸引；愛共產黨、愛祖國、愛集體、愛勞動、愛共產主義理想，等等。」⁷⁵此外，在文革之前，歌唱大我的旋律多半為兩拍或四拍的進行曲，或取材於民間小調的抒情曲調。突出的例外是廣受歡迎的三拍圓舞曲，如〈青年友誼圓舞曲〉（天戈曲，江山詞，1955）及〈我愛祖國的藍天〉（閻肅詞，羊鳴曲，1961）；前者為中國參加在波蘭舉行的世界青年聯歡節而創作，後者則歌頌空軍。⁷⁶這種華爾滋旋律在當時十分少見。

⁷³ 編者，〈天津舉辦關於抒情歌曲問題的討論〉，《人民音樂》，1959年第2期，頁18-19；影子，〈〈丟戒指〉是不健康的〉、〈各地展開有關抒情歌曲問題討論〉，《人民音樂》，1959年第4期，頁21-27。

⁷⁴ 羅傳開，〈介紹一首動人的抒情歌曲〉，《人民音樂》，1959年第4期，頁15。

⁷⁵ 宋揚，〈創造更新更美的群眾歌曲〉，《人民音樂》，1960年第11-12期，頁46。

⁷⁶ 感謝張援告知作者這兩首歌曲受歡迎的程度。

中共既然對於中國歌曲的政治要求越來越高，〈相逢在北京〉（宛青詞，鞏志偉曲，1962）受到批評，就不足為怪了。該曲講述老友在北京重逢敘舊。有人評論歌詞寫得不錯，但是曲調過於鬆弛，纏綿柔弱，不能顯現「革命的、愛國主義的感情，和由此而產生的為革命、為祖國獻身的英雄主義精神。」⁷⁷ 同時，官方也大力宣揚高唱反帝、反殖民的亞非拉的革命歌曲。有趣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在官方舉辦音樂會大力推廣亞非拉革命歌曲的時候，有些歌唱者選唱的反帝、反殖民的亞非拉的曲目經常不到三分之一；所選擇的多半是描寫愛情和生活風俗的作品，反映鬥爭的革命歌曲變成次要的。⁷⁸ 亞非拉歌曲中最受歡迎的，不是頌揚獨立和革命的雄壯進行曲，而是曲調溫柔悅耳的民歌，如旋律優美的古巴民歌〈西波涅〉（Siboney）和印尼民歌〈寶貝〉（butet）。⁷⁹ 這兩首歌曲各有奧妙之處。〈西波涅〉是古巴的一個少數民族，在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戰役中，不幸全族慘遭殲滅。這首歌雖然背後有其悲壯的歷史，卻以對西波涅姑娘的情歌形式來表現，旋律是倫巴音樂的強烈節奏。歌詞：「西波涅！你像朝霞一樣美麗，……你的嘴唇甜甜蜜蜜，像一朵玫瑰花，引蜜蜂來採她。西波涅！我的幸福就是你呀！西波涅！西波涅，樹林日日夜夜都在悄悄談著你。西波涅！我的生命，我不能沒有你。」如非當時中共鼓吹與古巴的「革命友誼」，這種政治不正確的歌詞內容，有點感傷的曲調，

⁷⁷ 〈相逢在北京〉初發表於《歌曲》，1962年第135期，頁14；李佺民，〈歌曲《相逢在北京》和由此想到的問題〉，《人民音樂》，1963年第6期，頁25、27。

⁷⁸ 王一亭，〈亞、非、拉美音樂介紹中的一個問題〉，《人民音樂》，1963年第5期，頁2-4。

⁷⁹ 楊琦，〈亞、非、拉美音樂廣播得好〉，《人民音樂》，1962年第7期，頁19-20；〈寶貝〉，《歌曲》，1961年第130期，頁11；〈西波涅〉，《歌曲》，1962年第136期，頁54，1959年的《外國名歌200首續編》也收入。

不可能被允許廣為傳唱。後來音樂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集《古巴歌曲集》雖然收入這首歌，《人民音樂》介紹這本歌集時並無任何文字提及〈西波涅〉。⁸⁰另一首印尼的〈寶貝〉(butet 意為小孩)敘述父親為反抗荷蘭統治，參加游擊隊，不能在子女身邊，請母子等他回來。這首歌的「革命性」要比〈西波涅〉強，演唱的機會比較多，但在若干城市也成了禁歌。

1963年，許多刊物會將「群眾歌曲」和「革命歌曲」交替使用，這也可看出群眾歌曲被要求帶有革命性的趨勢。同年年底，毛澤東嚴厲指責各種藝術形式的問題不少，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收效甚微；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藝術。這批示是兩年後文藝界掀起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一經傳達下來，文藝界積極向左轉。除了歌頌領袖之外，其他抒情歌曲完全被打入冷宮。⁸¹1964年春，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趙楓為文，明白要求音樂創作需要革命化、民族化和群眾化。革命化指「音樂的藝術在內容上應該反映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反映各國人民解放運動、反映世界人民革命鬥爭」。⁸²在一次音協的座談會上，有人開始上綱上線到群眾歌曲的內容攸關是否重視革命的問題。⁸³

1964年秋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編輯部、《歌曲》編輯部

⁸⁰ 《古巴歌曲集》第一集，簡譜本（北京：音樂出版社，1962），頁26-27；胡炳堃，〈古巴人民的心聲——評介《古巴歌曲集》第一集〉，《人民音樂》，1963年第4期，頁26-27。

⁸¹ 晨楓，〈記憶的歲月在歌聲中永恆〉，《歌曲》，2005年第4期，頁77、31。

⁸² 趙楓，〈試論音樂革命化和民族化、群眾化的關係〉，《人民音樂》，1964年第3期，頁4。

⁸³ 安波，〈重視群眾歌曲，寫好群眾歌曲〉，《人民音樂》，1964年第10-11期，頁22。

和《音樂創作》編輯部聯合選出 26 首優秀群眾歌曲。⁸⁴ 這些歌曲大多數為進行曲，歌詞內容越來越激進，要鬧革命的戰鬥性也越來越強。1950 年代曾有的愛好和平等語，已經從這些歌曲消失。1964 年 12 月，重慶市文化局等下令禁止印刷和出售的歌曲，包括「內容陳舊過時，缺乏時代精神」的〈漁光曲〉、〈寶貝〉，以及「內容不健康、談情說愛、曲調纏綿、不宜演唱」的〈茉莉花〉、〈花兒為什麼這樣紅〉、〈馬兒啊！你慢慢走〉等，「蘇聯歌曲也不宜提倡」。⁸⁵ 過去可以偷渡小我感情的外國歌曲，此時也成為箭靶。對於外國歌曲公開正式開炮，首先出現於《中國青年報》批評《外國名歌 200 首》及其續編是散播資產階級毒素。他們指出這兩本歌選只有少量的優秀革命好歌如〈國際歌〉，其餘歌頌愛情、宗教情懷和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歌曲，只會消解青年的革命思想。歌曲曲調的軟硬，其實是反映了不同階級感情之間的鬥爭。⁸⁶ 1965 年戰場擴大到《人民音樂》。有人指責這本歌集收錄大量西洋古典歌曲和歐美各國當代流行歌曲，編者將資產階級在沙龍、舞場、酒吧流行的歌曲和莊嚴的革命歌曲〈國際歌〉放在一起，不夠嚴肅。許多歌曲美化資本主義社會，宣揚階級調和、愛情至上、資產階級人性論、超階級的愛。⁸⁷ 其中所舉的例子以美國和西歐為主，只提了舊俄一首歌，沒有蘇聯歌曲（包括古典歌曲），

⁸⁴ 〈優秀群眾歌曲評選揭曉〉，《人民音樂》，1964 年第 8-9 期，頁 20。

⁸⁵ 〈附錄：應予禁止印刷、出賣的歌曲名單（1964 年 12 月 4 日）〉，重慶市檔案館藏，檔號 1085-01-0990-永久，頁 36-37。

⁸⁶ 韓昭、陳良，〈外國名歌二百首散佈了什麼影響？〉，《中國青年報》，1964 年 9 月 5 日，第 4 版；王朝柱，〈軟綿綿和「硬梆梆」〉，《中國青年報》，1964 年 9 月 5 日，第 3 版。

⁸⁷ 游忠，〈《外國名歌 200 首》宣揚了什麼？〉；孫樹（北京大學學生），〈毒害青年人的《外國名歌 200 首》〉，《人民音樂》，1965 年第 1 期，頁 37-40。

但儼如指桑罵槐。

1965年3月，《紅旗》精選刊載13首革命歌曲，主張這些歌曲方能表達社會主義新世代人民群眾的革命思想和感情。《人民音樂》編者附和道，這些歌反映了人民對黨和毛主席的熱愛，也是全國人民的革命熱情和革命意志的集中表現。群眾歌曲的戰鬥性，主要表現在節奏有力、音調明快的號角式的進行曲。並特別加按語說明：「革命的群眾歌曲是階級鬥爭的重要工具之一。」⁸⁸這13首歌曲有一半是以毛澤東為焦點，突出他在黨與革命中的領導角色。為了表現革命高潮和昂揚氣氛，這些曲調多次出現高音，並常以高音結束，其中〈大海航行靠舵手〉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都到了高音的Fa，超過一般人的音域。除非受過聲樂訓練的人，否則普通群眾恐怕只能拉長脖子用喊的或降音來唱。

林彪曾說，「教一個好的歌子，實際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課，又是文化課。」⁸⁹文革初、中期創下毛澤東的詩詞和語錄被譜成歌曲最多的紀錄。語錄歌是最具文革特色的產物，不但政治性極強，藝術性低，而且常常單調到可以只是用吼的。⁹⁰文革後期(1972-1976)出版了五集的《戰地新歌》，藝術性比語錄歌高，但收入的主要還是歌頌

⁸⁸ 〈革命歌曲選〉，《紅旗》，1965年第3期，頁31-49；《人民音樂》編輯部，〈進一步繁榮革命群眾歌曲創作〉，《人民音樂》，1965年第2期，頁6-7。

⁸⁹ 轉引自梁耀，〈大唱革命歌曲，大長革命志氣〉，《歌曲》，1961年第123-124期，頁29。

⁹⁰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文史精華》，2003年第1期，頁18-31。1969年至1971年，許多語錄歌被江青批為「黃色歌曲」，結果全國公開場合只能演唱四首歌曲：〈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國際歌〉。梁茂春、明言編著，《中國近現代音樂史(1949-200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34-35。

毛主席，及配合當時政治鬥爭與反應工農兵革命精神的歌曲，少數民族的情歌也常被填上政治性歌詞。其中第一、第二集包含大量民歌，流傳最廣，也是以民族歌曲來彌補抒情歌曲的不足。⁹¹ 但是所有歌曲的內容還是只有革命，只有大我；若是洩露一點私人情感，都可能被戴上「封資修」的帽子。文革初期中共號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實際上真正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屈指可數。阿爾巴尼亞的〈我們是真正的朋友〉，是極少數能公開演唱的外國歌曲。文革中後期一度流行的北韓歌曲，無論在作曲或作詞上，其風格與內容均與蘇聯群眾歌曲十分相似。除此之外，官方傳媒中的外國歌曲幾乎全被戴上「反動」、「黃色」、「封資修」的帽子，外國歌曲幾乎全部絕跡。

四、中蘇群眾歌曲與民間反應

在眾多外國歌集之中，在中國流傳最廣的當屬 1958 年出版的《外國名歌 200 首》。這本歌集大部分來自已經出版過且較為流行的外國曲目，尤以俄蘇歌曲為最大宗，佔三分之一強。1961 年出版的《外國名歌 200 首續編》，因為中蘇關係日益惡化，俄蘇歌曲的比例降到全書五分之一。⁹² 由於《續編》流傳比較不廣，在此不列入討論。這

⁹¹ 梁茂春、明言編著，《中國近現代音樂史(1949-2000)》，頁 34-35；晨楓，〈記憶的歲月在歌聲中永恆〉，《歌曲》，2006 年第 9 期，頁 72；訪問張援，北京，2014 年 9 月 5 日。

⁹² 音樂出版社編輯部編，〈編後記〉，《外國名歌 200 首》，頁 300。初版雖名為 200 首，實際數字為 207 首；音樂出版社編輯部編，《外國名歌 200 首續編》（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61）；2001 年又出版了章民、王怡編，《外國名歌 200 首（修訂版）》（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1），以時代變遷，內容難免須作調整為由，又刪除五首歌曲：〈太陽落山〉、〈我們舉杯〉、〈莫斯科——北京〉、〈斯大林

裡的比較基礎主要是中共建國十七年和斯大林時代的群眾歌曲。斯大林死後，在中國流行的蘇聯歌曲較少，最有名的是〈山楂樹〉(Уральская рябинушка, 1953) 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1956)，兩者均為抒情歌曲。對中蘇共產黨的立場而言，群眾歌曲自然是以提倡大我精神——愛國愛民、愛黨愛領袖、愛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建設為要旨。然而，實際表現在歌曲內容上，兩國也有差異。最顯著的差別是蘇聯歌曲在歌頌集體大我之餘，同時也允許個人小我感情的表達。

若以 1958 年的《外國名歌 200 首》為基礎，單以 76 首蘇聯的歌曲而論，會發現歌詞內容涉及大我者佔絕大多數。⁹³ 現代歌曲部分反映集體意識的有 50 首；純粹反映個人情感、完全不涉及大我的僅有 8 首（〈有誰知道他〉、〈紅莓花兒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樹〉、〈孤獨的手風琴〉、〈春天裡的花園花兒多美麗〉、〈瑪麗諾之歌〉、〈夏天的田野〉）。俄羅斯民歌中反映個人的有 13 首，反映集體的（反抗之類）只有 3 首。乍看之下，彷彿歌頌集體的歌曲佔了絕對優勢，事實上不盡然。這些蘇聯群眾歌曲同時兼及集體與個人意識，有很大的重疊部分；同時具備愛國與親／戀情的雙重性質，也是大我和小我相得益彰的結合。其次，這些歌曲即使頌揚大我，旋律也不完全用進行曲，有許多採用民歌或抒情悠柔的曲風。

反觀 1949 年以來，中國群眾歌曲絕大多數是進行曲。創作於雙

頌〉、〈蘇維埃青年進行曲〉。

⁹³ 帝俄與蘇聯群眾歌曲有 87 首，其中的蘇聯現代歌曲和民歌（包括蘇聯作詞者重新填詞的）共有 76 首。「紅莓花」(калина) 乃譯者孟廣鈞杜撰，它的正確學名是莢蒾花。按俄國民間文化，莢蒾花象徵少女美色。〈山楂樹〉正確的翻譯應為「烏拉爾的小花楸樹」。而 Рябинушка 的正確學名是「花楸樹」，象徵少女輕盈體態。

百期間的〈我的祖國〉（喬羽詞，劉熾曲，1956）是少數的例外。這首詞曲俱優的傑作，是韓戰電影《上甘嶺》的插曲。旋律帶有民間小調的風味，親切流暢。⁹⁴ 開頭的兩句：「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非常大器地拉開祖國風光的簾幕，迎面而來的是隨風搖曳的稻穗，空氣中瀰漫著稻香。最後以「到處都有明媚的風光，到處都有和平的陽光」收尾，暗喻「新國家」的幸福和美好前程，並以高音比喻祖國如太陽，作為結束。第二段的歌詞中出現了「姑娘好像花兒一樣，小伙兒心胸多寬廣；為了開闢新天地，喚醒了沉睡的高山」。雖然歌中的「姑娘」和「小伙」之間沒有任何「曖昧」關係，但在文革期間也差點被冠上「黃色歌曲」的罪名，原因是單單出現「姑娘」一詞，加上輕柔的曲調，不能表現革命精神。還有人批評作者將志願軍描寫成「貪戀和平生活的懦夫」，稱其為「毒草歌曲」。⁹⁵ 這首歌詞的特色是，不用毛時代群眾歌曲經常出現的政治或制式的話語，如為了祖國母親，拿槍上戰場之類，也是它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同樣強調祖國美麗山川的蘇聯歌曲〈祖國進行曲〉，產生於1936年，正值慶祝蘇聯憲法頒布施行之時，也是蘇聯政治氣氛日益嚴峻、大整肅即將開始的前夕，雖然仍是抒情的曲風，但是歌詞比〈我的祖國〉政治化：「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人們可以自由走

⁹⁴ 電影《上甘嶺》的導演沙蒙等人原先寫的歌詞，讓劉熾完全捕捉不到旋律，後來請喬羽重寫，劉熾不久就譜出曲調。胡殷紅，〈一條大河，永遠流淌不完的歌——人民音樂家劉熾的故事〉，《流行歌曲》，2011年第1期，頁44。

⁹⁵ 邱小兵，〈一樁不同尋常的離婚訴訟——作曲家劉熾的愛情悲歡〉，《家庭》，1994年第10期，<http://shang.cnfamily.com/199410/ca20957.htm>（2013年12月30日檢索）；原載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江蘇紅總》編輯部主辦《江蘇紅總》報第41期，1967年12月4日出版。原文無作者署名。轉引自〈把毒草歌曲拿出來示眾〉，《記憶》，2009年第18期，頁53。

來走去，就是自己祖國的主人；各處生活都很寬廣自由，像那伏爾加直瀉奔流。……我們驕傲地稱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⁹⁶等到人們獲悉斯大林的集中營運作的實情之後，再對照歌詞中提到的「自由」，覺得是謊言，也是諷刺。其次，這首歌最後兩句的翻譯反映了中蘇文化的差異。歌詞俄語原文是：「Как невесту, Родину мы любим; Бережем, как ласковую мать.」意為我們像愛戀新娘般的愛祖國，我們像保護溫柔的母親般的保護祖國。姜椿芳譯成「我們愛護祖國有如情人，我們孝順祖國就像母親」。俄文的 невеста 可以是新娘或是屆婚齡的姑娘，譯成「情人」，關係不同，尚不致相差太遠；但「愛戀」與「愛護」、「保護」與「孝順」則帶有明顯的文化轉譯。蘇聯畢竟是比較接近歐洲文化的國家，對於男女之情的表達比中國開放，即使在政治氣候開始緊繃的前夕，仍可描述對祖國的愛像對新娘一般。而中國人一提到母親，容易順理成章地想到孝順；以中國的國情，會期望人民對待祖國宛如對待母親一般，較難鼓勵人們像愛戀新娘、情人那樣地愛祖國。

再以戰士駐防邊疆的歌曲為例。中國的〈告訴我，祖國來的風〉以舒緩的曲調，表述一個守衛在北韓南界的中國哨兵，懷念毛主席、朱德總司令、祖國及其人民、父母，並掛心祖國的建設；關於情人的明言或暗喻，一個字也沒有。即使如此「乾淨」的歌詞，仍被批評懷有小資產階級吟風弄月的感傷情緒，不合乎戰士昂揚樂觀的精神。⁹⁷同樣戍守邊疆的蘇聯戰士，〈遙遠的地方〉一歌唱出的不僅有對偉大

⁹⁶ 音樂出版社編輯部編，《外國名歌 200 首》，頁 3-4。中文譯詞沒有翻譯「斯大林憲法給予人民受教育、休息和勞動的權利」。

⁹⁷ 〈告訴我，祖國來的風〉，《歌曲》，1954 年第 13 期，頁 10-11；戈風，〈告訴我，來自祖國的風〉不是一首好歌，《人民音樂》，1955 年第 2 期，頁 27-28。

的祖國山川、朋友親人的懷念，更有對情人的相思，誓言「為了你〔情人〕的幸福，為了祖國的安全，永遠不准敵人再侵犯我邊境」。值得注意的是，作詞者先提個人的幸福，才提國家的安全。這首歌曲採用華爾滋的旋律，在蘇聯廣受歡迎。十月革命之前，俄國一些歌曲也用華爾滋的旋律，蘇聯當局將其列入「俄國固有的曲風」之一，而不是舶來品。相較於中國傳統民間小調，華爾滋是西方資產階級的音樂，中國作曲家多半不採用這種旋律。〈青年友誼圓舞曲〉、〈我愛祖國的藍天〉是極少數的例外，其所以產生的原因，尚待查考。同樣關於邊疆戰士的，還有更受人歡迎的〈喀秋莎〉，但只有一句歌詞提到大我：「勇敢戰鬥保衛祖國」，其餘都是寫情寫景，而且是產生於蘇聯大整肅的高峰期。

中共絕大多數的公開播放或演唱的歌曲，也以歌頌集體大我為主，極少涉及小我感情。然而，人民私下有選擇的時候，可以不跟著官方路線走。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同名〈小路〉的蘇聯歌曲。〈小路〉(Дороженька) 有兩首內容、旋律完全不同的版本，一是 1937 年由查哈羅夫 (V. Zakharov) 作曲，謝苗諾娃 (P. Semenova) 作詞。旋律採用傳統俄國民歌曲風，敘述一位集體農莊的女勞動模範，穿上紅色衣裳愉快地去工作，農莊陽光燦爛、生活美好，大家過去的悲傷和痛苦不再回來。這要感謝列寧和斯大林，為農民鋪設了這條集體農場的康莊道路；所有的光榮、歌聲和尊敬，都為了偉大的領袖。中共官方讚揚這首歌反映集體農莊幸福生活。⁹⁸ 然而，民間更愛唱的卻是 1941 年伊凡諾夫 (N. Ivanov) 曲，鮑捷爾科夫 (S. Podelkov) 詞的〈小路〉。⁹⁹

⁹⁸ 〈歌曲說明〉，《歌曲》，1956 年第 29 期，頁 47。

⁹⁹ 音樂出版社編輯部編，《外國名歌 200 首》，頁 47。

它唱出有位姑娘想念在遠方打仗的情人，想要化身為一隻小鳥，盼望這條曲曲彎彎的細長小路，帶引她到遙遠的邊疆，尋找愛人，一起並肩作戰。雖然歌中有殘酷的戰爭、濃厚的煙硝味，卻因為思念和上戰場共存亡的勇氣，更增加了愛情的力度與深度，再加上舒緩輕柔的旋律，宛如情歌。正因為表達了戀愛情愫，又有保衛祖國的正确思想，廣受歡迎。類似〈小路〉曲詞俱佳，大我小我兼備的蘇聯歌曲數量很多，如〈窯洞〉、〈漆黑的夜〉等亦是。

蘇聯在戰爭期間的政治控制和審查制度較為寬鬆，許多近似情歌的群眾歌曲雖有保衛國家的訴求，但是最主要的感情寄託還是在於故鄉、家人與愛情。也可以反過來說，歌曲是透過表現個人的希望、關懷和情感，來訴求保衛國家的大集體。人民聽著從個人出發的家庭、家鄉到國家的歌曲，彷彿這些歌曲是為他們的境遇而作，更能提高在前線殺敵的士氣。¹⁰⁰ 因此，歌者慷慨激昂地高唱大我之時，也可以兒女情長地低吟小我。更明確地說，歌者大可以利用集體的大帽子，來偷渡個人的情感。

反觀 1950 年代的中國，中共當局將絕大多數建國前的老抒情歌曲列為黃色歌曲。建國以後新創作的群眾歌曲，多半品質欠佳，「曲高和寡」，抒情的旋律也都用在歌頌黨國領袖的大我為多，不是小我的男女之情；能為中共當局所接受的「工農階級抒情歌曲」寥寥無幾。老百姓小我情感的抒發，或是尋求旋律舒緩、輕鬆的歌曲，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訴諸於少數民族或地方傳統民謠、民間小調。年輕人愛唱的歌曲，有些來自電影《我們村裡的年輕人》、《五朵金

¹⁰⁰ Robert A. Rothstein, "Homeland, Home Town, and Battlefield: The Popular Song,"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Wartime Russia*, pp. 77-94

花》、《地道戰》等，如〈幸福不會從天降〉（沂蒙山小調）、〈蝴蝶泉邊〉（民族情歌）、〈太陽出來照四方〉（民間小調抒情曲）。表達漢族男女感情的曲作，最多出現在雙百時期，都是男女忙於工作等集體事業。¹⁰¹ 即使是內容如此正確的歌曲，仍會引來非議。最有名的一個例子是電影《柳堡的故事》的插曲〈九九豔陽天〉（黃宗江、胡石言詞，高如星曲，1957），因為結合民間小調而大受歡迎。電影拍攝於雙百時期，放映的時候適逢反右而受到批判，這首表達戰士非常委婉含蓄愛情的曲作也受到牽連。1958 春天，在報刊展開關於這首歌的討論。李煥之、瞿希賢均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隨後有人批評它的旋律「帶有纏綿、陰晦的情調」。有人甚至批評歌曲多次出現圓滑音的句子，這些地方「容易唱成油腔滑調的效果」。¹⁰² 最後這首歌曲以不能反映時代精神而成為禁歌。

另一抒發小我感情的渠道是蘇聯歌曲，特別是對於城市青年，蘇聯群眾歌曲無疑地提供了他們宣洩私人情感的絕佳管道。許多歌曲雖是表述戰場打仗或守衛邊疆，其思念愛人之心境，含蓄又深沉，時時跳躍在音符中。平心而論，俄國人對情感的表達本來就比中國人直接、開放，部分蘇聯群眾歌曲的歌詞其實與一般的浪漫情歌沒什麼兩

¹⁰¹ 少數民族情歌如〈姑娘變了心〉（黎族民歌），《歌曲》，1955 年第 24 期，頁 14-15；〈心上的人〉（內蒙民歌，德伯希夫編曲），《歌曲》，1956 年第 33 期，頁 12-13。漢人歌曲如〈礦山情歌〉（鶴崗、杜改詞，張程、公博曲），《歌曲》，1956 年第 37 期，頁 7；〈姑娘你跑向誰家〉（管樞詞，李煥之曲）、〈我的心兒不在裡邊〉（金帆詞，雅文曲），《歌曲》，1956 年第 39 期，頁 3-4、11-12；訪問張援，北京，2014 年 9 月 5 日。

¹⁰² 伍擁誼，〈抒情歌曲的創作要不要繼承於發揚「五四」以來的優秀傳統？〉、本刊編輯部輯，〈其他報刊對〈九九豔陽天〉的評論〉，《人民音樂》，1958 年第 5 期，頁 11、19。

樣。例如，「遇見親愛的姑娘，我的生活立刻變了樣。」（〈春天裡的花園花兒多美麗〉，1946）、「善良的人們請你告訴我，我的愛情在何方？」（〈夏天的田野〉，1954？）、「田野小河邊紅莓花兒開，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愛，可是我不能對他表白，滿懷的心腹話兒沒法講出來！……他對這樁事情一點不知道，少女為他思戀天天在心焦，……」（〈紅莓花兒開〉）。這些歌曲旋律輕柔，歌詞不但沒有革命精神，也完全沒有大我意識，只有男女愛情。如果類似歌曲的作曲、作詞者換成中國人名，中共當局會批評這些歌曲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是靡靡之音、黃色歌曲。這樣的歌曲能在中國廣為傳唱，全托蘇聯老大哥之福。1950年代在一切學習蘇聯的大旗掩蓋之下，方能使中國城市青年堂而皇之地在大庭廣眾下高歌這些表達浪漫愛情的歌曲，而不用擔心政治不正確的問題，以及可能伴隨而來的厄運。

196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日趨緊張。蘇聯群眾歌曲已經無法反映毛澤東日漸高漲的革命情緒，很難再為榜樣。《人民日報》一則報導聲稱，有個工人從小愛唱歌，他愛唱的都是些曲調婉轉抒情的歌，但學會這些歌曲後，對自己不但沒幫助，反而增加憂慮和苦悶。他回憶過去每次唱著〈山楂樹〉，腦海中立刻出現一幅秋雨連綿淒涼的景象；邊唱邊為歌中那位少女不知選擇誰為伴侶而著急擔憂。不過，在他參加〈東方紅〉排演後，尤其看到舞台表演反映當時革命鬥爭場面時，他激動得越唱越起勁，全身血液沸騰。他說：「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時代的革命青年，不愛唱革命歌曲，而唱那些萎靡不振、充滿資產階級情感的歌曲，思想會受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會削弱革命鬥志。」¹⁰³ 這樣的評論，等於將蘇聯歌曲和資產階級歌曲劃上等號，

¹⁰³ 冉義明，〈思想上的大豐收〉，《人民日報》，1964年11月10日，第6版。

蘇聯群眾歌曲被打入反革命的另冊，為期不遠。

文革初期的中蘇兩國彷彿隨時有交戰的可能，可以公開高唱的只有紅衛兵的反蘇歌曲。有首歌曲開頭兩句是：「反帝必反修，堅決打倒蘇修！反帝必反修，堅決打倒蘇修！」其後的道白是「蘇修老混蛋，你睜一眼看一看，中國人民不好惹，打你個稀巴爛！」¹⁰⁴ 這已經不是歌曲，而是公開的叫罵了。文革時候反修，凡是和蘇聯相關者，均是被批判的對象。例如，林彪批評〈北京——莫斯科列車〉「真是反動透頂！」他說：「我們的一切成就，一切勝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而這首歌歌詞卻唱道：「毛主席給了我一把金鑰匙，就是蘇聯的先進經驗。」又如〈中蘇友誼歌〉（郭小川詞，瞿希賢曲，1961），被批評當了劉少奇的應聲蟲，極力表達了劉少奇勾結蘇修的反動心情。這是因為紅衛兵指控劉少奇在 1960 年底舉行的第二次莫斯科會議，高呼「以赫魯雪夫為首的蘇共中央萬歲！」甚至高呼「赫魯雪夫萬歲！」¹⁰⁵ 可能由於這首歌，瞿希賢的音樂創作生涯因此中斷，連文革初期到處傳唱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也突然銷聲匿跡。

不過，即使反蘇修口號到處喊得震天價響，也不能完全影響許多人對蘇聯群眾歌曲的喜愛。蘇聯群眾歌曲當時不能出現在公開場合，但在下鄉知青之間卻傳唱頗廣。在那社會翻騰、變動劇烈的年代，即使原來志願插隊的知青也須面對茫然的未來，遑論非志願下鄉者。一位知青回憶她插隊的日子十分單調，每天不是跳忠字舞，就是唱語錄歌、看樣板戲。每天開會必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令人

¹⁰⁴ 法正居士，〈「文革」時期的外國歌曲——我的記憶〉，<http://jingshenkj.blog.sohu.com/120710035.html>（2014 年 1 月 27 日檢索）。

¹⁰⁵ 〈把毒草歌曲拿出來示眾〉，《記憶》，2009 年第 18 期，頁 50、52。

膩煩。《外國名歌 200 首》成了知青們最喜歡的歌本。農閒時候，朋友來訪，邊煮邊談邊唱。唱得痛快，一時忘了在唱禁歌。歌聲飛出廚房，飛進民兵連長的耳朵，他要沒收這本書。知青感到既然不能保住這心愛的書，只好心痛地把書扔進爐灶內，默默看它化為灰燼，以免後患無窮。¹⁰⁶ 有位女知青最喜歡〈共青團員之歌〉，每次唱到「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時，心中總會湧起一陣衝動，希望自己也能出生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像劉胡蘭、卓婭和古麗婭一樣，表現自己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¹⁰⁷ 〈共青團員之歌〉主旨在表現為國出征的大我意識，這位女知青想到的卻是個人主義。可見蘇聯群眾歌曲所含有的集體意識，在文革時期已經被抽離。類似這位女知青所詮釋的蘇聯歌曲，並非個別現象，反而相當普遍。蘇聯群眾歌曲在文革期間最吸引人的特點之一是，他們有文革歌曲中禁止提及的愛情與美麗的姑娘；青年們借助蘇聯歌曲，來表達被壓抑的人性需求。¹⁰⁸

文革時唱蘇聯群眾歌曲，可為抒情，也有可能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或抗議現狀所致。1950 年代蘇聯群眾歌曲所含有的集體內涵，到了文革時期幾乎完全消失；蘇聯群眾歌曲成為抒發個人感情或表達個人心理的符號。曾經走過 1950、1960 年代的人，對蘇聯群眾歌曲可

¹⁰⁶ 王天惠，〈可惜了那本《外國名歌 200 首》〉，收入知青檔案編選組編，《知青檔案（1962-1979）：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紀實》（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頁 212。

¹⁰⁷ 戈小麗，〈蘇聯歌曲和我們〉，《北京文學》，1999 年第 8 期，頁 96-100；朝陽，〈歲月如歌——大院春秋〉，<http://www.xilicun.net/syrg0/Xilicun/Dayuan.htm>（2014 年 1 月 28 日檢索）。

¹⁰⁸ 楊健，〈「知青歌曲」的氾濫〉，收入氏著，《墓地與搖籃：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頁 136-137。

能多是抱持懷舊之情，而非批判的態度。有些是單純的紀念／悼念逝去的時光，藉著蘇聯群眾歌曲重溫他們的青春夢；只要聽到那些熟悉的旋律，心中就會漾起一陣幸福感。¹⁰⁹事實上，這也是流行歌曲吸引不同世代和反映不同世代常有的現象。另外一種人懷舊之餘，也肯定蘇聯群眾歌曲具有思想性、藝術性、人民性，是生活的寫照、真情的凝聚、藝術的結晶。他們認為蘇聯群眾歌曲具有健康和深刻的思想內涵、優美動聽的旋律、濃郁的民族風。更有人懷念那個重視集體，懷抱理想的時代。¹¹⁰有趣的是，這些肯定蘇聯群眾歌曲思想性的人，所列舉出來喜愛的歌曲，九成以上是抒情歌曲，極少是純粹只有政治或革命意味的歌曲。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不再強調階級鬥爭和革命輸出，不再高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共重申與各國友好，但已經不是共產黨國際主義意義下的友好。換言之，文革結束後，愛國主義中的國際主義已經和民族主義分道揚鑣。

五、小 結

中共利用群眾歌曲，灌輸黨國至上的觀念，要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愛國主義」如何界定，向來都是由共產黨主導。從1950年代早期的黨國、毛主席和社會主義建設，逐漸演變為1960年代更為強調毛主席和世界革命；從群眾歌曲的日益激進，也可看出毛

¹⁰⁹ 王蒙，〈我們明朝就要遠航〉，收入氏著，《王蒙文集》（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卷9，頁265-266。

¹¹⁰ 曾遂金，〈歷史的詩篇：二戰時期前蘇聯群眾歌曲再思考〉，<http://yule.sohu.com/20050816/n226691076.shtml>（2005年8月16日檢索）。

的地位凌駕於黨之上的過程。再者，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也從 1950 年代的同等重要，到 1960 年代完全臣屬於民族主義之下；國際主義的內容是跟著中國外交路線走，其內容亦從早期的中蘇友好，轉變為重視亞非拉的友誼。

歌唱大我，表現愛國主義的歌曲，在公眾場合透過合唱的方式，確實可以激發愛國情緒、同仇敵愾之心，以及對黨國的認同感。這些歌曲的正面效果，不但官方傳媒經常可見，私人回憶也時有所錄。¹¹¹不過，即使官方思想控制日趨嚴密，其中仍有許多縫隙無法為官方所掌控。許多人私下還是會哼唱政治不正確的歌。人民對群眾歌曲的解讀不一定完全符合官方的期望，即使不無重疊之處，而這也恰恰說明了中共宣傳的限制。中共或許可以控制所欲傳達的信息內容和媒介，但在信息傳達給人民之後，卻無法控制人民依照自己的意願或需要來解讀這些信息。

其次，絕大多數的群眾歌曲是進行曲，用抒情歌曲的方式反映愛國主義，在中國隨著政治的日益激進，最後只能用在對毛主席和黨抒發個人溫柔的感情，絕不可對情人，即使是對父母親友，也會遭受批評，被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這有點類似 1920 至 1930 年代中期以前蘇聯官方提倡的群眾歌曲，也是以枯燥無味的革命歌曲為主。甚至一度只承認用大鼓大喇叭在街上大吹大打才叫音樂，這些歌曲過了政治宣傳期便很少人唱。¹¹²後來斯大林提倡資產階級文化價值，不介意作曲家取材於「靡靡之音」的爵士樂、倫巴、狐步等，才使旋律多樣

¹¹¹ 如王蒙，《不革命行嗎？》（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14、58。

¹¹² 賀綠汀，〈論音樂的創作與批評〉，《人民音樂》，1954 年第 3 期，頁 21；JL. 舒爾根，〈蘇聯歌曲底淵源〉，《人民音樂》，1957 年第 11 期，頁 9-14。

化，經久耐唱。毛澤東掌政時期的群眾歌曲，類似於蘇聯新經濟政策至二戰之前的那段文藝激進歲月。特別是大躍進以來，政治路線越走越激進（雖然期間有兩段極短的緩和期），到後來連喇叭和大鼓都不用了，只要大喊大叫毛語錄，就是「音樂」，將音樂推回到最原始的形式和內容。中國自 1950 年代晚期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路越走越窄，而這也反映了中蘇兩國不同的政治路線及文化價值觀的取捨。

第四章

階級鬥爭爲綱——電影中的敵我觀

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¹

毛澤東堅信且奉行《聯共黨史》中兩條路線鬥爭的概念及運作，² 意見分歧就是路線鬥爭。兩條路線指正確和錯誤的路線鬥爭，路線的正確與否，由掌握最高權力者來決定；在蘇聯是斯大林，在中國是毛澤東。一旦被劃入錯誤路線者，就是敵人；凡是敵人，都是壞蛋，必須對其從事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毛澤東說過他自己「歷來主張對立面的，沒有對立面，誰也不幹的。……『地富反壞右』，這都是對立面。」³ 因此，毛時代的敵方和我方是完全的二元對立、黑白分明，沒有中間的灰色地帶。

¹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毛澤東選集》，卷4，頁1428。

² 陳永發，〈抗戰時期的延安整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3月13日，未刊稿。

³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7，頁381。

中共建政之後，戰場上拿槍的敵人已被殲滅，但是不拿槍的敵人仍存在。「不拿槍的敵人」在國際上指受帝國主義、大資本家（主要是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指使或幕後支持の間諜，或其他潛伏和暗害分子，在國內指後來形成所謂「黑五類」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本章將以「反革命分子」作為中共政權下敵人的關鍵詞，用意之一在於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強調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根據共產黨的邏輯，「反革命分子」反對的是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因此他們必然屬於封建階級、資產階級或其代理人，這些都是共產黨必須打倒的對象。其二，在黑五類中，屬於封建階級的地主和農村資產階級的富農，在許多政治運動中的劃分標準已有含混之處，中共又定義「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壞分子」⁴，將反革命分子等同於壞分子；其三，右派分子也是反革命分子。因此「反革命分子」成了定義最廣的敵人，也是內容最為含混者。職是之故，本章以「反革命分子」作為敵人的關鍵詞。

1949-1954 年期間，中共在鎮反、肅反等政治運動中重點打擊的是美帝國主義間諜、國民黨特務、與國民黨有關係的人，以及所謂封建地主。這些與美帝、國民黨等勾結的反革命分子，對政權的威脅一直存在，自 1949 年以來到文革期間從未消失；雖然在 1950 年代中期基本上已清除殆盡，但到 1958 年二次台海危機之後，中共又把他們當成主要敵人。1955-1957 年間，新增加的敵人主要是與「胡風集團」有關或相似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反右運動發現的所謂右派分子，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知識分子，是所謂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從大躍進

⁴ 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http://mjls.hk.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320>（2013 年 7 月 21 日檢索）。

到文革前夕，除了原有沒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還新增了由黨員、幹部與工農階級蛻化而來的反革命分子，因此有必要不斷進行階級鬥爭，不斷地革命。

中共認為反動思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等各種落後思想）會經過各種管道侵蝕革命隊伍。電影是思想戰線上的強大武器，是最適合對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工具。因此，通過素有生活百科全書之稱的電影，可以樹立正確的敵我觀，教導民眾如何經由敵人的形象（面貌、裝扮、作風、生活習慣等）與使用的手段，辨識敵人及其幕後指使者，並宣傳「我方」對待敵人的正確態度。

列寧說過，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黨來說是最重要的。斯大林也說過，「電影幫助工人階級及其黨，以社會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為社會主義奮鬥而組織群眾，提高群眾的文化程度與他們政治戰鬥的能力」。電影既然是對群眾宣傳煽動的最重要工具，因此必須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中。⁵由於毛澤東時代的敵人定義，隨著政治運動的開展與密集舉行，越到後來越寬泛，在實際操作層面已經越來越難以捉摸，遑論期望所拍攝的電影能夠涵蓋每一種敵人類型。因此，利用電影探討敵我觀，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本章所列舉的只是毛時代比較重要的敵人類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敵人。

這裡必須略述 1949 年以後中國電影的產生及其相關機制。中共指導電影的中心思想是毛澤東的延安文藝講話：政治第一，藝術第二。中共在實行思想一元化的同時是管理一體化，表現在國家包攬與

⁵ 斯大林在 1934 年蘇共十七大中提到蘇聯電影放映機的數目，從 1929 年的 9,800 單位，增加到 1933 年的 29,200 單位。Н. А. Лебедев ред., *Партия о кино* (黨論電影) (Москва: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1939), с. 7, 10, 41, 44-45.

主導電影劇本的創作、電影發行放映、影評的撰寫等等。1952年元月，私營電影業被勒令公私合營，1956年之後全國只剩下公營電影，電影的內容更是以黨國政策為依歸。電影是否能拍攝與放映，更關鍵的是取決於審查制度；主要是政治審查，審查尺度總是隨政治氣候而變。制度性的審查牽涉的層級多，且常常須經過反覆修改與再審。1954年以前一個劇本至少須經過四級審查，1954以後則需經過六道關口。審查內容廣而多，可以大到故事梗概、劇本、編劇、導演、演員；也可以小至祥林嫂手中的魚該何時掉下來。此外，電影還會受到突發性政治運動的牽連而招罪。一部電影經常發生制度性審查已經通過，卻在拍攝完成後，受到突發性政治運動的衝擊，頓時成為負面典型與箭靶，不准上映或必須下片。例如，1951年，《武訓傳》(1950)在全國放映初期頗受好評，卻因為毛澤東突然掀起大規模地批判《武訓傳》的思想運動，指斥該片歌頌反動的封建統治，而逼使電影界為此大作檢討，元氣大傷，其後一年電影產量銳減；由前一年的二十幾部，驟減成兩部。⁶ 這些複雜多面的電影生產機制，本章及下一章不可能一一敘述，以下討論主要以影片最後上映的文本為準，劇本創作過程或審查機構要求修改的部分，原則上不加討論。

⁶ 賈霽的文章〈不足為訓的武訓〉主要批判武訓興學沒有站穩階級立場，向統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協和變節，走的是階級調和路線。毛澤東以社論的方式，批評武訓否定了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同時他還嚴厲指責為文稱頌這部電影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麼人，反而向這些敵人投降。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1-3、32-35、53-69、123-136；〈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第1版；易凡、紫卉，〈「禁映影片」的禁映內幕〉，《檔案春秋》，2006年第3期，頁25。

一、輸入蘇聯電影中的敵人類型

1920年代，蘇聯非商業性電影大行其道，大放異彩，名家輩出，如艾森斯坦 (Sergei M. Eizenshtein, 1898-1948)、普多夫金 (Vsevolod I. Pudovkin, 1893-1953) 等均在國際影壇上佔有一席之地。這些電影實驗性強，重點不在於敘述一個流暢的故事，而是重視藝術表現的創新。他們的電影往往以事件和群眾為主，利用蒙太奇、特殊剪輯手法表現內心世界，卻常常讓下層民眾看得一頭霧水。1935年，主管電影的舒米亞斯基 (Boris Z. Shumiatskii, 1886-1938) 呼籲電影要為百萬群眾而拍，而非為少數人的品味而攝；並且要求以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為拍片原則。隨著斯大林個人崇拜日盛和大整肅的來臨，電影拍攝與討論的政治導向日益高於藝術導向。德蘇戰爭爆發前後，戰爭電影成為主軸，戰後亦是如此；但斯大林時代和赫魯雪夫時代戰爭電影所強調的重點並不相同。⁷ 斯大林時期的戰爭電影從黨國的角度出發，強調蘇聯出兵乃是正義之師，同時描述領袖英明偉大的領導作戰。赫魯雪夫時代則多從百姓的角度出發，描繪戰爭的殘酷、人民的傷亡，表現更多的人性關懷以及對戰爭的反思。中共建政初期播放的蘇聯電影以斯大林時期的戰爭電影為大宗。

不過，蘇聯電影輸入中國早在十月革命之後就開始了。十月革命後，不少沙俄的達官顯貴逃到新疆，其中有人帶著小型手搖式電影放映機在家放映。1924年1月列寧逝世，3月北京和天津放映紀錄片《列寧出殯記》，這是最早在華公開放映的蘇聯片。1925年，蘇聯駐

⁷ Peter Kenez, "Black and White: The War on Film," in Richard Stites, ed.,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Wartime Russia*, pp.166-173; Birgit Beumers, *A History of Russian Cinema*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9), pp.100-128.

上海領事委託田漢在上海主持蘇聯影片《戰艦波將金號》(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емкин») 的放映，招待上海文藝界人士。至於商業性的放映，最早可能在哈爾濱；1920 年代中期，當地電影院已經放映蘇聯宣揚農工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影片。⁸ 1930 年以後，蘇聯兒童片《生路》(Путевка в жизнь)，應該是第一部在華放映的蘇聯有聲電影，後來又放映了《夏伯陽》(Чапаев)。抗戰時期的重慶，曾放映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夜鶯曲》、《大蘿蔔》。抗戰後在中國放映的多為紀錄片，還有彩色影片《寶石花》。無論在國民黨統治區或延安地區，蘇聯電影的放映數量並不多。⁹

1949 年之前，中國電影市場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美國影片的天下。中共建政初始，無意立即全面禁止美國電影在中國上映；然而韓戰的爆發，卻大大加快了禁映美國片的速度。到了 1950 年底左右，美國電影幾乎從中國銀幕全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蘇聯電影。¹⁰ 從此，電影從過去以娛樂為主要的功能，轉變為以政治教育為主的工具。

中共在文革前十七年間引進外國影片共 857 部，其中蘇聯佔了

⁸ 顏純鈞，《文化的交響——中國電影比較研究》(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頁 39；左紅衛，〈民國時期蘇聯電影在新疆的傳播〉，《電影評介》，2011 年第 16 期，頁 1；汪朝光，〈20 世紀初葉電影在東北邊陲之興——哈爾濱早期電影市場研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4 年第 3 期，頁 102；新華社，〈蘇聯影片在我國放映受到觀眾熱烈歡迎 已被當作學習蘇聯的重要工具〉，《人民日報》，1950 年 3 月 9 日，第 3 版。

⁹ 新華社，〈蘇聯影片在我國放映受到觀眾熱烈歡迎 已被當作學習蘇聯的重要工具〉，《人民日報》，1950 年 3 月 9 日，第 3 版；吳築清、張岱編著，《中國電影的豐碑：延安電影團故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130-131。

¹⁰ 汪朝光，〈建國初期上海停映美國電影之研究〉，《上海檔案史料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輯四，頁 124-137；茅盾，〈美國電影和蘇聯電影的比較〉，《人民日報》，1949 年 10 月 30 日，第 5 版。

49%，¹¹ 以斯大林時期拍攝的佔絕大多數。中共建國建政後，第一部蘇聯譯製片是《普通一兵》(Рядовой 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росов, 又譯為《馬特洛索夫》，1947)。劇情描述二戰期間一名叫馬特洛索夫的士兵，英勇抗敵，最後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敵人炮口，光榮犧牲。本片和《青年近衛軍》(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48)、《真正的人》(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 又譯為《鋼鐵意志》、《無腳飛將軍》，1948) 同樣描寫二戰期間蘇聯人民英勇地對抗納粹德軍。他們面對的均是戰場上拿槍有炮的真正公開敵人，易於辨認，並不是隱密或潛伏的敵人。這與國共內戰結束後，中共當局宣傳必須注意在中國本土或邊境活躍的隱密性「不拿槍的敵人」有本質上的差別。

1949年春天，蘇聯當局送了128部電影到中共各佔領區。¹² 中共並沒有照單全收，表示譯製片同樣需要經過審查。如蘇聯在1946年上演的兒童電影《小船長》(Пятнадцатилетний капитан, 1945)，東北製片廠原已譯畢(翻譯片第25號)，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卻以其「思想性」過於低劣，決定禁演。¹³ 這部禁映電影的腳本取材於法國地質學家和作家 Jules G. Verne (1825-1905) 在1878年完成的小說，講述一個15歲少年在太平洋海域臨危受命駕駛一艘捕鯨船，歷經暴風雨和強盜的劫持，終於讓幾名美國旅客安全返鄉。這是一個著重於少年歷險和鍛鍊成長的故事，確實沒有表現正確的政治思想，

¹¹ 轉引自柳迪善，〈蘇聯電影在中國——五十年代的考察〉，《電影藝術》，2008年第4期，頁55。

¹² “Список фильмов в Китае, 1949,” (給中國的電影清單，1949) ГАРФ (GARF, 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檔號 ф. 5283, оп. 22, д. 144, лл.132-134。

¹³ 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蔡楚生認為「蘇聯電影工作者經二十餘年之鍛鍊，仍產生出思想性如此低劣的影片，實屬不大好解，我等經過討論後決予禁演。」蔡楚生，《蔡楚生文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卷3，頁378。

敵人也不是用意識形態來區分，自然不符合中共的要求。又如《預備隊員》(Запасной игрок, 1954) 因為屬於「娛樂片，並無深意，決不選譯。」¹⁴ 不過，即使有思想高度，兼及藝術性，若是中國人不熟悉的人物或難以理解的內容，也可能不列入考慮。如長於蒙太奇手法的著名導演艾森斯坦拍攝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1938)，宣揚俄國抵禦外侮的愛國思想，在蘇聯廣受黨與觀眾歡迎；¹⁵ 但中國觀眾不熟悉涅夫斯基這個歷史人物，中共並沒有譯製本片。

中共選取放映的蘇聯電影以能夠符合意識形態和配合政策需要為前提。有關當局允許播放的蘇聯電影在反映「不拿槍的敵人」，這樣的敵人又分為公開的和潛伏的身分。公開的「不拿槍的敵人」指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要員，潛伏的「不拿槍的敵人」最重要的是富農、托洛斯基派和來自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間諜。對布爾什維克而言，沙皇遜位之後所成立的臨時政府，其要員均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且與帝國主義國家勾結，終被列寧政府所推翻；具體表現在電影《列寧在十月》(Ленин в октябре, 1937)。

蘇聯不是沒有地主，只是大地主多為貴族，他們在十月革命後或陸續逃亡海外，或在內戰時期為布爾什維克所殲滅。所以斯大林政權以富農充當蘇聯「地主」的代表。斯大林視富農為一個敵對階級，他們反對農業集體化最力。當全國農業集體化基本完成後，斯大林宣稱富農階級已經被消滅，但是其殘餘分子仍然伺機意圖報復，阻礙社會

¹⁴ 蔡楚生，《蔡楚生文集》，卷4，頁33。

¹⁵ 1949年蘇聯文化部送給中共的電影清單中有這部電影。“Список фильмов в Китае, 1949,” (給中國的電影清單，1949) ГАРФ (GARF, 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檔號 ф. 5283, оп. 22, д. 144, л. 132。

主義建設。電影《黨證》(Партийный билет, 1936) 就是講述殘餘富農分子從事間諜破壞活動的故事。片中的富農酋賓在西伯利亞殺死一位共青團支部書記後，化名潛逃到莫斯科，假裝努力工作、勤讀《聯共黨史》；實際則密謀縱火毀廠，卻又假裝捨身救廠而受傷，因此被推薦入黨，並擄獲同事也是優秀黨員安娜的芳心。酋賓入黨和結婚之後，為協助反政府分子混入黨委會議，竊取了安娜黨證，安娜因而被開除黨籍。酋賓最終目的是要進入安娜哥哥工作的國防工廠，取得製造飛機的秘密。這一切要到安娜的好友雅沙從西伯利亞回來後，才遭到揭發。同樣是竊取蘇聯國防機密的電影《最高的獎賞》(Высокая Награда, 1939)，講述某國想取得蘇聯發明的新飛機設計圖，利用托洛斯基分子安納托里亞來接近設計者的女兒——同在音樂學院讀書的娜佳。耐人尋味的是，這兩部電影對於揭發或批評親人，均加以責難。例如，酋賓在工廠黨支部大會的發言：「有一件事叫我很難說，但為了健全黨的組織，我又不能不說，就是我的妻子遺失了黨證，真很可能是敵人侵入黨的心臟來，對於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這是不能寬恕的過失。」安娜的若干黨員同事，包括黨委書記，都對酋賓大義滅親的發言不以為然。同樣地，安納托里亞對娜佳說：「這個年頭無論誰都不應相信，連父親也不該相信，出賣祖國的工程師少嗎？」娜佳聽到連父親都不應相信的話，非常生氣，覺得安納托里亞的話有問題。這也顯示蘇聯已經拋棄 1930 年代初期大力宣傳帕夫利克 (Pavlik Morozov, 1918-1932) 揭發父親是「富農」的大義滅親思維，重新強調家庭價值和威權的重要，明白地告訴人民即使政治至上，同時也不容許摧毀家庭的價值。¹⁶

¹⁶ 1935 年蘇聯對帕夫利克揭發父親低調以對，轉而強調他在校守規矩，工作努力

斯大林掌權時期，另一重要敵人是托洛斯基分子，凡是被指控為「托派分子」的就是敵人。托洛斯基派之於斯大林政權，就如同「蔣匪幫」之於中共政權。由於托洛斯基是斯大林的政治死敵，即使 1927 年他已被開除黨籍，1929 年被驅逐出境，但他在國內仍有追隨者，國外也有支持者。因此他對斯大林及其政權始終是一大威脅。斯大林時期所拍攝的電影中的托派都有海外關係，均與法西斯政權或帝國主義者有所勾結。特別是 1936 年公布的蘇聯憲法，明言蘇聯之政治基礎，因為推翻了地主與資本家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已臻成熟與堅固。因此，斯大林在全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宣布，蘇聯社會階級結構改變了，蘇聯所有的剝削階級都已經消滅乾淨，蘇聯社會也沒有敵對階級的存在；只有「蘇維埃工人」、「蘇維埃農民」和「蘇維埃知識分子」的存在。¹⁷ 既然蘇聯國內已經沒有階級敵人，所有的敵人都與國外勢力的勾結有關。此後蘇聯各種政治整肅，無論是 1930 年代後期的大整肅或是二戰後文化界的清除世界主義運動等，理論上「人民的敵人」都是與西方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托洛斯基派有勾結者，或對外國文化卑躬屈膝者。

1930 年代中期以來，蘇聯電影對所謂「托派分子」著墨很多。

的美德。關於帕夫利克崇拜的來龍去脈和官方宣傳內容的改變，詳見 Cateriona Kelly, *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 (London: Granta Books, 2005)。蘇聯當局再度強調家庭價值，主要基於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考量，參見 Robert W. Thurston, "The Soviet Family during the Great Terror, 1935-1941," *Soviet Studies* 43:3 (1991), pp. 553-574.

¹⁷ "О проект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Союза ССР: Доклад на чрезвычайном VIII всесоюзном съезде советов (25 ноября 1936 г.)," (關於蘇聯憲法草案：在全蘇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36 年 11 月 25 日) in Robert H. McNeal, ed., *И. В. 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斯大林選集) Том 1 [XIV], (1934-1940)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67), c. 141-146, 152.

例如，《列寧在一九一八》(Ленин в 1918 г, 1939) 乃是按照 1938 年出版的《聯共黨史》邏輯鋪陳演義而成。劇中的敵人是與帝國主義勾結的托派、布哈林派和富農，以及所有反對列寧、斯大林的人。他們聯合想要推翻列寧所建立的政權，以及繼承列寧革命事業的斯大林。列寧到工廠演講完後欲離開，男刺客諾維科夫擋住身後的群眾，還假惺惺地說：「大家不要擠，讓列寧同志先走！」藉此提供女刺客芬妮·卡普蘭有可乘之機，得以暗殺列寧；卡普蘭的形象是陰鬱，有點神經質，猛抽菸。

同樣重要的一部政治電影《偉大的公民》(Великий гражданин, 1937-1939, 上、下兩集)，幾乎包含了斯大林所有的重要政敵。斯大林共同參與了這部電影的創作，並要求導演將 1937 年公審黨國元老皮亞塔克夫(Georgii L. Piatakov, 1890-1937) 和拉狄克(Karl Radek, 1885-1939) 的證詞置入片中。導演厄姆勒(Fridrikh M. Ermler, 1898-1967) 成功地將電影內容與現實政治連在一起。片中的卡爾達蕭夫影射布哈林，鮑羅夫斯基影射托洛斯基，兩人聯合勾結任何反黨、反政府、反革命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白衛軍官等。他們背後均有西方政府撐腰，密謀混進革命心臟的蘇共中央委員會，以便消滅個別領導者，搞垮大規模的工業建設。他們反對工人提出的技術改革，用盡各種手段阻撓社會主義建設。托洛斯基派不惜將整個蘇聯抵押給西方國家，行為大逆不道。他們的陰謀一再失敗後，竟然炸燬運河，企圖製造群眾對黨的不滿；並殺害一個人民愛戴的領袖沙霍夫〔影射列寧格勒總書記基洛夫的被暗殺〕。從他們的語言、衣著、形象等，都可以將斯大林的政敵對號入座。這些人都有絕佳能力因應環境，可以隨

時隨地改變言語內容；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¹⁸ 正如著名的蘇聯電影史專家 Maiia Turovskaia 所言，此後凡是有張知識分子、有文化的臉、戴著眼鏡或留著山羊鬍鬚的人，都會被視為潛在的破壞分子、兩面派或階級敵人。¹⁹

在中國放映的蘇聯電影所呈現的另一種敵人類型，來自以美國為首的大資本家或帝國主義陣營的間諜。二戰之後形成的冷戰格局，蘇聯不再視美國和英國等為盟友，認為他們是與納粹德國攜手合作的帝國主義法西斯政權。這類型的電影有《易北河會師》（Встреча на Эльбе，又譯為《易北河兩岸》，1949）談的是美國與納粹合作，掠奪德國工業，培養間諜在蘇聯佔領區進行破壞，意圖挑起新的戰爭。《銀灰色的粉末》（Серебристая пыль, 1953）敘述多個西方國家處心積慮地勾結美國軍方與資本家，欲發動戰爭，製造化學武器，從中牟利。《秘密使節》（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1950）中的美國資本家兼議員，秘密地與英國、法國、德國聯手策劃新的戰爭，意圖消滅蘇聯。《陰謀》（Заговор обреченных, 1950）中的美國特務，假扮記者身分，破壞中歐某國的糧食生產和工業化，意欲推翻該國的共產政權。這些西方敵人不但在歐美國家製造禍端，同時也派遣特務從邊境混進蘇聯，刺探蘇聯的軍事機密。《山中防哨》（Застава в горах, 1953）刻畫陰險狡猾的西方帝國主義特務，偽裝成「古物考察團」，穿著少數民族衣服，戴上假野豬腳，勾結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群匪幫，偷越蘇聯國境，

¹⁸ 導演厄姆勒因為本片兩次得到斯大林獎。Julie A. Cassiday, "Kirov and Death in the Great Citizen: The Fatal Consequences of Linguistic Mediation," *Slavic Review* 64:4 (Winter 2005), pp. 806-810.

¹⁹ Майя Туровская, "Кино тоталитарной эпохи," (極權時代的電影) Л. Х. Маматова ред., *Кино: Политика и люди (30-х годы)* (電影：政治與人民，1930年代) (Москва: Материк, 1995), с. 49.

進行破壞活動。結果所有破壞行動皆為「我方」的偵察員、保安人員、戰士等機警地識破。綜而言之，蘇聯電影呈現的「敵」與「我」，都是醜化敵人，美化自己。

這些反映富農、廣義「托洛斯基派」、西方間諜欲顛覆蘇聯政權或破壞蘇聯建設者，不一定為中國觀眾所理解。俄文名字太長，特別是經常不用姓，而是名字加上父名，令人搞不清楚誰是誰。再者，有些鏡頭變換太快，內容複雜，有的談話過快聽不清楚；有些農民甚至看完《列寧在一九一八》後，連那個是列寧都不認得，遑論掌握其中的宣傳要義。許多人建議有關當局發送電影說明書，或放映前先作介紹，或邊放映邊解說，或在農村大量印製電影小人書，放映後再開座談會，利用壁報或劇照展覽作宣傳解釋工作；否則觀眾容易把進步人物當作落後分子，革命人物當作反動分子。²⁰ 中共對於學生和青年觀眾，也會舉行報告會、小型座談會、提出問題大綱，並要求撰寫觀後感，引導他們「政治正確」地闡釋電影的中心思想，糾正某些錯誤與模糊的認識。有關當局並特別要求工作人員：(1) 充分利用影片本身提供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具體而非抽象地、生動而非空洞地、通俗易懂而非深奧地宣揚其中道理。(2) 盡可能與當地的中心工作互相聯繫，使之發生動員組織群眾的作用。(3) 結合群眾的生活實際和思想實際，用對比和引證等方式，引導觀眾認識到：應該向影片學什麼？在生活中應該愛什麼恨什麼？擁護什麼和反對什麼？做什麼和不

²⁰ 〈群眾對放映電影的意見——讀者來信綜述情況 農民要求更多的電影下鄉〉，《人民日報》，1952年6月30日，第2版；〈電影院、電影放映隊應重視影片內容的解說工作〉，《人民日報》，1952年8月5日，第2版；〈加強關於翻譯片的宣傳解釋工作〉，《光明日報》，1952年7月7日，第3版；〈作好影片的宣傳解釋工作——讀者來信綜述〉，《人民日報》，1953年1月16日，第2版。

做什麼？²¹ 這些活動逐漸演變成中共宣傳機制的一部分，形成向群眾播放中外電影的相關配套措施。總之，電影放映不是以純娛樂為目的，而是要從中擷取官方意欲傳輸的訊息，因此必須組織各種討論，主動說明，更重要的是改正觀眾錯誤的思想，確保黨中央要傳達的觀念被觀眾正確地理解。

二、美帝、國民黨特務與地主：1949-1954

中共建政初期，敵人代表封建階級的地主、買辦和官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勾結的國民黨特務、美帝國主義派遣到中國活動的間諜為主。辨認敵人的首要準則是必須先站穩階級立場。早在 1920 年代，毛澤東就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²² 準確地說，毛的階級分析中，實際上含有敵方、朋友、我方三類。其實，所謂「朋友」可能因

²¹ 賈霽，〈配合宣傳總路線，做好電影下鄉工作〉，《大眾電影》，1954 年第 1 期，頁 28-29；青年團旅大市委宣傳部，〈關於運用電影向青年進行宣傳教育的初步總結〉，《大眾電影》，1954 年第 19 期，頁 28-29。

²² 本文的第一、二句話，在 1920 年代出版的時候，與後來的語句，有些出入，參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 年 3 月）〉，收入《毛澤東集》，卷 1，頁 161。現以當今通行用語本為準。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 年 3 月）〉，《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第 2 版），卷 1，頁 3、8-9。

為當下政策的需要，暫時成為被拉攏或統戰的對象；在階段性任務完成，或政策改變後，所謂的朋友就變成了敵人。敵人和朋友的分類，顯示毛澤東還是採取敵我二元的對立。由於「友」的部分涉及更多的是統戰問題，本章將不予討論。

遼瀋、徐蚌〔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的勢力已如風中殘燭。就在中共中央即將從農村遷往城市，從河北西柏坡遷往北平的前夕，毛澤東發出了警告：「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爭。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鬥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蔭蔽的鬥爭。……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²³

1949年之後，在中共眼中，明確的敵人只有軍閥從舞台消失，其他主要敵人仍然依附於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按照中共的邏輯，共產革命越成功，必定使得反對中共或反對革命的敵人越蠢蠢欲動，鎮壓反革命遂成為首要任務。在鎮反指示尚未發出之前，農村各地已經開始進行清「匪」（包括與蔣介石有關的「蔣匪」）、反霸運動和土地改革。1950年3月，中共中央針對「新解放區」「匪眾」屢有武裝暴動、搶劫公糧和物資、殺害中共幹部，以及在各地工廠、倉庫、鐵路和輪船等地進行破壞工作，發出嚴厲鎮壓、剿滅反革命活動的指示。²⁴ 接著韓戰爆發，國內外緊張形勢急劇升高，中共高層抓住機會，將鎮反從「新解放區」擴大到全國。1950年10月10日發

²³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毛澤東選集》，卷4，頁1428。

²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0年3月18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1，頁141-143。

出指示，堅決要求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特別是必須嚴厲打擊「帝國主義的特務間諜組織和特務間諜分子」。²⁵ 鎮反後來逐漸為在黨政機關舉行的三反運動，以及在私營工商業中的五反運動所取代。²⁶ 這兩個運動名義上是為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實際上是鎮壓反革命的延續。

「蔣匪幫」是中共新政權成立後的首要政治敵人，他們與封建階級、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皆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些「蔣匪幫餘孽」在 1949 年以後，常以特務的面貌出現。中共建國後第一部自製的反特片《無形的戰線》(1949) 就是刻畫這些人。故事發生背景在東北的一個城市，描述國民黨特務（簡稱國特）李天民，冒充汽車商人，指揮一批人馬，進行破壞工作。他曾在南京政治學校讀書，參加了軍統，後來到西南地區當特務，專門調查異黨和進步人士的活動；這段過去的歷史已是他「反動、反人民的證據」。由於背後有美帝國主義者撐腰，這些特務專會欺凌和濫殺弱小無辜者。國民黨特務說：「在敵區工作，要懂得鑽空子，敵人的舒服，就是我們勝利的機會」。片中的崔國芳因為特務曾經幫她父親解決困難，被迫提供她工作所在的橡膠廠運輸計畫，特務因而能夠縱火燒燬數輛滿載輪胎的大卡車。未幾，特務又要她拿到全廠詳圖，打算毀滅工廠。她感到痛苦不堪。在黨的幹部關心與耐性勸說之下，終於坦白一切，全盤托出罪行。本片乃宣傳鼓勵有「歷史問題」的脅從分子如崔國芳者，坦白向中共政府登記，政府會寬大處理。同時也提醒各機關工廠聘用任何新進人員

²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1，頁420-423。

²⁶ 三反指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指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

時，絕對不可單從純技術考量，必須了解他們過去的歷史與思想。²⁷片頭和片尾的字幕都引用毛澤東的話：「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電影《人民的巨掌》(1950) 的主人翁張榮也是國特，但身分更為隱蔽。他以進步工人身分混入上海紗廠，圖謀以極左言行挑起勞資緊張關係，並傳遞消息，造成敵機轟炸鋼鐵廠。張榮的妹妹在工廠當會計，受到進步工人的影響，得知哥哥是特務後，毅然與其劃清界線，檢舉立功。片終的螢幕上打出「嚴厲鎮壓反革命活動，保衛新中國經濟建設，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兩片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重視群眾關係，群眾會主動提供訊息。《無形的戰線》中年輕和年老的刻章工人、戶政事務所的辦事員，以及《人民的巨掌》中的鞋匠、坦白自新的特務共犯都主動提供線索給公安。中共以此宣傳國特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不過，兩片的關鍵舉發者有所不同，《無形的戰線》是脅從人員，而《人民的巨掌》是特務的妹妹。這等於在層級上更進一步，鼓勵家屬要大義滅親。除了雙百期間之外，中共一直宣傳並要求群眾對於階級敵人要能大義滅親。

這兩部電影的敵人分別偽裝成商人或工人，活動的空間在城市。他們都是國民黨所派遣的，其背後的真正指使者是美帝國主義，證明之一是特務給的錢都用美金。特務會利用對他人的小恩小惠或歷史問題尋找同謀共犯，並利用人們的輕忽而進行破壞工作。這些反革命的國民黨特務的形象具有若干共同特徵。他們的穿著打扮一般比較洋派，如穿西裝與背心、打領帶，戴大呢帽或白色寬帽，戴太陽眼鏡。若是中式服裝則為中山裝或長衫，經常像流氓似的嘴邊叼根煙。特

²⁷ 《《無形的戰線》教育了我們》，《大眾電影》，1950年第4期，頁24。

務的行為總是鬼鬼祟祟，眼神閃爍，抽菸喝酒，大魚大肉。反觀代表「我方」的公安或工廠黨的幹部，多穿幹部服、工人服；《人民的巨掌》的公安穿西裝打領帶，可能與背景在上海有關。公安或幹部若是抽菸，則是為了思考案情，而非享樂。

代表封建階級的地主是中共在農村的首要敵人。《白毛女》(1950)是描寫地主惡行惡狀最著名的電影。早在延安時期，即有歌劇、話劇的演出，後來拍成了電影，流行更廣。《白毛女》中的惡霸地主黃世仁形象鮮活，容易掀起階級仇恨。當時中共正在新佔領的農村如火如荼地進行土地革命，放映本片可以高張階級鬥爭的旗幟，也可藉機批判城市居民對鬥爭地主表現出來的事不關己的態度。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出版的《大眾電影》，闢出專頁，刊載觀眾的感想。有人看了《白毛女》之後，方才明瞭地主階級和反動派勾結，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進而批判自己思想錯誤，以為生長在城市，農民與地主階級鬥爭與己無關。²⁸ 另有學生承認自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沒有親身受過地主的壓迫和剝削，過去受了十幾年封建文化的欺騙，以為農民都是「牛背橫笛」、「牛背掛書」的快樂人。經過土改學習，在理論上認識了地主階級是敵人，但感情上還是建立不起對地主階級的仇恨。直到看了《白毛女》，才在感情上建立了階級仇恨，才認為需要對地主進行鬥爭。²⁹ 更有地主子女主動參加革命，檢舉了反革命的父親，使其得到「勞動人民給他應有的處分」。當天氣變冷時，母親不斷催促兒子給父親寄棉衣，但他有點猶豫：「寄吧，這是立場問

²⁸ 朱家實（海軍戰士），〈誰養活誰，誰是階級的敵人？〉；〈觀眾的話：電影《白毛女》深刻的教育了廣大觀眾〉，《大眾電影》，1951年第28期，頁20-21。

²⁹ 儲光啟（南大附中），〈要徹底摧毀封建勢力！〉，《大眾電影》，1951年第28期，頁20。

題，不寄吧，父親沒有棉衣，身上會冷。」在他看了《白毛女》之後，進一步地認識地主階級的罪惡，加強了對地主階級的仇恨；檢查了「父親沒有棉衣，身上會冷」的想法是同情反革命、階級立場不穩的表現，最後決定不給父親送棉衣。³⁰ 無論是雜誌編輯的刻意安排，或是觀眾心態的實際反映，這些心得刊登在官方刊物《大眾電影》上，就說明了官方希望灌輸的訊息：凡是地主都是敵人，必須站穩階級立場，與他們劃清界線、進行無情鬥爭。

藉由讀者投書顯現了有關當局「組織和指導」了觀眾的反映與期望，也是一種思想訊息的傳遞。同時，每一個重要的政治運動常有相配合的電影放映，作為宣傳，這也是毛時代統治的特點之一。例如，上海市為了配合中共展開的「反動黨、團、特務人員登記運動」，特別在全市免費放映三部中國電影：《無形的戰線》、《人民的巨掌》、《思想問題》(1950)，以及一部蘇聯反特電影《青年城》(又譯為共青城，Комсомо́льск, 1938)，「幫助市民認清特務的罪行和面目，及其對人民的危害性，使大家提高警惕，協助政府檢舉匪特，或督促他們從速向政府坦白登記自新」。為此，《大眾電影》特別刊登這些反特電影的討論提綱，期使人民有更深入的認識與正確的觀念。此外，還特別邀請若干曾經當過特務的「自新人」發表他們的觀後感。³¹ 未幾，上海電影界又為配合鎮反舉行電影宣傳週，擴大放映十四部中國和蘇聯的反特電影；出動十個以上的放映隊到工廠、學校、郊區放映。《大

³⁰ 趙健民，〈不給地主父親送棉衣〉，《大眾電影》，1951年第28期，頁21。

³¹ 汝霖，〈全市影院免費放映反特電影〉、〈最近上映的反特影片討論提綱〉、〈自新人看「人民的巨掌」〉，《大眾電影》，1951年第15期，頁6-8。提綱所提出的問題環繞在特務的出身及其行為，為什麼讓特務的行動可以得逞？他們用什麼手段達到目的，所犯的罪行為何？他們的背後指使者是誰，用意何在？人民對於特務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萬 7 千 550 間，可容納 100 萬人居住。⁶⁶ 這個數字即使屬實，也是杯水車薪，連上海市 300 萬職工住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遑論全國工人。上海工廠多集中在閘北、普陀等區，一般工人大部分都住在用竹竿、葦席搭建的棚戶區中，居住環境惡劣。上海市府遂於 1951 年 9 月選在西郊，動工興建工人新村（即曹楊新村）。第一批計有二層樓房 48 棟，162 個單元，1,002 戶；優先分配給普陀、閘北、長寧三區的勞動模範和部分住房困難的老職工等。

曹楊新村仿效蘇聯工人新村自給自足的概念，在新村內建有中小學校、幼稚園、托兒所、文化館、電影院、運動場、郵局、浴室、合作社、商店、銀行、小菜場、衛生所等。曹楊新村作為中國第一個工人新村和工人翻身的標誌，也成為外國訪客到上海必定參觀的「景點」。中共對於工人幸福新生活的宣傳，同時也出現在工人掃盲課本。書中描述工人新居的牆壁雪白、房間寬大、光線充足，清潔又衛生，有電燈、自來水、廚房和衛生設備，天井裡還有曬衣架。房子四周花木扶疏，又鋪著平直的水泥路；還有小河，新村就像個美麗的大花園。文化館經常舉辦演戲或體育活動，人們也可以在館中看畫報、下棋等。第一批新村居民陸阿狗、楊富珍、裔式娟等 114 位勞模和先進生產者手捧鮮花，敲鑼打鼓，興高采烈地告別昔日草棚，搬進新村，臉上都掛滿了幸福和喜悅的笑容。⁶⁷ 曹楊新村的室內空間，以當時的標準來看，非常寬敞。根據調查，1951 年的無錫職工平均每戶

⁶⁶ 〈數字和事實〉，《人民日報》，1955 年 5 月 1 日，第 2 版。

⁶⁷ 樂吟之，〈阿拉曹楊，上海最美！〉，《解放日報》，2011 年 5 月 22 日，第 1 版；學文化文庫編委會主編，張仲清編寫，《美麗的曹楊新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本書是給初小掃盲班閱讀用；祝總臨等著，〈曹楊新邨好風光〉，《速成識字補充讀物：曹楊新邨好風光》（上海：勞動出版社，1953），頁 1-3。

織工只能住到 12.25 平方米；⁶⁸而曹楊新村的一戶室（包括一個小餐廳、衛生間和廚房）有 45 平米，二戶室（多一個房間）55 平米。以 1950 年代的物質條件而論，這幾乎應驗了當時官方報紙常常宣傳社會主義未來美景的實現：樓上電燈、樓下電話。這個新村雖是樣板，卻不能低估其宣傳價值。

然而，當選為全國勞模之後，他們是否就像官方媒體所描述的那樣，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基於愛國熱情，對共產主義新社會的嚮往，或者受到官方宣傳的影響，1950 年代的許多勞模確實勤奮無私地工作。他們試圖領導自己的工作同仁參加社會主義競賽，全力投入工作和學習，分享他們的工作經驗；從報章雜誌諸多報導也可看出勞模對於當時的社會有實際的正面影響。

理論上，勞模的主要活動應該是繼續在原有的工作崗位上提高產量或品質等。實際上，許多勞模，尤其是那些明星勞模，很少回到原來的勞力工作職位上，而是成為管理階層或黨的幹部，並且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各種社會活動上。越著名的勞模，活動越多。明星勞模常常需要列席全國重大會議或共同接見外國代表團。大多數勞模頻繁地應邀到機關、部隊、工廠、學校、團體，報告介紹他們的工作經驗，或傳達與宣傳黨的新政策、響應各種政治運動，甚至剪綵、開球（球賽）、在開學或畢業典禮致詞等。同時，各界也會邀請勞模擔任一些名義上的職位。有些地方領導為了隆重起見，不論什麼會議都找勞模。有的地方甚至將勞模當「萬能英雄」使用，什麼活動都請他們參加。⁶⁹勞模兼職多、開會多、誤工多，也使他們少有時間工作、學

⁶⁸ 江蘇省檔，檔號 3008/永久/920，1951 年 6 月 12 日。

⁶⁹ 胡冰岳，〈關心勞動模範〉，《人民日報》，1955 年 2 月 25 日，第 3 版。

習、休息。例如，孟泰一度有 60% 的時間都用在參加社會活動，王崇倫也差不多。曾有一段時間，孟泰一下班，就有小學生三五成群在他家門口排隊等候訪問他，要求他講模範事蹟和對他們的期望。勞模還得常常接待記者、作家與上級工作組的採訪；被訪問到三更半夜是家常便飯。勞模也會收到許多群眾來信，請教技術問題、索取資料或要交朋友。有的工廠只好派專人為勞模接待訪客或回信，這也間接增加廠方的負擔。⁷⁰

許多勞模對這些活動也感到十分煩惱。武漢的朱玖經常出席各種會議，脫產時間過長，一年實際工作時間不到一半，別人的技術超過她，使她在群眾中的威信受損。她很苦悶地說：「再這樣下去就要成為只會說不會做的勞模了。」⁷¹ 有的勞模因為誤工或脫產太久，演講的時候都有點心虛，覺得再這樣下去，已經沒有什麼先進經驗可言了。勞模的苦衷還包括別人以完人要求他們，要他們起帶頭作用，卻不問具體情況。例如，不管有些勞模家裡食指浩繁，卻強人所難地要求購買過多的政府公債或多捐錢。⁷² 勞模也常常抱怨，向領導提出的各種改進工作的建議不受重視。他們自己或報紙常見的解釋是領導保守或官僚。⁷³ 這固然是一種可能，另外也有可能是勞模的建議與當時

⁷⁰ 〈鞍山市勞動模範國多地參加社會活動影響了生產〉，《內部參考》，號 91（1954 年 4 月 21 日），頁 228；〈廣州市第二屆勞模大部沒有起到模範作用〉，《內部參考》，期 20（1955 年 1 月 29 日），頁 367；陸灝，〈怎樣愛護勞動模範〉，《人民日報》，1955 年 11 月 26 日，第 2 版；〈遼寧一批著名勞動模範社會活動過多〉，《內部參考》，期 3603（1964 年 3 月 24 日），頁 2。

⁷¹ 〈漢口私營申新紗廠黨支部不重視領導生產〉，《內部參考》，號 161（1952 年 7 月 17 日），頁 205-206。

⁷² 〈四名勞模心裡的話〉，遼寧省檔案館藏，檔號 DE22/永久/101，頁 30-36。

⁷³ 洪澤，〈工業勞動模範劉慶祥 創制自動水車遇到了困難 有關部門應該支持幫助他〉，《人民日報》，1951 年 7 月 18 日，第 6 版；叢木生、李水相，〈先進思想

條件無法配合，確實無法施行。

另一方面，不少勞模當選之後，變得驕傲自滿、有功臣思想、唯利是圖。例如，遼寧的張明山自以為成績比別的勞模好，行為傲慢。在黨校學習，嫌屋子太熱頭昏，便回家睡覺；患了輕微神經衰弱，就不參加學習，逕到休養所。他不合群，也不肯接受批評。另有人當了勞模，就把重要工作交給徒弟做；做出的產品不合格，便大罵檢查員說：「廠長也不能把我勞模怎麼樣！」還有勞模壓制和竊取他人的工作成果。有的只向錢看，不肯去學習或換工資較少的工作班制。⁷⁴ 還有勞模變成「撈模」，撈名譽、撈官位、撈待遇，甚至撈老婆！

事實上，勞模運動存在著集體和個人的內在衝突。一方面，這個運動強調生產工作是為了集體的利益，而不是個人的獲利；另一方面，以個人英雄的方式來呈現勞模，會侵蝕集體意識。這個矛盾在實際的生產工作中更為凸顯。一旦勞模運動成為例行性活動之後，可能變成少數人的運動，產生突出英雄，但許多人跟不上或為個人利益打算的錦標主義毛病；中共特別強調要打擊這種帶有個人主義色彩的錦標主義。⁷⁵ 或者為了刷新生產紀錄，使得一些勞動者將精力集中在少數幾天，以求突破紀錄，結果出現少數先進者大大突破定額，多數工

的勝利》，《人民日報》，1953年4月21日，第2版；胡冰岳，〈「萬事大吉」嗎？〉，《人民日報》，1954年11月6日，第3版；康學忠，〈一定要批判保守思想〉，《人民日報》，1956年3月5日，第6版。

⁷⁴ 〈鞍鋼勞模滋長了比較嚴重的驕傲情緒和經濟主義思想〉，《內部參考》，號269（1954年11月25日），頁326-327。

⁷⁵ 〈劉伯承工廠運動〉，《人民日報》，1948年6月12日，第1版；〈反對培養勞動模範中的錦標主義觀點〉，《人民日報》，1952年3月4日，第2版；〈肅清國營工礦企業隱瞞錯誤謊報成績的惡劣作風〉，《人民日報》，1953年10月18日，第1版。

人卻落後，導致整個生產計畫執行不力。⁷⁶ 這些問題正是若干學者認為蘇聯斯塔漢諾夫運動失敗的關鍵因素。當最好的設備、人員等都分配給斯塔漢諾夫工作者使用，其他工人只能用次等、甚至劣等工具，以及和工作能力欠佳的同仁共事。即使斯塔漢諾夫工作者等少數人的產量能破紀錄，全體產量依然下滑。其次，勞模運動只管產量，不管質量；製造出來的瑕疵物品、零件經常無法使用，加上不間斷地密集使用機器，缺乏正常的維修，都會影響到整體的產量。這也是為什麼蘇聯官方在 1930 年代末已不再宣傳斯塔漢諾夫運動的主因。⁷⁷

還有工人會對勞模及生產運動產生反彈，認為共產黨藉由這樣的運動，要工人多加班、搞生產。他們怕和勞模在同一單位工作，如此一來會迫使廠方提高生產定額、增加勞動強度、累壞身體。因此有人會暗地破壞勞模的工作，使得勞模和非勞模之間的緊張關係增強。⁷⁸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蘇聯。蘇聯最初提倡斯塔漢諾夫運動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藉著斯塔漢諾夫工作者的破紀錄產額，來提高一般工人的原有定額。當時蘇聯工人收入是按件計酬，工資甚低，工作意願低落。有關當局意欲利用斯塔漢諾夫運動打破紀錄的方式，刺激生產，提高產量，⁷⁹ 結果使得所有工人必須工作更長的時間才能拿到原有薪

⁷⁶ 胡道源，〈領導職工訂好個人規劃〉，《人民日報》，1956年3月29日，第2版；〈社論：開展先進生產者運動〉，《人民日報》，1956年3月30日，第1版。

⁷⁷ Filtzer, *Soviet Workers and Stalinist Industrialization*, pp. 192-197; Siegelbaum 解釋斯塔漢諾夫運動式微尚有其他因素，Siegelbaum, *Stakhano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SSR, 1935-1941*, pp. 290-292.

⁷⁸ 顧眾、魏春山，〈學習先進經驗努力增產〉，《人民日報》，1952年7月31日，第2版；〈上海市 1950 年度勞動模範運動初步總結（修正稿）〉，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C1-2-197，頁 21-23。

⁷⁹ Filtzer, *Soviet Workers and Stalinist Industrialization*, pp. 180-192.

水，加上當選斯塔漢諾夫工作者往往靠的是機運（黨是否願意組織分配好的人力和設備），不完全靠實力，自然容易引起工人的憤怒不滿，常常對斯塔漢諾夫工作者進行人身攻擊，或故意破壞他們的工具和設備。甚至連低層經理人員也會因為斯塔漢諾夫工作者拖累整體產量而消極地抵制，如將他們轉調到別的部門，或開除他們，甚至殺死他們。⁸⁰ 中國的勞模制度因為沒有和工資直接掛鉤，勞模遭受到的攻擊不如蘇聯厲害，但是類似不滿的情緒還是存在。誠然，即使在許多非共黨的組織機構中，也常發生工作表現卓越優秀者，受到上級的表揚，卻遭到同仁的嫉妒和惡性競爭。不過，這與共產黨的表揚勞動模範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必須聽黨的話，還是有性質上的差異。一般而言，許多老百姓對勞模運動的看法頗能符合官方的期望，或者可以這麼說，負面的看法要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逐一浮現。

四、中蘇宣傳之差異與文革後的勞模討論

由於中蘇兩國的產業結構、國情和領袖偏好不同，勞模運動的宣傳也出現差異。這些差異至少表現在三方面：第一，新技術的宣傳。蘇聯和中國提倡勞模運動，最初經濟目標皆是為了提高生產力。蘇聯宣傳最重視利用新技術，突破原有的生產定額。中國由於物質缺乏，

⁸⁰ 根據蘇聯內務部文件，這些破壞運動者均被當局視為「反革命分子」。Павел Шеремет, “Стаханов отдыхает” (斯塔漢諾夫休息), *Огонёк*, (星火) No. 33 (5142), 2010年8月23日, 頁26, 轉引自 <http://www.kommersant.ru/doc/1486492/print> (2013年10月11日檢索)。Filtzer, *Soviet Workers and Stalinist Industrialization*, pp. 210-205; Siegelbaum, *Stakhano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SSR, 1935-1941*, pp. 196-199.

注重物資的回收、再利用和節約成本。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避免浪費和減低成本是長程目標。⁸¹ 這就是鞍山鐵工廠的孟泰會特別受到官方的讚揚的原因。他千辛萬苦地拾取和收存成千上萬的鐵釘、螺絲釘、鐵絲等小東西，而成為同仁的楷模。這也顯示了中蘇兩國在推展勞模運動時，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經過抗戰、內戰，需要竭盡所能地節約原料，以便恢復經濟。蘇聯的宣傳從一開始就將勞模運動和新的技術緊密結合在一起，斯大林聲稱，「沒有新的和更高的技術，斯塔漢諾夫運動是不可能出現的」；⁸² 雖然這與實際情形有出入，兩者之間並無必然關係；卻也顯示人口遠少於中國的蘇聯，冀望用此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同時也能夠和西方工業國並駕齊驅。反觀中共即使在 1956 年以前高度宣傳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新的技術卻沒有成為宣傳重點。早在 1950 年代初期，曾有報告指出，因為技術的改善，導致大量過剩勞力，工廠還是需要支付薪水給那些沒有工作可做的工人。⁸³ 又如，王崇倫在 1953 年發明「萬能工具胎」，當選鞍山市特等勞模。由於鞍山鋼鐵公司技術革新展覽在各大城市引起熱烈反響，王崇倫遂於 1954 年同數位勞模領銜向總工會建議，在全國開展技術革新運動，總工會採納了建議。《人民日報》雖然多次報導全國各地在技術革新中的佳績，⁸⁴ 事實上

⁸¹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9 日，第 1 版。

⁸² “Речь на первом всесоюзном совещании Стахановцев (17 ноября 1935),” in Robert H. McNeal, ed., *И.В. 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vol. 1 [XIV], p. 80.

⁸³ 〈全總黨組關於愛國增產運動的綜合報告（1952 年 9 月 8 日）〉，收入《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卷 1，頁 42。

⁸⁴ 〈全國各地技術革新運動逐步展開 許多工礦企業的技術革新已獲得初步成績〉，《人民日報》，1954 年 7 月 17 日，第 2 版。

引起的問題更多。「有的認為發動群眾搞技術革新同建立企業正常生產秩序有矛盾，影響計畫管理；有的認為本系統已經機械化了，再發動群眾搞技術革新是多此一舉；有的認為工人文化、技術水平低，國家投資有限，缺乏技術革新的條件」等等。中共中央認為，「把技術革新作為勞動競賽新階段或主要內容這個提法不確切、不完善、有缺點」。全國總工會遂於 1955 年初，取消技術革新的口號。⁸⁵ 大躍進時期，有關當局大力宣傳技術革命，但這更多的只是個口號，甚至是災難，而非實情；大量品質低劣的產品就是所謂技術革命下的產物。

第二，蘇聯宣傳高度重視物質獎勵，十分強調勞模因為打破工作定額，獲得大量的金錢報酬；將產量與薪資直接掛鉤，用更高的薪資及特權來刺激生產，加速經濟發展。蘇聯的媒體總是大肆宣揚各行各業的斯塔漢諾夫工作者，因為突破生產定額，從而薪資提高數倍等。這些勞模常常在全國表揚大會上，不只毫不隱瞞，反而自豪地告訴大家他們賺了多少钱，他們用這些金錢來購買收音機、腳踏車、香水等資產階級的物品。在明星勞模的官方版傳記毫不掩飾地有這樣的敘述：「輕鬆的工作，更多的薪資」、「好工作帶來更多的薪資」、「更多的錢代表更多東西，額外的舒適」、「做越多，賺越多」等等。⁸⁶ 中國沒有將生產和按件計酬直接掛鉤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的落後。蘇聯的獎勵制度涉及複雜的行政和會計制度；蘇聯勞模薪資採取累進計件工資

⁸⁵ 《中華全國總工會七十年》，頁 334-335。

⁸⁶ Joshua Kunitz, *Along Came Stakhanov* (Moscow: 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 1936), pp. 32-34; G. Griedrich, "Miss U.S.S.R." *The Story of Dusya Vinogradova* (Moscow: 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 1936), pp. 9, 22.

制，這需要大批訓練有素的人員，不斷地修正酬勞的計算方式。中國在政治上有眾多可靠的幹部，但是他們在經濟財政等技術方面訓練不足。⁸⁷其次，由於人口眾多，食指浩繁，周恩來稱此為「三個人飯，五個人吃」。中共必須採取低工資政策以減低失業率，⁸⁸畢竟這是中共視為實行社會主義的一項主要成就，否則高失業率也會侵蝕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中共對於物質獎勵的宣傳，在革命前後有程度上的變化。1949年之前，中共媒體曾經大肆報導勞模的獎金等實物獎勵；從建國後到大躍進之前，中共傳媒宣傳勞模的獎勵，雖將榮譽放在第一位，也宣傳當選勞模所帶來的經濟上實質好處。這段期間關於物質獎勵與優渥生活的報導也不少。⁸⁹這些物質獎勵，對於級別越低的勞模評選，越顯重要；往往越是基層，越受到重視。許多職工爭取評比生產先進，就是為了獎金及其他實質利益。但與蘇聯極為高調的宣揚物質獎勵相比，中國相對地要低調些。

中國不鼓勵物質獎勵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則與高層領導的思維有關。首先是中共高層無意將高生產率和改善工人生活的宣傳直接連在一起。例如，1953年中共中央指示全國總工會改正「生產長一寸，

⁸⁷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17-118。中國薪資的變化，見楊占城，〈我國工資制度的發展變遷〉，<http://news.sohu.com/20060208/n241732611.shtml> (2007年5月2日檢索)。

⁸⁸ 〈周恩來同志關於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1957年9月26日)〉，收入《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卷1，頁614-615。

⁸⁹ 例如，陳瑞楓，〈在一個幸福的家庭裡——記全國紡織工業勞動模範黃寶妹家討論憲法草案〉，《人民日報》，1954年8月19日，第3版；〈批判忘本思想 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上海鍋爐廠舉辦顧六法今昔對比展覽會〉，《人民日報》，1957年10月7日，第2版。

福利長一分」的口號，因為這顯然將個人當前的利益和長遠的集體利益連在一起。⁹⁰ 這樣的想法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有更進一步的發揮。毛不認為物質刺激是提高生產的唯一方式。他在閱讀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即有這樣的批注：「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質刺激。在困難的時候，只要把道理講通了，減少一些物質刺激，人們一樣要幹，而且還幹得很好。教科書把物質刺激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毛相信「應當強調艱苦奮鬥，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們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台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⁹¹ 在實踐上，毛澤東以群眾動員、思想改造和許多整風來取代物質獎勵，刺激生產。

第三，中蘇領導不同的文化價值觀。蘇聯的勞模必須如斯大林在1935年演講中所期望的那樣「有文化素養」，要將他們的文化水準提高到與工程師及技術人員相同的程度。例如，勞模家中的書架上必須有列寧和斯大林的文選，偉大的俄國／蘇聯作家如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愛倫堡、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蕭洛

⁹⁰ 〈中共中央對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口號問題的請示的批示（1953年8月）〉，收入《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卷1，頁169-171。

⁹¹ 斯大林對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撰寫，指導及參與極多。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內部發行，頁428、807。

霍夫以及西方作家如 Walter Scott, Jules Verne 等，還有旅行、探險、描述遙遠國度的書籍。⁹² 這當然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非實情。事實上，許多蘇聯勞模仍為文盲，休閒時間並非從事文化活動，往往在酗酒。不過，這樣的宣傳投射了官方對工人要有文化素養的期望。此外，斯大林認同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觀，恰好與毛澤東要求向農民學習成鮮明對比。

一般而言，中共要求勞模要有文化，主要指的是識字。1958年，黨號召技術革命、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理想的工人是有高度的社會主義覺悟及對科學知識的高水準文化，即要紅又要專，結合勞心和勞力的工作，結合專長與勞動，知識分子要融合在工農群眾之中。⁹³ 大躍進初期，全國熱火朝天地開展運動，致力於掃除文盲和成立農民大學。但這個運動十分短命，結果是品質很差，數量高度膨脹。理論上，這個運動希望將工農知識分子化；實際上，是將知識分子農民化。雖然官方口號大聲疾呼要將教育與勞動結合，事實上有關當局更在乎的是體力勞動，而不是腦力勞動。其次，1950年代初期成立的工農速成班，就教育品質而言表現較好，到了1958年之後一個個逐漸消失。⁹⁴ 尤有甚者，毛澤東不斷要求知識分子要向農民學習，其極端的形式就是文革時期的五七幹校和知青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⁹² G. Griedrich, "Miss U.S.S.R.," *The Story of Dusya Vinogradova*, p. 24; Иван Гудов, *Путь Стахановца: Рассказ о моей жизни* (斯塔漢諾夫工作者之路：講述我的一生)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8), с. 130.

⁹³ 〈社論：到勞動者的紅旗下集合〉，《人民日報》，1958年9月25日，第7版。

⁹⁴ 〈訪陳雪薇——知識分子的毛澤東與中國知識分子〉，收入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編著，《說不盡的毛澤東：百位名人學者訪談錄》（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上冊，頁283。

再者，中共對於提升農民文化水準較不重視的原因是，全國文盲的絕對數字過高，降低文盲率變得更為重要。中蘇兩國在共產革命之前，農村的文盲率均超過 80%。根據 1939 年蘇聯的統計數字，9 到 49 歲的年齡層中，94% 的城市人口和 86% 的農村人口識字。⁹⁵ 這是十月革命 22 年以後的情形。而根據聯合國文教組織在 2000 年發表的中國全國的識字率為 85.2%，⁹⁶ 這是中共革命 50 年以後的情形，而農村的識字率一定低於這個平均數。很明顯地，基於眾多的人口和中國相對的落後，中共在 1950 年代對於工農的文化程度無法要求太多。

老百姓能夠公開又較不受政治約束地討論勞模問題，以文革之後最多，這些討論又與勞模在文革時期的待遇有很大的關係。關於文革時期勞模境遇的資料並不多，眾多地方志往往是一語帶過。現僅能就筆者所見，作一略述。大多數勞模在文革期間均遭殘酷迫害，這是因為他們多半忠於原來提名他們的黨委；文革初起之際，黨委失勢，他們受到牽連，也跟著遭殃。他們被冠以「保皇派」、「走資派的社會基礎」、「假勞模」、「工賊」等罪名，被批鬥、遊街、罰苦役，有的受監禁審查，有的被搞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上海江南造船廠的勞模金龍山，被誣陷為「叛徒」，嚴刑拷打致死。當時只要和劉少奇有一絲關聯者，下場都慘，著名的掏糞工人時傳祥就是很好的例子。1959 年他當選全國勞模，和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握手合照，這張照片成了主要罪證；他被扣上各種罪名，先後遭批鬥五百多次，說他是「糞霸」、「工賊」。紅衛兵指控時傳祥說：「你跟劉少奇握過手，照過相，

⁹⁵ Sheila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37-138.

⁹⁶ "National Literacy Policies/China," <http://www.accu.or.jp/litdbase/policy/chn/index.htm> (2007 年 9 月 11 日檢索)。

給劉少奇寫過信，你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忠實走狗，背叛工人的工賊！」⁹⁷ 結果時傳祥被迫害致殘去世。

另一方面，也有少數勞模在 1968 年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成為其中成員，復又「翻身」變成文革的當權派。工業勞模郝建秀、王進喜、遼寧的尉鳳英和李素文等均是革委會成員。1969 年，尉鳳英和王進喜還當選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四人幫垮台後，這些職位自然也就煙消雲散。在文革前夕被黨中央稱為「毛主席的好工人」的尉鳳英，晚年回憶文革那一段，她說：「我們都錯了！」「那時候，許多事情我們並不了解，只是憑著忠於黨和毛主席的感情判斷是非。」「現在看，政治鬥爭的實質我們並不了解，許多事情我們並不知道。」⁹⁸ 事實上的確如此，這些勞模只不過是當時政治鬥爭之下的棋子，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門面，並無實權。

文革之後，許多人對黨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幻滅，他們的看法反映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並不多，卻已經由工人小說家胡萬春呈現在他的作品《人生在世》。小說的主角陳愛珍在 1950 年代成為上海紡織勞模，其後她以全心投入工作為生活重心，但現在人們已不相信體力勞動有樂趣可言。年輕女工對她說：「社會主義搞得再好，你還不是做工吃

⁹⁷ 楊志和，〈國家主席與掏糞工人的特殊友情〉，《福建黨史月刊》，2003 年第 1 期，頁 25-26。

⁹⁸ 尉鳳英，1959 年當選遼寧省勞模。她用 434 天完成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個人生產任務，4 個月的時間完成第二個五年計畫。1964 年黨中央稱她為「毛主席的好工人」。1968 年當選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王素梅，〈尉鳳英，欲說當年好困惑〉，《老年人》，1999 年第 2 期，頁 10-12。李素文 21 歲加入共黨，1959 年全國勞模，1968 年 5 月進入瀋陽革委會領導班子；1973 年 3 月共青團遼寧省委書記；1975 年 3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素文：大起大落後找回勞模的感覺〉，《報林》，2004 年第 2 期，頁 37-38。

飯？又不能白吃白拿？……當勞模又怎麼樣？文化大革命還是批你鬥你。」陳愛珍工作積極進取，以廠為家，一心想要改進工廠缺點。這些在 1950 年代備受推崇的勞模精神，到了 1980 年代，卻受到同事、甚至自己兒女的冷嘲熱諷。他們認為當今社會變化很大，陳愛珍還死抱著「細紗女工有幹勁，力爭上游當先進！」是思想僵化，不切實際，神經不正常。還有人視她為「害群之馬」，因為她的工作積極，迫使大家也必須多幹活。自從四人幫垮台後，陳愛珍從未被評上先進。她感嘆「真正的先進遭人白眼；後進靠請客、送禮、拉關係、開後門變先進」。一個青年工人明白地表示，想當先進，只要做到兩條：「一條是不請假，工作還過得去；另一條是貫徹十六字方針，即『香煙發發，馬屁拍拍，老酒喝喝，禮品塞塞』。」此外，子女對她的不關心家庭十分不諒解，陳愛珍對子女說：「我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其次才是一個母親。」⁹⁹ 這句話是她的人生哲學，也符合黨的期望。小說的結局以陳愛珍價值觀獲勝，是作者的主觀願望。小說更吸引人的卻是他筆下那些反對陳愛珍的人，正反映出文革後社會對勞模的普遍觀感。

鑒於許多老勞模的晚景淒涼，大多數的討論焦點都放在勞模精神及物質獎勵的重要性。從這些討論可以看出中共早期關於勞模的宣傳相當成功。人們一提起 1950 年代的勞模，基本的印象是他們像老黃牛一般，埋頭苦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問奉獻，不問酬勞。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不該將勞模視為完人，期望他們只能「苦驢累活搶著幹，遇到名利靠邊站」。許多人認為勞模是最勤勞的人，卻生活淒

⁹⁹ 〈人生在世〉寫成於 1982 年。胡萬春，〈人生在世〉，《胡萬春中篇小說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頁 1-70。

苦。清貧不該是勞模特色，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們也有權利追求合理合法的個人利益。¹⁰⁰ 其次，應該重視勞模的身心健康。有人認為不能提倡以勞模健康為代價，來樹立其光輝形象；為工作而不惜犧牲身體，乃至生命，於公於私都得不償失；也應該允許勞模擁有自我，可以選擇工作，有休閒生活，甚至懂得享受生活都不為過。¹⁰¹ 從1950年代官方與人們要求勞模要「奉獻」、「集體為重」、「賣命工作」，到改革開放以來認可勞模應該擁有「報酬」、「自我」、「享受生活」，是一種比較符合人性的價值觀改變，也意味從1950年代官方強調榮譽和集體利益到重視個人、個性的勞模精神的一種質的轉變。

面對這種轉變的挑戰，中共以所謂勞模轉型來回應。他們認為勞模應該由「苦幹型」（老黃牛）轉向「巧幹型」（專業技術強）；「經驗型」轉向「創新型」。¹⁰² 全國總工會表示，技術創新和參與商業代表了勞模的轉型成功和升值；勞模升值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勞模從商因此變得名正言順。官方讚許企業高薪聘請勞模、購買勞模的肖像權，使得勞模從昔日的沒沒無聞，走向自我包裝、自我展示，成了商戰的主角。有些私人企業借重民眾認為勞模是誠實可靠的形

¹⁰⁰ 王秉禮，〈清貧不該是勞模特色〉，《中國經濟週刊》，2005年第17期，頁59；劉裕章，〈新形勢下勞模的特點〉，《當代貴州》，2000年第11期，頁43；張順、賁衛華，〈我們需要怎樣的勞模〉，《唯實》，1998年第12期，頁93；德祥，〈勞模也應追求合理合法的個人利益〉，《中國職工教育》，2001年第11期，頁45；張天蔚，〈勞模的價值〉，《領導文萃》，1995年第10期，頁27。

¹⁰¹ 仲永偉，〈大家都來關心愛護勞模〉，《化工管理》，1996年第8期，頁43；王淦生，〈十個勞模八個病〉，《唯實》，1998年第5期，頁68；張怡、紀堯，〈女「勞模」光環下掩飾下的不幸婚姻〉，《三月風》，2002年第1期，頁7-10；鄭東亮，〈勞模標準的變與不變〉，《職業》，2004年第5期，頁14；劉煥杰，〈胡勞模的趣生活〉，《華北電業》，2004年第1期，頁76-77。

¹⁰² 劉裕章，〈新形勢下勞模的特點〉，《當代貴州》，2000年第11期，頁43。

象，為他們的產品代言。例如，年過花甲的全國第一代勞模鄭文忠，在瀋陽百貨大樓，身披綬帶親切地忙著接待顧客，販售化妝品，創下佳績。另有勞模協會組織勞模櫃外銷售，僅勞模王巧珍一人一年就銷售400萬元，相當於兩三個小型商場一年的銷售額。¹⁰³ 他們的成功也反映了許多人對1950年代勞模仍持正面觀點，認為他們值得信賴。但是勞模由體力勞動轉向商業，若受聘於私營企業，在某種程度也等於為資本家服務，這是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大倒退。

1979年，中共恢復了中斷二十年的全國勞模評選。2005年的全國勞模和先進工作者表揚大會，引起極大爭議，更凸顯了毛澤東時代的「勞模精神」與市場經濟變化的突兀組合。¹⁰⁴ 這次大會有四類人的當選引起注意和廣泛討論：(1) 首次有21名進城農民工獲選；(2) 著名運動員如劉翔、姚明等亦入選；(3) 獲選者「官」、「長」字身分特別多，工農數量少，各省官的比例至少都在60%以上；(4) 33名私營企業主當選，包括曾被《福布斯》(富比世)雜誌評為大陸十大富豪之一的劉永好。輿論針對這些大官、富商的當選，反應最強烈。有

¹⁰³ 舜太運，〈勞模在市場經濟中升值〉，《中國人才》，1996年第11期，頁22-23；〈「勞模」也是「無形資產」〉，《瞭望》新聞週刊，期12(1999年3月)，頁51；蘇北，〈新世代勞模的價值和內涵〉，《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4年第5期，頁21。

¹⁰⁴ 這次大會共選出2,969名：企業職工1,400多人、農民600多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800多人。其中女性500多人，佔18%；少數民族260人，佔9%。40歲以下近700人，61歲以上不到100人，分別佔23%和3%；最小17歲，最大85歲。大學專科以上學歷僅2,000人。慧杰、志敏，〈勞動與創造成就人才——從2005年全國勞模評選表彰看科學人才觀的新實踐〉，《中國人才》，2005年第9期，頁18-19；〈勞模評選引發三大爭議〉，南方周末，<http://news.runsky.com/homepage/n/rec/userobjectlai547979.html> (2006年8月11日檢索)。

人詰問那麼多的官員當選，是在選勞模，還是選優秀領導幹部？¹⁰⁵另外，有學者指責富豪當選勞模，變成了「贏者通吃」；不斷擴大勞動概念的結果，勞模就變成「原則上之各行各業的優秀分子。」¹⁰⁶官方的回應宣稱，勞模評選標準需要與時俱進。在多元化的社會，勞模就應該涵蓋勞動的所有形式和所有領域，「誰為社會創造了財富，誰就是勞動者，就應該被納入表彰的範圍。」¹⁰⁷官方的回應實際上是重新定義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概念。過去中共宣稱，舊社會統治階級靠剝削工農勞動者致富，輕視勞動；新社會則重視勞動，因為新社會的主人是勞動大眾。現在資本家不但可以加入共產黨，而且勞動成果可以名正言順地為資本家所享有，是否也等於回到了舊社會？

鑒於 2005 年勞模的長官比例過高，2010 年的勞模評選，中共特別規定企業負責人不能超過 22%。官方媒體還特別宣揚這次 325 名企業負責人當選，尚比原來設定的門檻還要低 0.8%，彷彿這是項偉大的成就。2010 年選出的 2,985 位各行各業有「突出成就的勞動者」，其中 14 人為兩院院士。¹⁰⁸而習近平在 2013 年春與勞模座談時，說：「在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勞動模範始終是我國工人階級中一個閃光的群體，享有崇高聲譽，備受人民尊敬。」他也將兩彈元勳鄧稼先（1986 勞模）歸屬於工人階

¹⁰⁵ 涌泉，〈勞模官多民少的思考〉，《時代潮》，2005 年第 9 期，頁 5。

¹⁰⁶ 孫立平，〈勞模評選的尷尬〉，《中國改革》，2005 年第 6 期，頁 52-53。

¹⁰⁷ 張學民，〈今年全國勞模評選的新變化〉，《中國石化》，2005 年第 7 期，頁 82；

王北平（北京市總工會副主席），〈弘揚勞模精神，尊重勞模價值〉，《工會博覽》，2005 年第 9 期，頁 4-6。

¹⁰⁸ 勞動模範 2,115 名，先進工作者 870 名。共產黨員佔全數的 85.1%，漢族佔 90.7%，女性 19.8%，41-60 歲佔 76.5%，專科以上教育 75%，農民 19.5%。〈2010 年全國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評選揭曉〉，《中國職工教育》，2010 年第 5 期，頁 10；鄭莉，〈「一線」與「長官」之爭〉，《當代勞模》，2010 年第 1 期，頁 26-28。

級。¹⁰⁹ 這樣的「工人階級」和勞模評選與毛時代的內容和性質大大的不同。毛時代藉由勞模評選所凸顯的工農翻身，已經完全消融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之中；雖然依舊強調黨的領導。

五、小 結

共產黨提倡勞模運動主要有兩個目的：經濟上增加產量，政治上灌輸致力於集體主義、跟隨黨的領導的觀念，成為新人。1949 年以前，中共重視勞模的經濟效益先於政治功能，強調勞模的帶頭作用，引領群眾努力生產。1950 年代之後，隨著政治路線激進，對勞模的政治要求與日俱增；單是工作成績優良突出遠遠不夠，須先考量政治態度，甚至出身。這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政治意識形態的重要性。1950 年代初期，大連有位工人總是提早到工廠，事先準備好當日工作必需用品。因為他的敬業態度，許多人提議他應該參選勞模。他回答說：「這有什麼？我從日本佔領東北以來，一直都是這麼做的」。¹¹⁰ 這句話顯現了他的政治認識不足、沒有凸顯黨的角色，因此失去了勞模候選的資格。

1950 年代的勞模運動，獎勵、提拔了許多第一線的體力勞動者。這些位居社會底層的人，在國民政府時代從未受到官方的重視。他們成為全國勞模後，所得到的名和利是 1949 年以前的工農所難以想像的，他們自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覺得工農翻身了，並認同黨所

¹⁰⁹ 習近平，〈在同全國勞模代表座談時的講話〉，《中國工運》，2013 年第 5 期，頁 4-6。

¹¹⁰ 藍英年口述，北京，2007 年 5 月 25 日。

宣傳的社會主義理想，積極投入建設，願意跟著黨走，這也正是中共要培養新人的核心價值。然而，市場經濟摧毀了毛時代極力宣傳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價值觀。今天許多勞模的稱號已經退化成為許多高級黨官和百萬富翁的裝飾象徵，評選勞模的標準也面臨越來越多的矛盾與挑戰，其所反映的問題也就是對中共是否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質疑。

現在社會以追求致富為第一要務，工人地位急速下降，勞模這個在毛澤東時代受官方重視的群體，今天已經鮮有青年會特別去注意。據《工人日報》報導，北京市地壇小學曾經舉行一次勞模問卷，隨機詢問學童知不知道什麼是「勞模」？大多數孩子都說不知道，反問勞模是幹什麼的？有的甚至回答：「勞模是不是民工呀，整天幹活的那些？」「勞模是不是清潔工人？」有一個回答：「我知道，勞模是模特（兒）的一種，估計是國際名模吧。」¹¹¹這與1950年代小學生立志要當勞模，大相逕庭。童話作家鄭淵潔自言，他上小學曾有過的作文題目：我長大了幹什麼？因為受到當時宣傳的影響，他寫說要學時傳祥做掏糞工人，為人民服務。¹¹²今昔相比，有如天壤之別。

最後，中蘇兩國在勞模宣傳的形式上大致相同，但是內容不同。蘇聯重視新技術和物質獎勵的宣傳；中國更重視政治態度，由最初的精神與物質獎勵兼有的宣傳，轉變為大躍進之後聚焦於精神獎勵的宣傳。這是因為中國的國情不同（發展落後、人口多、文盲多），以及毛澤東比斯大林重視人民的政治覺悟。同時，毛澤東要求知識分子向工農學習，但沒有鼓勵工農向知識分子學習；斯大林則偏愛資產階級文化，期望工農學習知識分子文化。

¹¹¹ 李紅軍，〈勞模應有新內涵〉，《中國審計》，2002年第8期，頁80。

¹¹² 進琴，〈名人小時候的理想〉，《小星星》（高年級版），2005年第6期，頁21。

第七章

「男女都一樣」—— 女拖拉機手與性別觀

哦！火犁，你是鋼鐵的戰馬；
火犁，你是我們親愛的戰友。
你發出愉快的聲音，
我們已到了開耙時候。
我們走遍田野，
駕著神馬馳行！……¹

1950年6月3日，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隊在黑龍江省德都縣成立。隊員們駕駛著插上紅旗的拖拉機，齊聲歡唱拖拉機之歌。女拖拉機手是中共建國之後亟欲塑造的一種新人典型和新中國婦女的模範。女拖拉機手的新人形象，係效法蘇聯的經驗；這種共產主義社會下的新婦女，正好為中共建國後的政經發展與婦女解放提供典範，成為教育中國婦女的新榜樣。

本章以女拖拉機手的宣傳與實踐為個案，闡析中共在學習蘇聯，塑造新人之際，性別所扮演的角色。中共大力宣傳婦女進入傳統以男

¹ 張振義，〈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隊〉，《人民日報》，1950年7月16日，第4版。

性為主的職業場域，目的何在？成果如何？婦女響應黨的號召，成為拖拉機手之後，實際的工作內容和生活情況與他們原來的期望有無落差？她們是否感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如果不是，那麼這種由上而下強制性地執行男女平等，意義何在？再者，本章藉著女拖拉機手的案例，比較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蘇女拖拉機手處境，可以折射出什麼問題？兩國均曾轟轟烈烈地推出女拖拉機手，又幾乎不約而同地在 1990 年代初立法禁止女性擔任這個工作，背後相似的因素引人深思。

一、中共建國初期的女拖拉機手宣傳與典型

1949 年 9 月 21 日，毛澤東在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式中，豪氣干雲地宣布：「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鼓舞、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這也意味著過去備受壓迫的工農群眾和婦女，都可以當家作主了。中共宣稱「婦女必須要參加生產，以推進社會的發展，爭取經濟獨立，這是婦女解放運動的關鍵」。婦女只要參加社會生產事業，就能享受與男子同等的權利。² 所以，隨著革命的成功，婦女走出家門，參與勞動生產，就是獲得解放，男女也就平等了。

事實上，男女平等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若要從理論與實踐層次來全面探討男女平等的問題，可以寫出成堆的專書。不過，若將討論的基礎簡化地設定成婦女參與家務以外的勞動，擔任過去只有男性才從事的工作，也算是男女平等的一種指標，那麼女拖拉機手即是其中的範例之一。

² 區夢覺，〈怎樣做一個新社會的新婦女〉，《新中國婦女》，1949 年第 1 期，頁 9。

拖拉機的普遍別稱是鐵牛，滿洲國時期在東北又稱為火犁或洋犁。拖拉機象徵農村嶄新與明亮的一面，代表著現代與進步。拖拉機在中國的使用，最早可溯源至兩次大戰期間，日本開拓團在東北的使用；德國拖拉機廠蘭斯 (Lanz) 也曾在瀋陽有代理商，出售與維修拖拉機。1945-1947 年，聯合國救濟總署送了將近二千台拖拉機到中國，目的不是要促進中國農業的機械化，而是要協助因洪水成災的河南重建。1938 年，蔣介石為阻滯日軍迅速西進，曾在河南炸開黃河大堤，引發大水。大水之後，野草蔓生，農民的土犁無法斬斷這些草根；拖拉機就是用來剷除這些草根，讓老百姓能再種田。這些拖拉機在犁過幾百萬英畝的土地之後，因破損而漸被棄置。1947 年秋天，聯合國救濟總署被解散，加上燃料與零件的缺乏，這些拖拉機站也跟著關門。³

中共剛剛接收東北之際，曾經利用從日本開拓團收繳而來的許多美製、德製等殘缺不全的拖拉機，重新拼湊組裝起來開荒種地。其後，蘇聯也陸續運送拖拉機到中國。中共建國初期所使用的拖拉機絕大多數來自蘇聯，直到 1950 年代後期，才出現從東歐進口或中國自製的拖拉機。

1948 年 4 月若干蘇聯製拖拉機運抵東北，中共便在甯安、通北、趙光、花園、永安、查哈陽等地建立了第一批國營農場，並利用來自於日本開拓團的中、日拖拉機駕駛員，開班招生，使東北成為中國最早開辦拖拉機班的地區。⁴ 此外，美國左派人士韓丁 (William

³ William Hinton, *Iron Ox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Chinese Farming* (New York &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pp. 1, 15.

⁴ 楊清海，〈花園農場的初創年月〉，頁 4、房福田，〈艱苦豪邁的開荒生活〉，頁 16-17，以上兩篇均收入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黑龍江省國營農場總局合

Hinton) 亦曾協助中共在河北冀縣成立拖拉機班；72 名學員之中，只有三名女性。⁵

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咸認女人不能扶犁，否則會壞了莊稼。中共則以女人能扶犁，而且是能操作機械化的火犁，來展現婦女參與勞動的光榮偉大，新社會的進步，婦女獲得解放。中共認為女拖拉機手代表了婦女告別舊社會的苦惡與封建，迎接新社會的美好與希望。婦女終於可以走出家門，與男人並肩工作而沒有羞辱感，這也就是婦女在新中國的翻身。女拖拉機手因此成為社會主義新婦女的一種代表。在官方宣傳這種社會主義新婦女之際，也同時意含新中國將成為一個農業機械化的現代國家。

1950 年代初期是中共最密集宣傳女拖拉機手的時候，這與形塑中國的新形象和施行農業政策關係密切。1952 年底全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 年開始加速推行農業合作化。職是之故，中共在宣傳女拖拉機手之際，也連帶宣傳集體農莊幸福快樂的生活，冀圖以此達到推行農業集體化的終極目標。這段期間官方藉由宣傳女拖拉機所呈現的農村婦女新形象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婦女快樂並自覺地參加生產，且以出外勞動為榮；他們即使遭遇困難，也會不畏艱辛地完成工作。由於當時尚在韓戰的陰影籠罩之下，所以官方的宣傳也強調會開拖拉機，就會開坦克車，這樣就可以保衛祖國。

中共宣傳女拖拉機手的途徑非常多元，其中電影的影響力不容小

編，《拓荒者的回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⁵ 韓丁乃左派世家出身。1945 年，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身分到重慶，並同毛澤東有過多次會談。1947 年，他又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成員的身分到中國。William Hinton, *Iron Oxen*, pp. 1, 8, 15, 28; 王永福、周毅文，〈一個老朋友的意見——訪美國友人韓丁〉，《人民日報》，1978 年 9 月 23 日，第 2 版。

覷。蘇聯電影《她在保衛祖國》(Она защищает родину, 1943, 又譯為《巾幗英雄》), 劇中的女主角原是一位賢妻良母兼能幹的女拖拉機手, 德軍的入侵摧毀了她幸福美滿的生活; 丈夫戰死, 幼子被德軍的坦克壓死, 促使她憤而組織游擊隊對抗德軍, 並親自駕駛坦克殺敵。同樣地, 在電影《拖拉機手》劇中的女主角是位女拖拉機隊長, 性格明朗, 熱情豪邁, 志趣高尚, 熱愛勞動, 竟日穿著工作服。這部電影拍攝於日蘇隨時有交戰可能的形勢下, 影片所傳達的另一訊息是, 農民必須學會開拖拉機, 也要學會開坦克車, 才能對付可能入侵的敵人。同時, 劇中也展示了集體農場機械化的優點; 凡是拖拉機耕過之處, 犁痕深淺適度, 整齊畫一。

在眾多蘇聯電影之中, 最能展現集體農場的富裕和快樂生活的電影是《幸福的生活》。影片開始未幾, 呈現在觀眾眼前的是, 堆積如山地的各種農產品, 果實纍纍, 令人垂涎欲滴; 黃金般的麥浪滾滾充滿了整個畫面, 在在宣示了農業集體化的優越性。平日辛勤認真工作且以參與生產為傲的女拖拉機手, 在收成之後, 均換上美麗花俏的衣裳, 快樂地結伴遊玩, 在市集的每一個角落都能聽到她們銀鈴般的笑聲。此外, 劇中還穿插著最令青年男女嚮往的談情說愛。整部片子所呈現的農村生活如此地浪漫與美好, 令人心生嚮往。農民的人間天堂捨此為何? 為了配合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 中共還將這些電影譯成蒙古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粵語等, 在中國各地播放。

除了宣揚蘇聯集體農場與女拖拉機手的美好生活之外, 真人典型同樣重要。號稱蘇聯第一位女拖拉機手安格林娜 (Pasha Angelina, 1913-1959) 的事蹟, 亦是中共官方宣傳重點。⁶ 蘇聯當局最初大力宣

⁶ 1929年初, 蘇聯已開設女拖拉機手駕駛課程, 特別是頓河地區。第一個女拖拉機

傳安格林娜，不是為了婦女解放，而是為了國家利益，勞力不足之故。蘇聯宣傳女拖拉機手與 1930 年代初的快速工業化關係密切。由於農村男性大量湧向城市工廠，農村缺乏勞力，安格林娜因此被樹立成女拖拉機手的樣板，以便吸引更多的農村婦女投入農業生產。

來自頓河地區的安格林娜是烏克蘭人，她克服了父兄與朋友的阻撓，在 1930 年成為女拖拉機手。1933 年她不顧村人的反對，組成一支女拖拉機手大隊，1935 年底得到列寧獎章，1937 年底被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此後每年都被選為代表，直到過世為止）。1938 年，安格林娜喊出「十萬婦女朋友上拖拉機」的口號，從此成為蘇聯家喻戶曉的人物。⁷ 她將農民的當家作主，集體農莊的富裕與幸福，完全歸功於十月革命、黨的領導和蘇維埃制度的偉大，而不是她個人的努力或其他特殊因素所致。中國的《人民畫報》、《人民日報》、《新中國婦女》均曾以圖片或文字的方式報導她的事蹟；為迎合教育水準較低的讀者，中共當局還將關於安格林娜的書翻譯和改寫成章回小說的形式。⁸

隊在 1929 年已經成立。Sue Bridger, "The Heirs of Pash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Woman Tractor Driver," in Linda Edmondson, ed., *Gender in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95.

⁷ 據說有二十萬名婦女響應她的號召。П. Ангелина, *Люди колхозных полей* (在集體農莊田野上的人)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4), с. 21-30, 67.

⁸ 〈蘇聯女勞動英雄巴夏·安琪琳娜〉，《新中國婦女》，1950 年第 6 期，頁 31-32；〈我如何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戰鬥著——蘇聯第一個女拖拉機手安格林娜〉，《新中國婦女》，1952 年第 1 期，頁 25；王大成譯，《安格林娜的故事》（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2）；《安格林娜自傳》（北京：青年出版社，1952）；陸梅林與海天根據安格林娜的《我的集體農場生活》與《在集體農莊田野上》二書，改寫成《集體農場生活》（上海：元昌印書館，1951）。

不過，安格林娜畢竟是外國人，對於中國老百姓而言，可能沒有足夠的親切感，唯有推出中國自己的女拖拉機手，才會更具親和力及說服力。中國東北是全國最早實行農業機械化的地區，地勢平坦，適合機耕，欲從中尋得與塑造女拖拉機手的典型，並非難事。1950年，中共即轟轟烈烈地推出中國的第一位女拖拉機手梁軍(1930-)。貧農出身的梁軍，是黑龍江省明水縣人。1947年，進入德都縣萌芽鄉村師範學校半耕半讀。她看了蘇聯電影《她在保衛祖國》之後，欽佩與羨慕劇中主角巴莎會開火犁，且能開坦克，從此便夢想當拖拉機手。1948年2月，她報名參加黑龍江省北安拖拉機手訓練班。在七十多名學員中，只有梁軍一名女性。最初機師不肯教她，理由是開拖拉機會弄得全身髒兮兮，不適合女性。許多男同學也在旁嘀咕：「女人還來學開火犁啦！」他們都不贊成收女學員，認為女人不能學習這種男性才能勝任的工作。幸虧校長支持，方得機師首肯；加上她特別認真學習，不辭艱苦，終於順利完成訓練。1950年6月，梁軍與十一名婦女組成了中國第一支女拖拉機隊。她們感謝共產黨與毛主席讓窮人翻身，從此能夠過著幸福的生活。⁹同年，梁軍當選全國農業勞動模範並參加中國勞模團訪問蘇聯。梁軍的事蹟與形象自然也成了全國主要媒體報導的對象，她的故事被編入教科書，強調農村婦女開始了新生活。¹⁰

此外，中共特別利用訪蘇歸來的農民勞模，回鄉轉述他們的「蘇

⁹ 顧雷，〈女拖拉機手梁軍〉，《人民日報》，1950年1月17日，第6版；〈英雄模範代表們上書毛主席〉，《人民日報》，1950年10月4日，第3版。

¹⁰ 〈女拖拉機手——梁軍與她的助手〉，《人民畫報》，1950年第2期封面；高盧，〈女拖拉機手梁軍〉（漫畫十幅），《新中國婦女》，1950年第6期，頁2-3；梅青，〈和女拖拉機手梁軍見面〉，《中國少年兒童》，1950年10月30日，頁18-19；宋雲彬等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1，頁70-74。

聯經驗」，以現身說法的方式來增加宣傳的說服力。據一位東北合作化時期的勞動模範回憶，凡是參觀過蘇聯集體農莊的農業勞模們，「個個都羨慕死了那天天喝牛奶吃麵包，春種秋收甚至連擠奶都是機械化的農莊生活。」他們回國後，將蘇聯的景象向鄉親們一一描繪，許多原本沒入社的農民都積極加入合作社，減低了中國農業合作化的阻力。¹¹ 女勞模在訪蘇期間，則特別關心與婦女切身的相關問題。女代表之一、河北束鹿縣副縣長田蘊就注意到，每個集體農莊都有很好的產科病房，女莊員生產可休息兩個月，女拖拉機手因工作較重，可以休息三個月。¹² 有位四川女鄉長回鄉後，對鄉親們作報告時說，過去常聽婦女抱怨：「一天三頓茶飯，空了補補縫縫，還要帶娃兒，哪裡還有好多力量搞生產！」因此到蘇聯訪問時，她特別詢問婦女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結果都得到相同的回答：「集體農莊有的是幼兒園、托兒所，你愛把孩子送到哪裡，就送到哪裡好了。至於縫衣服，都有縫紉機；做起來很快，不想做還可以到合作商店去買。……各個集體農莊都有麵包房，婦女們每做一餐飯的時候，只要燒一點菜就行了。有些廚房還有電氣設備，煮一餐飯快得很。」這樣的情景說明了蘇聯婦女不會受到瑣碎繁重家務的拖累，怎會不積極參加勞動？¹³ 這些女勞模的轉述，也等於為中國農村婦女的未來生活描繪出婦女解放、幸福美滿的遠景。

就在官方各式宣傳與女拖拉機手典型的鼓舞之下，各地相繼傳出

¹¹ 張鳴，〈「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收入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編輯部編，《老照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輯18，頁114-117。

¹² 子岡，〈婦女在集體農莊中是個巨大的力量〉，《人民日報》，1952年9月14日，第2版。

¹³ 燕凌，〈只有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村婦女才能徹底解放〉，《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1期，頁8。

當地第一個女拖拉機手的報導。例如，大連的楊桂花，安徽省農墾方邱湖農場的焦天鳳，新疆石河子農場的金茂芳。¹⁴ 他們均克服了教育程度低的困難、村人親友的冷嘲熱諷、外在自然環境的艱難挑戰，毅然決然地走出家門，成為女拖拉機手。

金茂芳栩栩如生地回顧梁軍的形象對她的影響。她說在家看了以梁軍為原型的紀錄片《女拖拉機手》，看到「全國第一代女拖拉機手梁軍從斯大林 80 號上走下來的鏡頭，身材魁梧，臉龐大大的，兩隻眼睛多有神，太陽一照，那樣子就更高大了，跟《西遊記》裡面如來佛在雲端上一樣。她那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我一輩子都記得，就是到我開拖拉機後，我下車子的時候都要模仿她的樣子。」¹⁵ 女拖拉機手的形象能夠和如來佛相提並論，怎會不讓婦女怦然心動？

女拖拉機手典型的出現等於將社會主義新婦女的形象具體化。她與當時中共大力推行的另一位男性新人典型——保爾·柯察金具有共同特質：均聽從共產黨的領導，無私無悔地獻身於黨；均有鋼鐵般的意志，能夠刻苦耐勞，戰勝一切困難；均致力於革命事業與社會主義建設。唯一宣傳內容有別者，乃在於因為性別之異，中共特別突出女拖拉機手典型意味著婦女解放，男女平等。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中共宣傳女拖拉機手，並沒有像宣傳蘇聯英雄保爾那樣積極動員；沒

¹⁴ 丁深，〈女拖拉機手——楊桂花〉，《現代婦女》，1950 年第 8 期封底（6 幅漫畫）；焦天鳳貧農出身，先後擔任村、鄉婦女領導工作；1953 年訓練成拖拉機手，1955 年授予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稱號，1964 年成為全國勞模。《安徽之最》，<http://ahnk.com.cn/jtwh/jtwh-31.htm>（2005 年 12 月 5 日檢索）；田流，〈兩個蒙族姑娘〉，《人民日報》，1952 年 6 月 12 日，第 3 版；秀珍，〈京郊五里店國營農場的女拖拉機隊〉，《人民日報》，1952 年 3 月 8 日，第 2 版。

¹⁵ 〈優秀的女拖拉機手〉，收入張呂、朱秋德編著，《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運故事口述實錄》（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頁 90-91。

有大量利用共青團邀請女拖拉機手舉行演講、座談會等，或在各地廣為開設女拖拉機班；只有少數女拖拉機手曾在大專院校表演開拖拉機，為農機院招攬新生。¹⁶ 究其箇中原因與性別無關，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中國實際環境與發展的限制。

二、婦女勞動實踐與機耕化發展

中共建國之後，官方極力鼓吹男女平等，但在實踐上卻出現矛盾現象。在理念上，男女平等的指標之一是工作上去性別化；在實踐上，卻又重男輕女，甚至強調性別分工。表面上，女拖拉機手的典型似乎證實了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在邀集女航空人員、女拖拉機手、女電車司機座談會上所說的話：「新中國第一批婦女新人物的實踐證明了在今天凡是男人可以做的工作，婦女同樣可以做。」鄧穎超進一步說明中國婦女在中共建國之後的勞動成就：「男女平等的權利，正在逐步實現。……過去很少婦女或者沒有婦女參加的重工業、交通事業、國防建設等方面，也出現了新型的婦女，如女盤鏟工，電車、汽車、火車的女司機，女航空員及跳傘員等等」，在國營農場中也出現了女拖拉機手和女場長。她們為中國婦女開闢了參加祖國建設的寬廣道路。¹⁷ 這些社會主義新婦女勇於進入傳統男性的工作領域，不但展

¹⁶ 1952年的五一勞動節之後數天，全國總工會安排來北京參加慶祝大會的勞模到各地參觀，其中包括在清華大學校園看梁軍開拖拉機的表演。據梁軍說，這樣的表演是為招生。訪問梁軍，哈爾濱，2004年8月2日；李霞影，〈幸福的回憶——紀念毛澤東誕辰110週年〉，《江南大學報》，<http://www.jnrain.info/indxb/83wenxue.html>（2004年8月2日檢索）。

¹⁷ 〈全國民主婦聯邀女航空人員等座談〉，《人民日報》，1952年3月15日，第1版；鄧穎超，〈新中國婦女前進再前進——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週年而作〉，

現了勞動的光榮偉大與男女平等。同時也說明了婦女唯有從事積極又自覺的勞動，才能享有幸福美滿的生活。官方再三申明婦女必須先有經濟獨立，才能在政治、文化、社會和家庭各方面和男人一樣獨立，而達到真正的男女平等。¹⁸從這些談話可以看出，中共試圖以婦女的經濟獨立與去性別化的工作來彰顯男女平等的理念。

不過，在實踐男女平等這個理念的同時，中共也設定了一個關鍵性的前提：婦女勞動要「事事從國家需要，從集體利益著想。」婦女眼中應該只有黨國的利益，沒有個人前途、榮譽和報酬的盤算。¹⁹換言之，新中國的婦女典範，除了要走出家門，熱愛勞動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服從黨的領導，聽黨的指揮。有了這樣的前提，中共可以視實際情況的需要，隨時「調控」婦女進出勞動場域。

正因為有上述的前提，中共在處理婦女出外勞動的工作問題時，會出現先男後女與性別分工的現象。中共剛取得政權之際，其實並不特別鼓勵女性進入職場。這是因為國共內戰結束後，中共立即面臨安置復員軍人的問題。即使其後有三年的韓戰，但戰事於1952年終止後，問題依舊。在城市裡，如何安排復員軍人的出路與日益增多的高小以上畢業生就業，已經令有關當局十分頭痛。男性勞力既已過剩，若再鼓勵婦女出來就業，無異雪上加霜，失業問題會更加嚴重。因此，中共透過各種管道，安置無業男性，並鼓勵高小以上畢業生回鄉或下鄉上山。勞動部長馬文瑞聲稱，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嚴重失業問題1956年已基本解決，城市中間散的男性勞力已極少。姑且不論馬文

《人民日報》，1952年9月24日，第2版。

¹⁸ 〈社論：用新的勞動態度，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祖國〉，《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2期，頁6-7。

¹⁹ 〈熱愛勞動是社會主義的高貴品質〉，《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4期，頁4-5。

瑞所謂的已經解決失業問題是否屬實，他也不諱言若干城市的閒散勞力有 90% 以上是婦女。²⁰ 由此可見，官方所謂已經解決失業問題指的是城市男性的工作問題，婦女的就業問題並不在官方考慮之內。馬文瑞勸告那些已經接受官方宣傳，認為不出外工作就是恥辱的婦女，應該耐心等待國家的安排，或從事無償的義務工作或社會勞動。正因為要解決男性就業問題，馬文瑞向婦女喊話：「家務勞動也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搞好了家務，對黨的勤儉持家的號召身體力行，同樣是光榮的。對有子女的人說，家務勞動的責任還是很重大的。使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能安心的工作和學習，也是對革命的貢獻。……一個有覺悟的同志，應當從如何對革命事業有好處來考慮問題，來解決個人與集體的關係。」²¹ 這等於是說婦女應以家庭為第一優先，出外就業是男人的事。馬文瑞這番談話，將原來官方重視的就業去性別化，反而變成傳統的性別分化：男主外，女主內。可見官方處理就業問題的原則是：先城後鄉，先男後女。因此，凡是具有「政治正確」觀念的城市新婦女，都應該欣然接受黨對勞力需要的調控與指揮。

同樣地，官方對待農村婦女勞力的態度，一如城市，需要接受黨的調控。中共主張在勞力缺乏地區，應該發動和組織婦女參加農業和其他生產勞動，沒有勞動習慣的也要養成勞動習慣。在勞力過剩的地區，則發展婦女從事林牧漁業和手工業，鼓吹飼養家禽家畜等是最適合婦女的工作；這樣的態度，無異又回到傳統的男耕女織的性別分

²⁰ 馬文瑞，〈進一步地解放婦女勞動力〉，《勞動》，1958 年第 15 期，頁 4。據蔣永萍研究，1949-1957 年屬於中國城市婦女不完全就業期。蔣永萍，〈50 年中國城市女性就業的回顧與反思〉，收入李秋芳主編，《半個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頁 152-162。

²¹ 馬文瑞，〈關於幹部下放進行勞動鍛鍊和參加基層工作的問題〉，《勞動》，1958 年第 1 期，頁 8。

工。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50年代的陝西為了增加棉花產量，省委與省婦聯特別強調棉花豐產與棉田管理乃是最適合婦女特質的工作：婦女的心細手快，更能符合棉務工作與管理的繁瑣與細緻。這樣的強調是鮮明的性別分工：粗重的種棉與拔棉桿由男性擔任，細密的摘棉與棉田管理完全由婦女擔任。²²

再者，由於農村支援婦女出外工作的配套措施嚴重不足，中共必須特別強調婦女不能因為參加生產而置家務於不顧。「參加生產是光榮的，擔負家務勞動也是很必要的。」在1950年代初期，即便大城市如上海都有托兒設施不足的問題，遑論落後的鄉村。有關當局只好再三呼籲農村婦女不可輕忽家務和養兒育女的責任。官方提出解決家事與農務衝突的辦法是：「農閒與天雨時，準備好全家衣服鞋襪；農忙時，從事農業勞動。」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廢。²³官方並沒有建議農閒期間男性也應該分擔家務，也就是說家務仍是女人必須、也應該承擔的「份內職責」。這樣的思維與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如出一轍。蘇聯實施工業化之後，高層領導感到勞力的短缺，因而促使婦女參加勞動生產逐漸由理論走上實踐。不過，即使蘇聯比中國進步，蘇聯政府能夠提供婦女減輕家務負擔的支援依然十分短缺。既然國家經濟發展必須依賴婦女勞力，因此斯大林時期的政策一直強調家庭與工作可以兼顧，並且這個政策是不容挑戰的。²⁴

除了中共官方實際上對農村婦女勞動的實踐有性別分工的傾向之

²² 高小賢，〈「銀花賽」：50年代農村婦女與性別分工〉，《社會學研究》（北京），2005年第4期，頁153-171。

²³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關於當前農村婦女工作的指示〉，《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8期，頁3。

²⁴ Gail Warshofsky Lapidus, *Women in Soviet Society: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119.

外，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傳統觀念，也是阻礙婦女出外勞動的原因之一。例如，安徽廬江縣的婦女向來不參加生產，偶然下田，就被譏笑。有一婦女下田幹活，天忽然下雨，有人就說是因為婦女下田的關係。這位婦女被說得滿臉通紅，以後再也不肯下田。另有婦女想參加生產，卻因配套措施不足，沒人帶小孩，地方幹部不幫忙解決，而無法出外工作。²⁵ 類似之例，不勝枚舉。自然，中國幅員廣大，婦女參與勞動的地域性差別極大。東北土地多，當地婦女參與勞動的比例要比南方婦女多。據官方統計，1949年東北全區參加農業生產的婦女佔女性勞力的60%，1952年達到80-90%。其次，中國農村經過連年戰爭，即使有勞力不足的問題，由於傳統觀念作祟，農村婦女出外從事的工作仍以非技術性、非重體力的工作為主。1952年，隨著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展開，全國約有30-40%的婦女參加了農業互助組的生產。²⁶ 中共則期望從1956年開始，在七年之內，要求農村男子全勞動力每年至少做250個工作日；並積極發動婦女參加農業和副業生產的勞動，在七年之內，要求農村女子全勞動力每年不少於120個工作日。²⁷ 由此可見在大躍進之前，農村婦女出外勞動的比例仍低。

大躍進時期，中共號召全民辦工業、興水利，使得全國勞力頓呈明顯短缺。就在勞動部長鼓勵婦女回家以疏解就業市場壓力的四個月之後，官方又出現鼓勵婦女出外工作的論點。首先，《勞動》雜誌刊

²⁵ 〈讀者來信〉，《人民日報》，1952年10月29日，第2版。

²⁶ 黃西誼，〈中國當代社會變遷中農村婦女經濟身分的轉換〉，《社會學研究》（北京），1990年第6期，頁62。

²⁷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人民日報》，1956年1月26日，第2版。

登了列寧認為婦女解放需從家務解放開始的文章。列寧相信男女平等，不應該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應該要使婦女獲得經濟和社會上的平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該讓婦女成為家事的俘虜。若將婦女只侷限在做飯和照顧小孩等家務上，會讓他們變笨與受人鄙視；而國家辦理公共食堂和托兒所就是要逐步解除婦女成為家庭的奴隸。²⁸《勞動》引用列寧的觀點，等於是間接駁斥了馬文瑞先前要求婦女以家庭為重的論點。

接續列寧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婦女若能從家務勞動中得到解放，則可以解決農村在合作化後勞力不足的問題。有些地方或許在一時之間仍然勞力過剩，那是因為還沒有擴大生產規模、沒有進行多種經營、耕作還沒精緻化之故。毛高喊「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²⁹因為大躍進的需要，毛澤東要積極開發婦女這項人力資源，鼓勵婦女投入生產建設，乃是為形勢所迫、必須解決全國勞力不足問題之故。

當時由於大批男性被抽調去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使得無論是城市或農村的婦女均大量外出勞動。由於城市的大規模招工，眾多農民進城工作，農村婦女或出於志願，或迫於現實因素，從事農活者亦眾。據估計，大躍進期間一般婦女參加田間工作的勞力佔總勞力的60%。³⁰也就在這個時期，「鐵姑娘」一詞開始頻繁地出現在《人民

²⁸ 1958年中共對婦女政策的轉折，見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頁172-174；〈列寧論解放婦女勞動力〉，《勞動》，1958年第15期，頁2。

²⁹ 〈毛主席論解放婦女勞動力〉，《勞動》，1958年第15期，頁3。

³⁰ 俞小波，〈婦女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力量〉，《人民日報》，1960年3月8日，第7版。

日報》。早在 1950 年代初，即可零星看到官方以「鐵姑娘」形容那些進入傳統男性職業場域的婦女先鋒；她們沒有傳統姑娘的柔弱形象，而是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勇於打破傳統保守思想的新女性。³¹ 當時「鐵姑娘」一詞，強調的是新舊婦女的對照，而且多半是個案。到了大躍進時期，官方宣傳「鐵姑娘」事蹟，除了讚揚婦女勇敢且熱烈地投入生產之外，這個名詞所代表的工作去性別化意味也漸漸明顯。

文化大革命期間，報章雜誌所報導的「鐵姑娘」已不再是零星個案，而是成群結隊、風起雲湧地在各地出現，因而成為文革時期的一種特殊現象。³² 這些鐵姑娘隊的出現，似乎具體實現了過去中共官方宣傳的男女平等，工作去性別化。特別是當毛澤東登高一呼「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可以撐起半邊天」、「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更將婦女可以擔任男性所做的任何工作的觀點推展到極致。官方強力宣傳「鐵姑娘隊」想要傳遞的訊息是：生理不是決定一切的條件，人的努力與意志可以克服所有客觀的限制，婦女可以在體力與智力上與男性平等。實際上，這些訊息所反映的卻是女性的價值由男性的標準來衡量。³³ 當時幾乎所有的鐵姑娘隊成員都年輕未婚。有些隊伍的形成是婦女響應官方宣傳的回應，但也有很多不是自發性的組成，而是因為某些工作男勞力不足，只好組織婦女

³¹ 常瑞敏，〈「三八」婦女測量隊在成長中〉，《東北婦女》，1953 年 4 月（結束號），頁 7-9；〈評論：打破婦女不能幹這幹那的保守思想〉，《勞動》，1959 年第 1 期，頁 15。

³² 根據金一虹的調查，幾無婦女自發組成的鐵姑娘隊，鐵姑娘隊也不像官方宣傳或人們想像的那麼普遍。〈「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頁 181。

³³ Emily Honig & Gail Hershatter,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4.

去做。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女的在第一線的居多，男的反面像蔥花般的點綴。³⁴ 以數量而言，鐵姑娘大隊其實只佔全國婦女的極少數，她們卻是國家宣傳機器的重要樣板。文革時期婦女參與勞動生產的數量究竟是多少，因為十年動盪而統計數字付諸闕如。

文革時期常見諸報端「鐵姑娘隊」的有女子採油隊、鑽井隊、帶電作業班、架橋班、女子搬運班、雷鋒女子民兵班、拖拉機班、鋸木隊、海洋採殖班等。為了彰顯中國工業發展的進步，與農業相關的拖拉機班雖列名其中，卻不是官方宣傳的焦點。這比起 1950 年代初轟轟烈烈地宣傳女拖拉機手，1960 年代的女拖拉機手班宣傳反而像陪襯，當然這與中國農村機械化發展的遲緩有關。

1955 年夏天，毛澤東曾估計全中國要完成基本農業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至五個五年計畫，即 20 至 25 年時間。³⁵ 換言之，他期望在 1980 年左右，全國能夠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達到「耕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的境界。事實上，心比天高的毛澤東對中國實行機耕的期望與現實情況有極大的落差。據官方統計，1957 年全國機耕面積只有 2,636 千公頃，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 2.4%，當時人拉犁耕地或開荒的情形仍十分普遍。大躍進時期的農村發展重點之一在於改良傳統農具，可見離農業機械化的理想仍相當遙遠。1962 年，全中國才有 8.1% 的面積機耕化，1965 年為 15%，1980 年為 41.3%。³⁶ 目前

³⁴ 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頁 183-184。

³⁵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 年 7 月 31 日）〉，收入《毛澤東文集》，卷 6，頁 438-439。

³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市場信息司編，《中國農村經濟統計資料，1949-1996》（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頁 212。另一組數據為 1957 年只有 1.64%，1965 年有 13.5%。見武少文主編，《當代中國的農業機械化》（北京：中國社會

我們無法得知這些數字如何估算而來，是否準確，不過高估的可能性大於低估。即便是高估，中國到了1980年，全國最多也只有約五分之二之的機耕地。換言之，毛澤東在大躍進之前，對全國機耕化的估算，實有冒進之嫌。

倘若考慮到中國工業基礎比蘇聯還要薄弱的情況之下，毛澤東的估計更是大冒進。蘇聯在1930年代實行農業集體化，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整合支離破碎的土地，以利機耕。蘇聯快速工業化的成功，使其在機械製造與燃料取得較為容易。即便如此，蘇聯在收割、播種等近乎全面機械化，則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亦即建國接近五十年才告完成。³⁷ 其次，蘇聯地勢平坦遼闊，適合機耕。反觀中國地形則是北部平原廣，南部丘陵多。中國除了北大荒、新疆、內蒙等各地國營農場有大塊耕地之外，其餘農地大多為小塊或丘陵起伏的水田。而且中國水稻種植面積雖只佔全國糧食面積的四分之一左右，產量卻約佔糧食作物總產量的一半，其中90%以上稻穀集中在不適合於機耕的南方及長江流域。1950年代初期的機耕，多使用蘇聯製適用於旱地耕作的大型拖拉機，不適合用於水田。無論是履帶式或輪胎式拖拉機，特別是輪胎式拖拉機到了水田，容易深陷泥漿，往往動彈不得，或者壓溝嚴重，造成田面不平；加上行駛時泥漿四濺，操作困難。機器若受到泥水侵蝕，又會嚴重磨損，甚至停擺。中國在1950年代後期，雖然成功地改良了適合水田耕種的輪式拖拉機（特別是葉片式驅動鐵

科學出版社，1991），頁297、302。兩書都沒交代這些數據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到了文革後期，中共領導心知肚明中國不可能在「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因此，在1979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王任重宣布停止使用這個口號。

³⁷ СССР.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蘇聯：農業), <http://dic.academic.ru/dic.nsf/bse/129091/%D0%A1%D0%A1%D0%A1%D0%A0> (2014年10月14日檢索)。

輪)，³⁸但是這種大型輪式拖拉機碰到小塊耕地，機器的轉彎倒退次數較多時，會造成空轉的時間多，邊角地也不易耕到。手扶拖拉機雖然輕巧，移動方便，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但手扶拖拉機使用也十分費力，而且直到 1963 年底，手扶拖拉機還在試驗階段。³⁹何況即使解決了拖拉機本身的問題，零件、機械製造與燃料供應等也經常發生問題，這也和中國工業化程度低有連帶關係。拖拉機常常或因缺乏燃料、或因零件不齊、或因維修不善而停擺。同時，由於農村一般缺乏運輸工具，當時卡車價格太高，政府發給或補助購買的拖拉機，在全國許多地區用在運輸的時間往往超過用在農田耕種的時間，造成很大的浪費。上述種種均是阻礙中國機耕化的重要因素。

有了拖拉機，還需要人來駕駛。中蘇兩國最初宣傳女拖拉機手主要是政治上意識形態的考量，數量多寡反而不是重點。蘇聯即使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農村出現勞力短缺，女拖拉機手人數依然不多。一直要到二次大戰爆發，男人都上前線打仗，婦女必須承擔所有農活時，女拖拉機手的數量才開始竄升。1935 年，蘇聯有女拖拉機手 19,000 人，到 1940 年是 64,000 人。因為戰爭的關係，參加拖拉機手訓練課程的女性由 1940 年的 8.5% 驟升到 1942 年的 51%。1943 年更升到 54%-57%，這是最高峰。戰爭結束後，女學員人數就開始急劇下降。到 1947 年初只有 17.4%，1949 年僅有 5%。從 1945 到 1949 年，拖拉機班學員已經是男性佔絕大多數。蘇聯農業部為挽回女拖拉機手的急劇流失，在 1951 年甚至頒布特別法令，要求拖拉機站的訓

³⁸ 李連斌，〈拖拉機實行多種作業——記江西省水田機械化的經過〉，《人民日報》，1958 年 4 月 23 日，第 2 版。

³⁹ 鄧卓榮、馮悟初，〈我國水田地區拖拉機的探討〉，《人民日報》，1964 年 11 月 4 日，第 5 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A38-2-694，頁 44-48。

練班至少需有 30% 成員是女性，但此舉無濟於事。到 1954 年蘇聯全國只有 2.4% 的拖拉機手是女性。⁴⁰ 1959 年蘇聯政府廢除拖拉機站，並將設備與人員轉到集體農場時，女拖拉機手和女收割機手一共只佔全國農機手的 0.7% (17,000 位)。⁴¹ 簡言之，二次大戰之後，無論蘇聯政府如何大力宣傳女性要履行他們的愛國義務，並提供比過去優厚的福利措施，都無法吸引婦女踴躍當拖拉機手。到 1978 年全蘇聯的 400 萬個農機員中，女性只有 24,000 人。⁴² 換言之，到了蘇聯農業基本上全面實施機耕化之後，女性農機人員只佔全部人數的 0.6% (千分之六)。

中國在 1949 年之後，女拖拉機手的數量從來沒像蘇聯那樣曾經達到舉足輕重的地步，而一直是微不足道。中國不像蘇聯那樣曾因戰爭關係，導致農村男性勞力嚴重不足，而需借重女拖拉機手耕種。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地形差異，加上全國農機化程度低，女拖拉機手比例遠遠不及蘇聯。據不完全統計，1957 年全國大中型拖拉機（混合台）約有 14,674 台。⁴³ 目前找不到當時全國拖拉機手總數，只能作大致推算。假設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全數拖拉機都能使用的話，每台拖

⁴⁰ Ю. В. Арутюнян, *Механизаторы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в 1929-57 гг.* (蘇聯農機人員，1929-1957)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0), с. 59-60, 68-69, 115, 301.

⁴¹ *Итоги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59 года СССР* (1959 年蘇聯人口普查總結) (сводный том綜合卷) (Москва: Госстатиздат, 1962), 表 45-46, с. 159-160.

⁴² “Праздник, рожденный трудом,” (勞力產生的節日) *Крестьянка* (農婦), № 5 (1978), с. 6.

⁴³ 1962 年有 54,938 台；1965 年有 72,599 台。《中國農村經濟統計資料，1949-1966》，頁 197；1985 在國營農場共有 64,183 台，頁 158。另一數據，1950 至 1957 年，共進口拖拉機 16,750 台。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農業機械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 21。

拉機配置兩名拖拉機手（一般至少兩名，不論性別），那麼最保守的估計，全國約有三萬名左右的拖拉機手。而據婦聯的統計數字，1957年全中國的女拖拉機手只有400人。⁴⁴女拖拉機手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據梁軍說，她男女徒弟的比例是20:1。⁴⁵姑且不論梁軍的記憶是否有誤，可以肯定的是男女比例極為懸殊。大躍進之前，婦女出外工作的比例偏低，女拖拉機手人數簡直就像撒蔥花一般的點綴。

1961年初，陸定一估算中國要根本解決農機化時，需要農機駕駛員184萬人。⁴⁶但是直到1965年底，國營機械站的職工才只有15.6萬人，其中有8.8萬名的拖拉機手。⁴⁷而拖拉機手只是農機人員其中的一種，即使將機械站所有職工均算是農機人員（其實機械站還有行政人員），全國農機手最多也只有陸定一估算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想見女拖拉機手人數更少。以安徽碭山縣為例，在1970年代初，全縣有2,800多個鐵姑娘隊，參加婦女達32,000多人，其中也只有女拖拉機手48人。⁴⁸因此，我們可以說直到文革結束，女拖拉機手對於中國提高經濟生產的貢獻十分有限，官方宣傳女拖拉機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考量。

⁴⁴ 〈人民代表集中批判右派分子 揭露野心家們企圖奪取對知識分子的領導權〉，《人民日報》，1957年6月29日，第1版。

⁴⁵ 訪問梁軍，哈爾濱，2004年8月2日。

⁴⁶ 陸定一，〈農業中學創辦二週年〉，《人民日報》，1960年2月27日，第4版。

⁴⁷ 武少文主編，《當代中國的農業機械化》，頁302-303。

⁴⁸ 〈把婦女優秀分子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 碭山縣各級領導班子中都配備了一定數量的女幹部 上海益民食品四廠從工人中選拔的一批女幹部成長很快〉，《人民日報》，1973年3月15日，第1版。

三、女拖拉機手的工作與實際生活

研究農村問題最困難的是，很難找到農民自己所寫的文字資料。到底農村婦女如何看待中共宣傳的女拖拉機手，目前資料欠缺，難以得知。倒是在文革初期，中共曾經引發一場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潮。大批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眾多女青年亦加入這個行列。⁴⁹ 從許多女知青的回憶錄可以得知，中共對城市女性的宣傳相當成功。許多城市婦女最嚮往的工作之一就是成為神氣、能幹又浪漫的女拖拉機手。她們自然不能代表所有農村出身的女拖拉機手的聲音，而且連女知青自己對農村生活的看法，也都必須審慎對待。⁵⁰ 不過，這些女知青畢竟留下較多文字資料，可以讓人對於女拖拉機手的工作與生活窺豹一斑。以下的敘述，主要以女知青的經驗為主。

在一個講究階級成分、政治背景的社會，要成為一個拖拉機手需要具備相當條件，不是任何人想當就能當，特別是在政治路線激進的時候。有關當局選擇拖拉機班學員的主要標準是成分好，最好是貧下中農或工人子弟；而且要「政治可靠，身體健康，有一定文化」。不過，即使階級成分不錯，往往也需要群眾推薦，領導考核等等，才能

⁴⁹ 第一波在1950年代中期，第二波先後有兩百多萬城市青年到國營農場參加開發建設。詳見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一九五三——一九六八年）》；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一九六六——一九八〇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⁵⁰ 女知青對下鄉插隊生活的回憶和評價，與她們返鄉後的社會地位關係密切。詳見Nora Sausmikat, “Resisting Current Stereotypes: Privat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Former Rusticated Women,” in Woei Lien Chong, ed.,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p. 255-283.

如願。⁵¹ 如果階級成分不好，那就更須努力表現，得到黨的認可，才能被錄用。

官方宣傳女拖拉機手典型，強調的是婦女解放，勞動偉大，為黨、為集體作出犧牲奉獻，較少提及物質獎勵。但是中共所標舉的典型人物，都有一夕成名的機會；可以從原本籍籍無名的地方小民，一躍而成各大報刊爭相報導的全國性人物。其次，還有可能如梁軍等人那樣，得到出國訪問、進修或是成為幹部的好處（即使並非必然如此）。這些榮譽與種種可能得到的實質好處，對許多女青年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也是她們紛紛夢想成為女拖拉機手的因素之一。事實上，希望成為女拖拉機手的動機自是五花八門，可以多種理由並存。有的可能是受到女拖拉機手典型或英雄主義的激勵；也有人可能是因為官方宣傳中沒有明言的潛在利益所致；有的可能出於私心，只是想出風頭，覺得當女拖拉機手高人一等；有的因為出身不好，希望能以勞動者的身分，爭取政治認同，以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⁵² 還有因為蘇聯電影所引發的浪漫想像——女拖拉機手可以充滿豪情壯志地駕著鐵牛，在一望無際的田野奔馳，而且還可以談戀愛。雖然當時中國觀眾並不知道的是，蘇聯電影中所呈現的富裕與快樂的集體農莊生活，在第一個施行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都沒有真正的實現，更何況相對落後的中國。不過，這也正是共產黨宣傳的厲害之處，總是將未來

⁵¹ 除業務課外，還必須上政治課（時事政治、社會發展、共產主義遠景的教育）。楊清海，〈花園農場的初創年月〉，收入《拓荒者的回憶》，頁 7；房福田，〈艱苦豪邁的開荒生活〉，收入《拓荒者的回憶》，頁 16-17；上海市農委拖拉機訓練班，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A72-2-533，頁 6；巴瑛，〈生命裡的黑土地〉，《北大荒文學》，2009 年第 1 期，頁 47-50。

⁵² 金茂芳原是山東地富子女出身，參軍入疆當女拖拉機手。〈優秀的女拖拉機手〉，收入《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運故事口述實錄》，頁 91。

的生活描繪得彷彿如人間天堂一般，即使那是十分遙遠的夢想，卻予人無限的想像與希望。宣傳中還會特別強調只要透過不斷地努力，並且聽從黨的領導，那樣的生活美景終將到來。

一位女知青生動地描述她從電影中投射出來的拖拉機手工作情形：「穿上整齊的工作服，把頭髮塞進工作帽裡，坐在我們東方紅拖拉機高高的駕駛座上，手握著方向盤，眼睛注視著前方，在寬敞的大道和廣袤的田野上奔馳。多麼英姿颯爽，多麼威風凜凜，多麼詩情畫意。」等到「美夢成真」的時候，這些瀟灑和浪漫的想像，很快地就被髒、累、險、苦的現實生活所取代。女知青在蘇聯電影中看到的女拖拉機手下班後，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等到她親身體驗之後，方才發現拖拉機手的生活竟是終日與機器為伍。機器一開，滿臉熏黑；還得常常檢修機器，幾乎無時無刻總是一身油黑。⁵³此外，坐在拖拉機上也不見得舒服。在炎炎夏季，烈日當空之下，發動機散發的大量熱氣，使得駕駛室像火爐一般；一坐進去往往就是一整天，渾身是汗，衣服乾了又溼，溼了又乾，易長疥瘡。還有飛濺的麥芒、泥土，令人全身發癢，極不舒服。若座艙是開放式的，在冬天會凍得要命；若是密閉式的，竟日呼吸不到新鮮空氣也難受。⁵⁴

其次，女拖拉機手最常睡覺的地方不是床上，而是睡靠在車旁或蜷縮在車裡。農忙耕地，為搶農時，連續出車，數夜不休，幾乎成了農機手的家常便飯。梁軍在還沒收徒弟時，一天兩班，每天至少工作十來個小時。有時候單機黑夜作業，下班不敢回隊，就鑽在麥草堆裡

⁵³ 朝紅陽，〈我是公社的拖拉機手〉，<http://www.xilicun.net/syrg0/Xilicun/Tractor.html> (2014年1月24日檢索)。

⁵⁴ 〈淮河岸邊的女拖拉機手〉，《人民日報》，1972年3月13日，第3版；顧雷，〈女拖拉機手梁軍〉，《人民日報》，1950年1月17日，第6版。

睡覺，到天亮才回隊。⁵⁵再者，農耕之外，又常常得起早摸黑地出車運輸，經歷風吹雨淋日曬，下了日班，又上夜班。拖拉機手往往為了響應國家號召的高額產量，經常提出「歇人不歇車」的口號，結果造成機械沒有定期保養或過度使用，加上路況不佳或疲勞開車，車禍頻繁，⁵⁶拖拉機手非死即傷的情況，經常上演。若遇到天冷嚴冬，更是狀況百出。新疆拖拉機手金茂芳曾在攝氏零下 45 度的氣溫之下，因為機油太稠，拖拉機熄火。她除去手套，用嘴對著管子吸油，結果嘴皮被冰凍的油管粘破了，滿口滿手都是血，她還是繼續吸，直到啟動為止。⁵⁷女拖拉機手也有可能在茫茫戈壁，車燈突然壞了，看不見路，卻碰上一群野狼，只好將自己反鎖在駕駛室一整夜，直到天亮，狼群散去才解危。⁵⁸或是在寒風刺骨的冬夜出車運豬，來回幾百里，身無遮擋又沒有大衣保暖，凍得實在撐不住了，就輪流爬到車上的豬堆裡取暖，豬還不歡迎她們來擠！⁵⁹

以體力而言，婦女駕駛拖拉機，就像開大卡車，特別是碰上某些機型的拖拉機，需要很大的力氣才能啟動，不一定每個婦女在體力上都能夠勝任。⁶⁰其次，男女生理的其他差異也容易造成工作上的困

⁵⁵ 訪問梁軍，哈爾濱，2004 年 8 月 2 日；房福田，〈艱苦豪邁的開荒生活〉，收入《拓荒者的回憶》，頁 21。

⁵⁶ 朝紅陽，〈我是公社的拖拉機手〉，<http://www.xilicun.net/syrg0/Xilicun/Tractor.html> (2014 年 1 月 24 日檢索)。

⁵⁷ 李秀芩，〈文化戍邊：打造屯墾事業的新高地〉，《兵團建設》，2004 年第 2 期，頁 12-13。

⁵⁸ 趙阿華，〈我的父親母親〉，<http://culture.enorth.com.cn/system/2002/12/19/000476240.shtml> (2002 年 12 月 19 日檢索)。

⁵⁹ 張寧，〈我當淮北平原上第一個女拖拉機手〉，《世紀》，1999 年第 1 期，頁 17。

⁶⁰ 金茂芳發動一輛「磨特斯」就需要有 12 公斤的力量去拉，一些重活、危險的活，硬著頭皮也做。〈優秀的女拖拉機手〉，收入《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

擾。例如，有些男機手很難體諒女拖拉機手在生理期的難處。曾有男拖拉機手因為女助手經期請假，便大發牢騷，甚至怠工。⁶¹ 又如，長時間在戶外工作的女拖拉機手，常常需要憋尿。他們若在生理期過度勞累，或常在天寒地凍的情況下工作，均十分容易留下許多伴隨終生的婦女病或職業病。目前找不到關於中國女拖拉機手患病的有系統資料，不過，蘇聯學者對他們的女拖拉機手研究的結果，即或中蘇地形氣候有異，相似的工作性質還是具有參考價值。據蘇聯學者統計，當過一至三年的女拖拉機手，有三分之一的人生病；當了十年左右的女拖拉機手，有二分之一的人生病；十年以上的，則有三分之二的人生病。⁶² 雖然中共在大躍進期間再三強調婦女的工作要貫徹「三調三不調制度」——亦即月經期調乾不調濕，懷孕期調輕不調重，哺乳期調近不調遠；務使婦女在這三期，不下冷水，不做重活，不熬夜。事實上，中共會作這樣的強調，正是凸顯了這種不顧婦女生理期和孕期而工作的情形，已經嚴重到不能忽視的地步。⁶³

女拖拉機手除了需要克服男女生理差異外，還要面對傳統保守觀念或社會規範對女性擔任拖拉機手的許多挑戰。在中國農村，多年來一直還是有「男人不做飯，女人不種地」的觀念。許多男人認為開拖拉機根本「不是女人的工作」；不是因為女性不能勝任，而是因為那是男人才可以做的工作。這樣的心理不但在中國處處可見，甚至到了

人生命運故事口述實錄》，頁 99。啟動東方紅拖拉機也十分費力，不是一般女子的體力能夠勝任。

⁶¹ 李德江，〈我當了生產隊長〉，《新中國婦女》，1955 年第 3 期，頁 11。

⁶² Н. Корина, “О тракторе и о себе,” (關於拖拉機，關於自己) *Крестьянка* (農婦), № 8 (1987), с. 18.

⁶³ 〈人民公社真正好，照顧婦女真週到〉，《勞動》，1959 年第 1 期，頁 18。感謝定宜莊教授對此論點的提醒。

1980年代的蘇聯都還非常普遍。蘇聯男拖拉機手常常對女拖拉機手懷有公開的敵意與輕視，有的甚至暗中破壞女拖拉機手的機器。他們也會與農場經理聯手，分派給女拖拉機手最老舊或破爛的機器，以確保他們無法上場工作，讓她們知難而退。⁶⁴此外，傳統的社會規範有時也會造成夜間出車的障礙。女知青在農村有時享有「特殊待遇」，她們若是和男機手在深夜共車工作，比較不會流言滿天飛。但是若換成農村出身的女拖拉機手，則易引起村人的閒言閒語，以致許多男拖拉機手不願和女拖拉機手共車，也有女拖拉機手因為這個緣故而離職。⁶⁵

再者，黨國宣傳機器經常只是口頭上強調男女平等，真正灌輸尊重女性的觀念並不多。事實上，中共的許多宣傳內容仍夾雜著缺乏性別意識的論述。女拖拉機手置身在佔絕大多數的男機手中，必須更加努力，才能贏得男機手的「尊重、友善和真心的認同」。⁶⁶正因為如此，許多女拖拉機手為了證明自己不輸於男性，常常自願加班，工作更為賣力，結果使得原來已經很長的工時，變得更長，工作也變得更為繁重，⁶⁷也因此使得官方宣傳女拖拉機手刻苦耐勞的形象最後成為事實。

女拖拉機手在工作之外，如何對待婚姻、協調家務，更是必須面對的最大挑戰。絕大多數的女拖拉機手模範都是年輕未婚，如此才能

⁶⁴ Н. Корина, “Наказаны...рулем,” (為方向盤所處罰) *Крестьянка*, № 3 (1987), с. 22.

⁶⁵ 訪問梁軍，哈爾濱，2004年8月2日；紀錄片 *All Under Heaven*, directed by Carma Hinton, 1985。

⁶⁶ 張寧（上海知青），〈我當淮北平原上第一個女拖拉機手〉，《世紀》，1999年第1期，頁17。

⁶⁷ 朝紅陽，〈我是公社的拖拉機手〉，<http://www.xilicun.net/syrg0/Xilicun/Tractor.html> (2014年1月24日檢索)。

無後顧之憂地全力投注於工作。在蘇聯，男拖拉機手屬於技術工人，收入穩定且高，是農村女性爭相結婚的對象，女拖拉機手在婚姻市場上就沒有男拖拉機手這麼吃香。中國亦是如此。據梁軍說，扯後腿反對女性當拖拉機手的多是男人，最主要的是現實考量，因為女拖拉機手很難兼顧工作與家庭。女拖拉機手成婚之後，其家人一般多會阻撓或反對她們繼續擔任這個工作；也有結婚之後自己就不願再做了；也有婚後退居二線，當機車修理工。成婚之後還繼續開拖拉機的婦女，多半是嫁給同行的農機手，畢竟同行的丈夫較能理解拖拉機手工作的辛勞。

女拖拉機手的家務，特別是照顧小孩，主要還是靠上一輩，或請保姆幫忙。梁軍回憶說，有一次她抽空回家探望出疹的兒子，三歲的幼兒看到久未見面的母親時，卻叫她阿姨。⁶⁸ 倘若是沒有後援的女拖拉機手，那就得各顯神通。最悽慘的情況則是由於工作忙碌，不得不將小孩送給別人。1950年代初期，湖南一位女兵響應黨的號召，到新疆參加生產建設兵團；夫妻同是農機手，但因為工作忙碌，無暇照顧嬰兒，只好將兩個月大的女兒，送給了別人。⁶⁹ 這是對中共政權及其所標榜的婦女解放理想莫大的諷刺。過去中共總是宣傳，只有在苦惡封建的舊社會，婦女受到剝削，或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只好忍痛將小孩送人撫養。孰料到了「新社會」，黨國鼓勵婦女積極參與勞動，卻無法提供足夠的照顧幼兒機制，結果依然上演父母與親生骨肉被迫分離的悲劇。

同時，黨與社會對男女拖拉機手也有不同的期望。即使女拖拉機

⁶⁸ 訪問梁軍，哈爾濱，2004年8月2日。

⁶⁹ 趙阿華，〈我的父親母親〉，<http://culture.enorth.com.cn/system/2002/12/19/000476240.shtml> (2002年12月19日檢索)。

手能在技術與體力上勝任這個工作，她還是會被期望扮演其他傳統女性的角色。例如，官方宣傳除了強調梁軍「不僅是勞動婦女學習技術、文化與愛護機器的好榜樣」，而且稱讚她還能在閒暇時間「幫助同志縫補衣服」。⁷⁰ 相比之下，官方媒體只會報導男拖拉機手閒暇之餘鑽研技術，從來沒看到官方表揚男拖拉機手為人縫補衣服！再者，到了農閒時期，男的可以抽煙聊天，女的仍須繼續操勞家務，完全不得休息，家務似乎成了女性的「天職」。類似情形也發生在蘇聯。例如，在沙拉托夫 (Саратов) 地區，官方宣布的是男女拖拉機手工作時間都是夏季十小時，冬季七小時。結果所謂「七小時」，事實上變成從早上七點工作到晚上七點，夏天的工作時間更長。在夏天，男女一樣忙，大家沒話說；到了冬天男拖拉機手休閒時間較多，而女拖拉機手仍得照顧家庭與小孩。⁷¹ 諷刺的是，當中國女勞模參觀蘇聯時，曾經羨慕蘇聯婦女可以在商店裡買到麵包，減少她們做家事的時間。她們不知道的是，這些女拖拉機手卻經常忙得連進麵包店的時間都沒有！還有蘇聯女拖拉機手抱怨她們夏天工作時間那麼長，工作十五年多，從沒有休假過，可以與子女共度暑假；或在九月開學日，快樂地陪伴剛屆齡入小學的子女到校。⁷² 這樣的抱怨也反映出中蘇生活水準的落差。蘇聯工人每年有固定的休假，中國則到文革結束前，休假制仍是聞所未聞。不過，由目前所見資料，儘管中蘇婦女都覺得家事育兒的負擔重，卻未見她們抱怨男人也應該分擔家務。這是否暗示她們認為分擔家務與否，和男女平等的議題無關？

⁷⁰ 高盧，〈女拖拉機手梁軍〉（漫畫十幅），《新中國婦女》，1950年第6期，頁2-3；宋美姪，〈托起巾幗的是黨〉，《中國婦女報》，2001年7月11日，第4版。

⁷¹ Н. Корина, “Наказаны ... рулем,” *Крестьянка*, № 3 (1987), с. 23.

⁷² Н. Корина, “О тракторе и о себе,” *Крестьянка*, № 8, с. 17.

由於資料的不足，無法從各個方面來檢驗婦女成為拖拉機手之後，是否感到男女平等？她們所了解的男女平等意涵又是什麼？前面提到女拖機手艱辛工作的理由之一，是要爭取男機手的認同。這種隱含的不平等，目前所見資料並未多加以著墨。不過，有一項比較具體的指標，可以作為檢驗男女平等的一個面向，而且這個問題幾乎是每位在外工作的勞動婦女都會遭遇到的，那就是男女的同工同酬。

早在 1952 年，山西平順縣西溝村的申紀蘭因為在村裡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當時被譽為「創舉」，還因此被選為全國勞模。⁷³ 在國營農場的女拖拉機手屬於農業工人，他們與城市工人一樣是領薪資的（若是生產隊的農機手則領工分）。但是城市女工都不一定與男工同工同酬，遑論農村。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直到 1970 年代初期，在農村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依然執行不力。我們可以從《人民日報》在 1972-1974 年突然大量報導與強調落實同工同酬的政策，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中共之所以突然在 1970 年代初期特別重視要落實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主要是因為從 1971 年開始，正好是中國進行規模最大的農田水利建設的時候，絕大多數男性勞力均出外參加基本建設，出現農活勞力嚴重不足的現象，要調動婦女的積極性，吸引婦女參與農事，執行同工同酬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⁷⁴ 也只有在同工

⁷³ 申紀蘭雖然爭取到同工同酬，但他在許多方面也是默認男尊女卑。藍村，〈「勞動就是解放，鬥爭才有地位」——李順達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婦女爭取同工同酬的經過〉，《人民日報》，1953 年 1 月 25 日，第 2 版；天和，《紅色人生：勞模申紀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89-118。

⁷⁴ 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頁 192；〈老隊長的方案〉，《人民日報》，1971 年 11 月 29 日，第 3 版；《人民日報》在 1972 年有 38 篇文章提到男女同工同酬，1973 年有 44 篇，1974 年有 25 篇。由於 1973 年展開批林批孔運動，此後各地均將未落實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全歸咎於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

同酬不再被視為單純的經濟問題，而「首先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路線問題」之後，⁷⁵中共地方幹部才會重視，而且大張旗鼓地宣揚。同工同酬實行之後，婦女出勤率果然大大提高。例如，湖南汨羅公社認真執行同工同酬之後，大隊婦女的出勤率由 40% 竄升到 90% 以上。⁷⁶目前找不到直接來自女拖拉機手對於同工不同酬的看法。不過，女拖拉機手也是鐵姑娘隊的一種，其他鐵姑娘隊的觀點多少反映一些看法。一般而言，女知青組成的鐵姑娘隊較多會認為男女同工同酬是理所當然，⁷⁷但也不是所有鐵姑娘都會意識到同工不同酬是個問題。有人覺得工分拿得比男的少，是種「無私奉獻的精神」；也有鐵姑娘認為幹得多，拿得少，才能讓群眾信服。還有人仍認為女人就像窗戶，再大也大不過門；女人再能，能不過男人。她們進而認為同樣工作，男性比女性領得更高的工資是應該的。⁷⁸這些鐵姑娘們對同工是否應該同酬有不同的認知，亦反映對男女平等的解釋因人而異，其差異性之大，有時彷彿光譜的兩極。

平心而論，對城市居民而言，農村的勞動都很辛苦，拖拉機手的工作也不例外。工時長又密集，工作重又累人。連農家出身的梁軍也不諱言，拖拉機手的生活確實辛苦。所以她收徒弟的標準是「身體好，能吃苦，熱愛專業」。⁷⁹問題是又有多少女拖拉機手能夠僅僅憑

⁷⁵ 金繼祖、洪松，〈男女同工要同酬——評農村分配問題上的一種錯誤傾向〉，《紅旗》，1972 年第 2 期，頁 61。

⁷⁶ 〈汨羅公社黨委成員聯繫執行政策中的問題——認真學習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人民日報》，1972 年 8 月 15 日，第 2 版。

⁷⁷ Zhai Zhenhua (翟振華), *Red Flower of China: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oho Press, 1993), pp. 170-171.

⁷⁸ 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頁 193。

⁷⁹ 訪問梁軍，哈爾濱，2004 年 8 月 2 日。

著肯吃苦、熱愛專業，日復一日地度過他們艱辛勞累的歲月？全國婦聯副主席劉清揚曾經批評河北有些農業社設法培養了一批女拖拉機手，但他們同當地駐軍軍官結婚後，就不當了，脫離生產，住到部隊。他們穿上皮鞋和絲綢衣服，坐汽車回家。這樣對農村幹部和農民會有不良影響，也是婦女解放道路上的思想倒退。⁸⁰ 從中共宣傳社會主義新婦女的角度來看，這些婦女的作為在當時自然是政治不正確。但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則完全可以理解。如果劉清揚也曾實際體驗過拖拉機手的工作與生活，她很有可能也會做出相同的決定。

中共給子女拖拉機手的稱譽，含有光榮、亮麗、燦爛之意。官方宣傳報導中也會提及女拖拉機手生活的艱苦和遭遇到的困難。不過，這些困苦都意味著一種必要的歷練，是成就新人不可或缺的經驗。所以，即使女拖拉機手有一時的頓挫或消極的思想，最後總會在毛主席偉大思想的鼓舞與黨的領導下，堅持到底，克服困難，完成任務。曾有女知青回憶，她是用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為精神支柱，咬牙撐過生活的簡陋、工作的艱困。⁸¹ 這當然是一個可能的原因；也可能有其他如為勢所迫、經濟問題、勞力不足等實際因素而必須苦撐下去，比較細緻的圖像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1990年1月，中共頒令禁止婦女從事重體力、井下、野外作業，拖拉機手的工作亦在被禁之列；俄國在1992年1月也明令禁止婦女從事類似工作。中俄兩國立法禁止婦女從事重體力工作，或許意在保護婦女，但這是否又落入同一窠臼——婦女的就業仍是由國家代為

⁸⁰ 劉清揚也是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河北省人民代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統戰部繼續召開的座談會上 提出尖銳批評和改進工作的積極建議〉，《人民日報》，1957年5月16日，第4版。

⁸¹ 張寧，〈我當淮北平原上第一個女拖拉機手〉，《世紀》，1999年第1期，頁17。

決定？婦女的自主權又在哪裡？共產黨高唱在革命成功之後，婦女就能當家作主，實際上卻一直是黨國在為婦女當家作主。男女平等的意義之一，應是男女對工作都有同樣的選擇權。若要婦女從事傳統男性工作或重勞力的工作，應該先問婦女願不願做，由她自己選擇決定要或不要，而不是由國家代為決定。

四、小 結

中蘇兩黨以宣傳女拖拉機手，作為昭示男女平等的一種表現；然而女性還是有傳統的角色和任務需要完成。對女拖拉機手而言，除了工作本身與傳統觀念的挑戰之外，她們面臨最大的難題是家務與工作的協調。這一點中蘇皆然。同樣的新人如蘇聯保爾·柯察金，或其他男性勞動模範，官方宣傳焦點是要效法他們為革命、工作獻身的精神，卻沒要求這些男性新人的典型，同時也需要照料家務與家人，或者頌揚他們在閒暇之餘，還會為人補衣等「婦女美德」。其次，成為社會主義新婦女有一個最關鍵的前提：必須服從黨的領導。當黨的意志實際上體現的是男性價值時，男女平等的概念往往淪為共產黨操弄婦女，使其符合黨國利益之下的工具。由於中蘇兩國對社會主義新女性的要求，其實還是以男性價值為標準；因此新人的性別是男性，是 new man，而不是 new person。

中蘇兩國同樣基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提倡婦女解放，加入勞動生產。蘇聯最初是基於政治上意識形態的需要，⁸² 而不是實際情況的

⁸² Gail Warshofsky Lapidus, *Women in Soviet Society: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pp. 97-98.

考量，鼓勵婦女成為女拖拉機手。一直要到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蘇聯當局方才開始積極地宣傳女拖拉機手。二次大戰使得女拖拉機手的人數急劇竄升；戰後則人數一路下滑。從政府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蘇聯當局推廣女拖拉機手基本上算是成功的；蘇聯婦女在國家農業最需要人力的時刻投入生產，貢獻不可抹滅。反觀中國，女拖拉機手自始至終人數極少，而且絕大多數集中在全國有限的國營農場，政治宣傳意義遠遠高於實質經濟效益。部分原因固然與中共建國後，沒有發生遍及全國的戰爭（韓戰戰場不在中國境內），沒有像蘇聯那樣有勞力嚴重不足的現象，許多地區反而有勞力過剩的問題；另一重要原因乃是中國的機耕化條件遠遜於蘇聯。中共藉著宣傳女拖拉機手，相當成功地塑造出一個農業機械化與婦女解放的新人形象。許多城市知青年嚮往成為女拖拉機手，即為明證。然而，當她們「美夢成真」之後，方知實際生活與官方宣傳有很大的落差。

若是從男女平等的實踐角度來看，中蘇兩國推廣女拖拉機手的經驗，均以失敗告終。因為拖拉機手的工作辛苦，連蘇聯男拖拉機手仗恃技術在身，都是一有機會就到城市另謀高就，從事薪水更高、工時固定的工作；遑論需要克服生理問題，又需照料家務的女拖拉機手。他們在經濟允許，又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往往寧願留在家中或從事其他職業，而不願擔任這種勞苦、易受男機手排擠又難以兼顧家庭的工作。⁸³ 中國的女拖拉機手未嘗不是如此。另一方面，女拖拉機手與其他鐵姑娘隊的典型，在改革開放時期備受批評。許多人認為那是過去極左政策下的產物，當過鐵姑娘隊的成員也認為必須重視男女生理的差異，這些重體力或危險的工作對婦女健康的斲傷太大，而反對婦女

⁸³ Н. Корина, "О тракторе и о себе," *Крестьянка*, № 8, с. 17-18.

再從事類似工作。⁸⁴ 這樣的看法其實也展露了男女平等與工作去性別化之間的緊張關係。中蘇兩國主政者先後在 1990 年代初，以國家權力禁令婦女擔任拖拉機手，雖有保護女性之用意，卻也是種對婦女職業自主權的干涉。

關於婦女職業自主權問題所引起的廣泛討論，出現在文革結束之後。1980 年代，中國大陸開始出現「婦女樂於回家」的論調。這個論點緣起於天津郊縣大邱莊的婦女，在家庭經濟不虞匱乏的情況下，紛紛辭工回家，當個快樂的家庭主婦。這可以說是對毛澤東時代極力鼓吹婦女走出家門的反動，令人感到彷彿「一覺回到解放前」。毋庸否認地，毛時代大力提倡婦女投入生產，婦女出外工作的比例大為提高，使得婦女不再圍著鍋爐轉，能夠將自己的能力貢獻於社會，這可以說是一種進步。1988 年元月起，《中國婦女》雜誌即以此為主題，廣邀讀者，展開關於「女人的出路」的辯論，歷時一年。大家討論改革之前的婦女解放是否是真正的解放？婦女是經濟改革下的犧牲品，還是獲益者？女人的最佳出路是回家，還是就業？綜合讀者所表示的意見，歸根究柢的問題是：什麼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什麼才是真正的婦女解放？答案見仁見智。大多數的婦女仍傾向於出外工作，但是托顧幼兒的設施不足，往往讓他們面臨工作和家務蠟燭兩頭燒的情境。編輯部沒有做出最後總結，但也透露婦女應該有自己選擇生活的權利。⁸⁵

⁸⁴ 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頁 188。

⁸⁵ 曾俊花，〈我寧可不要這種解放〉，《中國婦女》，1988 年第 4 期，頁 9；馬麗珍、宋美婭，〈要緊的，是選擇生活的權利〉，《中國婦女》，1988 年第 6 期，頁 15；〈信稿摘登〉，《中國婦女》，1988 年第 9 期，頁 17-19。

事實上，如何協調家務與工作的衝突，是全世界婦女經常共同面臨的難題。雖然計畫經濟與政治宣傳下的性別議題與男女平等，並不一定比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為劣。但是正因為共產黨不斷宣傳與強調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婦女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實現男女平等，自然可以要求檢驗是否果真如此？如本文所示，共黨治下婦女的出外就業，還是受到黨政策的強勢操作與調控。黨在處理婦女就業的問題上，往往並非從婦女個人的意願出發，而是從黨的利益和黨的需要出發，這與男女平等意含尊重婦女的自主權，兩者之間仍然存在頗大的距離。

結 論

一、中蘇新人的差異及斯大林模式的討論

本書各章闡析中共學習蘇聯，宣傳新人觀；利用小說、教科書、電影、歌曲、勞動模範等媒介，希望能塑造「人民」，也就是中共所謂的新人。中共對新人的要求是，能夠站穩階級立場，以集體、黨國為重，發揚勞動光榮的精神，實踐男女平等。中蘇兩黨對於新人的基本核心價值並無差別。不過，對照新人特質與宣傳內容，會出現值得再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首先，中蘇新人的特質，若作細緻的比較可以看出更多的異同，這裡僅粗略地指出兩點，作為拋磚引玉之用。第一，蘇聯和中國的新人典型均介於虛實之間；斯塔漢諾夫與郝建秀的成功事蹟有很大的成分是建構出來的。其次，保爾雖是小說中的人物，但保爾的若干故事取自於真人生活；雷鋒與歐陽海確有其人，而兩人的言行和事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軍方宣傳部和金敬邁塑造出來的。這些典型同在虛實之間，卻都是官方要推展的新人典型。但是蘇聯的新人有成長與成熟的過程；中國不是過程很短，就是沒有。如保爾有成熟的過程，雷鋒或歐陽海沒有成長過程，彷彿一生下來就是黨的理想典型，無須塑造或改造，反而更難為大眾所效法。第二，蘇聯和中國都強調新人要在黨的領導之下成長或成熟。如果新蘇聯人的奮鬥目的與黨的最終目標相合，蘇聯當局不介意新人突出個人色

彩，容許他們的特立獨行，甚至違反紀律。最著名的例子是飛行員契卡洛夫 (Valerii P. Chkalov, 1904-1938)。他非凡的飛行紀錄包括不著陸的飛越蘇聯和飛越北極，兩者原被視為不可能的任務，契卡洛夫的成功不僅表示人可以征服自然，同時也展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他也有未經上級允許，擅自出航的紀錄。¹實際上，蘇聯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存在著矛盾關係。一方面，集體主義的理想是個人成為一個大機器的小螺絲釘，所有的個人為了建設共產主義，和諧且團結地共同奮鬥。另一方面，斯大林的制度又注重英雄式個人的成就，藉以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特別讚揚與鼓勵在運動、文化、飛行和勞動生產有成就的英雄，並給予豐厚的物質獎勵、特權和榮譽。這些人的成就使得國家可以利用他們來動員人民，完成國家所欲達到的目標。²這種英雄式的個人雖然也是社會主義新人的一種，在毛澤東的中國，特別是大躍進以後卻很難為中共當局所容忍。中共會嚴厲打擊具有個人主義特色的錦標主義或類似言行，至少在宣傳上，中國不允許突出個人色彩。³

這裡試從比較中蘇的風俗習慣、國家發展、領袖偏好與觀念之異同，來解釋兩國宣傳新人的差異，進而討論所謂的蘇聯模式問題。中蘇兩國因為傳統風俗的不同，利用群眾歌曲與電影來宣傳愛國觀和愛

¹ 1937年，Chkalov的飛越北極計畫，原定終點站是舊金山，但中途因氧氣供給不足，迫降於美國奧瑞岡。Jay Bergman, "Valerii Chkalov: Soviet Pilot as New Soviet M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1 (Jan. 1998), pp. 135-152.

² Mark Sandle, *A Short History of Soviet Socialism*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9), p. 247.

³ S. A. Smith也認為中共比蘇聯更強調個人必須臣服於集體。見S. A. Smit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08-209.

情觀也出現差異。蘇聯人的感情表達與歐美較為近似，中國人則相對地保守。因此蘇聯在斯大林治下，即使在政治氣候最嚴峻時期，旋律舒緩、近似情歌的歌曲抒情對象不限於黨與領袖，還可以表述個人的愛情，且比例不低。中國的群眾歌曲抒情對象絕大多數只能用在集體，特別是對毛主席和黨的頌揚。再者，蘇聯電影表達愛情的言語或肢體動作（無論是否為俄羅斯民族），都比中國人（包括少數民族）直接和奔放得多。即使在大整肅的高峰和二次大戰期間，蘇聯電影中的愛情場面仍然不少，中國則否。

其次，中蘇處於不同的國家發展階段，而有不同的宣傳重點與文化認同。蘇聯地廣人稀，勞動模範的宣傳重點之一是新技術。中國人口眾多，全民識字率低，沒有勞力短缺問題，機耕化條件不足，因此宣傳勞模運動，難以大力提倡新技術的運用，以免男性失業人口過多，所以女拖拉機手也不能在中國廣為推展。在提高勞模的文化程度上，斯大林期望工農出身的勞動模範不只是識字而已，還要能夠有向上提升的文化素養，擁有資產階級生活品味（如電影《光明之路》的女工用香水、穿洋裝）和文化品味（出席音樂會、欣賞芭蕾、閱讀俄國經典文學）。毛澤東時期的勞模主要在於提高他們的識字程度，但排斥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毛澤東更重視勞模政治意識的提高。這就牽涉兩國領袖的價值偏好與觀念歧異，同時也觸及所謂「蘇聯模式」的問題。

毛時代的「蘇聯模式」，更準確地說，應該稱為斯大林模式。大陸學者對於斯大林模式的定義，各家不一，但都同意其特點之一是黨中央的高度集權。有些學者認為這個模式的背後理論基礎是強調階級鬥爭；1930年代，斯大林將黨內矛盾等同於階級矛盾，造成肅反擴

大化。⁴ 若干中國學者認為，文革後中共實行的改革開放，就是對斯大林模式的否定。⁵ 然而，這些學者所引用的斯大林階級鬥爭談話，都是 1920 年代或 1930 年代初期，亦即農業集體化完成之前對待富農的階級鬥爭，卻不談 1936 年以後蘇聯的轉變（在中國是 1956 年以後）。他們認為中國自大躍進以來政治路線的日益激進化，階級鬥爭越來越厲害，全是受到斯大林模式之害所致。這樣的詮釋與將文革所造成的災難全都歸咎於四人幫，毛澤東無須承擔任何責任，有異曲同工之處。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本書藉由電影呈現的敵我觀，清楚地反映了中蘇領袖對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與階級鬥爭看法的歧異。自從 1936 年頒布憲法之後，斯大林聲稱蘇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蘇聯國內已經沒有階級敵人，因此國內的階級鬥爭也應該隨之消失。但斯大林又補充道，這並不意味蘇聯國內就沒有敵人存在。蘇聯依然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著，外國間諜會向蘇聯後方滲透；同時，在蘇聯已被擊潰的階級殘餘亦非孤立，所有在國內活動的敵人都是外國的代理人，他們得到蘇聯國外敵人的直接支持。階級鬥爭的一端在蘇聯，另一端在資產階級國家，這些階級殘餘會繼續進行垂死掙扎。斯大林主張不可

⁴ 李宗禹等認為斯大林在 1920 年代末提出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化的理論，並且直到他過世都奉行這個理論。這個理論為斯大林模式打上鮮明的烙印。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頁 286、465；沈宗武，《斯大林模式的現代省思》（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 120、162-187；孔寒冰，〈蘇聯模式在中國是如何被強化的〉，《俄羅斯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78-85；邢和明，《中共眼裡的蘇聯模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114、190。這些研究中只有邢和明承認毛澤東也犯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

⁵ 左鳳榮，〈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斯大林——蘇聯模式的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7 年第 1 期，頁 13；馬龍閃，〈蘇聯模式與「中國道路」的探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15-27。

低估「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機關派遣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到我們國家裡來、並力圖尋找時機對我國施行武裝侵犯的作用和意義。」⁶ 因此，1936年以後大整肅中的幾個著名「表演性審判」(show trials)，在語言上就有所改變，從階級敵人轉變成黨的敵人，原本團結一致對抗資產階級的黨，變成黨的下層懷疑上層菁英的黨。所有「反對」斯大林的各派系領袖都有裡通國外的罪名；「人民的敵人」、「反蘇維埃分子」基本上取代了「階級敵人」的用語；「托洛斯基派」等敵人的定義不斷擴大。⁷ 這些敵人用語的改變，並不表示政治上的清算「敵人」隨之消失；反而因為敵人定義不斷延展，濫捕、濫殺無辜，造成1930年代後期聲名狼藉的肅反擴大化。然而，自從殘酷的大整肅結束後，雖還有整肅活動，但僅限於局部地區（如列寧格勒，主要是黨內整肅）或文化界，規模遠比1930年代的全國性小得多。當然規模小並不代表就沒有濫捕濫殺，也不意味殘暴的消失，但是比起毛在1957年以後的政治整肅運動，確實有別。

斯大林在1938年出版了《聯共黨史》一書，以兩條路線鬥爭總結蘇共的政治經驗，以農業集體化和快速工業化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總結。全書最後三章尤其強調階級鬥爭，即越接近1936年（該書的時間下限），階級鬥爭越厲害。毛澤東深受《聯共黨史》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影響。1957年以前的毛澤東政策，基本上追隨蘇聯1936

⁶ 〈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1937年3月3-5日）〉、〈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1939年3月10日）〉，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36、153、267-268、276。

⁷ J. Arch Getty and Oleg V.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 trans. Benjamin Sher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37, 468-471, 527-528, 578.

年以前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不過，中國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和集體化進行得比蘇聯順利，特別是農業合作化不但速度快，而且沒有像蘇聯農業集體化那麼血腥殘忍，中國私營工商業者接受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造，也沒有引起太大風波，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大多歸順，不免令他志得意滿。尤其是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對毛有除魅作用。毛覺得中國可以試圖走一條不同於蘇聯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他最初信心滿滿地計劃邀請黨內幹部、黨外人士幫助中共改進缺點，使黨更為完善，故以開門整風的方式，期望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孰料黨內、黨外人士對中共的批評相當激烈，促使毛澤東的「走中國自己的道路」變得激進化。他不同意斯大林關於生產資料和工具國有化之後，國內階級敵人就消失的看法，反而認為更要緊抓階級鬥爭。毛堅信「經濟上消滅階級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消滅階級」。⁸ 他批評斯大林因為混淆了敵我矛盾和內部矛盾，「對反黨分子和群眾中的一些不滿分子，缺乏具體的嚴格的分析，把他們一律看作是同帝國主義有勾結的反革命分子，一律叫做人民公敵」，造成肅反的擴大化，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和組織錯誤。⁹ 在毛看來，中國在 1957 年 7 月 1 日以前進行的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一方面有社會主義世界同帝國主義世界的嚴重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面，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由資本主義到社會

⁸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 年 11 月 21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7，頁 553。

⁹ 毛澤東，〈對《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一文的批注和修改（1963 年 3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0，頁 263-264。

主義的過渡時期，人民中還隱藏一部分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例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¹⁰反右運動只是毛在政治與思想持續鬥爭的一部分，也是一種不斷革命的形式。他可能認為反右運動並沒有像蘇聯那樣產生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且只有要求右派接受勞動改造，並非處死。這比起蘇聯大整肅約一百萬的死亡人數，¹¹似乎算不了什麼。然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正錯劃的右派結果顯示，全國五十五萬餘的右派分子，99%都是錯劃的。¹²難道這不是另一種形式的肅反擴大化的結果？

1958年初，毛澤東在文字上已經提及「不斷革命」，¹³他在多次講話中重申階級鬥爭的存在及其複雜性。毛主席不忙於宣布消滅階級；因為思想上與政治上的地主、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情緒的危險性都還存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不但在國外，在資本主義世界，嚴重地存在著；就是在國內，也還是存在著。要教育群眾提高革命警惕性，嚴防敵人的破壞活動」。¹⁴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後，中共階級鬥爭的調門越來越高，現形的、暗藏的、殘餘的「反革命分

¹⁰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7，頁51、53。

¹¹ 一百萬的數字是取各家的平均值。詳 Michael Ellman, "Soviet Repression Statistics: Some Comments," *Europe-Asia Studies* 54:7 (2002), p. 1162; Steven Roseffelde, "Stalinism in Post-Communist Perspective: New Evidence on Killings, Forced Labou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30s," *Europe-Asia Studies* 48:6 (1996), pp. 959-987.

¹² 五十五萬是官方公布的數字，實際人數應不止於此。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修訂版），下卷，頁641。

¹³ 毛澤東，〈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1月2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7，頁43。

¹⁴ 毛澤東，〈對《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稿的批語和修改（1958年11月、12月）〉、〈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12月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7，頁574、641。

子」也因為這樣的政治情勢，定義變得越加寬廣，人數越來越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達到頂峰。這種越來越激進的階級路線同時也反映在教育上，尤其是大學入學資格上。入學不是看成績的好壞，而是看家庭出身，造成許多悲劇。¹⁵ 蘇聯的情形剛好與中國相反，1936 年代中葉以來，蘇聯捨棄了先前大學入學資格重視的工農階級背景，轉而重視學業成績；為了國家管理和建設的需要，教育更重視技術官僚和菁英的培養。¹⁶ 由此可知，毛澤東不斷強化階級鬥爭，並不是中共對斯大林模式的小調整，而是毛在治國大方向對斯大林模式的重大修正。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學習蘇聯經驗是「青出於藍」。自從中蘇分歧日益擴大，毛想走「中國自己的道路」，變成政治激進化走得比斯大林還遠，還極端。這並不全然是學習蘇聯的結果，我們不應該將造成中國左傾激進產生的所有問題和不良後果，全部歸咎於「蘇聯模式」或斯大林模式，而忽略毛澤東及中共高層應當承擔的責任，否則會阻礙對毛政權本質的了解。毋庸諱言，毛澤東的許多政策與作法確實源於斯大林模式，其中包括黨一元化的領導，時至今日，中共允許資本家回籠，市場經濟大行其道，但對黨一元化的領導奉行不渝，這方面確實是斯大林模式對中國的遺害未消。

¹⁵ 劉小萌，〈文革前學校教育中的階級路線問題〉，《領導者》，總 58 期（2014 年 6 月），頁 137-150；徐友漁，《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29-37。

¹⁶ Sheila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35-236; Mark Sandle, *A Short History of Soviet Socialism*, p. 243.

二、宣傳新人的成效與民間的解讀

對新人宣傳的有效性的討論，可以歸納成三種。第一種看法認為共產黨做得相當成功。官方的宣傳教會了人民一套政治語言和政治行為模式；即使不是完全的新人，共產黨的國家社會主義創造出一群子民，願意效力於比生命更高大的理想，願意為這個理想犧牲、殺戮和死亡。¹⁷ 第二種看法是塑造新人的成功與否，必須視個人出身家庭而定。如果生長在革命前的舊知識分子或貴族家庭，家裡有另一套價值系統可與蘇聯價值系統相抗衡者，那麼他們就比較不容易被蘇聯的宣傳牽著鼻子走。但是對於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工農子女、或住在孤兒院的知識分子後代而言，他們就很容易受到蘇聯宣傳的影響。特別是若干出身不好的人，反而會更努力地改造自己，力行與認同宣傳所灌輸的新人價值，並非出於被迫。¹⁸

第三種如程映紅的觀點。他認為從理念上而言，新人是失敗的。原因何在？其一，共產革命者聲稱，要按照其意識形態和設定的社會經濟目標所建立的新社會，並沒有成功，這也意味著將共產革命精神寄託在新人的失敗。其二，新人計畫的難以實現，是因為新人的典型混合了虛構和真實的人物，而以小說中的虛構人物佔多數。不過，程映紅也沒有否認塑造新人的努力，以及新人確實有別於革命前的舊人

¹⁷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pp. 198-237; Ronald Grigor Suny, "Book Review on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Slavic Review* 66:1 (Spring 2007), pp. 106-108.

¹⁸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chapters 4-5; Jochen Hellbeck, "Speaking Out: Languages of Affirmation and Dissent in Stalinist Russia,"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1 (Winter 2000), pp. 85-96.

物。但他認為共產黨用強硬的手段，相信藉由外力可以改變人性，實踐上證明在蘇聯、在中國、在古巴的新人試驗皆以失敗告終，許多黨領導道德品質不佳就是最好的例證。¹⁹

事實上，評價毛時代新人的成效必須放在具體的社會環境、資訊流通和理想的激發來討論。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提倡新人，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進行，以烏托邦世界的理想來激勵人們的熱忱和想像，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而奮鬥。大躍進時期，人民積極響應興建水利及大煉鋼鐵，即使部分人民迫於形勢不得不做，還是有許多人受到社會主義理想的激發和新人宣傳的影響。例如，楊繼繩回憶自己的父親，因為大躍進導致的饑荒而餓死，但他對於當時宣傳的「三面紅旗」成就，依然深信不疑。他「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²⁰ 他的經驗並非孤例。1960年代一波高過一波的知識青年下鄉運動，固然有為情勢所迫不得不然的知青，也有自願獻身革命事業者，這也是1950年代以來中共積極宣傳集體主義的結果。²¹ 因此中共的宣傳和塑造新人，還是有相當成功的一面。不過，若是放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情境來看，歷經文革的浩劫和市場經濟的挑戰，大多數人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已經幻滅，環境也不再封閉，可以

¹⁹ Yinghong Cheng,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pp. 215-223.

²⁰ 楊繼繩，《墓碑：1958-1962年中國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第9版），上篇，頁8。

²¹ 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7）；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增訂本。

取得資訊的管道多元，尤其在網路興起之後，當權者很難完全壟斷資訊，只允許官方唯一的詮釋觀點存在，官方的宣傳也有被驗證或被質疑的可能，成效自然不如毛時代。

另一方面，宣傳媒介的差異會影響到宣傳成效。教科書形式是白紙黑字，可以自由詮釋空間相對地最小。歌曲曲調和歌詞的詮釋以黨所提倡的主旋律和主題為要，中國歌曲大部分較能符合官方的期望；碰到外國歌曲時，為顧及當時外交政策，有時需妥協，對於「政治不正確」的外國歌曲仍允許流傳。而作為媒介之一的勞動模範，由於是活生生的真人典型，含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他們可以假冒或偽裝，也有可能做出不合黨要求的事，風險高，而且黨無法完全主控人的改變，無法像教科書那樣時常修正。以第一屆全國勞動模範為例。人民出版社曾於1951年4月出版《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會議紀念刊》，後來不少出版社根據該書介紹模範英雄及其事蹟。1955年中共當局即發函各界，列出一批不宜繼續宣傳的勞動模範名單，原因是若干被評選出來的勞模，「有的已經蛻化變質，有的甚至原來就是犯罪分子和地主分子；另有些模範事蹟係虛報、是假勞模。」²²短短四年就出現許多蛻化分子，時間一長，更難以掌控。

電影予人詮釋的空間和彈性最大，同樣的電影有可能出現相反的解讀，有些人看到或喜歡的正是官方不希望傳播的價值觀。例如，1955年秋天北京放映印度片《兩畝地》、《流浪者》。青年學生特別愛看《流浪者》，是因為在看不到美國電影的情況下，「印度影片資本主義風味十足」，情節有趣、歌舞動人，令人難忘。但也有人反對這類

²² 〈文化部關於檢查對不宜繼續宣傳的英雄、模範和模範單位的已出書刊進行處理的通知（1955年3月29日）〉，收入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1），卷7（1955），頁86-87。

電影的播放，並質問放映印度片的現實意義是什麼？對中國的社會建設有什麼意義？²³ 經過數年的宣傳與教育，許多觀眾逐漸習慣觀賞電影要注意其「思想性」。

中共可以主導傳播正確的新人觀，卻無法完全主導人民如何解讀什麼是「新人」、什麼是「好的黨員」，雖然中共的宣傳在毛時代具有相當成效，但也不能忽略在這成效背後，異於官方觀點的「雜音」。中共所播放的電影自然希望觀眾效法的是影片中體現的新人精神，但是觀眾往往有自己的解讀和偏好。因此他們會心儀電影《保爾·柯察金》中穿水兵服的美麗冬妮婭，《英雄虎膽》中女性魅力十足的國民黨特務阿蘭，或是《第四十一》中有著迷人藍眼睛的白軍軍官。這些人卻都是資產階級的化身，共產黨要打倒的對象。

從人民對宣傳回應的多樣性，可以清楚地說明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人民也不是像極權主義理論者所言，只能被動地承受當權者的意識形態灌輸，完全被原子化 (atomized)，毫無自己的看法。只是倘若政治上非主流的意見為他人所知，可能會因此付出昂貴的代價。有一事例頗能說明這種情形。中共執行中蘇友好政策期間，一位北京的工程師在「大鳴大放」時對人說：「其實蘇聯專家中不一定是好人。」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就因為這句「反蘇」言論，這個工程師被打成右派，逐出北京，調到東北工作。到 1965 年，中蘇關係已經全面惡化，這個工程師又私下對人說：「其實蘇聯專家中也有不少好人。」又因為這句話，在文革時他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下放青海改造。²⁴

²³ 〈北京觀眾看印度電影的反映〉，《內部參考》，期 226（1955 年 10 月 29 日），頁 161-162。

²⁴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頁 3-4。

此外，中共宣傳的新人觀點，也就是文革前十七年對青少年的養成教育。韓戰時期教科書已經出現形容敵人十分煽情、具有謾罵、攻擊性強的文革語言，雖然時間不長，但是大躍進以來，類似語言出現的強度和頻率日漸增大。這樣的語言暴力日後就反映在紅衛兵身上；再加上肢體暴力，結果造成許多悲劇。目前關於文革肢體暴力的來源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但是語言暴力與十七年的養成教育有很大關係。

中共宣傳的新人觀點對受眾者至少造成兩個重要影響：以階級分敵我及價值二元化。受眾者對待世界和事務的言行也變成黑白對立、二元兩極。當價值呈兩極化、非彼即此的情況下，凡是屬於政治不正確的一方，均可被視為敵人、「非人」，而成為嚴酷打擊的對象。毛澤東時代的結束，並不代表那時的教育和宣傳的影響也跟著完全消退。毛時代宣傳中對人對事二元對立的態度，至今仍留存在許多人腦海中。他們或許不再用「階級鬥爭」、「毛澤東萬歲」、「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等當年激進用語，但是他們仍然習慣於看世界或評斷事物一分為二，黑白分明，沒有中間灰色地帶；不允許壞中有好、好中有壞，以較為複雜與多面向的角度來看人或事。從當今許多成長於1950、1960年代的人，他們所出版的著作或互相筆戰之中，對各種議題的討論往往持單面觀點、二元對立的價值，且同時存在強烈的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情緒，可見一斑。

三、新人與黨的角色

阿圖舍認為論及意識形態領域，必須重視國家機器的存在。統治者可以將所欲灌輸的意識形態包裝在各學科，如語文、算術、自然歷

史、科學、文學等，成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²⁵ 本書呈現的其他社會教育的媒介，如群眾歌曲、電影、勞動模範所發揮的功能，絕不亞於學校教育，有些地方甚至勝過學校教育。阿圖舍談的雖然是資本主義國家，且以法國為例，實際上更適用於共產國家。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尚有市民社會可以與國家機器對抗；但是中國是一黨獨大的國家，又沒有市民社會與之監督抗衡，黨國機器能夠發揮的功能更強大有力。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完全掌控塑造新一代人民的意識形態陣地，不同於阿圖舍筆下資本主義的法國，中共不容許任何非主流意識形態的介入，更不可能像法國社會那樣，讓不同意識形態的各派人馬爭奪話語霸權。同樣重要的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塑造「主體」的過程，在封閉、與外界隔絕的環境裏，成效更為顯著。今日中共的宣傳密度和力度不亞於毛時代，但即使有效果，成功的程度仍不能與毛時代相比（當時還有毛的魅力、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理想），因為網路無遠弗屆，人民與外在國際世界的接觸頻繁，碰到與宣傳相左的信息，常會消解官方的論述。

再者，阿圖舍相信「主體」是被建構出來的。他以基督教的宗教意識形態為例，說明宗教意識形態不論是透過新約、舊約、神學著作還是各種聖禮儀式等，其目的在於將人民改造成主體，使他們服從上帝的旨諭。上帝將自己界定為出類拔萃的大寫的主體 (*par excellence* Subject)。上帝通過自己並因自己而存在的人，建構了祂的小寫的主體、從屬於祂的小寫的主體，如同上帝的子民從屬於上帝。大寫的主體建構出來的小寫主體，有如上帝的鏡像。上帝需要人，正像大寫的

²⁵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152-155.

主體需要小寫的主體。²⁶阿圖舍的大寫的主體，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指涉上帝，在共產主義國家則是黨或以黨的化身而出現的領袖。黨在新人觀的塑造與宣傳中扮演最關鍵的角色。儘管中蘇在新人宣傳的重點存在差異，但是不能忘記兩國新人最核心的共同點，是最終都要聽命於黨，服從於黨。

中共的黨性高於一切，個體完全服從集體的觀念，與晚清以來若干中國知識分子提倡的集體為重觀念，在本質上有些差異，那就是滅絕個性、個體。1949年以前，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主要指涉國家或社會，中共則是以黨代國，並且這個黨不是任何一個政黨，必須是奉行馬列主義、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的先鋒——中國共產黨。因此，對中共而言，黨可以代表所有的集體。而梁啟超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提倡的集體為重，並沒有要將個人自由和個性全盤抹殺，但是中共則特別要求個體和集體不能兩全時，必須犧牲個體。一言以蔽之，就是堅持黨性，惟黨是從。不過，由集體直接等同於黨或其領袖，這中間有個過程，也就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集體內涵的差異。中共新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雖然均延續以集體為重的觀念，但是兩個年代還是有程度上的差別。由本書的愛國觀和愛情觀所示，1950年代尚可個人與集體並存，集體可以黨國、毛主席、社會主義建設來表現，到了1960年代中後期，集體的比重越來越大，並且越來越聚焦於毛主席及其所提倡的世界／不斷革命，在文革高峰期個人完全沒有存在的空間。

中共素來自許對國家有救亡圖存的重任。因此，中共的宣傳創造

²⁶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177-181.

了一種氛圍：自建國以來，中國一直處於被敵對的國際勢力包圍的情況。即使韓戰結束，以美國為首（後來又加入的蘇聯）的帝國主義國家從未鬆懈對中國的顛覆活動。處於強敵環伺的情況下，中共時時不忘對內宣傳外國侵略的可能及其領導抗敵的正當性，因此也掌握了道德資源。職是之故，在救亡圖存、集體為重的大前提之下，中共當局有權對違反黨的意志的任何「敵人」採取殘暴手段或政策，可以名正言順地開脫嚴酷施政的罪名。一旦被指控為「敵人」者，則成為眾人皆可口誅筆伐，甚至拳腳暴力對待的賤民。體現黨意志的新人也可成為中共打擊「敵人」的工具。

黨與新人的關係類似於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共產黨常常以集體之名，黨就是集體的代表，要求人民服從黨的領導。新人各種觀念的內容隨著黨的政策反覆，也不斷地改變，最後定義還是由黨來決定。無論內容如何改變，不管邏輯是否正確，不管為何政策會突然急轉彎，也不問為何昨是今非，只要黨對某一觀念有新的定義，新人就必須接受。即使政策改變或重新定義觀念，並非在中共事前的規劃之中，但這也說明必須緊跟著黨的路線，才是新人應有之義。作為父母的黨知道，而且有權決定什麼是對子女最好的利益；作為子女的新人可以偶有不守規矩的時候，但不可以挑戰黨的權威。即使斯大林容許英雄式的個人存在，同樣也不能容忍他所界定的黨的權威受到挑戰。²⁷ 因此共產黨大力宣傳的新人典型最終還是黨的螺絲釘，他們無須具有辨別能力，只要跟著黨走才是金光大道，最後是所塑造的新人完全成為黨馴服的工具。

文革之後的中國大陸，老百姓已經厭倦於政治運動與思想掛帥，

²⁷ Jay Bergman, "Valerii Chkalov: Soviet Pilot as New Soviet Man," pp. 149-150.

加上市場經濟的導向，人民價值觀丕變。人民吸收資訊的管道不像建國初期與文革時期那樣，完全由國家控制。當今大多數的中國人對人生抱持唯我獨尊、向錢看齊的態度，服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做人原則。這與過去毛時代提倡的以集體為重、以黨為尊有高度的反差。市場經濟並不必然會產生全民皆是唯我主義者，歐美社會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投入，即是一例。如果不走極端，不將黨等同於集體的全部，提倡集體的重要性並非壞事，這本來也是一個正常社會所需要的品質之一。但是過度或單獨強調集體，完全忽略個人，必然引發許多弊病與反噬。特別是由黨來界定和干涉集體的內容，很容易予人操縱權力的空間。集體內容被中共所詮釋和操弄的結果是，晚清以來提倡公德的呼籲，是以最壞、最致命的方式被呈現和運用。結果使得中國到了二十世紀末，當大陸人民對集體理念不再信任，而又必須重新建立公德所遭遇的難度，要比梁啟超當年提倡的新人公德觀，更為艱辛與困難。

最後，尚有一值得注意的面向，就是國共兩黨同樣以俄為師，為何結果如此不同？箇中原因錯綜複雜，不過藉由本書舉述的各種媒介宣傳為例，亦說明了若干緣由。兩黨均宣傳集體至上，中共運用和動員各種資源和媒介的能力，令國民黨望塵莫及。國民黨向來只重視文字宣傳和學校教育，輕忽非文字宣傳和社會教育。如本書宣傳國際觀所示，南京時期的國民黨希望能夠利用教科書實行黨化教育；但是組織、宣傳部門鬆散，無法以黨的力量加以貫徹，達到目的，而中共卻做到了。國民黨撤退來台之後，開始重視下層民眾，提倡宣傳下鄉，除了傳統的報紙、書刊之外，還有反共歌曲、話劇、民間雜藝、電影、新聞影片等。事實上，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也曾討論過這些形式，只是鮮少付諸實行；或者曾經利用過，頻率仍低。來台後，國民黨

的宣傳與內戰時期相比，雖有改善，但還是紙上談兵比實際行動要多。²⁸ 例如，國民黨在台灣也曾經一度想效法中共的勞動模範運動，推出克難英雄運動，目的要反攻大陸。從 1951 年至 1962 年，一共舉辦十二屆的克難英雄大會，但是大多僅限於軍隊中推行。克難英雄運動最初主要表揚廢物利用、節約原料等發明，後來內容變得幾乎無所不包，令人不知所以。²⁹ 除拍攝新聞短片之外，國民黨仍舊過度依賴文字宣傳，對象也還是以知識分子為主。《中央日報》在這段期間的每年年初和年尾，對於克難英雄的報導最多；但是內容多是領袖和高層長官的嘉勉詞語，強調反攻大陸的目標，至於克難英雄本身的事蹟報導多半語焉不詳，甚至連克難英雄運動的宗旨也寫得籠統模糊。³⁰ 這樣的宣傳方式及心態，與國民黨抗戰時期在重慶仿效斯塔漢諾夫運動所推行的全國工作競賽，差異甚微。

國共在海峽兩岸同為黨國體制，內容和機制迥然有別。相對而言，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比較緊密，不像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內容那樣鬆散。同時，中共可以透過強而有力的組織力量，由上而下有效地貫徹政令；而國民黨的橫向、縱向的組織、宣傳等各部門的聯繫宛如散沙。即使國民黨來台之後，號稱「痛定思痛」，黨本身的運作機制比

²⁸ 詳見余敏玲，〈導論：同中有異的兩岸黨國體制〉，收入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1945-200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 12-17。

²⁹ 雖然一度想在學校推廣，但似乎沒有成功。〈台中市各中學校選克難英雄〉，《中央日報》，1951 年 5 月 11 日，第 4 版。1963 年起克難英雄改稱為國軍英雄。

³⁰ 例如，《中央日報》頭版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報導首屆克難英雄大會，列舉的官員及其講話比克難英雄還多。蔣中正親向陸、海、空、聯勤代表佩章，卻沒有任何關於這四個代表事蹟的介紹，連他們的感想也隻字未提。這些人彷彿是木偶，只會舉手高呼：「總統萬歲！萬歲！萬萬歲！」《中央日報》，1951 年 1 月 2 日，第 1 版。

起大陸時期仍是乏善可陳。此外，尚有一外在因素影響兩黨黨國體制的運作。國民黨雖有大量國營企業，仍允許私人經濟存在，這就為社會留了一個活路；不像中共將所有生產工具收歸國營或集體化，藉此來控制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等的方方面面，使得老百姓除了依附黨國，別無他路可以生存，也因此造就了中共更為嚴實的黨國體制。



參考書目

檔案

ГАРФ (GARF, 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 ф.5283, оп.18、22.

上海市檔案館藏, A23-2, A45-1, A38-2, A72-2, B1-2, B105-1, B105-2, B105-8, C1-2, C14-2。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43)審三字第5二號), 1954, 施顯華先生資料提供。

江蘇省檔案館藏, 檔號 3003/長期, 3008/長期。

遼寧省檔案館藏, 檔號 DE22/永久。

重慶市檔案館藏, 檔號 1085-01-0990-永久。

報刊

《人民日報》, 1948-1978、1990。

《人民音樂》, 1950-1965、2008。

《大眾電影》, 1950-1959。

《工作競賽月報》1943。

《中央日報》, 1951。

《中國青年》(上海), 1925。

《中國青年》(北京), 1949-1998。

《中國青年報》, 1957、1964。

《中國婦女報》, 2001。

《內部參考》, 1950-1964。

《文匯報》, 1950、1956。

《文藝報》, 1958-1959。

《北京大學校刊》, 1957。

《北京日報》, 1957。

《民國日報》(上海), 1924。

- 《民國日報》(廣州)，1926。
 《光明日報》，1952。
 《東北婦女》，1953。
 《紅色中華》，1934。
 《紅旗》，1958、1965、1972。
 《重慶晚報》，1997。
 《現代婦女》，1950。
 《勞動》，1958-1959。
 《進步青年》，1950。
 《新中國婦女》，1949-1954，1956年改名《中國婦女》，1988。
 《新中華報》，1937-1938。
 《新華月報》，1949。
 《新疆日報》，1957。
 《解放》週刊，1939。
 《解放日報》(上海)，2011。
 《解放日報》(延安)，1942-1943。
 《電影藝術》，1960。
 《歌曲》，1952-1966、1990-2006。
 《廣州民國日報》，1926。
 《遼寧青年》，1982。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Komsomol'skaia pravda, 共青團真理報), 1939, 1966.
Крестьянка (Krest'ianka, 農婦), 1978, 1987.
Правда (Pravda, 真理報), 1934, 1985.

中文專書

- 《古巴歌曲集》，第一集。北京：音樂出版社，1962。
 《安格林娜自傳》。北京：青年出版社，1952。
 《初中課本世界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第1版，1960第5版。
 《初中課本世界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第1版。
 《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原版。
 《初級中學課本世界地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1961。
 《初級中學課本世界歷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 《高中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 第 1 版，1956 第 2 版。
- 《高中歷史（試驗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高級小學算術課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 《高級中學世界現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 《高級中學課本：世界現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 第 1 版。
- 《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香港：文風出版社，1946。
- 〔宋〕朱熹集註，楊家駱主編，《四書集註（甲種本）》。台北：世界書局，1957。
- 丁洪、趙寰、董小華，《真正的戰士：董存瑞的故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
-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普通高中《歷史必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第 3 版。
-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人民教育出版社書目(1950-1999)教材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反帝之歌（翻譯歌曲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
- 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文件），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上海：內部發行，1986。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 ，《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9。
- ，《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85。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第 2 版。
-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

- 料》。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 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黑龍江省國營農場總局合編，《拓荒者的回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 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2005。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青年英雄的故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4。
- 中國藝術館籌備處、北京華人經濟技術研究所編，《中國群眾藝術館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市場信息司編，《中國農村經濟統計資料，1949-1996》。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
- 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編，《歌選一百首》。上海：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1950。
- 中華全國總工會編，《中華全國總工會七十年》。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5。
- 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編，《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89。
- 中耀改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新華書局，1950 縮寫本。
- 天和，《紅色人生：劳模申紀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1977。
-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
- ，《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
- 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王大成譯，《安格林娜的故事》。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2。
- 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 王芝九編，江季筠助編，《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6月原版，1952年8月北京初版。
- 編，鞏紹英校訂，《初中課本，世界歷史》，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第1版。
-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王恩爵，《新時代世界史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 王祖廉、黎錦暉、黎明編，《新中華國語讀本》。上海：中華書局，1931。
- 王素、夏星改編，毅進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 王蒙，《訪蘇心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 ，《王蒙文集》。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
- ，《不革命行嗎？》。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 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記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 司馬璐，《鬥爭十八年》。香港：亞洲出版社，1952 初版。
-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香港：三聯書店，1972。
- 著，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 第 1 版，1995 第 5 版。
- 田漢，《田漢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
- 白刃縮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縮寫本）。天津：知識書店，1949 初版。
-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石年，《斯大林歌集》。北京：新華書店，1954。
-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 列·費·葉爾紹夫著，北京師範大學蘇聯研究所譯，《蘇聯文學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 朱嬰編，《蘇聯歌曲》。上海：自立書店，1953。
- 朱嬰選編，《新生歌選（1-4 合訂本）》。上海：自立書店，1953。
-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補卷》。東京：蒼蒼社，1985。
- ，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東京：蒼蒼社，1983 第 2 版。
- 米定斯基著，李敬永等譯，《蘇聯人民的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 老鬼，《血與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余岱宗，《被規訓的激情：論 1950、1960 年代的紅色小說》。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 吳冷西，《憶毛主席》。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 吳昭江、李晴改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開明書店，1952。

- 吳迪（啟之）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1949-1979》。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 吳運鐸，《把一切獻給黨》。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 第 1 版，1957 第 3 版。
- 吳履平、李隆庚編，《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 / 歷史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吳築清、張岱編著，《中國電影的豐碑：延安電影團故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 李永安主編，《中國職工勞模大辭典》。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5。
- 李求實編，《革命歌集》。廣州：中國青年社，1926。
- 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 李純武編，江季筠助編，《蘇聯現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 李斌，《中學國文教科書研究(1912-1949)》。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 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
- 杜萬啟主編，《新中國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1。
- 沈志華，《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000。
- 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
- ，《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 ，《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
- ，《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45-195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沈宗武，《斯大林模式的現代省思》。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 沈長虹，《初級中學外國歷史課本》。北京：新華書店，1950。
- 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 邢和明，《中共眼裡的蘇聯模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孟犁野，《新中國電影藝術史稿(1949-1959)》。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
-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一九五三——一九六八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 武少文主編，《當代中國的農業機械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 祁曉萍編著，《香花毒草——紅色年代的電影命運》。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 金敬邁，《歐陽海之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
- 青島市史志辦公室編，《青島市志·紡織工業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 柯爾巴諾夫斯基著，草嬰譯，《蘇聯的戀愛婚姻與家庭》。上海：時代出版社，1950。
-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
-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第 2 版。
- 胡萬春，《胡萬春中篇小說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 音樂出版社編輯部編，《外國名歌 200 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58。
- ，《外國名歌 200 首續編》。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61。
- ，《革命歌曲大家唱》。北京：音樂出版社，1964。
- 祝總臨等著，《速成識字補充讀物：曹楊新邨好風光》。上海：勞動出版社，1953。
- 草嬰，《我與俄羅斯文學：翻譯生涯六十年》。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
- 徐友漁，《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 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
- 馬龍閃，《蘇聯文化體制沿革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蘇聯模式與「中國道路」的探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 高中歷史教材編寫組、DC 加拿大國際交流中心合作編寫，普通高中《歷史必修(1)》。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第 3 版。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0。
- 高嘉、李念村，《斯大林之歌》。上海：真理書店，1953。
- 商金林，《葉聖陶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 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台北：秀威出版社，2010。
- 教育大辭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國立編譯館主編，《教育大辭書》。台北：文景書局，2000。
-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 ，《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 張呂、朱秋德編著，《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運故事口述實錄》。
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
- 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編著，《說不盡的毛澤東：百位名人學者訪談錄》。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 梁星，《劉胡蘭小傳》。北京：青年出版社，1951 第 1 版，1952 第 3 版。
- 梁茂春、明言編著，《中國近現代音樂史(1949-200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梁啟超、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
- 梁曉聲，《重塑保爾·柯察金》。北京：百花出版社，1999。
- 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
- 章民、王怡編，《外國名歌 200 首（修訂版）》。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1。
-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 ，《劉氏女·楊氏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 許國榮、左萊，《金山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修訂版。
- 陳光祖、蔡迪編，《初中世界地理課本》。北京：新華書店，1950。
- 陳伯達等著，《人性·黨性·個性》。香港：潮汐社，1947。
- 陳其編，《教師教學用書：世界歷史（九年級）》。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 陳彥著，裴雲譯，《中國之覺醒——文革後中國思想演變歷程，1976-2002》。香港：田園書屋，2006。
- 陳原，《不是回憶錄的回憶錄》。上海：文匯出版社，1997。
- 編，《初中外國地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1951，1953 第 6 次修訂版。
- 編譯，《蘇聯名歌集》。桂林：桂林新知書店，1941。
- 陳珮華(Anita Chan)，《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7。
- 陳歌辛編，《蘇聯群眾歌曲》。上海：自立書店，1953。
- 陸梅林、海天，《集體農場生活》。上海：元昌印書館，1951。
- 傅健明，《教科書價值取向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
- 傅彬然、覃必陶，《外國史》。上海：開明書店，1948。
- 彭達林科改編，陸立之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上海：北新書局，1951 年 1 月初版，3 月再版。

-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再版。
- 黃新原，《五十年代生人成長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
- 奧斯特洛夫斯基著，黃樹南等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
- 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和俄語系 72 級工農兵學員合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 奧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等譯，《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 年第 1 版，1995 第 2 版。
- 楊生茂、李純武編，《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 第 1 版，1957 第 3 版。
-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 楊健，《墓地與搖籃：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
- 楊堯編著，《中國近現代中小學地理教育史》。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楊繼繩，《墓碑：1958-1962 年中國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
-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農業機械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 解放軍報編輯部編，《王杰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資中筠，《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
- ，《譯林舊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 雷良棻編，《蘇聯群眾歌曲集》。上海：中華書局，1954。
- 雷鋒，《雷鋒日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63。
- 廖輔權編，《蘇聯群眾歌曲集》。上海：萬葉書店，1953。
-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一九六六——一九八〇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中國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增訂本。
-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劉心武等編著，《讓我們來討論愛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劉雲主編，《中央蘇區文化藝術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

- 潘安榮註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 潘克拉托伐著，李鐵民譯，《蘇聯現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50。
- 編者不詳，《新中華歌選（合訂本）》。上海：陸開記書店，1953。
- 蔡楚生，《蔡楚生文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
- 鄭昶編，《新中華外國地理》。上海：中華書局，1932。
- 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 學文化文庫編委會主編，張仲清編寫，《美麗的曹楊新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
-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 閻蘋、張雯，《民國時期小學語文教科書評介》。北京：語文出版社，2009。
- 戴伯韜，《戴伯韜教育文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修訂版。
- 薛範，《歌曲翻譯探索與實踐》。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鄺平章譯，《蘇聯中等學校世界史教學提綱》。北京：大眾出版社，1953。
- 闕仲瑤編，《蘇聯群眾歌曲新編》。上海：新音樂出版社，1953。
- 顏純鈞，《文化的交響——中國電影比較研究》。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
- 曠晨、潘良編著，《我們的五十年代》。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5。
- 羅家倫，《新人生觀》。重慶：商務印書館，1942。
- ，《新人生觀》。台北：台灣華國出版社分社，1951。

中文論文

- 〈2010 年全國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評選揭曉〉，《中國職工教育》，2010 年第 5 期，頁 10。
- 〈上海四所大學讀書調查——名著最喜愛，《紅樓》居榜首〉，《重慶晚報》，1997 年 11 月 27 日，第 3 版。
- 〈女性大都被幹部娶走了〉，《週末報》，2010 年 10 月 14 日，第 31 版。
- 〈毛主席會見留蘇學生〉，《初中課本：語文》，冊 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頁 66-72。
- 〈向瘟神開炮〉，《十年制學校小學課本（試用本）語文》，冊 8。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頁 111-115。

- 〈在美國，有一個孩子被殺死了〉，《高級小學語文課本》，冊 4。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頁 69-77。
- 〈我在美國〉，《高中語文課本》，冊 1。北京：新華書店，1950 初版，頁 124-127。
- 〈把毒草歌曲拿出來示眾〉，《記憶》，2009 年第 18 期，頁 50-56。
- 〈李素文：大起大落後找回勞模的感覺〉，《報林》，2004 年第 2 期，頁 37-38。
- 〈要有鮮明的愛與恨〉，《高級小學語文課本》，冊 9。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頁 100-103。
- 〈桑博〉，《高級小學課本語文》，冊 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 第 7 版，頁 98-100。
- 〈朝鮮孩子們的心(一)、(二)〉，《高級小學國語課本》，冊 1。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 修訂版，頁 14-19。
- 〈蘇聯煤礦的勞動保護〉，收入宋雲彬等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1。北京：新華書店，1950 初版，頁 104-107。
- 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蘇秀：最喜歡的作品沒有公映，真的是很遺憾〉，《電影往事》，下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頁 231-248。
- 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對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接受反饋的思考〉，收入戴錦華編，《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文化出版社，2000，頁 192-227。
- 小林多喜二，〈母親〉，《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5。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頁 121-129。
- 孔寒冰，〈蘇聯模式在中國是如何被強化的〉，《俄羅斯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78-85。
- 巴瑛，〈生命裡的黑土地〉，《北大荒文學》，2009 年第 1 期，頁 47-50。
- 戈小麗，〈蘇聯歌曲和我們〉，《北京文學》，1999 年第 8 期，頁 96-100。
- 毛澤東，〈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高小語文課本》，冊 4。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頁 1-2。
- 毛翰、趙會鳳，〈十七年文學論爭檔案（歌詞篇）〉，《名作欣賞》，2009 年第 30 期，頁 21-28、47。
- 王天惠，〈可惜了那本《外國名歌 200 首》〉，收入知青檔案編選組編，《知青檔案（1962-1979）：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紀實》。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頁 212-213。
- 王北平，〈弘揚勞模精神，尊重勞模價值〉，《工會博覽》，2005 年第 9 期，頁 4-6。

- 王秉禮，〈清貧不該是勞模特色〉，《中國經濟週刊》，2005年第17期，頁59。
- 王素梅，〈尉鳳英，欲說當年好困惑〉，《老年人》，1999年第2期，頁10-12。
- 王淦生，〈十個勞模八個病〉，《唯實》，1998年第5期，頁68。
- 世衡，〈戀愛革命論〉，收入梅生編，《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冊4。上海：新文化書社，1923。
- 左紅衛，〈民國時期蘇聯電影在新疆的傳播〉，《電影評介》，2011年第16期，頁1-2、39。
- 左鳳榮，〈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斯大林——蘇聯模式的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7年第1期，頁11-16。
- 仲永偉，〈大家都來關心愛護勞模〉，《化工管理》，1996年第8期，頁43。
- 任光宣，〈重讀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俄羅斯文藝》，1998年第2期，頁58-62。
- 伊林作，晶譯，〈第十八課 蘇聯的一分鐘和美國的一分鐘〉，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4。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初版，頁134-147。
- 朱良，〈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義罪名的真相〉，《炎黃春秋》，2006年第8期，頁1-7。
- 何云波，〈當神聖已成往事——世紀之交「鋼鐵熱」之反思〉，《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33期1，2009年1月，頁131-134。
-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文史精華》，2003年第1期，頁18-31。
- 余一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俄羅斯文藝》，1998年第2期，頁63-75。
- ，〈再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俄羅斯文藝》，2000年第3期，頁20-25。
- 余敏玲，〈學習蘇聯：中共宣傳與民間回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0，2003年6月，頁99-139。
- ，〈導論：同中有異的兩岸黨國體制〉，《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1945-200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1-29。
- 吳俊忠，〈我們是否還需要「保爾精神」？〉，《俄羅斯文藝》，2000年第3期，頁9-13。
- 呂芳上，〈1920年代中國知識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收入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 代史研究所，2003，頁 75-102。
- 李秀芬，〈文化戍邊：打造屯墾事業的新高地〉，《兵團建設》，2004 年第 2 期，頁 12-13。
- 李里峰，〈群眾運動與鄉村治理——1945-1976 年中國基層政治的一個解釋框架〉，《江蘇社會科學》，2014 年第 1 期，頁 218-230。
- 李紅軍，〈劳模應有新內涵〉，《中國審計》，2002 年第 8 期，頁 80。
-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收入李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路》。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頁 347-370。
- 杜林，〈走進去，跳出來：我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俄羅斯文藝》，1999 年第 1 期，頁 76-79。
- 杜致萬，〈網上對話錄——關於保爾和比爾·蓋茨〉，《俄羅斯文藝》，2000 年第 3 期，頁 16-19、33。
- 汪朝光，〈20 世紀初葉電影在東北邊陲之興——哈爾濱早期電影市場研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4 年第 3 期，頁 97-106。
- ，〈建國初期上海停映美國電影之研究〉，《上海檔案史料研究》，輯 4。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 124-137。
- 沈志華，〈關於 20 世紀 50 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頁 83-93。
- ，〈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頁 29-42。
- ，〈從波匈事件到反右派運動——毛澤東否定八大路線、重提階級鬥爭的思想歷程〉，收入章詒和編著，《五十年無祭而祭》。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07，頁 15-124。
- 里亞包克良奇作，嚴風譯，〈二十世紀年代裡〉，收入宋雲彬等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6。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 修訂版，頁 91-104。
- 周志強，〈拜物主義催生的「精神分裂」〉，《人民論壇》，2013 年第 3 期，頁 30-31。
- 孟用潛，〈我國小麥總產量壓倒美國〉，《初級中學課本語文》，冊 6。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頁 26-31。
- 易凡、紫卉，〈「禁映影片」的禁映內幕〉，《檔案春秋》，2006 年第 3 期，頁 23-28。
- 東北人民政府教育局編，《初級中學教科書：世界地理》。瀋陽：東北新華書店，1951。
- 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社

- 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頁169-193。
- 柯臨清(Christina K. Gilmartin)，〈共產黨早期組織中的性別和性別政治〉，收入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公司，2007，頁87-128。
- 柳迪善，〈蘇聯電影在中國——五十年代的考察〉，《電影藝術》，2008年第4期，頁55-60。
- 耐因，〈不朽的友誼〉，收入《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1。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頁71-73。
- 胡殷紅，〈一條大河，永遠流淌不完的歌——人民音樂家劉熾的故事〉，《流行歌曲》，2011年第1期，頁40-45。
- 茅盾，〈剝落「蒙面強盜」的面具〉，收入《高中語文課本》，冊6。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初版，頁47-56。
- 孫立平，〈勞模評選的尷尬〉，《中國改革》，2005年第6期，頁52-53。
- 孫雲，〈延安時期勞模表彰運動的實際功效——以吳滿有形象的建構及影響為例〉，《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2期，頁11-22。
- 海涅，〈奴隸船〉，收入《高級小學課本語文》，冊4。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第6版，頁65-69。
- 涌泉，〈勞模官多民少的思考〉，《時代潮》，2005年第9期，頁5。
- 高小賢，〈「銀花賽」：50年代農村婦女與性別分工〉，《社會學研究》(北京)，2005年第4期，頁153-171。
- 張怡、紀堯，〈女「勞模」光環下掩飾下的不幸婚姻〉，《三月風》，2002年第1期，頁7-10。
- 張偉然，〈私情·經濟·政治——計劃經濟時代一卷「生活錯誤」檔案的解讀〉，收入王奇生主編，《新史學(第七卷)：20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189-219。
- 張順、賁衛華，〈我們需要怎樣的勞模〉，《唯實》，1998年第12期，頁93。
- 張寧，〈我當淮北平原上第一個女拖拉機手〉，《世紀》，1999年第1期，頁17。
- 張鳴，〈「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老照片》，輯18。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頁114-117。
- 張學民，〈今年全國勞模評選的新變化〉，《中國石化》，2005年第7期，頁82。
- 梅青，〈和女拖拉機手梁軍見面〉，《中國少年兒童》，1950年10月30日，頁18-19。
- 梅益，〈深情的懷念〉，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回憶

- 錄》，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 65-67。
- 習近平，〈在同全國勞模代表座談時的講話〉，《中國工運》，2013 年第 5 期，頁 4-6。
- 許紀霖，〈大我的消解——現代中國個人主義思潮的變遷〉，收入鄭正來編，《中國社會科學輯刊》，總期 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18-21。
- 陳永發，〈抗戰時期的延安整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年 3 月 13 日未刊稿。
- 彭志平，〈回首北大荒 梁曉聲：無奈的劫數〉，《中國時報》，2008 年 1 月 5 日，第 A17 版。
- 舜太運，〈勞模在市場經濟中升值〉，《中國人才》，1996 年第 11 期，頁 22-23。
- 進琴，〈名人小時候的理想〉，《小星星》（高年級版），2005 年第 6 期，頁 21。
- 馮至，〈馬鈴薯甲蟲和蜜橘〉，收入《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5。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頁 82-90。
- 黃西誼，〈中國當代社會變遷中農村婦女經濟身分的轉換〉，《社會學研究》（北京），1990 年第 6 期，頁 60-72。
- 楊志和，〈國家主席與掏糞工人的特殊友情〉，《福建黨史月刊》，2003 年第 1 期，頁 25-27。
- 楊忠虎、張用建，〈陝甘寧邊區勞模運動述論〉，《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2010 年第 5 期，頁 95-103。
- 楊朔，〈平常的人〉，收入《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5。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 初版，頁 95-101。
- 董健，〈「保爾熱」下冷思考〉，《俄羅斯文藝》，2000 年第 3 期，頁 13-15、25。
- 鄒韜奮，〈在雅爾達〉，收入宋雲彬等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2。北京：新華書店，1950 初版，頁 149-155。
- 翟志成，〈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辯及其現代意涵〉，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1-57。
- 劉小萌，〈文革前學校教育中的階級路線問題〉，《領導者》，總 58 期，2014 年 6 月，頁 137-150。
- 劉小楓，〈記戀冬尼婭〉，《讀書》，1996 年第 4 期，頁 84-92。
- 劉良模，〈美國的黑人〉，收入《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1。北京：新華書店，1950 原版，頁 113-117。

- 劉良模，〈羅伯遜〉，收入《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1。北京：新華書店，1950 原版，頁 108-112。
- 劉煥杰，〈胡勞模的趣生活〉，《華北電業》，2004 年第 1 期，頁 76-77。
- 劉裕章，〈新形勢下勞模的特點〉，《當代貴州》，2000 年第 11 期，頁 43。
- 張天蔚，〈勞模的價值〉，《領導文萃》，1995 年第 10 期，頁 27-28。
- 影子，〈「小芳」的青春記憶〉，收入林春芬主編，《無華歲月：我們的 1966-1976》。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 248-253。
- 德祥，〈勞模也應追求合理合法的個人利益〉，《中國職工教育》，2001 年第 11 期，頁 45。
- 慧杰、志敏，〈勞動與創造成就人才——從 2005 年全國勞模評選表彰看科學人才觀的新實踐〉，《中國人才》，2005 年第 9 期，頁 18-19。
- 編者，〈革命歌曲選〉，《紅旗》，1965 年第 3 期，頁 31-49。
- 蔣永萍，〈50 年中國城市女性就業的回顧與反思〉，收入李秋芳主編，《半個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頁 152-162。
- 鄭東亮，〈勞模標準的變與不變〉，《職業》，2004 年第 5 期，頁 14。
- 鄭莉，〈「一線」與「長官」之爭〉，《當代勞模》，2010 年第 1 期，頁 26-28。
- 謝安邦，〈趙占魁運動的作用及其經驗〉，收入中國工運學院工人運動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頁 156-162。
- 瞿秋白，〈美國的真正悲劇〉，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6。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 原版，頁 83-92。
- 薩巴林作，符其珣譯，〈自動工場〉，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冊 4。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 初版，頁 139-146。
- 蘇北，〈新世代勞模的價值和內涵〉，《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4 年第 5 期，頁 21-22。
- 紀廉，〈美國佬，滾回去！〉，收入《十年制學校初中課本（試用本）：語文》，冊 5。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頁 105-106。
- 曉冬，〈「勞模」也是「無形資產」〉，《瞭望》新聞週刊，期 12，1999 年 3 月，頁 51。

英文專書

Adamson, Bob. *China's English: 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 Hong

-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lt, Herschel and Edith. *The New Soviet Man: His Upbringing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64.
- Beumers, Birgit. *A History of Russian Cinema*.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9.
- Chang, Hao (張灝).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Cheng, Yinghong (程映紅).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 Clark, Katerina.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nd edition.
- Culp, Robert.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Dunham, Vera S. *In Stalin's Time: Middleclass Values in Soviet Fiction*.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Figes, Orlando.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 Fitzpatrick, Sheila.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Fullop-Miller, Rene.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 Getty, J. Arch & Oleg V.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illespie, David. *Th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Novel: 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 D.C.: Berg Publishers, 1996.
- Griedrich, G. "Miss U.S.S.R.": *The Story of Dusya Vinogradova*. Moscow: 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 1936.
- Hansen, Mette H. *Lessons in Being Chinese: Minority Educ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in Southwest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 Hellbeck, Jochen.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eller, Mikhail. *Cogs in the Soviet Wheel: The Formation of Soviet Man*. Translated by David Floyd.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88.
- Hinton, William. *Iron Ox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Chinese Farming*. New York &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 Honig, Emily & Gail Hershatter.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Kaganovsky, Lilya. *How the Soviet Man Was UnMade: Cultural Fantasy and Male Subjectivity under Stali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8.
- Kaple, Deborah A.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elly, Cateriona. *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 London: Granta Books, 2005.
- Kenez, Peter.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Kharkhordin, Oleg.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Kotkin, Stephe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Kunitz, Joshua. *Along Came Stakhanov*. Moscow: 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 1936.
- Lapidus, Gail Warshofsky. *Women in Soviet Society: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Liebes, Tamar & Elihu Katz. *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 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Lilly, Carol S. *Power and Persuasion: Ideology and Rhetoric in Communist Yugoslavia, 1944-1953*.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1.
- Medvedev, Roy A. *Khrushchev, the Years in Pow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eisner, Maurice J.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 Munro, Donald J. (孟旦)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 Ridley, Charles Price, Paul H. B. Godwin, & Dennis J. Doolin. *The Making of a Model 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 Sandle, Mark. *A Short History of Soviet Socialism*.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9.
- Siegelbaum, Lewis H. *Stakhano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SSR, 1935-194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mith, S. A.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tites, Richard.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Urban, Michael & Andrei Evdokimov. *Russia Gets the Blues: Music,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Unsettled Time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Venturi, Franco.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von Geldern, James & Richard Stites, eds. *Mass Culture in Soviet Russia: Tales, Poems, Songs, Movies, Plays, and Folklore, 1917-195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Welch, David.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nd edition.
- Zhai, Zhenhua (翟振華). *Red Flower of China: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oho Press, 1993.

英文論文

- Althusser, Louis.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p. 127-186.
- Bergman, Jay. "Valerii Chkalov: Soviet Pilot as New Soviet M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1, Jan. 1998, pp. 135-152.
- Bridger, Sue. "The Heirs of Pash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Woman Tractor

- Driver.” In Linda Edmondson, ed., *Gender in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 194-211.
- Cassiday, Julie A. “Kirov and Death in the *Great Citizen*: The Fatal Consequences of Linguistic Mediation.” *Slavic Review* 64:4, Winter 2005, pp. 799-822.
- Culp, Robert J. “‘Weak and Small Peoples’ in a ‘Europeanizing World’: World History Textbooks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Perspectives on Global Modernity.” In Tze-ki Hon and Robert J. Culp, eds.,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p. 211-245.
- Davis, R. W. and Oleg Khlevnyuk. “Stakhanovism and the Soviet Economy.” *Europe-Asia Studies* 54:6, Sept. 2002, pp. 867-903.
- Eisenstadt, S. N.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29:1, Winter 2000, pp. 1-29.
- Ellman, Michael. “Soviet Repression Statistics: Some Comments.” *Europe-Asia Studies* 54:7, Nov. 2002, p. 1151-1172.
- Fritzsche, Peter & Jochen Hellbeck. “The New Man in Stalinist Russia and Nazi Germany.” In Michael Geyer & Sheila Fitzpatrick, eds., *Beyond Totalitarianism: 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02-341.
- Gladney, Dru C.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 / Mino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1, Feb. 1994, pp. 92-123.
- Hellbeck, Jochen. “Speaking Out: Languages of Affirmation and Dissent in Stalinist Russia.”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1, Winter 2000, pp. 71-96.
- Hosking, Geoffrey.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R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ast and Present*, vol. 175, May 2002, pp. 162-187.
- Jones, Alisa. “Chang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 History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Edward Vickers & Alisa Jones, eds., *History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65-100.
- Kenez, Peter. “Black and White: The War on Film.” In Richard Stites, ed.,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Wartime Russia*.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66-173.
- Lasswell, Harold. “Propaganda.” In Robert Jackall, ed., *Propagand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

- Liu, Yu. "Maoist Discours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motion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36:3, 2010, pp. 329-362.
- Robins, Kevin, Frank Webster, and Michael Pickering. "Propaganda, Inform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In Jeremy Hawthorn, ed., *Propaganda, Persuasion and Polemic*.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87, pp 1-18.
- Roseffielde, Steven. "Stalinism in Post-Communist Perspective: New Evidence on Killings, Forced Labou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30s." *Europe-Asia Studies* 48:6, Sept. 1996, pp. 959-987.
- Rothstein, Robert A. "Homeland, Home Town, and Battlefield: The Popular Song." In Richard Stites, ed.,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Wartime Russia*.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77-94.
- "Sambo I、II"。《初級中學課本英語》，冊 5。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5，頁 50-52。
- Sausmikat, Nora. "Resisting Current Stereotypes: Privat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Former Rusticated Women." In Woei Lien Chong, ed.,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p. 255-283.
- Sheridan, Mary. "The Emulation of Hero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3, Jan.-March 1968, pp. 47-72.
- Suny, Ronald Grigor. "Book Review on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Slavic Review*, Spring 2007, pp. 106-108
- Thurston, Robert W. "The Soviet Family during the Great Terror, 1935-1941." *Soviet Studies* 43:3, 1991, pp. 553-574.
- Zhao, Suisheng.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3, Sept. 1998, pp. 287-302.
- 應曼蓉編，〈Two American Boys〉、〈A Negro Boy in the Soviet Union〉、〈Black Jimmy〉，《初級中學課本：英語》，冊 1。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頁 124-128。

俄文專書

- Ангелина, П. *Люди колхозных полей* (在集體農莊田野上的人).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4.
- Аннинский, Лев.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Николая Островского* (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8. 第三版.
- Арутюнян, Ю. В. *Механизаторы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в 1929-1957 гг.* (蘇聯農機人員, 1929-1957).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0.
-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1920-1925 гг.*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 文件) Москва: АО Буклет, 1994.
- Герберг, Семен Р. *Стаханов и стахановцы* (斯塔漢諾夫和斯塔漢諾夫工作者們).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5.
- Гудов, Иван И. *Путь Стахановца: Рассказ о моей жизни* (斯塔漢諾夫工作者之路：講述我的一生).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8.
- Залесский, К. А. *Империя Сталина: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斯大林帝國：傳記百科辭典).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0.
- Итоги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59 года СССР (сводный том)* (1959年蘇聯人口普查總結, 綜合卷). Москва: Госстатиздат, 1962.
- Корев, Ю. С. *Советская массовая песня* (蘇聯群眾歌曲). Москва: Музфонд СССР, 1956.
- Лебедев, А. ред. *Партия о кино* (黨論電影). Москва: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1939.
- McNeal, Robert H. ed. *И. В. 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斯大林選集)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67.
- Разаков, Федор И. *Наше любимое кино---Тайное становится явным* (我們喜愛的電影：秘密變成公開).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04.
- Сохор, А. Н. *О Музыка серьезной и легкой* (論嚴肅和輕鬆的音樂). Ленинград: Музыка, 1964.
- Сохор, А. Н. *Рус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песня* (俄國、蘇聯歌曲). Ленинград: Советский композитор, 1959.

- Трегуб, Семен А.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 (1904-1936)* (尼古拉·雅列克塞維奇·奧斯特洛夫斯基).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0.
-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 *Что делать? Из рассказов о новых людях* (怎麼辦?新人的故事).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9.

俄文論文

- Гюнтер, Ханс. “Поющая родина: Советская массовая песня как выражение архетипа матери.” (歌唱祖國：蘇聯群眾歌曲所表現的母親原型)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文學問題) No. 4, 1997, с. 46-61.
- Довин, Е. & С. Кара, “Тема художника: ‘Учитель’ с Герасимова.” (藝術家的課題：《教師》與格拉莫西夫) *Искусство в жизни* (生活的藝術), Ленинград, No. 10, 1939, с. 32-34.
- Радищ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Н. “Беседа о том, что есть 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 (談有關祖國之子), *А. Н. Радищев: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 (阿·尼·拉季雪夫：哲學作品選集)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 с. 262-270.
- “Прие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й 8 стран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毛主席接見八個拉丁美洲國家代表)《十年制學校高中課本：俄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 第一版)，冊 2，頁 45-47。
- Рыжкова, Н. А. “Массовая музыка 20-х годов: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х нотных каталогов.” (1920 年代的群眾音樂) Е. В. Дуков, *Между обществом и властью: Массовые жанры от 20-х к 80-м годам XX века* (介於社會和政權之間：群眾樂種，1920-1980 年代)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2002, с. 164-173.
-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о том, чт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и все реакционные элементы — бумажные тигры.” (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北京師範大學外文系普通教育改革小組編，《九年一貫制試用課本（全日制）：俄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第 1 版，冊 13，頁 27-30。
- Толстая-Стегал, Елена. “К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фону книги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文學背景)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etique* 22: 4, Oct.-Dec. 1981, с. 375-399.
- Туровская, Майя. “Кино тоталитарной эпохи.” (極權時代的電影) Л. Х. Маматова ред., *Кино: Политика и люди (30-х годы)* (電影：政治與人民，1930 年代)

Москва: Материк, 1995, с. 26-51.

網路文章

- 〈「保爾」是昨天的英雄？〉, <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6.htm> (2000年11月17日檢索)。
- 〈40年代, 延安大生產運動〉,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206> (2014年2月12日檢索)。
- 〈共產主義道德〉《中國共產黨新聞——人民網》,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73273/10415162.html> (2014年3月8日檢索)。
- 〈我校解放初期校長王芝九介紹〉, 《蘇州市第一中學百年校慶》, <http://www.sz1z.com/xq/ReadNews.asp?NewsID=2962> (2010年3月27日檢索)。
- 〈理解全國勞模大會簡介〉, <http://acftu.people.com.cn/BIG5?67589/4612353.html> (2007年11月23日檢索)。
- 〈勞模評選引發三大爭議〉, 南方周末, http://news.runsky.com/homepage/n/rec/use_rorbjectlai547979.html (2006年8月11日檢索)。
- 〈鋼鐵咋這樣煉成了？〉, <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7.htm> (2000年11月17日檢索)。
- 尹曙生, 〈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 <http://mj1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320> (2013年7月21日檢索)。
- 余岱宗, 〈樣板戲的「禁慾」與樣版戲的偽激進〉, 《世紀中國》, <http://www.cc.org.cn/> (2001年4月20日檢索)。
- 李輝, 藍英年, 〈一個世紀的漫長接觸和影響——關於蘇聯文學與中國的對話〉 (上), 中構網: <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12.htm> (2000年11月17日檢索)。
- 李霞影, 〈幸福的回憶——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週年〉, 《江南大學報》, <http://www.jnrain.info/indxb/83wenxue.html> (2004年8月2日檢索)。
- 法正居士, 〈「文革」時期的外國歌曲——我的記憶〉, <http://jingshenkj.blog.sohu.com/120710035.html> (2014年1月27日檢索)。
- 邱小兵, 〈一樁不同尋常的離婚訴訟——作曲家劉熾的愛情悲歡〉, 《家庭》, 1994年第10期, <http://shang.cnfamily.com/199410/ca20957.htm> (2013年12月30日檢索)。
- 范若丁, 〈尋找保爾·柯察金〉, <http://book.peopledaily.com.cn/big5/paper17/1/class>

- 001700002/hwz1119.htm (2000年11月11日檢索)。
- 徐祖哲，〈保爾精神鼓舞我們前進〉，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72296010097rl.html (2014年1月24日檢索)
- 張朝陽，〈暗戀冬妮婭〉，中構網：<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5.htm> (2000年11月17日檢索)。
- 淳亮，〈《鋼鐵》——那燃燒著的真實人生〉，http://culture.163.com/edit/000707/000707_31399.htm (2014年1月24日檢索)。
- 陸谷孫，〈歌的流變〉，《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38226> (2009年12月3日檢索)。
- 曾遂金，〈歷史的詩篇：二戰時期前蘇聯群眾歌曲再思考〉，<http://yule.sohu.com/20050816/n226691076.shtml> (2005年8月16日檢索)。
- 朝紅陽，〈我是公社的拖拉機手〉，<http://www.xilicun.net/syrg0/Xilicun/Tractor.html> (2014年1月24日檢索)。
- ，〈歲月如歌——大院春秋〉，<http://www.xilicun.net/syrg0/Xilicun/Dayuan.htm> (2014年1月28日檢索)。
- 楊占城，〈我國工資制度的發展變遷〉，<http://news.sohu.com/20060208/n241732611.shtml> (2007年5月2日檢索)。
- 董曉敏，〈在遼闊的烏克蘭草原上〉，<http://ourgoldenage.org/article-1404-1.html> (2014年1月24日檢索)。
- 趙阿華，〈我的父親母親〉，<http://culture.enorth.com.cn/system/2002/12/19/000476240.shtml> (2002年12月19日檢索)。
- 劉小楓，〈冬妮婭的中國情節〉，中構網：<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10.htm> (2000年11月17日檢索)。
- 劉亞樂，〈給胡金梅老師的一封信〉；劉書琴，〈在工作中體驗保爾〉，<http://www.zuowen.com> (2000年6月21日檢索)。
- 謝晉，〈我拒刪《紅色娘子軍》中的愛情戲〉，《鳳凰視頻》，2008年10月25日，<http://v.ifeng.com/e/200810/8f9bd63f-01bf-4b65-9a71-a4ab43e472e7.shtml> (2014年1月23日檢索)。
- “National Literacy Policies/China.” <http://www.accu.or.jp/litdbase/policy/chn/index.htm> (2007年9月11日檢索)。
- “Время победы: История знаменитой песни ‘Катюша’.” (勝利的時刻：名歌〈喀秋莎〉的歷史) Новости: Первый Канал (31 марта 2005), <http://www.ltv.ru/>

[news/social/74325](#) (2013年5月17日檢索)。

Желт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й Стаханов закончил жизнь в сумасшедшем доме,” (斯塔漢諾夫在瘋人院過世) *Смена* (接班人), 12-10-2005, <http://smena.ru/news/2005/10/12/6117> (2007年4月19日檢索)

Самоделова, Светлана. “Переплавленная жизнь.” (重新評說的一生)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莫斯科共青團員) <http://www.mk.ru/editions/daily/article/2006/11/20/175049-pereplavennaya-zhizn.html> (2014年7月19日檢索)。

“СССР.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蘇聯：農業) <http://dic.academic.ru/dic.nsf/bse/129091/%D0%A1%D0%A1%D0%A1%D0%A0> (2014年10月14日檢索)。

Шеремет, Павел. “Стаханов отдыхает.” (斯塔漢諾夫休息) *Огонёк*, (星火) No. 33 (5142), 2010年8月23日, 頁26, 轉引自 <http://www.kommersant.ru/doc/1486492/print> (2013年10月11日檢索)。

電影

紀錄片 *All under Heaven*, directed by Carma Hinton, 1985.

中國

《人民的巨掌》(1950)。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上海姑娘》(1958)。 http://www.56.com/u24/v_OTMwMDUzNjU.html。

《千萬不要忘記》(196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4NTc4Njcy.html?f=22045701。

《五朵金花》(1959)。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天羅地網》(1955)。濟南：齊魯音像出版社，2004。

《火紅的年代》(1974)。中國經典懷舊電影收藏館，第九部

《北國江南》(1963)。 http://www.56.com/u94/v_MTAxMDkyNjM1.html。

《白毛女》(1950)。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白毛女》、《紅燈記》、《龍江頌》、《海港》、《杜鵑山》、《沙家濱》、《龍江頌》、《海港》、《智取虎威山》，均來自《中國樣版戲大全》，河北百靈音像出版社，2012。

《冰山上的來客》(1963)。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早春二月》(1963)。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我們村裡的年輕人》(1959)。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續集）》(1963)。中國經典懷舊電影收藏館，第七部。
- 《幸福》(1957)。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武訓傳》(1950)。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花好月圓》(1958)。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虎穴追蹤》(1956)。濟南：齊魯音像出版社，2003。
- 《阿詩瑪》(1964)。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青春之歌》(195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W5bYc6uhR8>。
- 《青春的腳步》(1957)。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前哨》(1959)。濟南：齊魯音像出版社，2003。
- 《南海的早晨》(1964)。 http://www.56.com/u60/v_ODkxMzQ3MjE.html。
- 《思想問題》(1950)。 http://www.56.com/u82/v_MTA3MzM3ODA3.html。
- 《柳堡的故事》(1957)。北京：中國三環音像社，2006。
- 《紅色娘子軍》(1962)。中國經典懷舊電影收藏館，第九部。
- 《英雄虎膽》(1958)。北京：中國三環音像社，2004。
- 《秘密圖紙》(1965)。北京：中國三環音像社，2004。
- 《國慶十點鐘》(1956)。濟南：齊魯音像出版社，2003。
- 《斬斷魔爪》(1954)。 http://www.56.com/u79/v_NTA1MjUwOTI.html。
- 《尋愛記》(1957)。濟南：齊魯音像出版社，2006。
- 《無形的戰線》(1949)。濟南：齊魯音像出版社，2004。
- 《媽媽要我嫁》(1956)。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跟蹤追擊》(1963)。廣州：珠影白天鵝音像出版社，2003。
- 《雷鋒》(1964)。 http://www.56.com/u47/v_NTA1OTIxMTY.html。
- 《奪印》(1963)。北京：中國三環音像社，2005。
- 《槐樹莊》(196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3MTQ2NTY4.html。
- 《箭杆河邊》(1964)。北京：中影音像出版社，2005。
- 《霓虹燈下的哨兵》(1964)。濟南：齊魯音像出版社，2000。
- 《蘆笙戀歌》(1957)。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護士日記》(1957)。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鐵道衛士》(1960)。濟南：齊魯音像出版社，2003。

蘇聯

- 《306號案件》(Дело № 306, 1956)。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一個人的遭遇》(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1959)。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士兵之歌》(Баллада о солдате, 1959)。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小船長》(Пятнадцатилетный капитан, 1945)。瀋陽：半島音像出版社，2002。
- 《山中防哨》(Застава в горах, 1953)。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不能忘記這件事》(Об этом забывать нельзя, 1954)。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光明之路》(Светлый путь, 1940)。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共產黨員》(Коммунист, 1957)。Москва: Мастер Тэйп Интернейшнл。
- 《列寧在一九一八》(Ленин в 1918г, 1939)。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列寧在十月》(Ленин в октябре, 1937)。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拖拉機手》(Трактористы, 1939)。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保爾·柯察金》(Павел Корчакин, 1956)。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庫班河上的哥薩克人》(Кубанские казаки, 1949)。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海底擒謀》(Тайна двух океанов, 1955)。http://www.56.com/u49/v_NDI4NDU4MzA.html。
- 《秘密使節》(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1950)。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偉大的公民》，上、下集(Великий гражданин, 1937-1939)。<http://megogo.net/ru/view/6866-velikiy-grazhdanin.html>。
- 《區委書記》(Секретарь райкома, 1942)。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教師》(Учитель, 1939)。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第四十一》(Сорок первый, 1956)。北京：中國青少年音像出版社，1997。
- 《陰謀》(Заговор обреченных, 1950)。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晴朗的天空》(Чистое небо, 1961)。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最高的獎賞》(Высокая Награда, 1939)。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雁南飛》(Летят Журавли, 1957)。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銀灰色的粉末》(Серебристая пыль, 1953)。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鋤奸記》(Поединок, 1944)。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魯勉柴夫案件》(Дело Румянцева, 1955)。廣東：深圳音像公司，1999。
-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1942)。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 《黨證》(Партийный билет, 1936)。廣東：深圳音像公司，2005。

索引

Alov, Aleksandr A. (Александр А. Алов)
/ 61

Anninskii, Lev A. (Лев А. Аннинский)
/ 51

Culp, Robert / 9-10, 120-121

Donskoi, Mark S. (Марк С. Донской) /
61

Figes, Orlando / 9, 224, 351

Hellbeck, Jochen / 9, 351

Heller, Mikhail / 18

Kaganovsky, Lilya / 9, 65

Kharkhordin, Oleg / 26, 59

Kostrov, Taras (Тарас Костров) / 48

Kotkin, Stephen / 8-9, 351

Lasswell, Harold D. / 6

Munro, Donald J. (孟旦) / 10

Naumov, Vladimir N. (Владимир Н.
Наумов) / 61

Turovskaia, Maiia / 184

Verne, Jules G. / 179

一畫

一超多強 / 122

一網一本 / 96

一邊倒 / 5, 16, 36-38, 86, 93-94, 99,

138, 140

二畫

《人生在世》 / 300

丁玲 / 231-232

七屆二中全會 / 36-37

二次大戰 / 52, 98, 101, 111-112, 131,
325-326, 340, 345

人民公社 / 40, 144, 214, 220, 332, 349

人民民主國家 / 98-99

人民教育出版社 / 人教社 / 54, 92, 94,
96, 104, 110, 119, 353

九評蘇共中央 / 40, 109

人權 / 113-114

八屆十中全會 / 109, 212, 252, 349

八路軍辦事處 / 53

十月革命 / 7, 23, 27, 50-51, 62, 98, 100,
106, 116-117, 127-128, 163, 177,
180, 234, 299, 312

三畫

《三里灣》 / 242

《士敏土》 / 41

三大戰役 / 35, 187

三民主義 / 33-34, 90, 120, 360

- 三面紅旗 / 109, 247, 352
- 三個世界 / 41, 86, 105-106, 112, 118, 120
- 大整肅 / 67, 131, 161, 163, 177, 182, 233, 345, 347, 349
- 大躍進 / 4, 40, 43, 66, 86, 95-96, 107-109, 114, 117, 122, 144, 153, 171, 174, 208, 210, 212, 217, 242, 245, 248, 250, 256, 274, 295-298, 306, 320-324, 327, 332, 344, 346, 352, 355
- 工會 / 3, 36, 38, 272
- 工業化 / 50, 66, 100, 184, 262, 312, 319, 324-325, 347
- 四畫
-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 37
- 《丹孃的故事》 / 41, 54
- 不斷革命 / 18, 42, 77, 143, 204, 220, 349, 357
- 中共 / 中國共產黨 / 1-5, 7, 10-21, 27-30, 32-44, 46, 53-55, 59-62, 65-71, 74, 78, 80, 82-84, 86-87, 89-93, 95, 97, 102, 104, 106, 109-110, 112-115, 117-122, 126-127, 132-138, 141-146, 150-151, 155, 159-160, 163-164, 166, 169-170, 174-175, 177-180, 182, 185-191, 194-195, 197-199, 202-207, 209-210, 213, 215, 217-220, 223-224, 227-232, 235, 240, 246, 248-251, 253, 256, 259, 262, 266-270-273, 275, 279-284, 286-288, 291, 294-296, 298-299, 301-313, 315-320, 322, 328-329, 332-334, 336-338, 340, 343-344, 346, 348-350, 352-361
- 中宣部 / 中共中央宣傳部 / 27, 35, 82, 88-89, 92, 231
- 中蘇友好協會 / 38, 53
- 中蘇關係 / 5, 17-18, 30, 36, 39-40, 67, 70, 86, 105, 108, 110, 117, 142-143, 159, 166, 209, 354
- 丹娘 / 69
- 五七幹校 / 298
- 五四 / 五四時期 / 20, 27, 44, 54, 122, 223, 225, 227
- 五項原則 / 113
- 厄姆勒 (Фридрих М. Эрмлер) / 183
- 反右運動 / 2, 66, 106, 119, 121, 144, 152, 165, 174, 199, 204-206, 230, 242, 246-247, 349, 354
- 反革命分子 / 42, 174, 188, 219-220, 349
- 反帝反殖 / 114, 120, 144
- 反霸 / 反霸權主義 / 86, 119, 123, 187
- 天戈 / 154
- 巴勒斯坦 / 118
- 戈巴契夫 / 266
- 文革 / 文化大革命 / 4-5, 36, 41, 43-44, 70-73, 76-78, 86-88, 96, 104, 109-110, 112, 117-118, 122, 144-146, 154, 156, 158-159, 161, 167-169, 174-175, 178, 206, 208-209, 213, 216, 219, 242-243, 252-258, 275,

293, 298-301, 322-324, 327-328,
335, 341, 346, 350, 352, 354-355,
357-359

日內瓦會議 / 113

日本 / 15, 19, 86, 104, 112-113, 122,
130, 133, 142-143, 197, 281, 305,
309

日本開拓團 / 309

木青 / 143

毛澤東 / 毛主席 / 1, 3-5, 7, 10-14, 17-
18, 33, 36-37, 39-40, 42, 46, 67-69,
71, 75, 83, 86, 88-90, 92, 96, 104-
107, 109-110, 112, 115-116, 118-
119, 121, 125, 127, 134, 136-141,
144-147, 154, 156, 158-159, 162,
166-167, 169-171, 173, 175-176,
186-187, 189, 192-193, 195, 203-
206, 208-210, 212-214, 217, 219-
220, 225, 229, 240, 250, 253, 255-
257, 267, 269-270, 272, 284-285,
294, 297-298, 300, 303, 306, 308,
310, 313, 321-324, 338, 341, 344-
350, 352, 355-357

王汎森 / 20

王杰 / 69

王芝九 / 92-93, 113

王崇倫 / 274, 290, 294

王莘 / 137

王進喜 / 275, 300

王蒙 / 134, 169, 170

王雙印 / 125, 145

五畫

《古麗雅的道路》 / 54

《外國名歌 200 首》 / 139-140, 143,
146, 157, 159-160, 162-163, 168

世界地理 / 42, 87, 96-97, 110, 114, 116

世界革命 / 42, 112, 118-119, 126, 144-
145, 169, 216

世界歷史 / 42, 87, 93-94, 97, 100, 111-
112, 119

丘爾金 (Александр Чуркин) / 138

以蘇聯為首 / 86, 97, 110-111

主體 / 3, 14, 356

冬妮婭 / 48, 57, 72, 76-78, 250, 354

出版總署 / 54, 85, 87, 89, 91, 94

包產到戶 / 212

北京大學 / 63, 65, 74, 102, 157, 200

北越 / 98

北戴河會議 / 212

北韓 / 98, 112, 142, 159, 162

卡翁達 / 112

卡斯楚 / 116

古巴 / 10, 116, 142-143, 155, 352

右派 / 右派分子 / 144, 152, 174, 195,
199, 204-208, 212, 214, 237, 242,
276, 327, 349, 354

台海危機 / 174, 206

四人幫 / 71, 257, 300-301, 346

四清五反運動 / 213

市場經濟 / 5, 79, 82, 302-303, 305-306,
342, 350, 352, 359

布加勒斯特會議 / 40

- 布哈林 / 183
- 布爾什維克 / 7, 23, 25, 49-50, 58, 60, 180
- 民族解放運動 / 97, 111, 113-114, 142
- 田桂英 / 272
- 田漢 / 27, 75, 178
- 申紀蘭 / 336
- 白軍 / 49, 58, 60, 76, 83, 209, 218, 354
- 皮亞塔克夫 (Георгий Л. Пятаков) / 183
- 六畫
-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 203, 207
- 伊凡諾夫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 / 163
- 伊紐什金 (Михаил Инюшкин) / 139
- 伊薩克夫斯基 (Михаил В. Исаковский) / 129, 131
- 光未然 / 144
- 全國工作競賽 / 284, 360
- 共青團 / 8, 38, 47-49, 57-58, 60, 62-63, 65, 68, 70, 76, 78, 109, 181, 263, 316
- 列別杰夫—庫馬契 (Василий И. Лебедев-Кумач) / 129-130, 132-133, 138
- 列寧 / 10, 12-13, 23-28, 30-32, 51, 54, 61, 86, 99, 125-127, 163, 175, 180, 183, 185, 196, 209, 213, 224, 231-232, 236, 297, 312, 321, 347
- 匈牙利 / 39, 106, 110, 203, 207
- 印尼 / 112-113, 117, 142-143, 155-156
- 同工同酬 / 336-337
- 向警予 / 227, 229
- 合作化 / 合作化運動 / 66, 241-242, 273, 310-311, 314, 321, 348
- 地主 / 24, 154, 174, 180, 182, 186, 190-191, 207, 212-215, 249, 252, 271, 349, 353
- 地富反壞右 / 173, 175, 206, 213
- 多爾瑪托夫斯基 (Евгений А. Долматовский) / 129
- 安波 / 143, 156
- 安娥 / 140, 152
- 安格林娜 (Паша Ангелина) / 311-313
- 托洛斯基派 / 托洛斯基分子 / 托派分子 / 48, 60, 181-183, 185, 347
- 朱玖 / 290
- 朱德 / 162, 269
- 朱踐耳 / 145
- 朱駒 / 140
- 百花齊放 / 百家爭鳴 / 雙百 / 13, 114, 136, 149, 160, 165, 189, 202-203, 205, 218, 240-242, 248, 274
- 米哈爾克夫 (Сергей Михалков) / 125, 146
- 米留汀 (Юрий С. Милютин) / 129, 138
- 羊鳴 / 154
- 老鬼 (馬波) / 62, 74, 76
- 自由主義 / 6, 29, 195, 197-198, 208, 232, 342
- 艾奇遜 / 103
- 艾森斯坦 (Сергей М. Эйзенштейн) /

- 177, 180
 衣佐托夫 (Никита А. Изотов) / 263
- 七畫
-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 297
 余永澤 / 248-249, 256
 克難英雄運動 / 360
 吳運鐸 / 53, 67-68
 吳滿有 / 268
 呂驥 / 132, 140-141, 147
 希特勒 / 103-104
 希揚 / 144
 抗美援朝 / 61, 63, 102, 137, 230, 278
 抒情歌曲 / 128, 130, 146-147, 149,
 150-151, 154, 156, 159, 160, 164,
 169-170
 李名方 / 142, 144
 李伯釗 / 133
 李劫夫 / 143, 145-146
 李求實 / 133
 李素文 / 300
 李貢 / 69
 李森科 / 26
 李煥之 / 144, 165
 李瑞環 / 275
 杜那耶夫斯基 (Исак О. Дунаевский)
 / 129-130, 138
 杜魯門 / 103
 沙可夫 / 133
 沙皇 / 100, 104, 180
 沈志華 / 17, 37, 40, 107, 204, 354
 沈霞 / 229-230
- 男女平等 / 5, 12-13, 43, 58, 308, 315-
 317, 321-322, 333, 335-337, 339-
 343
 私有制 / 98, 106
 車爾尼雪夫斯基 (Николай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 22-23, 27
- 八畫
- 《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 41
 亞非拉 / 112-113, 116-119, 142-144,
 155, 170
 亞非會議 / 113-114, 117
 亞歷山大羅夫 / 亞歷山大羅夫將軍
 (Александр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 /
 129, 132, 139
 兩條路線鬥爭 / 13, 173, 208, 216, 245,
 347
 周化岭 / 154
 周建人 / 89
 周恩來 / 60, 113, 269, 273, 296
 周巍峙 / 137
 孟什維克派 / 58
 孟用潛 / 108
 孟泰 / 272, 290, 294
 宗派主義 / 29
 帕夫利克 (Павлик Морозов) / 181
 延安文藝講話 / 175
 延安時期 / 13, 21, 28, 32-33, 35, 44, 92,
 136, 178, 190, 225, 228-229, 262,
 267, 270, 282-283, 286-287
 延安整風 / 30, 32, 53
 拉丁美洲 / 86, 97, 112-113, 115-117,

- 119, 142
- 拉狄克 (Карл Б. Радек) / 183
- 拉赫梅托夫 (Рахметов) / 22
- 拖拉機手 / 5, 14, 43, 232-234, 272-273, 307-316, 323-341, 345
- 東歐 / 37, 98, 102, 106, 110, 112, 309
- 林彪 / 118, 158, 167, 257
- 林道靜 / 248-250
- 波克拉斯兄弟 (Дмитрий Я. и Даниил Я. Покрассы) / 129, 134
- 波蘭 / 39, 49, 58, 106, 154, 203, 258
- 法西斯政權 / 182, 184
- 狐步 / 170
- 知青 / 74, 167-168, 255-256, 298, 328, 330, 333, 337-338, 340, 352
- 社會主義陣營 / 37, 86, 97-98, 105-107, 109-113, 117, 140
- 社會革命黨 / 58, 183
- 金山 / 60
- 金帆 / 144, 165
- 金敬邁 / 69-70, 343
- 金燦然 / 91-92
- 阿雷莫夫 (Сергей Алымов) / 138
- 阿圖舍 (Louis Althusser) / 3
- 阿爾及利亞 / 117, 142-143
- 阿爾巴尼亞 / 110, 159
- 非洲 / 86, 112-115, 117, 119, 142
- 冼星海 / 127
- 九畫
- 《怎麼辦？》 / 22-23
- 《政治經濟學》 / 89
- 《革命歌集》 / 133
- 《被開墾的處女地》 / 53
- 保爾·柯察金 (Павел Корчакин) / 26, 45-46, 52-53, 59, 61-62, 65, 67-68, 70-71, 74, 76, 80, 315, 339, 354
- 保爾精神 / 46, 52, 55, 59-60, 62-63, 65-67, 70-71, 73-75, 80-84
- 俄共 / 蘇共 / 蘇聯共產黨 / 5, 8, 25, 31, 39-40, 52, 67, 70, 82, 105-106, 109, 125, 127-128, 160, 167, 175, 183, 209, 220, 224, 226, 263-264, 266, 347, 348
- 俄國 / 蘇聯 / 2, 5, 7-11, 13, 15, 16-17, 21-24, 26-28, 30-31, 36-41, 45-52, 54, 59, 61-62, 66-67, 69-72, 79-84, 86, 92-94, 96-102, 104-112, 117-120, 122, 125, 127-135, 138-140, 145, 150, 152, 157, 159-171, 173, 177-185, 191, 193-194, 196, 199-200, 205, 207-209, 218, 220, 224, 226-227, 232-237, 239, 241, 244, 246, 250-251, 253, 258-259, 261-268, 274, 278, 280, 285-288, 292-299, 306-307, 309, 311-315, 319, 324-326, 329-330, 332-335, 338-340, 343-352, 354, 358
- 勃蘭切爾 (Матвей И. Блантер) / 129, 131, 139
- 南京政府 / 90, 96, 102, 120
- 南斯拉夫 / 2, 98, 110, 207
- 契卡洛夫 (Валерий П. Чкалов) / 344
- 姜椿芳 / 53, 132, 162

姚明 / 303
 姚筱舟 / 145
 帝國主義 / 4, 33-34, 36, 41, 86, 93, 96-99, 102-104, 106, 109, 111, 113-120, 126, 133, 137, 142, 144, 151, 174, 180, 182-184, 186-189, 194, 201, 207, 231, 272, 348, 355, 358
 思想改造 / 2, 11, 29, 89, 211, 282, 297
 按件計酬 / 292, 295
 柯雷切夫 (Осип Колычев) / 139
 查哈羅夫 (Василий Захаров) / 163
 柳湜 / 89
 洪長泰 / 33
 紅衛兵 / 4, 88, 122, 167, 299, 352, 355
 紀廉 (Nicolas Guillen) / 116
 美國 / 5, 15, 36, 58, 86, 96-104, 106-109, 111-112, 115-116, 118-120, 122, 130, 133, 137, 143, 157, 178-179, 184, 194, 198, 207, 230, 309-310, 344, 353, 358
 美麗其格 / 141
 胡石言 / 165
 胡風集團 / 174, 195, 197-198
 胡萬春 / 300-301
 胡繩 / 89
 胡耀邦 / 70
 茅盾 / 103-104, 178, 229
 英雄主義 / 29, 59, 155, 168, 282, 329, 338
 郁文 / 125, 145
 革命接班人 / 88
 韋息予 / 91

十畫

《真正的人》 / 41, 75
 個人主義 / 4, 20, 29-30, 43, 57, 59, 64, 68, 70, 78, 157, 168, 195, 197-198, 205, 215, 233, 238-239, 246-247, 253, 291, 344
 個人崇拜 / 11, 66-67, 69, 105, 145-146, 177, 266
 修正主義 / 67, 70-71, 109-110, 118, 175, 207-213, 254, 348
 倪志福 / 275
 倫巴 / 155, 170
 夏衍 / 246-247
 孫叔平 / 38
 孫維世 / 60, 76
 時傳祥 / 275, 299-300, 306
 海涅 (Heinrich Heine) / 114
 涅克拉索夫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 / 129
 特務 / 174, 184, 186, 188-189, 191-195, 197-203, 206-207, 217, 221, 354
 留邦 (Исаак Любан) / 139
 索洛維約夫—謝多伊 (Василий П. Соловьев-Седой) / 129
 袁水拍 / 140
 郝建秀 / 274, 279-281, 286-287, 300, 343
 馬文瑞 / 317-318, 321,
 馬可 / 8, 140
 馬列學院 / 21, 28
 馬林 (Maring, Hendricus Sneevliet) / 31

馬克思 / 10, 232
 馬思聰 / 142
 《(馬恩列斯) 思想方法論》 / 89
 馬都索夫斯基 (Михаил Л. Матусовский) / 129
 高玉寶 / 75-76
 高如星 / 165
 十一畫
 唯物論 / 7, 22-23, 28, 337
 國民黨 / 中國國民黨 / 12-13, 15-16, 31-34, 55, 90-91, 95-96, 102, 120-121, 174, 178, 186-189, 192-194, 200, 206-207, 219, 230, 241, 243, 268, 275, 284, 354, 359, 360-361
 國共內戰 / 35, 53, 67, 88, 179, 193, 270, 275, 317
 國際主義 / 4, 12, 85, 126, 136-140, 142, 144, 146, 169-170
 國營農場 / 66, 309, 315-316, 324, 326, 328, 336, 340
 基洛夫 / 183
 婦女聯合會 / 38, 319
 尉鳳英 / 300
 屠格涅夫 / 22, 27, 297
 張明權 / 148
 張春橋 / 254
 張秋風 / 268
 張國燾 / 227
 張朝陽 / 77-78
 張聞天 / 28
 張灝 / 9, 19

教材 / 教科書 / 10, 14, 20, 41-42, 52, 54, 58-59, 85, 87-97, 99, 101-102, 104, 108-110, 111-115, 117, 119-123, 210, 250, 297, 313, 343, 353, 355, 359
 教育部 / 12, 88-89, 91-96, 111-112, 231
 晨耕 / 147
 曹楊新村 / 288-289
 梁軍 / 272, 313, 315-316, 327, 329-331, 333-335, 337
 梁啟超 / 9, 18-20, 45-46, 357, 359
 梅朵 / 194, 235, 238-239
 梅益 / 45, 47, 53-56, 71-72
 第三世界 / 86, 112, 118-119
 習近平 / 304-305
 莫斯科東方大學 / 133
 郭小川 / 167
 郭沫若 / 140
 郭頌 / 153
 陳少敏 / 279
 陳原 / 97-99, 115, 133-134
 陳荒煤 / 202-203, 259
 陳雲 / 229, 284
 陳歌辛 / 136, 152
 陳獨秀 / 227
 陸定一 / 89, 95, 327
 陸阿狗 / 288
 麻扶搖 / 137

十二畫

〈愛情的位置〉 / 257
 《普通一兵—亞力山大·馬特洛索

- 夫》 / 41, 54, 76
 《解放日報》 / 26, 29-30, 288
 《解凍》 / 200
 斯大林模式 / 蘇聯模式 / 11, 16-17, 343-350
 勞模 / 勞動模範 / 5, 8, 9, 13-15, 26, 43, 81, 163, 234, 241, 251, 261-267, 269-280, 282-306, 313-314, 335-336, 339, 343, 345, 353, 356, 360
 勞模精神 / 282, 301-304
 喬羽 / 161
 富農 / 100, 174, 180-181, 183, 185, 212-214, 346
 彭述之 / 227
 斯大林 / 8, 11, 13, 16, 23, 25-28, 38-39, 45, 50, 54, 59-60, 66-67, 81, 98-99, 105, 110, 125, 131, 138-140, 146, 159-160, 162-163, 170, 173, 175, 177, 179-180, 182-184, 200-202, 208-209, 220, 224, 235-236, 251, 258-259, 264-266, 286, 294, 297-298, 306, 315, 319, 343-348, 350, 358
 斯塔漢諾夫 (Алексей Г. Стаханов) / 26, 261-269, 274, 279-280, 284, 287, 292-295, 298, 343, 360
 斯塔漢諾夫運動 / 261-269, 284, 292, 294, 360
 普多夫金 (Всеволод И. Пудовкин) / 177
 普希金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 128, 297
 殖民主義 / 4, 41, 86, 112-114, 119, 142
 無產階級 / 12-13, 15, 23-26, 28, 51-52, 56-58, 68, 71-72, 118, 125-126, 140, 147, 175, 178, 182, 186, 203-205, 207-208, 212, 215-217, 224-226, 241, 246, 253-257, 259, 300, 357
 無產階級革命 / 23, 52, 71-72, 178, 225-226, 253, 257
 程今吾 / 231-232
 程映紅 / 10-11, 351
 肅反 / 2, 174, 195, 219, 345, 347-349
 舒米亞斯基 (Борис З. Шумяцкий) / 177
 萊蒙托夫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 128
 賀綠汀 / 147, 170
 進化論 / 19, 22, 272
 階級立場 / 12, 15, 58-59, 68, 72, 109, 176, 186, 191, 205, 216, 240, 343
 階級鬥爭 / 4, 12-13, 24, 27, 41-42, 67, 71, 73, 82, 97, 105, 109, 120, 122, 128, 145, 158, 169, 171, 173-176, 190, 198, 203-204, 206, 208-216, 218, 220, 236, 250, 253-254, 345-350, 355
 階級異己分子 / 212, 219
 階級敵人 / 76, 122, 182, 184, 189, 203, 209, 211, 215, 219-220, 231, 346-348
 集體/集體主義 / 大我 / 4-8, 10, 12-13, 15, 19-22, 25-26, 28, 43, 50, 55-56, 59, 64, 79, 91, 95, 100, 127, 130-131, 134, 136, 138, 146-147, 149,

152-154, 159-160, 163-166, 168-170, 180, 194, 197, 205, 212-214, 219-220, 223-226, 229-231, 233-236, 239, 241-242, 244, 246-247, 256-258, 262, 274-275, 277-278, 282, 291, 297, 302, 305, 310-312, 314, 317-318, 324, 326, 329, 343-348, 352, 357-359, 361

馮至 / 102

黃色音樂 / 149-150, 153

黃克武 / 9, 18-19

黃宗江 / 165

黃繼光 / 69

十三畫

塞克 / 132

塔爾可夫斯基 (Арсений Тарковский)
/ 139

奧氏 / 奧斯特洛夫斯基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 / 45,
46-52, 53, 56, 60, 63, 66, 70, 72, 75,
82-83, 297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 3, 14, 121, 356

愛國主義 / 4, 12, 42, 85, 90, 126, 138,
146, 155, 169-170

新民主主義 / 1, 62, 174

新民說 / 9, 18-19

新婦女 / 43, 307-308, 310, 315-316,
318, 338-339

新蘇聯人 / 7-9, 52, 265, 343

楊沫 / 54, 74

楊奎松 / 17, 219

楊富珍 / 288

楊繼繩 / 352

萬隆會議 / 113-114, 142

群眾歌曲 / 大眾歌曲 / 15, 42, 125-133,
135-136, 138, 141, 145, 149-150, 153,
156-161, 164-171, 344-345, 356

葉聖陶 / 89

葛·彼得洛夫斯基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 / 51-52

董必武 / 284

董存瑞 / 67, 69

蛻化分子 / 206, 213, 215-216, 353

喬式娟 / 274, 288

資本主義陣營 / 86, 97-98, 113, 180

路學長 / 79-80

雷鋒 / 10, 19-20, 68-70, 76, 145, 217,
219, 323, 343

十四畫

廖承志 / 62

種族歧視 / 99, 101-102, 113

管平 / 147

維爾什寧 (Михаил Вершинин) / 139

蒙古 / 74, 98, 140, 142, 311

赫魯雪夫 / 39-40, 67, 105, 107, 167,
177, 202, 209

趙占魁 / 268

趙楓 / 132, 156

趙樹理 / 242

十五畫

〈論十大關係〉 / 39-40

-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 21, 28
 劉小楓 / 78
 劉少文 / 53
 劉少奇 / 21, 28-30, 34, 85, 167, 269, 271, 299-300
 劉心武 / 254, 257
 劉永好 / 303
 劉胡蘭 / 67, 69, 168
 劉清揚 / 338
 劉翔 / 303
 劉熾 / 161
 德萊賽 (Theodore Dreiser) / 199
 德蘇戰爭 / 177
 歐陽海 / 69-70, 343
 潘文林 / 153
 潘克拉托伐 (Анна М. Панкратова) / 93
 緬甸 / 113, 117
 蔣介石 / 36, 104, 187, 214, 231, 309
 蔡和森 / 227, 229
 鄭昶 / 96-97
 鄭淵潔 / 306
 鄭超麟 / 227-228
 鄧小平 / 5, 95, 118-119, 246
 鄧稼先 / 304
 鄧穎超 / 223, 232, 316
 鞏志偉 / 155
 魯迅 / 32, 102
- 十六畫
- 《戰地新歌》 / 158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 26, 41, 45-49, 52-58, 60-62, 66-68, 71-79, 81-82
 整風 / 28, 30, 32, 53, 203-204, 206, 214, 228, 297, 348
 機耕化 / 316, 323-326, 340, 345
 盧溝橋事變 / 130
 穆拉杰里 (Вано Мурадели) / 125, 139, 146
 蕭洛霍夫 / 52, 297
 蕭澗秋 / 210, 250
 諾索夫 (Георгий Носов) / 138
 諾維科夫 (Александр Новиков) / 138, 183
 閻肅 / 154
 閻錫山 / 67
 鮑捷爾科夫 (Сергей Поделков) / 163
 鮑羅廷 (Михайл М. Бородин) / 31-32
 龍飛 / 154
- 十七畫
- 戴伯韜 / 89-90, 119, 121
 爵士樂 / 129, 170
 聯共黨史 / 《聯共(布)黨史》 / 32, 60, 173, 181, 183, 347
 臨時政府 / 180
 謝苗諾娃 (Пелагея Семенова) / 163
 韓丁 (William Hinton) / 309-310
 韓戰 / 61, 64-65, 69, 74, 102, 104, 112-113, 122, 137, 161, 178, 187, 194, 206, 310, 317, 340, 355, 358
- 十八畫
-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

題〉 / 204, 206, 208, 294

《蘇聯現代史》 / 93

瞿希賢 / 137, 144, 148, 165, 167

瞿秋白 / 32, 99, 133, 223, 227

聶耳 / 127

鎮反 / 2, 174, 187-188, 191, 193, 206,
219

十九畫

壞分子 / 174, 195, 205-206, 212-213,
276

羅申 (Николай В. Роцин) / 285

羅伯遜 (Paul Robeson) / 101

羅家倫 / 20-21

二十畫

蘇共二十大 / 8, 39, 105-106, 209, 266,
348

黨化教育 / 90, 95, 359

黨性 / 黨的觀念 / 組織觀念 / 4, 21, 26,
28-30, 53, 57, 228-229, 357

黨紀 / 黨的紀律 / 23-26, 28

黨國體制 / 360-361

黨組 / 35-36, 95, 212, 276, 287, 294,
297

二十一畫

鐵托 / 98

鐵姑娘 / 321-323, 327, 336-337, 340-
341

歌 曲

〈7月26日頌歌〉 / 143

〈丁香花開〉 / 130

〈九九豔陽天〉 / 165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 127, 158

〈土地革命成功了〉 / 127

〈大海航行靠舵手〉 / 125, 145, 158,
167

〈小路〉 / 163-164

〈山楂樹〉 / 160, 166

〈中阿友好歌〉 / 142

〈中國—拉丁美洲人民友好歌〉 / 142

〈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歌〉 / 137, 141

〈中蘇友好歌〉 / 140

〈中蘇友誼歌〉 / 167

〈中蘇兄弟心一條〉 / 142

〈友誼之路〉 / 140

〈太陽出來照四方〉 / 165

〈太陽落山〉 / 139, 159

〈北京—平壤〉 / 140

〈北京—莫斯科列車〉 / 140, 167

〈民族獨立行動之歌〉 / 143

〈丟戒指〉 / 153-154

〈全世界人民心一條〉 / 137-138, 141,
144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 144, 146,
158, 167

〈共青團員之歌〉 / 168

〈印中友好歌〉 / 142

〈有誰知道他〉 / 160

〈西波涅〉 / 155-156

- 〈在遼闊的烏克蘭草原上〉 / 60
〈告訴我，祖國來的風〉 / 147, 162
〈快樂的人們〉 / 132, 138
〈我的祖國〉 / 161
〈我們走在大路上〉 / 145
〈我們舉杯〉 / 139, 159
〈我愛祖國的藍天〉 / 154, 163
〈我親愛的好姑娘〉 / 130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 136
〈孤獨的手風琴〉 / 160
〈幸福不會從天降〉 / 165
〈拂曉的燈光〉 / 148
〈東方紅〉 / 136, 145, 158, 166-167
〈東京—北京〉 / 143
〈社會主義好〉 / 144-145, 152-153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 157
〈青年友誼圓舞曲〉 / 154, 163
〈俄羅斯〉 / 138
〈哈瓦那的孩子〉 / 143
〈春天裡的花園花兒多美麗〉 / 160, 166
〈相逢在北京〉 / 155
〈紅莓花兒開〉 / 130, 160, 166
〈要古巴，不要美國佬〉 / 143
〈夏天的田野〉 / 160, 166
〈海港之夜〉 / 130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 146
〈祖國進行曲〉 / 130, 132, 134, 138, 161
〈神聖的戰爭〉 / 132
〈祝酒歌〉 / 13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 141
〈馬兒啊！你慢慢走〉 / 157
〈假如明天帶來了戰爭〉 / 133, 134
〈唱支山歌給黨聽〉 / 145
〈國際歌〉 / 137, 143, 146, 157-158
〈莫斯科—北京〉 / 139, 159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 160
〈喀秋莎〉 / 130-132, 134, 138, 163
〈斯大林之歌〉 / 139
〈斯大林頌〉 / 139, 159
〈黃河大合唱〉 / 127
〈黑姑娘〉 / 130
〈愛老撾〉 / 143
〈萬歲！親愛的鋼〉 / 140
〈萬歲，阿爾及利亞〉 / 143
〈義勇軍進行曲〉 / 127
〈解放伊利安〉 / 142
〈解放西伊里安〉 / 143
〈歌唱中國共產黨〉 / 144
〈歌唱毛主席共產黨〉 / 154
〈歌唱毛澤東〉 / 141
〈歌唱祖國〉 / 137, 141
〈漆黑的夜〉 / 130, 164
〈漁光曲〉 / 151-152, 157
〈漁家女〉 / 151-152
〈瑪麗諾之歌〉 / 160
〈遙遠的地方〉 / 138, 162
〈窯洞裡〉 / 130
〈蝴蝶泉邊〉 / 165
〈德聶伯爾河掀起怒濤〉 / 60
〈蝶戀花·答李淑一〉 / 145
〈寶貝〉 / 155-157
〈蘇軍之歌〉 / 139
〈黨是我們的舵手〉 / 125, 145-146

電 影

- 《306號案件》 / 201
 《一個人的遭遇》 / 208
 《人民的巨掌》 / 189-193
 《上甘嶺》 / 161
 《上海姑娘》 / 240
 《千萬不要忘記》 / 215
 《士兵之歌》 / 208
 《大風浪裡的小故事》 / 205
 《小船長》 / 179
 《山中防哨》 / 184, 194
 《不能忘記這件事》 / 196, 199-200
 《五朵金花》 / 164, 247-248, 253
 《天羅地網》 / 202
 《夫婦進行曲》 / 212
 《火紅的年代》 / 255
 《北國江南》 / 210-211, 214-215
 《只不過是愛情》 / 232
 《生路》 / 178
 《白毛女》 / 190-191, 252, 254
 《光明之路》 / 250, 345
 《共產黨員》 / 244-246
 《冰山上的來客》 / 207, 220
 《列寧出殯記》 / 177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 178
 《列寧在十月》 / 178, 180, 253
 《地道戰》 / 165
 《她在保衛祖國》 / 《巾幗英雄》 / 311, 313
 《早春二月》 / 210, 250, 253
 《我們夫婦之間》 / 212
 《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 164, 246-247, 250, 253
 《杜鵑山》 / 254
 《沙家濱》 / 254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 / 180
 《兩畝地》 / 353
 《夜鶯曲》 / 178
 《幸福》 / 240
 《拖拉機手》 / 232-234, 311
 《易北河會師》 / 《易北河兩岸》 / 184
 《花好月圓》 / 240-242
 《虎穴追蹤》 / 202
 《阿詩瑪》 / 252-253
 《青年近衛軍》 / 41, 48, 54, 75, 179
 《青年城》 / 《共青城》 / 191
 《青春之歌》 / 54, 248-249, 253, 256
 《青春的腳步》 / 240
 《保爾·柯察金》 / 61-62
 《前哨》 / 206
 《南海的早晨》 / 207, 215, 249
 《柳堡的故事》 / 165, 242, 244-245, 252-253
 《流浪者》 / 353
 《紅色娘子軍》 / 252
 《紅燈記》 / 254
 《思想問題》 / 191
 《英雄虎膽》 / 206-207, 354
 《夏伯陽》 / 41, 178
 《庫班河上的哥薩克人》 / 《幸福的生
活》 / 234-236, 311
 《海底擒謀》 / 201

- 《海港》 / 254
《海濱激戰》 / 202
《秘密使節》 / 184
《秘密圖紙》 / 207
《馬戲團》 / 130
《偉大的公民》 / 183, 196
《區委書記》 / 196
《國慶十點鐘》 / 203, 240
《教師》 / 236-239
《斬斷魔爪》 / 196, 198-199
《梁山伯與祝英台》 / 240
《第四十一》 / 208, 218, 220, 241, 354
《陰謀》 / 184, 193
《最高的獎賞》 / 181, 196
《尋愛記》 / 240
《普通一兵》 / 《馬特洛索夫》 / 179
《晴朗的天空》 / 208
《智取虎威山》 / 254
《無名島》 / 206
《無形的戰線》 / 188-189, 191-193,
202
《真正的人》 / 《無腳飛將軍》 /
《鋼鐵意志》 / 179
《雁南飛》 / 208
《媽媽要我嫁》 / 240-241
《跟蹤追擊》 / 207
《預備隊員》 / 180
《奪印》 / 214-215
《槐樹莊》 / 213, 215
《銀灰色的粉末》 / 184
《箭杆河邊》 / 214-215
《鋤奸記》 / 196-197
《魯勉柴夫案件》 / 200-201
《戰艦波將金號》 / 178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 61, 250
《霓虹燈下的哨兵》 / 217, 252
《龍江頌》 / 254
《關連長》 / 212
《寶石花》 / 178
《蘆笙戀歌》 / 240-241, 248
《黨證》 / 181, 192-194, 196, 198, 200,
220
《護士日記》 / 240
《鐵流》 / 41
《鐵道衛士》 / 20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00)

形塑「新人」：
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

著 者／余敏玲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話：(02) 2782-2916 · 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 2789-8208

傳真：(02) 2789-8204

排版印刷／達雯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昆明街 235 號 6 樓之 3

電話：(02) 2388-0676

初 版／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定 價／新臺幣 4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04-4534-3 GPN 1010400375